

果

錄

蘇俄婦女

霍爾著 蒲耀瓊譯

E. W. Halle 著
蒲耀瓊 譯

蘇 俄 婦 女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後

自柏拉圖經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直至馬克斯所宣示的共產主義的理想，一旦在現存的國家中實現了，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自不待言。因此，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成功以來，只要是討論到蘇俄的書籍，無論內容如何，莫不「洛陽紙貴」，暢銷無餘；而青年對之，更形瘋狂。但是人的神經總是有限度的，緊張之後，必繼以鬆懈，故蘇俄問題現時已不甚能刺激人們的精神了。再加以近數年世界風雲變幻莫測，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繼布爾雪維克主義而生，人們的注意力一部又自列寧的莫斯科轉到墨索里尼的羅馬。接着德國重整軍備，日本侵略遠東，意大利進攻非洲，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將爆發，全世界的人，終日惶惶，無暇顧及東家長西家短的理論，而只是想到當前切身的實質問題：『我們如何應付世界第二次大戰？』因此，討論蘇俄的書籍，在中國市場中，差不多有漸趨沒落之勢。

不過這本『蘇俄婦女』並不在此例之中。其故又何在呢？

(一)『蘇俄婦女』是一本內容充實的書，其收集材料之廣泛，是其他討論俄國婦女的書所不能及的。作者從古代俄國的舊式婦人一直敘述到今日的蘇俄的新女子；描寫她們如何地自求解放，在革命中如何地掙扎，革命後如何地與男子一同建設新俄。這本書不僅是一部俄國婦女解放史，而是全世界婦女的解放史，牠指示我們婦女解放的整個路線。這一本書並不是投機一時的，而是有歷史意義的——尤其是對於我們全世界的婦女。所以在任何時代，任何情形之下，這本書都是值得一讀的。

(二)中國婦女的解放，擾攘了三十年，而其結果如何呢？大部分還是在奴顏婢膝之中。一部分自命為解放的女子，又走錯了路。娜娜自玩偶家庭中走出來，因為要求自身的經濟獨立，又走到死路上去而成爲另一種玩偶——如現時的『花瓶』之類。這並不是中國女子的體力智力不如人，而是我們未認清路線。總之，全人類未得解放，女子得不到解放；全人類未享經濟、政治、法律的平等，女子絕對享不到平等。這本書雖然不能絕對說是我們中國婦女解放的指南，但至少可作一參考。這是此書值得我們——尤其是我們婦女——一讀的第二點。

(三)從這本書中，我們知道蘇俄的婦女在十數年的戰爭中——第一次大戰與內戰中——

如何地努力掙扎；她們真可謂食不求飽，居不求安，置生死於度外。她們因此獲得了現在的地位，蘇俄因此達到了現時復興的國情。我國也經了連年的內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要來臨，這正是我們中國婦女表現我們特有的美德——犧牲精神——的時候。我們不要為家庭而犧牲，為兒女而犧牲，為愛情而犧牲；我們要像這本書中所描寫的俄國婦女那樣為主義而犧牲，為謀全人類的幸福而犧牲，為國家社會而犧牲。這是此書當此風雲緊急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值得我們——尤其是我們中國婦女——細細一讀的第三點。

這本書之無色彩，無黨派的偏見，已見本書作者的原序中，恕譯者不再囉嗦。

我譯這本書動筆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尾。所以經過如此長時間者，因為我有一個家與兩個小孩子要照管；又因在北平時要抽出一部分工夫來編輯我們幾人主辦的『求實月刊』與『華北日報婦女週刊』，所以直至一九三五年的六月纔譯好一半。接着華北局勢變動，被迫離平，痛心國事，心緒惡劣，加以小兒不慣南方苦熱，接連生病，以至事與願違，到京四五月，很少動筆。直至秋末冬初，纔重行開始，至年底方告結束。

這本書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的，自然不免多所錯誤；不過經外子董霖的詳細校閱，想不至使

蘇俄婦女

讀者諸君十分失望吧？

四

譯者 一九三六年一月，於南京。

序言

對於俄國已往十五年中之種種變化事件——此種事件不但現時有其政治的與經濟的重要，並且是整個人類史的一章——試作持平之論的著作家，在西歐已不乏其人。本書看起來就近乎這種嘗試。本書不敢說是有客觀性，這種客觀性時常反損作者的深知，只有一本沒有作者的書纔有此可能。本書以下詳敘的事實，自然沒有什麼色彩或黨派的偏見，不過作者以爲心懷坦白並非就是不要信仰，從這種意義來說，也許可以視爲是主觀的。

本書所根據的信仰是：在新俄羅斯，一種按照大規模的創造的程序正在進行，也可以說是一種無數萬人的賦與人性之程序（The process of the humanization）。現在俄國正在進行的解放與已往歷史上所紀載的不同，因爲牠是依據計劃的而又是空前的大規模的。在歷史發展中，無論這個程序如何地轉變，而一件事已經達到了：婦女之賦與人性（The humanization of women）。根本改造一切人類關係的嘗試，在蘇維埃國家中以一種意想不到的規模在進行。因爲這些

人類關係中包含男女的關係，又因為在展開於蘇維埃國土之新史中，婦女在各方面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又因為婦女問題第一次被認為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並由社會之自覺的意志而進於解決，所以俄國的婦女問題就是俄國的問題——甚至我們不認為牠是一個政治的，經濟的，或純文化的問題，而是上面所指的那種意義的人類史中之一個問題。

已往關於蘇聯的書籍的作者，有的人也熟知這一點，我已經想到我這本書的第二種目的，無論我的非俄國的前輩的了解是如何地同情於俄國，而他們也不能想到這一個目的。我的計劃就是表現俄國婦女之一般的人性問題，不僅是要拿牠當現代問題之複合物(Complex)之一，並且還當牠是進行了多年而又是純俄國性質之進化之鏈的最末的環子(The last link in a chain of evolution)。我自始就看清楚了，雖然俄國史的最末一章就是人類史的一章，但是現在也只能以俄國的標準來判斷。

溫故而知新這種俗話，引用到蘇俄是更恰當些的。確是如此，在俄國有一條單純發展的路線，一種帶有特別俄國性質的單純而偉大的歷史進程，因此，在我討論蘇俄婦女地位之前，加以舊俄時代婦女史的鳥瞰，假如讀者以為太詳盡了，那我可以提出幾點，證明已往與現在的關連，並且證

明俄國婦人以一種只有歷史才能解釋而又助長革命之精神的能力，精神的準備以應付當前的任務。

我想，我可以說是熟知俄國的特徵，俄國的性質，俄國的民族，和俄國的文化，一方因為我是生長於俄國的，再加以對於俄國古代藝術之多年的研究。但絕不是俄國創造精神的古代遺跡的先入之見，引起我追溯我早已熟知的俄國民族性之現代的情形，並且從俄國藝術史上轉變我的注意力到俄國的改造新人性與新女性的天才方面去，而是因為我絕對相信我可以發現同一的創造力在進行工作。

書籍不但有牠的命運，並且還有牠的歷史。假如我要詳述這本書的歷史，簡直可以成爲一本巨著。耗費了我已往二年中之一半時間以在蘇俄各部收集材料這件事，在現時各種困難情形之下，雖然有各種機關與男女名人——我要向他們熱烈地感謝——的鼓勵與幫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此，我特別要感謝隨時隨地供給消息與幫助的莫斯科的負責對外文化關係的機關

V. O. K. S.

芬尼娜·霍爾 (Fannina Halle) 一九三二年七月於維也納

544.5948
431
(528)2

目錄

第一章 俄國古代婦女……………一

- 一 基督教以前時代……………一
- 二 基督教時代……………九

第二章 新時代的曙光……………一二八

- 一 彼得大帝與卡薩林第二時代之形式的改變……………二八
- 二 農奴與婦女之解放……………四六

第三章 俄國革命前的婦女……………六〇

- 一 在革命運動中……………六〇

二 赤色十月之前夕……………九九

第四章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與婦女解放……………一二二

一 列寧與勞工婦女……………一二二

二 「革命的女兒」……………一二九

三 廢除宗教儀式的結婚……………一四〇

第五章 新性道德法典與理論……………一四五

一 「自由戀愛」之被誤解……………一四五

二 列寧對於「一杯水的理論」之見解……………一五〇

三 一萬萬六千萬人討論新婚姻法……………一五六

四 蘇俄婚姻法……………一七〇

第六章 母性與兒童……………一八二

一 生產節制與生育過剩	一八三
二 婦嬰保護	一九三

第七章 戀愛結婚與家庭

一 昨日與今日	二一九
二 共產青年團中之情形	二二八
三 新婦女	二五二
四 新式結婚與家庭	二五九

第八章 賣淫之廢除

一 沙皇時代的賣淫	二八六
二 蘇俄制止賣淫	二九二
三 救濟院	三〇六
四 第一次從良娼妓之工人大會	三二三

五 最終的目標……………三三四

第九章 婦女的新領域……………二五六

一 婦女在國家與政治中的新領域……………三五九

二 文化生活……………三八二

三 生產事業……………四一八

四 五年計劃與婦女……………四二六

第十章 新生活……………四四九

一 新與舊……………四五二

二 生活之社會化……………四七四

三 阿爾泰金納婦女公社……………五〇〇

結論……………五二二



婦女從家庭奴役中解放出來“……不要說得天花亂墜，吾們應該到婦女那邊去，並告訴他們：吾們來替你們剝薯皮並洗滌小寶寶的痰圈……”

（錄自某蘇聯領袖關於家事社會化之演講詞）

婦女：真慈悲！放解者來了（蘇維埃諷刺畫）。

蘇俄婦女

第一章 俄國古代婦女

一 基督教以前時代

母系制度之反應

在古代的『白靈娜』(bylina)——是詠早年間流傳下來的英雄事業的史詩之一種——中，有以下的故事：土格林王(Prince Tugarin)攻基輔城(Kiev)，基輔城王夫拉提密爾(Vladimir)派人尋找世界聞名的英雄伊利阿·謨羅美茲(Ilya Muromets)。但是伊利阿不在家，只找着他青年的妻子沙薇西娜(Savishna)；她說他立刻就去。於是：



她命令侍從備良馬，

着上英雄的盔甲，

不忘帶着充滿弩箭的袋子，

也未忘帶上強弓與利劍，

飛身騎上馬鞍，

風馳電掣一般。

立刻到了基輔城，

出現於夫拉提密爾王之前。

基輔城中每個人都相信大英雄伊利阿·謨羅美茲來了。土格林王的不幸到了，他在咒罵之中逃走了，實際上伊利阿本人既不知道，也未夢想到是誰去替他攻打土格林的。

在另一個『白靈娜』中，說到英雄丟乃·伊梵諾維支 (Dunay Ivanovich) 的妻

的誇她自己，說基輔的射擊名手沒有能超過她的。當她與她丈夫對敵時，她打敗了他。



其他古代的『白靈娜』許多謳歌這樣同一勇武性質的女英雄的。在東羅馬帝國(Byzantine)之編年史家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得着許多關於在基督教以前時代的(Pre-Christian)俄國婦女英武的歷史事實，他們記載羅馬人與基輔王沙勿亞托斯拉夫(Svyatoslav)的武士激烈戰爭後，羅馬人剝死者的衣服時，發現其中有婦人的死屍，她們穿着男人的盔甲，很勇敢地隨着她們的丈夫戰爭。又記載着關於羅馬皇帝摩利西亞斯(Mauricins)及德國大主教聖·蓬尼腓斯(Sf. Boniface)的事，其中敘述斯拉夫婦人時，十分的讚美：她們的忠實是如此其偉大，所以當她們丈夫死了之後，她們有時甚至殉節。

關於這種事，由以下俄國的敘事詩中之一段，或許可以易於明白些：瓦西麗沙·尼古尼修娜(Vassissa Nikulishna)風聞夫拉提密爾王想要除去她的摯愛的丈夫而和她結婚，她不願與夫拉提密爾王結合；並且警告她的丈夫，叫他不要踏着夫拉提密爾的陷阱。但是她的丈夫責罵她是過慮；他不注意她的警告，終於被害了。夫拉提密爾來接她。但是瓦西麗沙要求先與她已死的丈夫作別。國王答應了，但是派兩位武士伴着她。於是這個婦人找着她的最親愛的丹尼拉·鄧尼西支(Danila Denisich)深深地一而再地在他面前鞠躬，忽然對伴着她的武士說：

唉，啊唉，兩位勇士啊，

請轉告夫拉提密爾王：

他不會允許我臥在荒郊，

同我的愛人丹尼拉·鄧尼西支臥在荒郊！

於是瓦西麗沙抽出了利劍，

瓦西麗沙割掉她玉白的雙峯，

瓦西麗沙以她玉白的雙峯掩上她的明眸。

兩位勇士只有揮淚憑弔。

在民間詩——敘事詩及歌謠——中及古代風俗，人情，禮儀，以及其他各方所反映的俄國古代婦女的特質，一直遺流到近世，從其中得出來的結論是：她們愛自由，有獨立的意志以選擇丈夫，並且似乎與丈夫有同等的社會地位。由俄國古代內斯托(Nestor)的編年史中，我們知道當在水

邊遊戲與宴會時，婦人根據她們預先的同意而結婚，我們又知道波羅茲克（Polotsk）王的女兒羅尼達（Rognyeda）拒絕嫁與基輔王夫拉提密爾，因為他是一個奴隸的兒子。在十六七世紀的俄國，這種事是意想不到的。

又一個史詩敘述基督教以前時代的俄國婦女，她們自己選擇丈夫而不用男子的意見；這個史詩說英雄杜白林亞·尼克提支（Dobrynya Nikitich）在荒野中遇着一個騎馬的女人，他襲擊她。但是這個女人「提着小杜白林亞的金紅色的頭髮，擲在她的深囊中，」當他們到家的時候，對他說，假如她愛他時，她就要嫁與他——這件事以後成爲事實了。

這個敘述包含女權時代的反映，女權時代，在俄國人及在斯拉夫民族延續的期間，較之其他歐洲民族爲長久。關於這個，在史學家波克羅維斯基（Pokrovsky）所作的俄國文化史中，指出了在斯拉夫人中，印度歐洲（Indo-European）的字根 Peter, Vater, père（梵語 Pitar）等等，是完全沒有的，同時他們不但熟習印度歐洲的 Maty（Mutter, mater, mère）這個字，並且還特別有字指示姊妹的兒子。而且母親的兄弟還有特別的稱呼，妻子的母親亦有特別稱呼，在俄國人中，妻子的母親是仁慈岳母。

斯拉夫人的這種及其他的特徵，在許多的學者——尤其是維納斯派（Viennese School）的文化史學者解釋得很清楚，他的理論，以為斯拉夫民族與拉丁和日耳曼民族相較，是一種特別注重母權的民族。但是這種問題是要有相當的注意，我在此不再詳述了。

無論如何，觀察一些事實總是很感興趣的。譬如，在古代斯拉夫民族中，血族的關係，不是由父親而是由母親那方來決定的。在十一世紀俄國最早的法律書上，第一條，在計算親屬時，第一先寫姊妹的兒子。在古代斯拉夫民族中，不是父親而是母親為一家的中心，在父系制度以前時代，家庭管理，耕種土地，生產工業等事，都操於母親之手，男人出外打獵，很少在家。譬如所謂女性的保護這件事，在古代的俄國法律上，其重要性遠不如日耳曼人的法律。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婦女不但在法律上是獨立，並且甚至能以戰爭來解決神裁判法。婦女的財產權的範圍很廣，所有的妻子，能夠自由處理她們的財產，而不用得丈夫的同意；反之，丈夫如不得妻子的同意，不能隨意處置她的裝奩。

俄國文化史學家夏雪哥夫（Шашков）所著的俄國婦女史說：

斯拉夫的文化，是由婦人而發生的。在婦女被棄置而為奴隸以前，尤其在俄國人中，其原始

的文化中，含蓄着如此良好的因素，以致斯拉夫的文化得與歐洲文化並駕齊驅。因此纔不致被人認爲這個民族的名字斯拉夫（Slav）與奴隸（slave）這個字有相同的意義。在某一個時候，都說斯拉夫（Slav）這個字，意思就是奴隸（slave）。

斯拉夫最初出名的統治者，都是學問淵博，志識高超的婦女：和法官，律師，秩序與和平的創造者。其中在波蘭者有凡達（Vanda），她是波蘭最初統治者的女兒，並且是克累科（Cracon）城的創始者，她的智慧與美麗是同樣的有名。在捷克人中的是安馬孫（Amazon）領袖麗布生（Libussa），她頒佈了一個憲法，其中剝奪所有男人的權利，安馬孫成了一個女性的國家。在她死之前，指着後來建立普累格（Pilsne）城的地方，說那兒將來會成一個繁華富庶之區。

在俄國歷史開始之時，有女王阿格（Ogda），她是一個歷史的人物，在她丈夫伊哥爾（Igor 945—73）暴卒之後，統治基輔城差不多有二十年，一直等到她兒子沙勿亞托斯拉夫成年之後。她統治她的兵隊像一個男性君王，攻打德瑞維林人（Drevlians）替她丈夫復仇，她用數百年後莫斯科沙皇所採的方法，將敵方的好人都殺絕了。她到全國各地去打獵，徵稅與上貢，一直到了君士

坦丁堡，傳說她在彼處受了洗禮——她是很傾向基督教的——她制定法律，建立新秩序；一言以蔽之：她在那一個世紀是一個聞名的「偉人」。在俄國人的記念中，這位「神怪的，」「聰明的」女王阿格，較之任何男性君王所留下的印象都深；她旅行用的雪車，還保留在她的故都普斯科夫（Pskov）。

無疑的，基督教以前時代的俄國婦女的地位，是由於人們對她們的自然之知識，她們的魔力，她們先知的天才，她們治病的能力，她們卓絕的使命等等的迷信而擡高的。但是女王阿格的人格多方面發展的重要原因，是在乎她寡母的地位；因此，在女王的地位以外，還享有更大的特權。在古代的俄國，依照斯拉夫民族最早的風俗，賦與寡母——尤其是有兒子的寡母——以在家庭中的絕對的威權。總之，在基督教以前時代的俄國，為母者是有極高的榮譽的，這就解釋俄國史詩中的男女英雄，都是由母親撫養大的這件事實。沒有小孩的寡婦，認為是「孤人」。在以後基督教盛行時代，這種對於母親的崇拜，轉變而為對聖母的崇拜了。俄人之尊崇聖母，是世上無與倫比的。俄國聖母像和教堂之多，也是居世界的首位。

我們又知道，這時代的其他許多國王的妻子——她們也像古代許多俄國君王一樣的是諸

曼而不是斯拉夫的後人——可以接見使臣，並且和他們談判外交。在九四五年時伊哥爾與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第七（Constantine VII）及羅曼諾斯第一（Romanos I）所訂的條約中，明白表示俄國大使中有女使臣。女王們不但有她們自己的城市，甚至她們還有軍隊，是由她們自己的經濟來供養的。其他較女王低一級的婦女，也有她們自己的采地，自己的村鎮，自己的錢財，這些都是由她們自己經營，在早年，俄國婦女有權親身至法院訴訟，或者遣派代理人；在某種情形之下，她們甚至得法律的保護，有時還享受特權。譬如任何人侵犯了一個婦女，其所受的法律裁制，比之侵犯男子的案子要重得多。有許多這種權利，一直遺留到婦女最受壓迫時的俄國歷史中。但是，大半婦女在基督教以前時代所享受的獨立與自由，已經失掉了好幾百年了。

二 基督教時代

宗教與國家下之婦女

當一千年轉變到希臘正統基督教時候，使東歐與西歐在某一個時期有了隔閡——尤其在舊俄時代——甚至在俄國人與拉丁化的斯拉夫人中亦生障礙，這個轉變在俄國人中發生了許

多的新情形，並且影響了婦女的地位。其最著者，就是基督教是從東羅馬來的，而俄國的處女地還在她的原始幼稚時代，自然狀態還未鏟除，現在忽被不自然的城市文化的巨潮氾濫進來了。牠介紹了一種宗教性質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否定生命，反對輕率與放縱的精神，牠的內在的原素及其代言者不但與俄國人的性質不同，並且是相反的，俄人對於這種精神是憎恨的。在一種青春的民族中，人們剛剛撥動了生命，還浸潤在強有力的人與自然之宇宙一元論中，還沈醉在美與生命的享樂中的時候，僧道及節慾主義都被認為是最高的理想。這種宗教的文學，是反對羅馬人的不道德與放縱的，尤其是反對他們那些上等社會的婦女，而這種文學自然地移植到俄國了，但是在原始的俄國的情形之下，是完全不適合的。這種文學的觀念，是羅馬人數世紀來自世界各國集起來的，其中充滿了東方色彩反對婦女的偏見，這一朵繁華世界的毒花，不幸移植到俄國來了！因為牠與俄國的物質與物質環境完全不同，因此發生對於婦女不良的印象，以婦女為罪惡之原素，所有唯一得救的方法就是：犧牲一切以迴避婦女。

在初期基督教的數百年間，就是所謂雙重信仰時代——即宗教的混合主義，一方信儀式宗教的觀念，一方探信民間無稽的流傳，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十八世紀——古俄婦女的地位，似乎

已經改變了一些。但是婦女仍舊是她丈夫的伴侶，夫拉提密爾·摩諾馬格斯王(Vladimir Monomach)在他所寫的教訓式的遺囑中，雖然很注意提醒男子，不要使婦女凌駕男子，但是仍舊勸人愛他們的妻子。但是在這時，基督教的法律，很清楚的劃定了家庭的關係，上層階級都反對多妻制度與強制離婚：這是父系制度發展的原因，這種父系制度是由社會與經濟的情形來決定的，以後在俄國根深蒂固地建立起來了。這種情形也可以說是婦女自由選擇丈夫的權利——至少在統治階級的婦女中——慢慢地失掉了。童年婚姻，在十二世紀時已有記載了，無疑的是因為東方風俗的流行，所以婚姻是要由父母來主張的。

婦人漸漸地屈服於家庭的意志，以後又屈服於丈夫，同時『閨闈制度』(Terem)又於此時出現。在用意與建造上，這都是一種特別的東西：牠是一種建築，俄國的貴族將他們的妻子隱藏於內，而不使與世人見面。這種制度與出家爲尼的情形相彷彿，遁入空門的事，在當時的皇族婦女中是很普遍的，因於婦女的地位一天一天地低落，以前所提到的那本夫拉提密爾·摩諾馬格斯所寫的書中，給他子女貢獻一個良好的勸戒說：『救你們的，不是僧道主義，而是良善工作。』近古的俄國編年史中，對於皇族婦女——尤其那些沒有子女的寡婦，是要強迫入尼庵的——不記載別的，只

是說她們如何棄絕紅塵，吃素，懲罰自己，或者隱入尼庵與教堂。彷彿只有這種誠虔的事務——有時也記載婚姻與生產——纔值得記載，纔值得作那些宗教的信徒者的歷史家的榜樣。這種情形，在俄國一直繼續到一二三八年韃靼來侵犯的時候；雖然平民的情形不同，但是我們無由得知他們的詳細生活。

當十五世紀，經過了二百五十年，俄國擺脫了韃靼統治之後，他們的民族又發現於莫斯科的新舞臺上，他們已有相當的變化，在文化與生理方面也吸收了亞洲蒙古的成分，到這時候，俄國婦女的屈服，已經達於極點了。的確，沙皇伊凡第三（Ivan III）的妻子索非阿·培利俄羅加斯（Sophia Paleologus），於一四七六年，在新建的莫斯科城，接見威尼斯（Venetian）的大使空塔利尼（Contarini），並且很尊敬地給與他正式覲見；但是她生而為羅馬帝國的公主，在羅馬受的教育，因此她得有特權，在沙皇朝廷中有特殊的地位。俄國最老的自由城諾夫哥羅德（Novgorod）——牠是韃靼所留下唯一的自由城，因此牠死死地保守着牠的歷史——要被莫斯科所侵略的時候，著名的寡母馬法·波沙德尼差（Marfa Possadnitsa）攝政女王誓死反抗；我們不能從這個事實得出什麼結論來。但是她的特出的智慧，她的口如懸河的辯才，她的犧牲精神，她的

勇敢堅毅的志向等，能鼓勵人民與武士們一再行動，因此最後得到諾夫哥羅德城的自由，但是像馬法·波沙德尼差也是很少有的，她是代表基督教以前的俄國婦女的精神，她是一朵愛自由的垂暮之花，俄國婦女的進展到她以後，就停止了許多年。

十六世紀之初，婦女的幽禁在俄國已經是完全的事實了。「閨闈」不但當作了尼庵，當作了抵禦外來罪惡的世界的保護者，並且已經成了不可破的堡壘，成了一個鐵的牆圍，將一切朋友與仇敵都拒之於外，成了外表具有羅馬節慾主義的土耳其閨房（Islamic harem）。

現在俄國婦女歷史上最悲慘的一章開始了。婦女普通不但認為是虛假的，不忠誠的，好詐的，諂媚的，嚙舌的，一切罪惡的原素，並且認為是不潔的，卑下的人類，這有些像東方的情形。教堂裏，在聖壇的左旁，為婦人指出來一個特定的地方；她們不許走近聖壇，她們也不能經過大門——沙皇之門——而去領受聖餐，她們只能走對着祭壇左邊的那個旁門。在婚禮中，新婦接受鐵的指環，而新郎的卻是金的。在她結婚之後，她就要帶上頭巾，一直到老死。假如她打開頭巾，甚至是偶然的，都要認為是嚴重的罪惡，認為是最不良的行爲。假如是別人打開她的頭巾，她的丈夫定要在族長法庭前控訴。當時到莫斯科去的第一個西歐人奧大利公使黑白斯丁（Herberstein）的記載上說：

婦女的生活是非常的淒慘。因為俄國認為在街上走的人沒有誠實的。於是中上階級都將他們的婦女幽禁起來，甚至外面的人無緣與她們見面或說話；家庭的管理也不託付與她們，整日只是縫織等事……很少讓她們到教堂去，更不許去拜訪朋友，老婦是例外，因為沒有人注意她們，疑惑她們。

愈是貴族的家庭，對待婦女愈是嚴厲。沙皇的公主是婦女中之最不幸者，她們葬送在『閨閣』之內，一生簡直沒有一些希望逃出這種束縛去講戀愛，據說她們終日無所事事，只是祈禱與哭泣。不僅是黑白斯丁，就是其他的人也證明了在十六世紀的俄國貴族的婦女——除掉寡母，我們知道她們是享受特權的——甚至兄弟同近親都看不見她們，外人更看不見了。但是有時也有很少的特別情形，當一家之主希望給與他的客人以最高的友誼的表示，於是『閨閣』的祕密就打開了，主人的妻子，已婚的女兒或兒媳，引來見男客人，在這種情形時，要舉行一種特別的儀式，在外人看起是很特別的。俄國旅外僑民科托希金（Kotoshikhin）於一六六六年在瑞士所寫的

「沙皇阿雷克塞·密卡宜羅維夫治下之俄國」中所描寫的儀式，與其前一世紀的情形差不多。

在一個宴會之中或者別的機會，無數的賓客聚集在一個貴族的家中，筵席開始了，主人宣布他的妻子要來見客。妻子於是來到舉行宴會的屋子，站在寬的空場——第一個屋角——同時客人都站在門邊。女主人於是以「小禮」歡迎賓客，就是鞠躬至腰部，客人以「大禮」還答，就是鞠躬至地。主人又以「大禮」歡迎他的客人，並且表示他希望客人與他的妻子接吻。但是客人要他先行與夫人接吻。主人依照客人的話而吻他的妻子。於是所有的客人一個跟一個地鞠躬至地，走到她面前，吻她，退回來時也一鞠躬至地。女主人以「小禮」答謝各位客人。並且對每個客人獻一杯酒，同時主人又一個一個的對賓客一鞠躬至地，不論是多少人都要如此，並且請他們飲酒。但是客人請主人先飲。主人命他妻子先飲，然後輪到他，他們夫婦將酒一起倒出來與每個客人飲；每個客人都要飲這個酒，鞠躬至地，當他們退還酒杯時，又鞠躬至地。

這樣地招待了客人之後，女主人一鞠躬就回到女客那兒去了。未婚的女子，不能參加這種儀式；她們是永不見生客的。

外國彼時的記述又說妻子出來款待賓客，是由於客人對主人的要求；客人吻她的雙頰而不是嘴；婦女在這種時候，穿上華麗的，宴會的衣服，在禮節進行當中，要更換好幾次的外衣；她們是要等宴會開始纔出來的，由其他地位較低的已婚或寡婦陪伴着；在她們獻一杯葡萄酒或白蘭地酒與客人時，她們先行自己飲一些。俄國文化史學家沙北令 (Sabytin) 於所著的『十六七世紀俄后之宮庭禮俗』中說：

這種風俗，除證明了關於俄國婦女幽禁的種種報告及俄國古代社會之分裂——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外，還證明了一家之主婦的已婚婦女，在家庭朋友中間是有很高的地位，與她見面的特權和受她的款待，是表明友誼的最高點。我們在這種風俗中，又得知尊敬婦女的俄國普遍的特有的禮節，因為鞠躬至地，是對於個人表示恭敬的，最老的，最尊貴的方式。

最後的話，告訴我們一種最早——大概在基督教以前時代——的風俗，雖然婦女的地位變

更了，牠還與其他迷信的風俗一樣地遺留於基督教時代。

大概在十六世紀的中葉，當可怖的沙皇伊凡（Ivan）——從文化上與政治上，在某種意義上他可以說是他那一時代的最後的人物——時代，由他的近臣，起草了『家庭儀式』（Dobrostroy）；那是主教西爾未斯忒（Sylvester）所手創的禮節及道德的法典，牠是將以往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學識概括起來的。在這個『家庭儀式』中，在某方面可稱之為『修道儀式』，因為牠禁止一切世俗的事，尤其關於肉慾一方面的事，而又日以繼夜地禱告——在這個儀式中，婦女已經退化成一物品，成為家長的所有物，男子只是發施命令，而女子則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服從的。

……假如一個妻子不服從，或者不注意她丈夫……告訴她的話……就應該按着她犯罪的程度，拿鞭子打她；但是不要當着人打，應該在無人時候……不要直打着臉或者耳朵，注意以拳打她胸部的時候……不要用木頭或鐵的棍子。因為一個人因為怒而採取這種行動時，是有極不幸的結果的；譬如她變聾了，或者失了明，或者在她手腳的什麼地方的骨頭折了，或是別的

地方出了毛病……拿穩鞭子，注意選擇打的地方：鞭打是很痛的，並且有效，是勸善的而又有益於康健……。

……但是假如她的罪是很嚴重的，事情就不是這樣簡單了，她的反抗如出乎範圍之外，則剝去她的襯衣，捉住她的手，給她一頓好打——自己卻要斯斯文文的，以免生氣……。

……一個婦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關於何種事，都要與她丈夫商議……假如她要接受別人的招請，或請別人來拜訪她，她都要得她丈夫的允許纔行……除了刺繡與家務事以外，不許同她的客人談別的話……只談良妻應該如何的生活以及如何指導家事，如何的訓戒孩子和僕人，如何的服從丈夫及與他商量任何事……假如她不懂得教化的事，她就應該很斯文的當心她的言辭……一個人同這種好的婦女纔能消遣時光：不是為吃與喝，而是為得好的交談……。

教育兒童也用同樣的方法；很小的獨立行動，都以殘酷暴行來毫不容情的壓制，無論大小事，一個唯一的理想就是尊敬那專制的父親，他是一族中最年長的，是族長，所有一族的人都奴婢

似的服從於他。關於這一點，沙北令說

俄國的奴隸制度並非完全的奴隸制度。其實是一種幼稚的情形……如果在事實上有一種卑下的形式附於這個幼稚的情形之上者，那就是對於家族的簡單的原始的觀念，過分的尊視父權及其他威權……。

假如我們承認這是道德的力量，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前就活動於我們社會中的，則我們可以自動地回答，『在這種社會中婦女的地位如何』這個問題。因為人民甚至連人格的價值這種觀念都沒有，婦女自由這種觀念如何能發生呢？因為這種原因，大半的婦女都被認為是低一等的，好像小孩一樣的要隨時在指教之下……。

婦女幽禁在『閨闈』中，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與文化的活動，消磨一部分的光陰於刺繡之中，在貴重的錦緞上——所謂『針畫』——繡上物件並鑲上珍寶與金貨，大半為供神所用，其技巧之高，有時甚至可和畫的聖像相比較；但是大半的時光還是消磨於飲宴之中，她們也不失掉機

會以享受肉體的快樂，因為這種舒適的，飽暖的生活的結果，她們都很肥胖，我們又證明了那時的男人喜歡胖女人，在當時及以後，俄國一般人理想的美是強壯的，肥滿的婦人，常常是「白的，」或者「皮膚好的，」關於她們有這樣的說法：「假如上帝善意賜與她們以強健，美麗自然就會臨到。」

十七世紀的一個德國旅行家阿丹·俄雷利烏斯 (Adam Olearius) 描寫俄國婦女的外形如下：「婦女們都是中等身材，結構都很好，有秀美的外形和四肢，但是在城市中，她們都是塗脂抹粉的，其化裝術如此不精而刺目，以致看起來就好像別人揉了一把麵粉在她們的臉上，用刷子將雙頰刷得很紅……。」

他又說：「好像貴族與富商的小孩一樣，只有一點家務事，甚至沒有，她們結婚後，一些也不注意牠，只是終日坐在那兒，以金銀線刺繡美麗的綢手巾……。」

至於俄國的男人，像俄雷利烏斯所說，他們是：

照例是大的，肥的，強壯的人……都願有長鬚鬚與大肚子，凡是如此的人，在人羣中總是受

尊敬的……他們拿沐浴當爲十分重要的事。因此，在城市中或鄉村中，有許多公共的或私人的澡堂，他們時常在其中洗澡……。

因爲婦女公開的擦粉，因此，按照習俗新郎在婚期將近時，在其他的禮物中，又要送一個化妝盆子。

雖然彼此交換禮物，但在婚禮之前，新婦新郎彼此不見面的。雙方的父母訂這個「買賣」契約；視新娘爲禮物，但是她必須是白璧無瑕的處女，否則她要受很大的屈服與侮辱。俄雷利烏斯又說：

因爲新郎在以前並未見過新娘，一直等他在結婚的廳堂中纔見面，有時他是受欺騙了，不是得了一個可愛的新娘，而是一個畸形或有病的女人，或者不是所訂新婦的本身，而是替她的朋友，甚至是一個婢女；在上等階級中這種事是很多的，她們過一種貓犬生活是無足爲奇的，鞭打妻子在俄國人中更是普遍的事。

與妻子比較，丈夫自然是完全自由的，甚至在結婚後他還可以尋求不正當的愛，除此之外，在婚禮中，新娘的父親還要給他一條「新鞭子」以象徵威權；這個鞭子稱爲 *Пурка*（即蠢物），僅僅是爲他妻子而用的，時常掛在新牀之上。

妻子有輕微的過失，都要以這個 *Пурка* 來懲罰，這樣認爲纔能達到最高道德的目的，稱之爲「教訓妻子。」假如男人不這樣教訓他的妻子，就要說：「他們不治理家庭，也不注意他們的靈魂，將來——這世和來世——不會得好結果的，他們的家庭終於要破敗。」

婦女習於這種待遇之後，她們腦中想不到還有別的情形，以爲她們生來就是爲鞭打的。在黑|白|斯|丁|及|其|他|的|西|歐|旅|行|家|所|記|俄|國|各|式|各|種|的|婦|女|的|趣|話|中|，|說|一|個|俄|國|婦|人|嫁|了|一|個|德|國|人|或|意|大|利|人|，|因|爲|丈|夫|不|打|她|，|反|倒|問|他|因|爲|什|麼|不|表|示|愛|她|的|舉|動|，|一|直|擾|得|她|丈|夫|性|子|起|來|了|，|給|了|她|一|頓|痛|打|——未|注|意|前|面|所|提|的|「|家|庭|儀|式|」|中|所|指|示|的|打|人|方|法|——於|是|她|就|因|此|而|死|了|。

俄雷利烏斯不同意這個敘述，他說：

一個俄國婦女以爲她丈夫打她愈凶，愈是表示他愛她的心，否則就是不愛她，許多歷史學家都如此說，在俄國編年史 *Petrei Petrus* 中及黑白斯丁的記載中都有……我沒有這種經驗，我也不能想像這種事……。

但是俄國的諺語——大概十五六世紀，當時在德國仍舊有一句話，說一個婦女，一個驢，和胡桃樹，生來就是爲挨打的，這個諺語證明了幾百年來婦女的地位——以他簡潔的辭句，表現婦女同樣淒慘的情形：「丈夫不打妻子，即表示他不愛妻子。」「我們愛的人我們要折磨他。」「我愛她如同我自己的靈魂，我搖她如同一株梨樹。」「打你的妻子，可以改良你的菜食。」「孤獨是不幸，與婦人在一起——雙倍的不幸。」「一隻母雞不是一隻鳥，一個婦人不是一個人。」「婦人是一個煮湯罐，打她，她不會破。」「打你的皮衣，牠可以變得更暖和些，打一個婦人，她能變得更聰明些。」「婦人是煮湯罐，放在裏面的東西都可以沸。」「你一生有兩次打你的妻子，就是表示你愛她：一次是在她入門時，一次是在你驅她出門時。」還有其他同樣性質的諺語。

按照俄國的舊習，一家之主的責任是爲所有的家中人「準備」奴僕與子女一樣，這就是說他負責青年男女的婚嫁。地主們保留了這個風俗，直到農奴制度廢除的時候；在哥薩克人中，是「阿塔門」(Ataman)的責任將新娘交與新郎，以執行父親的職務，貴族們——大公爵同沙皇——亦如此。

在古代俄國，自己選擇新婦的權利只有皇帝有，他就像羅馬的皇帝及中亞細亞的國王，在全國的女子中選擇他的新婦。下一個特別聖諭與所有的「博雅斯」(Boyar)與地主，及所有莫斯科及外省的「博雅斯」的親近人，命令當地官員選擇處女以爲沙皇的新婦，凡有處女的人，必需「不許猶豫一時」地立刻送她至附近的城鎮，在此檢查以後——如沙北令所設想，依照東羅馬帝國的例子，必定有一個標準的身量——然後送至莫斯科。如此，有時不下二千的各階級的女子聚集在莫斯科，沙皇的新婦即由此中精選；有時選着一個平民的女兒。

幾百年來，在教堂中結婚認爲是上層階級的特權。甚至到十八世紀，在雙重信仰還存在時，平民結婚一概沒有宗教的儀式，反對當時猶流行於西比利亞的重婚制的鬭爭，亦在此時；他們結婚「不要主教」非教徒的習俗，只圍繞在「綠柳的週遭」而行結婚禮。

在中古的俄國，並不像西歐，既沒有『處女結』之存在，又沒有審判巫女及火焚之事。但是在十八世紀，婦女因行使魔術而被幽禁於尼庵中，或者處以死刑是有的。最後公開行刑一個貧農女巫安娜·馬利阿·斯維基門 (Anna Maria Schwegemann)，是於一七二五年在德國，最後公開焚燒女巫是於一八〇七年在西班牙。但是替代『處女結』的有『閨闈』在『閨闈』之中，妬忌的丈夫可以隨時偵查，一方所有的婦人——尼姑，算命者，香客，及販夫走卒——都由女僕的媒介而進來了。在他們之中，有一種特別的婦人，她們的職業是以種種巧技，為不相識的青年男女拉攏。

據那時的旅俄外僑所說，俄國的婦女不是難於接近的，甚至是素不相識的人都可得見她們——雖然不屬於正統教的基督徒，是要被認為非基督徒，而以一种恐怖心來看待。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婦女中，產生出一種特別道德的法律：假如婦女與一個不識的男子犯奸淫罪，這是可免的，因為她將來生的小孩是可受洗禮的；反之假如一個男人與一個不識的婦人犯罪，這孩子是不能受洗禮的，因為這要增加『不能受洗禮者』之數目，所以罪是更大。

但是男人並不屈服於這種理論，對於他們妻子的任何不忠誠，以最殘忍的方法來對待。有時

妻子以祕密的毀謗來爲她們自己報仇——無論其來源如何——人們都相信的。有時甚至婦人謀害了她們的丈夫。謀殺丈夫的妻子，是要以非人道的殘酷法律來懲罰，活埋，非刑拷打至死。但是丈夫爲妬忌或不正行爲的制裁而殺害了妻子時，就沒有法律來裁判他。

自中歐封建國家來到俄國的外邦人，雖然他們是很浪漫的，並且很能適於那種蠻橫粗暴，也不禁被一般俄國人的野蠻態度，口頭的發誓與咒罵，尤其是被各階級的淫佚放縱所震駭。俄雷利烏斯寫道：

他們都是飽暖思淫慾的，你可以看見他們終日各處游蕩。尤其是酗酒，在這一方面，他們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利害。……酗酒之罪，普遍於各階級中，教徒與非教徒，上等與下等階級，男人與女人，青年與老人，假如你時常看見他們臥在大街上，或者輾轉於泥水中，你都不會注意的，因爲這是每天所要發生的事……。

在十五六世紀，情形還是一樣的，甚至到十七世紀，在男女所聚居的宗教的家庭中，也是如此：

在各方面，粗暴的放縱和酗酒都流行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起了一種反應，一種本國的新的制慾主義的潮流發生了，進而至於絕端的反對性與結婚，發展成爲巨大的宗派運動，俄國自根本上發生了搖動；這個運動產生了一些著名的婦女領袖。其中最著名的是莫羅梭娃夫人 (Lady Morozova)，她是一個慈善的貴族寡婦，與皇家有關係的。她是原始教主阿瓦乾 (Avvakum) 的熱烈信徒，阿瓦乾是領導拉斯可爾宗派 (Raskolnism) ——即古俄時代凋謝的宗教教義——的誓死鬪爭，以反抗尼空 (Nikon) 長老——他是俄國新時代的宗教改良家，沙皇都是他的信徒。這位熱烈的莫羅梭娃夫人，誓死要維持已將近於化石而幾乎不可認識的東羅馬帝國教規，終於被監禁而受非刑，成了一個理想——雖然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理想——的殉難者及女英雄。她就好像基督教以前時代的妻子隨着丈夫戰死在沙場一樣——甚至引起敵人的敬慕——又像二百年後在革命運動中，俄國婦女反對沙皇專制那樣英雄地死去。

新時代的曙光已經來臨。

第二章 新時代的曙光

一 彼得大帝與卡薩林第二時代之形式的改變

正如俄國最早期的歷史是由一個婦人——基輔女王阿格(Olga)——揭開的一樣，這第一章莫斯科維特(Muscovite)的羅馬帝國觀念達於頂點的，並且各方都勝利而最終內部崩潰的俄國史，也是由一個婦人來結束牠。但她不是一個寡母，而是沙皇的女兒彼得大帝的姐姐索非阿(Sofya)，她是一個有野心的陰謀婦人，因為是在『閹閹』中長成的，所以那時流行於彼處的虛假風氣她都具備得有。她在任何事上都是十分放縱，但是自外表上看來，她彷彿是一個贊成茹素，祈禱，制慾主義，和專務誠虔事業的婦人。因為她的兄弟彼得太年青了，不能執掌政權，她因此不入尼庵而登皇基，她一往直前，模仿羅馬帝國的先輩，她是他們間接的後襲，並且是最後一個。

閹閹制度存在了四百年，現在得此機會慶祝牠遲緩的成功，但只是曇花一現。年青的沙皇彼

得，被他姐姐篡奪了皇位，成年之後，於一六八九年，以堅決的手腕將政權奪過來，將女皇索非阿和「閹閹」以及與此有關的事，一齊掃除了。

彼得大帝，於婦女方面亦如其他的事，是一個偉大的改良家，在一七〇四年的聖諭中，他將婦女自奴隸中解放出來。禁止父母與近親強迫女子結婚。訂婚儀式在結婚之前六個星期中舉行，訂婚之後，男女雙方可以自由晤會。在這個時期中，雙方如有不如意處，可以解除婚約。父母與保護人必需宣誓證明他們的子女並非受強迫而結婚的，地主於他們的農奴也要作同樣的宣誓。這道聖諭，至少在理論方面廢棄了強迫婚姻；但是只影響了中上階級，於普通婦女毫無關係；在農奴制度一天存在時，她們就一天屈服於地主的專制意志之下，就好像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的婦女屈服於她們的丈夫一樣。我們在許多悲哀的民歌與詩中就能證明這個事實，這些詩歌是哀悼那些委身於她們所不愛的人的婦女之命運的。

但是，一個新時代，於彼得大帝時放了曙光：俄國歷史與俄國婦女歷史是轉到一張新頁上了。俄國因為地理上的關係介於歐亞之間，歷來是偏向於東方；現在轉過來向着「遠眺歐洲的窗戶」了，而這個巨大的組織物，現在蠢動了，終於忽然分裂成兩個相等的部分。

那些在國外的旅行者，回來見着婦女這樣的堅毅，自由，並且意識到她們自己的力量及對社會之審美的和道德的價值，不勝驚異。在他們所見的及所經驗的敘述中，都充滿了驚異。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對於婦女如此的和善，如此的受了良好教育，如此的可愛和自由，也大大地驚奇這個「特異的神跡」：「她們甚至對政治也感覺興趣，並且時常赴公共的宴會，這是認為榮幸並且允許參加的事……」（見柏加斯基（Perkaskyi）著的：『彼得第一時代之教育與文學』）。

「宴會」早就風行於一八〇三年所建的沙皇新都會聖彼得堡了——彷彿像凡爾賽的夜會，是「在某家中的自由集合。」閨闈的門，忽然大大的打開了。婦女在從前只知道自己本國的服裝，現在穿上鯨魚骨和歐洲摩登的服裝，同她們的丈夫一起赴宴，男人除非他們已經自動除去長鬍子與長衣外，都強迫地去掉了。在這種宴會中，在光可鑒人的地板上，跳歐洲新式的舞蹈，由瑞士與法國逃出國境的政治犯，予以很優秀的指導。但是這個新奇時髦的社會，其內容還是近於中世紀，近於莫斯科城黑暗之一角。因此，雖然在以後的時期，外國人還是抱怨說在這種夜會中，男人還是當着婦女抽煙，婦女裝飾得很死板，與男子離得遠遠地，你看我，我看你，漂亮的紳士時常喝得爛醉如泥，由他們的同樣醉了的僕人扶着回家。沙皇彼得自己也下命令，規定凡是冒犯所謂良好禮

節的人，都要罰他自「大鷹的酒杯」中飲酒，這的確不是無關重要的事。化裝跳舞會也有了，有許多化裝的紳士與貴婦在其中；愚人節也有；由君王與主教領導的許多大議會，被一些爛醉的大臣所包圍，這等事是數見不鮮的。

自外表上看起來，歐洲的習俗，一天一天的風行了，而自內容觀察，一時並沒大多變化，但是歷來只認爲是「惡極的動物，是魔鬼的後襲，是迷人者」的婦人，在西歐影響之下，漸漸地發展——實際只是在上層階級中——到「自然的動物中之最可驚奇的」東西了，詩人羅莫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歌頌她們說：「啊，俄國的女英雄！」

自彼得大帝的寡妻卡薩林第一（Catherine I）——一個小的不出衆的婦人——登基以來，十八世紀俄國婦女登基的時代就此開始了，一位意大利歷史學家描寫這個時代是永續的「快樂家庭中的悲劇。」在卡薩林第二的統治下，法國勢力對於俄國上層階級是很顯著的；她原是一個德國公主，與佛爾泰（Voltaire），格利姆（Grimm）提德羅（Diderot）及其他的哲學百科辭典學家很接近；她將雕刻家法空萊（Falconet）召至聖彼得堡，她自己寫戲劇，寫諷刺詩，寫神話小說，及筆記等。整個朝廷過着這種放蕩的生活，就與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一樣，所不同者，在路易

時是法國貴婦享受優遇，在此則男性成了寵人，其中最著者爲波得門金(Polyomkin)親王，她是女王卡薩林第二的「蓬巴杜爾」(Pompadour)。於是，俄國上等階級婦女的活力的本能，經過莫斯科的閹割制度長時間的壓迫，現在於女皇庇護之下，開始在熱烈的放蕩中找發洩之路——或許可以說是燦爛優美，但已經是出乎一切範圍之外了。這些婦女，與卡薩林自己一樣，也寫些談話的有含意的戲劇，並表現一些文化與知識的興趣，然而，一個俄國文化史學家說她們代表「一代有很高道德性質的青年女子，而在她們長成之後，都變成娼妓了。」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不但自愚昧及麻木不仁中覺悟過來的婦女，就是男人中的知識份子，都反對這種自卡薩林第二時代就有的只爲男人生存的俄國青年婦女。

因爲要進一步克服數百年來的偏見，並且給與人民以一種新教育，卡薩林又改良教育制度。但是只實行了一半，因爲在俄國根本缺少教育家。然而在幾個大城市中也開辦了些學校，在斯莫尼(Smolny)的女教堂中，後來有了一個專爲貴族的女兒所設的學校，其中有四百八十個女孩子在法國女教師指導之下，學習外國語與美術。

一七八三年，聖彼得堡建立了一個學院，做照法國的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以

後，牠又附設於研究學院 (Academy of Learning)，其職務是去「創立綴字的規律與文法，並提倡研究俄國歷史。」除了一些上等階級的婦女以外，所有那時的文人——包含笛夏文 (Dyer-shavin) 和方維新 (Fonvisin)——都加入這個學院共同工作。達西科娃 (Dashkova) 公主是院長，因此，婦女得着了一種在新時代的俄國纔能得着的地位，在沙皇時代的俄國是絕對不能的。卡薩林娜·達西科娃 是一個特出的婦人；她自幼對於政治就很有興趣，十八歲時，她鼓勵並且參加一七六二年的政變，在這次政變中，柔弱無能的彼得第三被廢，卡薩林第二 登基。她與女皇一樣的與那時歐洲的名人都有書信往還；在她旅行歐洲的時候，與佛爾泰 和提得羅 都會見過，他們兩個人說到她都是很興奮的，亞歷山大赫曾 (Alexander Herzen) 說她是「俄國女性的偉人，在她身上流露出一種燦爛的，不可比擬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彼得從莫斯科的死寂中解放出來的。」但是，達西科娃 公主在她那一個時代的社會中是孤立無援的，因此，在卡薩林 死後，俄國皇位又復搖動，她被充軍到一個荒涼的村中去，後來纔由她朋友將她救出來。

與彼得大帝的改良一樣，卡薩林 第二時代的「開明的專制主義」雖然有許多西方文化的影響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也只是影響了當時俄國社會的表面，並未深入。平民是完全未受影響。還

有更甚於此者：歷來有相當自由活動的農民，現在也進到奴隸的狀態的程序之中了——這種程序是起始於十六世紀之末，當彼得大帝之時，成爲農奴制度了——這個過程是在卡薩林第二時代完成的。農奴的身心都完全交與地主。獨立的人格之最後的遺跡都消滅了。農民不幸的家庭生活，又漸漸的屈服於貴族的專橫勢力之下。人民的結婚，並不徵求他們自己的同意。『初夜權』(Jus primae noctis)也漸次成立了，有時地主甚至將他們糟踏過的女子，脫得一絲不掛，再放狗來蹂躪她們……因此，無論如何可羞恥的侵犯與待遇，這些農奴的婦女沒有不屈服的。俄國婦女歷來受的一切男子的野蠻行爲和專制——時常由於過度的飲酒——現在都集中在這些可憐蟲的身上了。

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農奴不與土地一同出賣的事是常有的。這時也常見一種如下的廣告：『出賣：女僕人，年三十，小黃牡馬一匹。至政府大臣家中看貨。』但也不是沒有例外，假如農奴們因爲特出的天才，忠實可靠，或者別的原因，也有被他們的主人解放，或者視作家人之一分子；有時因爲他們永垂不朽的事業而被解放。在俄國文學上就有這樣一件事：詩人浦什金(Pushkin)的保姆阿麗娜·羅地阿諾夫娜(Arina Rodionovna)對於浦什金的生活之重要，就等於歌德的母

親對歌德一樣；她有說神話故事和唱歌的天才，並有幻想與支配言語的本領，她是第一個女人將她所照管的小孩引入於俄語的精神與美麗中，浦什金詩才的發展也要歸功於她。這個詩人也終身的愛她。他有的詩是獻與他的『小的老鴿子』、『他患難中的朋友。』

言歸正傳。亞歷山大第一時代（一八〇一—二五），是起始於『耶穌救世主義的觀念，而以阿拉克徹耶夫（Arakcheyev）的答刑為結束，』在那個時代，聖彼得堡，查科夫（Chakov），卡桑（Kasan）等大學都設立了——已經成立的莫斯科大學，那時是彼得大帝之女耶利薩未達·培特羅夫娜（Yelisaвета Petrovna）公主的基礎——婦女的地位，還是繼續受制於卡薩林第二時代所定的方針。法國的小說，在那時形成所謂俄國受教育的婦女的精神之滋養品的一部，但是她們並未覺悟到她們自己的人格，法國大革命，在起初只使俄國迷惑，對於俄人的腦筋同靈魂，一直到後來，一些影響也沒有。假如我們讀托爾斯泰作的拿破崙戰爭時代的小說『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我們對於他所描寫的女人——姊妹卡拉金（Karagin），委拉·羅斯托娃（Vera Rostova），愛倫·培蘇克哈娃（Ellen Besukhava）——不勝驚奇，她們只知說法國話，她們的生存只是為丈夫同兒女，盲目地走她們的人生之道，一些也不顧週圍所發生的事。哥哥爾

(Gogol) 所描寫的貴婦也是一樣「簡單而和藹」在各方面都很和藹，「在詩人格利善耶多夫 (Griboyedoff) 寫的古典派的喜劇『降禍於智者』 (Voe to the man of Intellect) 中，所描寫的無色彩的，空虛的女性，也是一樣的。在實際生活中，只有光榮的丟羅娃 (Durova)，纔能使人回想到基督教以前時代俄國女英雄的男性的勇敢，她在與拿破崙的菩羅提諾之戰 (Battle of Borodino) 中，作一個女騎兵而受了傷，拿破崙之戰，奪去了許多婦人的丈夫，並且奪去了許多女人結婚的希望。因為要為她們的生命找一點新意義，這些可憐的女人就像失了靈魂那樣的徘徊，終於轉到各種神怪的，誠虔的教義上去，尤其是基督教。直到第二代人時，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纔使她們覺察出來，接着一種新形態的婦人出現了，一種十九世紀形態的婦人。這種婦人，證明了是一種發展過程中的鎖鍊之環，牠聯繫基督教以前時代的婦女和現代俄國的摩登婦女。

在這種婦人之中，於俄國文學中能找出一個可愛的代表，就是浦什金所描寫的美麗的，熱情的勇敢的泰蒂娜·那麗娜 (Tatyana Larina)，她是頭一個敢於對一個男人承認她自己的愛情，因此，於某種意義上，她是比男子還長得高；現在我們在實際生活中也能遇着這種婦女。

當尼科拉斯第一剛登基時，反抗分子的暴發就開始了。頭一個可以遠遠地見到的反抗的象

徵，就是一八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一羣軍官與知識份子的叛變，他們大半都受法國革命的影響，是在一八一二年的『愛國之戰』之後連合起來的，因為組織的實際原因，他們的事業，在起初就斷定要失敗的；波克羅維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稱這次的叛變為『俄國中等階級革命的最初而也是最末的嘗試。』十月黨領袖之一培斯特耳（Пестел）上校，在他行刑之前與沙皇尼科拉斯的信上說：『陛下，我因為愛我們的人民而冒犯你。我不能屬於社會，因為我自己永未希望過任何東西。我是屬於全體的人羣，我為人類的幸福，為愛人類，預備在任何時候流我最後的一滴血。』他的同志與他同一心意，其中有四人與他同時殉難。所有這個『秘密團體』的人，都發配到西比利亞去了，但是這些人並不是單身地到那個黑暗荒涼的地方去的。差不多所有充軍到原始環境的西比利亞去，在那可怕的礦中作苦工的男人們，都是由他們的妻子自動地伴着去的，有的是姊妹或母親伴着……。

這些十月黨的婦女是否與她們的丈夫的信仰相同呢？在後來所出版的記載中，尤其在佛爾孔斯卡亞（Волконская）公主的日記中，多有述敘這一點的，公主在十八歲時——她比丈夫小二十歲——犧牲了光榮的生活與財產，一些也不畏縮，表示那些十月黨婦女了解並且分擔她們

丈夫的理想與計劃，因此也爲她們丈夫的主張而努力。在佛爾孔斯卡亞被視爲「政治犯之妻」，在車中旅行六千俄里而達到她丈夫的所在地尼爾金斯克（Nizhnyj Novgorod）以前，她親筆書寫她捨棄一切的權利，以至她本人的家庭生活，將她的小孩交託與親戚帶領，因爲不許帶着牠；當她會着丈夫時，他正與其他的同志一樣，一到西比利亞就帶上腳鐐手銬。她敘述她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非常深刻動人：

……塞基耶（Serej）衝出來迎着我。她的鐵鍊的聲音使我戰慄：我不知道他是要帶腳鐐的。我一看見這些鐵鍊，是如此的震驚與感動，以致我先跪下吻他的鍊子，然後吻他……我一個星期只能見他兩次（她繼續往下寫）。在我們初被充軍時，我想大概只有五年就完了。後來我告訴我自己也許只是十年。更後——十五年。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後，我不希望什麼了……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上帝：就是他必定要讓我的小孩走出西比利亞（她在放逐中生了兩個小孩）。

亞歷山大第二加冕宣言（一八五五），恢復了他們的自由——三十年後允許他們回家。但

是同時有許多死的或被殺的，他們的人數從一百二十一減至三十一人了。

在十八世紀要找這一樣的事件是不可能的——找像玉西尼維斯卡亞 (Yushnevskaia) 方維新 (Fonvisin)，穆拉維阿娃 (Muravyova)，達維多娃 (Davydova)，拿瑞西克娜 (Naryshkina)，羅山 (Rosen)，嚴達耳茲娃 (Yentaltseva)，波耳 (Pol)，培斯達西夫 (Bestushev) 三姊妹，多爾桑 (Tarison) 的母親與姊妹——她們與那些被流放者，在冰天雪地的阿爾泰山 (Altai Mountain)，在赤塔 (Chita) 和尼爾金斯克渡過了她們一生，這些完全是十九世紀的；同她們的丈夫一樣，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暴風雨的產物，她們已經預先知道下一代中的俄國婦女要繼續努力。四十年之後，詩人奈克拉梭夫 (Nyekrasov)，對於兩個『被放逐的公主』佛爾孔斯 卡亞 (Volkonskaya) 和特盧培茲卡亞 (Trubetskaya)，在他所著的抒情詩『俄國婦女』中，建立了一個偉麗的紀念物。維拉·菲格尼爾 (Vera Figner) 在莫斯科『波里特卡脫爾桑博物館』 (Museum of Politkatorshan) (Politkatorshan 爲 Political offenders condemned to hard labor 之縮寫) 所懸掛十月黨婦女的像片作的讚詞：『精神的美，是維持長久生命的美，十九世紀中葉俄國婦女之可愛的人格，至今猶表現已往不可磨消之光榮，彼等的饑寒，損失，和所受精神

的痛苦，使彼等與後來革命婦女結爲姊妹。」

當尼科拉斯第一的沈悶時代（一八二五—五五），俄國的專制主義——如馬開斯德·叩斯丁所說『以殺戮來壓制之絕對的帝制』——達到了極峯。所有的精神的活躍都結冰了，化石了，人民幾乎不敢呼吸。但是俄國偉大的文學和新聞學都由潛伏的，燃燒的憤怒中興起，這種憤怒，以一種偉大的，帶有創造性的狂流而湧出來了：赫曾（Herzen），格蘭諾夫斯基（Granovsky），圖該尼挨夫（Turgenev），浦什金，勒蒙托夫（Lermontov），白令斯基（Belinsky），查達耶夫（Chadaev）等人的活動，利用他們的時代向前進。

對於婦女，這時是男女不平等的快樂的婚姻，和『被誤解的妻子』之古典時期：貴族風雅的女子，所謂『毛絲綸小姐』（Muslin Misses），在斯莫尼院（Smolnyi Institute）受貴族的教育，而受磨難於她們粗暴的，殘酷的，獸性的丈夫的手中。因此，文學（尤其是畢塞門斯基（Priglasny）的著作）被深刻的痛苦所刺激了，替那些在婚姻中受屈服與傷害的俄國婦女的痛苦作不平鳴，後來還有許多女性的擁護者，都因爲這種家庭的悲劇而產生了，他們——包括尼克拉梭夫（Nykrasov）——的著作中，充滿他們自己愁容滿面的母親的幻像。這就是喬治桑德

(George Sand)在那時所張的婦女解放的旗幟，在俄國所受的熱烈歡迎比在任何處都大的原因。凡在俄國文學與文化生活有價值者，都視喬治桑德爲預言家，而依從她的教訓與理想。除了拜倫(BYRON)而外，幾乎沒有一個外國作者像這個婦女解放的擁護者，對於俄國文學和俄國婦女的思想所遺的影響，是如此其強，如此其久遠的。

這粒種籽落在肥沃的土地上了。在各方面都有求知的熱望，都想從現存的不自由的限制中逃出來，這些希望，有很少數有卓絕天才的婦女——如斯塔索娃(Стефанова)她是有名的美術史學家的妹妹，里克哈秋娃(Лихачова)和其他的幾人——以勤苦攻讀來達到了目的。斯塔索娃寫道：「我年青時，既無人注意，又沒有認真的目的及任何目標，只是娛樂，」這就是表現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俄國中上階級婦女之整個生活。聖彼得堡文法學校的有勢力的監督和馬麗亞·亞利山大拉娃(М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對於這些想求學的婦女很表同情。她們開辦「馬麗亞文法學校，」於是歷來爲貴族與富人專享的教育，現在一切女子，不分等級都能享受了。試觀五十年代俄國新興的文學，及其所描寫的女性的可愛，我們找得出與以前不同的人物，假如我們加以注意，發現她們時常是一樣的：一種個性很強的婦女，實力不足以作生活的奮鬥，對

於如何逃出她的飽食自私的生活之不幸的問題，要找一個回答，並且希望去作一些不自私的，解放的事業。有了這種目的，她時常轉而求助於一種雖然是有天才的，善辯的，知識高於她的，但是意志力不如她的男子，並且這個男子不能作社會的或其他的事務：是一個『多餘的人』。這樣的婦女，與剛查羅夫（Goncharov）小說中的阿格（Olga）和阿甫羅莫夫（Ablomov）一樣，圖該尼挨夫小說中的婦人也是如此。俄國的男人很少與他們強壯的配偶相等的，這雖然不是特徵而也是奇特之點，因此許多寫實派作家，有時描寫他們的女主角的丈夫，完全是幻想的，瘋狂的叛黨，或者是國外的好事者，而不是俄國本地人（例如圖該尼挨夫的『晚上』中之布加利亞的英沙羅夫（Issarov），剛查羅夫的『阿甫羅莫夫』中之德國的斯科爾茲（Scholz））。

但是，時間已經來到了——五十年代之末——一種普遍的驚動，一種數百年的睡眠之覺醒，俄國第一次的偉大的覺醒，如狂風暴雨一般的掃過全國。所有的先進和俄國思想界的權威數十年來所希望的改良，並未落空，亞歷山大赫曾自『對岸』搖『鈴』的警聲，也未落空。克利密阿之戰（Crimean War）的失敗，完全暴露了現行政治與經濟制度之腐敗，證明了牠是如何的不適合於時代。不但社會的各階層，甚至政府，都覺得基於阻止自由經濟發展及國家生產勢力發展之

農奴制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是難於保守的；政府也開始屈服。對於新聞的檢查也漸懈怠，因此出版界對於那些緊急的問題，也能發表意見了。許多司法改革也加以討論。以後並見諸實行，對於農奴制度之廢除，也加以正式的考慮。唯理性學家，公法學家，道德家，一代的新人物產生了——微尼舍夫斯基 (Chernyshevsky)，多布羅盧普夫 (Dobrolyubov)，畢沙拉夫 (Pissarev)，彭墨羅夫斯基 (Pomyalovsky) 及其他人——他們為根本的新生命的哲學，為新的社會制度，為新的理想，而作勇敢堅決的奮鬥。文化的復活開始了，一種對文化與知識之熱烈的希求，深入人民的各階層，甚至達到內地的省分。各處的公共圖書館，讀書會，星期讀書班，及許多自求教育的團體都興起了。自由的空氣，普及了許多大學校。

斯拉瓦非耳斯 (Slavophiles) 的俄國國民性之發現——這是社會構造的基礎——將歷來被輕視的婦女的地位提高了。圖該尼挨夫，在他的文章『獵人的文件』(Papers of Sportsman) 中，除了幾個其他的人物外，他描寫了一個不幸的僕婦，她的主人將她的頭髮剪了，並且送到鄉下去，因為她膽敢與一個男人講戀愛。但是圖該尼挨夫不訴諸鬭爭與反抗，而反求援於溫和與原諒。沙提科夫——斯查德利甫 (Saltykov-Shchedrin) 反對農奴制比較強烈。他的農奴培夫耳 (Pavel)

的妻子「馬夫拉西卡的故事」(Story of Mavrushka)，是深刻動人的。她原來是自由的，嫁與她所愛的培夫耳之後，也成爲農奴。但是她的女主人還以爲她不够低聲下氣的。鬭爭開始了。但是馬夫拉西卡不屈服，並且宣告絕食。這不是棋逢對手的鬭爭，所以結果馬夫拉西卡自縊而死。

俄國劇場始創者俄斯特羅夫斯基(Ostrovskiy)，以商人階級的婦女爲題材，寫他的劇本「暴風雨」(The Tempest)。畢塞門斯基感人的著作「痛苦的命運」(The Bitter Lot)是描寫農村婦女不幸的生活，彭墨羅夫斯基，在他所作的「中下階級的快樂」(Lower Middle-Class Happiness)中，表現小官吏的生活，並且以譏諷的口氣提到「毛絲綸小姐」這句話，他在這狹小的階級中，也找出了良好性質的婦女，這個時代的婦女們，在希望「一個不同的生活」中，銷磨了一生。牧師的女兒，現在於人羣中也佔有了地位，不久以後，在俄國文學中，在多斯托耶夫斯基(Dostoyevskiy)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現了妓女。從各種黑暗的隅角中，這些「被傷害的，被侮辱的」都被置於光明之下；整個生活有了一種新的希望。

但是，專寫平民的第二代作家的先驅，是我們已經提過作「俄國婦人」(Russian Women)及「母親」的詩人尼克拉梭夫，他的詩是從農村婦女之不幸的生活中湧出來的，是廢除及改良

農奴制度之不斷的痛苦的呼聲，是現存制度之熱烈的咒詛。

他的咒詛詩之一是音律和諧的『在途中』(On The Road)。這個詩人坐着郵車去旅行，那個車夫告訴他關於他妻子的事，她是在她主人家生長大的。她不但養成貴族的態度，並且有貴族的習氣，一旦她的主人心血來潮，決定她必需要嫁給一個微賤的農夫，這個不幸之環鎖，聯繫了兩條性命。

以下是一個道地的勞苦農婦的畫像：達雅(Darya)是農人甫羅夫(Prova)的妻子。她的一生是充滿了苦工和對於兒女的擔心。但是她是一個健而美的婦人，『在她容顏上帶着能幹的，強壯的記號，』如同俄國鄉村中許多婦人一樣，『達雅的表情是嚴肅的，安靜的，她的動作是有力，她的步態與眼光，處處表示她有皇后風。』這個詩人描寫她工作時說，當她蓬鬆着頭髮，手中拿着鐮刀，『站在高的玉蜀黍中，』她時常是忍耐的，以一種心平氣和來擔當饑寒，當她舉手一揮時，割下來整束的玉蜀黍。甚至在別人埋葬她的丈夫時，她都不怠她的工作。一個婦人失掉她的丈夫，失掉她兒女的父親，失掉她工作的侶伴，是很不幸的。但是在她眼淚還未乾時。這個年青的寡婦急急的到樹林——當冬至時——去斫柴。她到達之後，在辛苦的工作時，她沈入於她與丈夫的生的回憶

中，揮辛酸的眼淚追悼他，最後墜入疲勞中差不多失掉了知覺。她夢見她沒有丈夫而作了長久的工，她疑惑她是否能獨力支持家庭與農場的工作……但是在這清晰的夢正在進行時，這個可憐的農婦已經凍死了——這就是『痛苦的命運』的象徵，是無數的達雅，是俄國農婦的命運的象徵。

二 農奴與婦女之解放

命運賜給了婦女三個可怕的定運：

第一：嫁的丈夫是奴隸，

第二：母親作了奴隸，

第三：屈服於奴隸。

每個這樣的不幸

都臨於俄國婦女之身。

——尼克拉梭夫（朱麗葉·索斯開斯（Juliet Soskice）譯）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在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的宣言中，宣布了農奴制度之廢除，於是結束了俄國歷史的貴族的階段。在俄國婦女史中，也同樣是個重要的關鍵。

幾年之前，隨着文學的討論之後而發生的，就是婦女問題之趨向實際的情形，文學是極端的擁護婦女的主張，而為婦女盡力，牠喚醒她們社會的和知識的興趣，擴張她們家庭的活動，使她們加入教育與工作的各部門——在此我們只提到幾個人名字：白令斯基，赫曾，畢沙拉夫，多布羅盧善夫，微尼舍夫斯基，米克黑羅夫（Mikhailov），和夏雲哥夫。

當克利密阿之戰時——五十年代——女子中等學校，在俄國已經有一百四十八所，學生有十六萬八千。許多愛自由的女作家發表了她們的意見，其中在五十年代之末，有馬科·沃夫查克（Marko-Vovchok）的名字出現了，她描寫農奴的痛苦，所留的影響是很大的。自一八五九年以後，婦女的特有報紙『黎明』出版了，同年秋天，聖彼得堡大學對於那些渴望研究的婦女，也實行開放：科西尼（Korsini）是頭一個婦女在法科聽講的，別的婦女也繼之而起，至一八六〇年，就有了幾十個女學生。查科夫大學也有同樣的情形。特為二百五十位女子開辦了一個三年畢業的師

範班，這些女學生都是已經畢業於文法學校或者已承認的其他學會。

婦女要求研究醫學之奮鬥也非常激烈，政府認為這是婦女運動之最高點，並且影響於俄國青年的革命運動，因此所以拒絕了。但是，一八六一年，婦女又得了勝利，拿地雪達·蘇斯羅娃（*Nyeshda Suslova*）——她是一個農家女，這是非常奇怪的——是俄國第一個婦女入聖彼得堡大學醫學院聽講的女學生。但是她和其他的兩個女學生——波克娃（*Boikova*）和科西娃羅娃·拉德尼娃（*Koshchevarova Rodnyova*）——終於不允許在那兒，於一八六三年被送到祖利克（*Zurich*），五十年代之初，在那兒的四個女子，已有兩個是研究醫學的；她們二人在此於一八六七至八年中，很成功的完成她們的學業。有許多女子，步着她們的後塵而到瑞士去，她們的努力，更引起政府當局反對婦女學醫。一八七三年之夏，在祖利克大學中的一百十位女子中，有九十六個是希望作醫生的。同年，政府下諭，命令俄國女學生回返祖國，同時恢復了公開的反動，借口這些女學生在外國過不道德的生活，並且受了社會主義觀念的影響。凡是反抗命令的，都以嗣後不許參加考試及不給與職業來威嚇。大部分的女學生——她們衝開了法德瑞士各大學之門——於是都回國了。

在她們回國之後，這些醫學生，開辦了女子醫學院，以便繼續她們的學業；一八七二年醫學院因為她們的要求而成立了。但是這個學院與其他的女子大學，只續辦了十年，在這個期間中，造就了七百五十個女醫生，以後她們作了驚人的工作。

因為女作家則布麗科娃（Tsebrikova）之助，一八七一年聖彼得堡開始辦了福勒伯爾科（Froebel Course）與幼稚園，以後又開辦了培斯圖熱夫科（Bestushew Course）這個對於俄國婦女運動有特殊的重要關係，因為牠後來發展成爲「女子大學科」（歷史哲學系和數理系），這是許多婦女的教育中心。不久在莫斯科也開辦了女子大學。全國各地的婦女，都蜂湧到新教育中心，就好像火山爆烈後的熔岩，被潛伏的勢力所驅策一樣。最後緊張情形漸漸鬆懈，又擺脫了壓迫，於是俄國婦女被解放了的精力——在行動中之自然的活力和行動之熱望——無阻礙的向前突進。拋去了一切以往傳統的觀念，每個人都蜂湧到大學裏去，每個人都渴望獨立，自由，與公共活動。甚至那些提倡這種精神的人，對於這種情形，都覺得驚異，那時的著名革命家科尼羅夫（Королю）描寫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女文學家，女學生，和女虛無黨人的外形，他說甚至在那個時候，她們的頭髮都已經剪短了，口中含着雪茄，面上架着眼鏡，在羣衆中出風頭，「有時對於接近她

們的人有很大的激怒的影響，以致使那時的人要宣布放棄舊社會制度時，都需要極大的勇敢和忠誠的信仰。」

猛烈地流入婦女生活之內的洪水，是從何處來的呢？在農奴和婦女解放之中，有何因果關係呢？

不可再緩的二千萬農奴之解放，與巨大的社會騷動同時發生：他們的強迫的勞力，已經爲他們的主人聚集了巨大的財產。塞巴斯托堡 (Sebastopol) 之敗，也是中傷『小父親』 (Little Father) 沙皇及保護他的上層構造，和政教不分的觀念之原因之一。這個革命的改變，同樣也影響了家庭，家長制同時也開始破裂。從各方面都湧起精神的，知識生活的巨浪。借喬治桑德的著作而深入俄人心中的自由觀念，現在又因從法國來的曇花一現的聖西門 (St. Simon) 主義而受了一個新刺激；這個思想的巨浪，在徹尼舍夫斯基所領導下的俄國知識界中，受了熱烈的歡迎。

自某幾方看來，那些以女子權利當着本身事的婦女解放的擁護者，較之法國烏托邦主義還要更進一步，因爲他們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和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之革命觀念的影響。在這個時代，人們都從事於研究與辯論，有力而帶有熱烈反抗的婦女運動也產生了。剛出頭的農

民與勞工，起初對於這個運動是袖手旁觀，這是自然的現象。被欺騙了而出之以暴動的農民之失望，知識階級之不滿，要求重建經濟社會生活根基之澎漲了的資本主義——這一切都是社會崩潰的根源。

被俄國社會騷亂所推動的婦女的大部分。除了很少的大地主的女兒之外，都是屬於中產階級的，就是新興的『部爾日瓦』(Bourgeoisie)；就是因廢除農奴制所摧毀了的小貴族家庭；還有所謂『拉斯諾金茲』(Rasnochintzy)他們不是貴族，但是不用繳納稅款，其中包含下級軍官、牧師、下級官吏和自由職業者；也有商人階級中的分子。

這個階級中的男子，在國家事業中能容易找着事做，而女子就得爲牠們的生活而作苦鬪，並且必須要有一個職業。但是，對於職業的服務之需要，在那時是很小的，這種壞現象不但影響婦人，並且及於畢沙拉夫稱爲『善於批評的無產階級』(critically minded proletariat)中之信仰民主主義的知識界的男子，他們在將來的俄國革命中，也佔很重要的地位。俄國的知識階級，爲他的生存問題和自身的興趣，不得不反抗愚昧、黑暗和壓迫，並且逼迫他們爲較大的自由，爲發展他們的才幹，爲他們求學的環境，爲他們的服務的準備而奮鬥。在這個階級中，我們找着一種所謂

「貴族的悔過者」(aristocratic penitents)，他們覺得對於人民應該悔罪，因此他們作人民的保護者以反抗本階級的人，以贖他們罪過。這些悔過者中之最後偉大的一個代表，就是利奧·托爾斯泰伯爵(Count Leo Tolstoy)。

俄國的知識階級的大部分，都從他們和民衆，尤其和農民接近的環境中產生的；其中許多人的生活情狀和貧乏，簡直與這些被壓迫階級的一樣，其中的分子，差不多對於新社會主義理想，是非常地易於接受。又因為這個知識階級時常將自己與民衆視而爲一，於是在這時發生了「到民間去」發生了大公無私地爲民服務的運動，關於這個，我們以後要討論到的，這是俄國真正知識階級與有自由觀念的較興盛的階級之嚴格的分別。大部俄國女學生是屬於這種「拿羅德尼克」(Narodnik)，屬於這種有革命思想的集團，她們「到民間去」——的確也沒有別的出路——從一八六一年起，她們不但佈滿於學校中，並且充滿了牢獄和堡壘。

在這一點，俄國婦女解放運動中之愛自由的激烈派，與自由思想派分道揚鑣，俄國婦女運動的道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婦運已經就獲得勝利了，其他數國，也以此爲奮鬥的目標——於是與在九十年代纔發生的西歐婦女運動劃分開了。因爲先進的而實際上本身又無理論

的俄國婦女運動，起始就是純民主政治的，是帶有革命性質的。雖然牠是起於經濟的需要，但是其實質還是由於一種理想的原因，其中主要者為社會與道德的原因；換言之，就是求知的迫切心，求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以及為人民服務和救他們於困苦中的希望。

和這個問題有關係的實際職業，第一就是教師與醫生。於是，有一個時期「人民的教師」這句話，在俄國是指那些離開了可以得很大報酬的城市，依着自己的意志，為可憐的小薪俸，而去到荒涼的鄉村中的婦女，在那個地方，她是絕對的孤獨，而又處於仇視她們的當地執政者的掌握中，她不但教導那兒的小孩，並且及於小孩的父母，她們像這樣犧牲自己從事於下層工作。由於他們的文化上的努力，這些婦女有意地或無意地在政治中佔有地位。鄉村中的女醫生，看護婦，助產婦等，其情形亦如此。她們實際的收入比較高些，但是因為只有她們纔是受了訓練的，她們必須綜攬各科醫務，不但照顧本村的病人，並且及於其他各處，所以不免過勞而消盡了她們的精力。這些在鄉村中服務的婦女，是被各省唯一的自治團體「生孟斯特瓦斯」(Сыематвос) 為沙皇時代之省自治機關所聘用；他們對於這些婦女的工作十分重視，所以很願意給她們以機會，以施行文化工作。

後來許多終身從事於革命的婦女，在鄉村也踏着這種文化工作的道路：索非阿·巴地拉 (Sofya Bardina)，索非阿·羅斯恆·文·赫斯非爾得 (Sofya Lözchern Von Herzfeld)，阿格·拉唐生 (Olga Natanson)，索非阿·培羅夫斯卡亞 (Sofya Perovskaya)，菲格尼爾 (Figner) 姊妹等人。但是這種文化工作無論如何不能使所有的婦女滿意，她們漸漸表示疑惑，並提出質問，一直到徹尼舍夫斯基在他的小說「作了些什麼」中，纔解答了婦女問題如何可以有理性地自理論化為實際這個問題。自純文學的觀點看來，這本小說是不足輕重的，但其影響及於整個世紀（徹尼舍夫斯基是後一代青年的領袖，他的革命觀念的代價就是終身的徒流，一八六三年被幽禁於聖彼得堡與聖保羅堡塞中）。與革命家拉克米多夫 (Rakhnmetov)——這個角色，與圖該尼挨夫小說中的主角一樣，沒有很清楚的設計好——並駕齊驅的，是他的妻子重要女英雄維拉·巴夫羅夫娜 (Vera Pavlovna)，她從家庭生活中之「暗室」中逃出去，並且獲得了經濟的獨立，又因根據商業的基礎以建立的共產主義生產合作社，而得了社會活動的範圍，她於是成了未來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細胞之創造者和組織者。這就是徹尼舍夫斯基這本書中的人物。徹尼舍夫斯基這本小說，掀起了驚人的風浪。在實際生活與文學中，憤怒的父母與丈夫，作了

一種有規則的反抗此書中的主張的運動，因為他們覺得家長的權利被搖動了，並且有許多妻子背夫潛逃。但是這種運動是不生效的，而維拉·巴夫羅夫娜的縫紉會社，在那些希望實現能力的婦女眼中，是一種新的啓示；牠被視爲一種理想，於是全國婦女爭起效尤，接着出現了鞋業，釘書業，及其他職業的合作社。現在每一個婦女都有志於經濟的獨立與謀求職業。在那時已經風行的公社（Communes）——這是一種公共家庭，爲離開了父母或者丈夫的女工及女學生所住宿的，她們在那兒與男學生住在一起——所謂六十年代的聖彼得堡公社，對近年來廣布在蘇俄的居住公社（Residential Communes），貢獻了很精密詳盡的模範，這事我們以後再論及。我們以前所提到的科尼羅夫，親眼看見過這種公社的生活。據他報告說：

同居人的物質環境都不同，但是所有的資財都認爲是公共財產。認互助爲共同生活之最高的規律。這種公社使生活非常的便宜，因此青年人都聚於一處，以增加我們在知識水準以上的人們的勢力。牠更能使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在我們私人生活中，實現我們的理想，同時我們的居住不但不好，並且較工廠工人還壞，因此我們不需要分清什麼東西是你的，什麼東西是我的。

這種公社對於外省來的婦女，甚是重要。她們有許多是完全與富貴的家庭脫離了，身無分文的要來讀書。自然她們都希望找着些工作。但是既無親友，又乏人照顧，自然很少成功的。如果沒有公社中的互相幫助，有許多婦女不免因此流離失所。在我們互相的關係中，凡是傳統的和不忠實的，都絕對屏除，對於外表上一些也不注意，我們朋友住在一起，就好像最親近的家人。

反對公社的人，對於通行於公社的道德不斷地攻擊，這是意料得到的；毀謗如雨一般地降在他們身上。拉克米多夫在他寫的「作了些什麼？」中，就供給以這種毀謗的材料，因為他說：「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煙袋——你的煙袋；我的太太——你的太太。」但是，實際上，徹尼舍夫斯基及一部分虛無主義者，他們的生活是嚴肅的，差不多是節慾的，視婦女只是同志，視戀愛與色慾為浪漫生活，為不合時代的情感。他大聲疾呼：「打倒戀愛問題，」與六十年後蘇俄大部青年喊口號的精神一樣，只是方式不同而已。「現在的讀者，對於戀愛問題並不感興趣，因為他們腦中充滿了如何去改善我們的行政，如何改良司法制度，和如何改良財政農民等問題。」

其他希望受教育及過獨立生活的婦女，如果遇着家庭的極端的反對，時常私自離開家庭，或

者用詭計，此種詭計就是施行所謂「假婚」(Sham Marriage)計策；這就是說，一個女子由於預先的同意，嫁與一個思想相同的男子，但是只是形式上的結婚，於是這個假丈夫給她一張護照，因為在沙皇時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之初。法律規定了如不得父母或丈夫的同意，女人是得不着護照的。借着這種方法，婦女得着自由去作她們自己所願作的事。凡婦女希望出外留學者，都借這種「假婚」方法，在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之初，這件事差不多成了俄國知識階級中的通常制度了。許多後來著名的俄國革命婦女，都借重這個假婚，否則就不能達到教育之路和社會活動。索非阿·科瓦勒夫斯卡亞(Sofya Kovalovskaya)——在她那時候，也舉行了假婚；以後成了國際上著名的算學家，及斯托克荷爾母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的教授——最不幸的，她在西歐找不着一個家庭。像她這種情形不斷的發生，一個假婚慢慢成爲真的婚姻，不過多半是不幸的婚姻。

七十年代之初的著名宣傳家星尼卡布(Sinyegub)，在他的日記中，對於他那時的假婚，留下了一段很有興趣的記述。

某日，我們正住在公社中時，查爾新（Charshin）來告訴我們，說他自維阿特卡（Vyatka）的女朋友處得着一封來信，這個朋友是台鄂斯生學校（Diocesan School）的女教師，她在那兒教一些大點的女學生以關於人民服務的常識，他說在這封信中，這位女教師告訴他說有幾個學生正在準備按照這種理想以決定她們的生活，但是她們的家庭極端反對。其中一個最好的，是一位牧師的女兒，她屈服在父母專制之下，於是決定逃跑，不幸被找着了，又受她父親的壓制。一切書信自由都被剝奪盡了，她的家庭千方百計使她出嫁……除了假婚之外，無法逃出，這封信要求受信者找一個適宜的丈夫。我立刻就答應辦這一件事……！

在那個時候，星尼卡布還是一個青年學生，立刻起程作數千俄里的旅行，去到一個荒涼的鄉村，爲一個完全不知名的女子爭取自由，他的同志不但替他預備好了結婚穿的新衣，並且還有禮物，這是婚後要退還的。他到那兒就拜訪女孩子的父母，並且受了很好的款待，按照預定的計策，這個女孩跑進來，當着另一個本地客人，摟着星尼卡布的頸子，並且哭着說：「你終於來了，塞麗阿夏

（Seryosha）

這個牧師從報紙上得知星尼卡布是一個貴族，並且是大地主的兒子，很快活的同意了這個結合。在幾分鐘之內，全村的人都知道牧師女兒的祕密未婚夫來了。慶祝公開訂婚，戒指也交換了，雖然這兩個青年人以前未見過面，但是他們還要裝着是愛人，妝奩也預備好了，以宴會的快樂來慶祝婚禮，婚後這一雙青年人立刻出發至聖彼得堡，她的父母一些也沒有疑惑。這個妻子住在一個公社裏專心讀書，同時在工人中宣傳社會主義。

但是星尼卡布對這個託付與他照管的美麗的妻子拉利薩 (Larissa) 發生了戀愛，但是因為是一個革命家，在種種情形之下，甚至不能對她宣布他的愛，他與她的關係只是同志。一直到後來的某日，拉利薩已經早對他的丈夫發生了愛情，這個「假」婚於是就弄假成真了。數年以後，星尼卡布因為在工人中宣傳社會主義，被判處了九年的礦中苦工，拉利薩同他一起流放到西比利亞，去走那一條十月黨人之妻所走過的，而以後無數俄國革命婦女還要走的那條荆棘之路。

第二章 俄國革命前的婦女

一 在革命運動中

「……求自由的激烈運動，在俄國各階級婦女的靈魂中，都能得着反應。俄國婦女一旦要起而爲被壓迫的權利作奮鬥時，她的力量必遠勝於男子，因爲她有穩健不屈的熱情。」這是俄國婦女史的最大權威者安勿蒂特羅夫（AmFteatrov）所說的，他估計在社會鬭爭與民族叛亂中，婦女的力量比例可以定爲一比四（見『俄國社會運動中之婦女』）。但是，當尼科拉斯第一時代，被主人所遣到西比利亞的農奴七千人，其中三分之一強是婦女。

朱珪耶夫（Zhuguyev）所稱的一八一九年『哥薩克暴動』（Cossack Revolt），領導者就是婦女。其中二十九位女戰士，在暴亂平定之後，都受鞭打之刑。但是沒有一個求饒恕的。在一八三〇年的『塞巴斯托波爾』（Sebastopol）暴動中，不下於三百七十五位婦女被判處死刑。勇敢地

懷抱着或者攜着她們的孩子，從容就死，亞歷山大第一時，諾夫哥羅德（Novgorod）政府中之著名的「農民軍事殖民地暴動」，婦女不但佔領導的地位，並且在其預備時期還進而為暴動的煽動人。凡對專制與壓迫愈強的反抗，在失望的羣衆中，婦女的戰鬥員的數目愈大。

俄國革命自「十月叛變」之後就漸漸的打下根基了，實際的革命運動是起始於農民解放與廢除農奴制之時，十分失望的農民本身和一部分因此而受損失的地主都反抗此舉。接着第一次革命組織產生了。在一八六一年末前，徹尼舍夫斯基所發表的俄國第一次的宣言出現了：「對於農民，喚醒他們為將來的革命而組織他們自己。不久，第一次違禁的雜誌『大俄國』也產生了。徹尼舍夫斯基是這個新雜誌的生命和靈魂，他因為發表這個宣言而被捕，並且流放到西比利亞礦中去作苦工。」

同年，學生的暴動也發生於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大學，以後就成為時常發生的事了。牠們直接的起因是由於政府的果斷，因為政府同時採用了完全反動的政策，對於大學生施行了新規則，取消學生結社集會權，解散他們已有的團體，尤其採行了各種法規，以限制那些屬於沒有特權的，貧窮階級的革命青年。但是學生方面誓死反抗，因為他們不服從新的規則，激起了政府的仇恨心。許

多學生都被監禁或者充軍，大學也關門了。後來在婦女不許入學這個條件之下，又允許學校重行開辦，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牠無疑地證明了那些在高位的人，了解並且能正確的估計婦女所佔的地位。除了徹尼舍夫斯基以外，許多有名的著作家，發行家與學生們——包括密卡宜羅夫（Mikhailov），畢沙拉夫（Pissarev），西爾甘諾夫（Shelgunov）——都被捕了。但是，這種辦法，和在一八六三年波蘭叛變勢力之下較進步的各界之讓渡辦法，同一不能壓制學生中的騷動：大學仍然是革命的中心，學生這個字仍舊與革命這個字同其意義。

這時由學生所發表的宣言『新俄國』是很有意義的：一如波克羅維斯基（在俄國史中）所說，這個宣言的作者對於同時代的西歐共產文化，甚至共黨宣言都不熟習，但是對於未來的俄國革命之方式與目的有先知之明：其中所列舉的要求，就是蘇俄早年間所實施的方案——一切學校的自由教育，婦女的絕對平等，土地的社會化，法律承認的盜竊的商人營業之廢除，及國有營業等。

當一八七四年時，局勢進步甚速，革命宣傳已有了普遍的組織以資應用。總部設在聖彼得堡，在那兒有一個叫着『查科夫茲』（Chaykovtsi）的團體——這個名字為紀念他們的領袖而得。

的，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在某一時是屬於這個團體的——自一八七三年以來，就很活動，牠的口號是『到民間去』，希望在鄉村中尋找社會主義理想的贊助者。起初的和平宣傳，漸漸採取了革命運動的性質，以作武力暴動之準備，這大半是受了巴苦寧 (Bakunin) 的影響。

這個『不分階級的文人』 (unclassed intellectual)，曾經參加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來在俄國監獄中，寫『懺悔書』與沙皇尼科拉斯第一，並且請求亞歷山大第二緩刑，他的理論一直是包含大斯拉夫的原素，依據他的意見，俄國農民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巴苦寧主張說：俄國的『馬施克』 (Mashk) 農人，由於他已往的歷史，和政府當局對他仇視的態度，以及鄉村公社殘留着的習俗，他成爲取消土地私有制度之最好的工具，他有一個明顯的革命的要求，這個革命可達到世界革命的最後目的，達到『不用法律而創造一個新世界，並且得到自由』的目的。根據這個意思，俄國人又可以說是人類的救星。巴苦寧又主張說：民衆不需要教訓，社會主義者之唯一任務，就是去指導他們如何從剝削和國家專制中解放他們自己。但是因爲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必定不要與民衆疏遠，不要自外面去左右他們，必定要打入羣衆中，將一切失望者之騷動，地方上的變亂與叛變，都集中成爲一個民衆總暴動。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必須要捨棄他

們的階級特權，穿上農民或工廠工人的衣服，到工廠和鄉間去，拿起鎌刀和鎚子，在鄉村和城市中間過工人的生活。巴苦寧說：「訓練民衆？這是很愚蠢的。民衆對於他們所需要的比我們還知道得清楚一些。反之，我們必需從他們得教訓，我們要設法探測他們生活和力量之秘密——實在這個秘密是不難探測的，只是對於那些生活在所謂教育界的人們是難於知道的……。」

這個教訓對於七十年代之俄國青年的影響，是非常的大。許多青年男女，離開了大學，學習一種職業，從事於鄉村或工廠工作，以作革命的預備。差不多「到民間去」的人，都將他們的出身隱藏起來，裝成普通的農民。這個運動，在驚人的短期間，散布於全俄，但是在一八七七年發生兩個巨大的審判案以後又停止了，這兩個審判都是由犯案的人數而得名，一個叫「五十人之審判」，一個叫「一百九十三人之審判」，這些犯人都來自知識階級。

這兩個司法的反抗「全俄社會革命組織」的運動的兩大案件之一，是在一八七七年二月開始發動的。這五十個罪人，有一半是來自上等社會的婦女，她們是在外國或本國讀書的，因為其中大部分的誕生地而被稱爲「莫斯科的女英雄」。司法部長巴冷伯爵（Count Pahlen）給沙皇的失望的報告，是代表政府當局對於婦女所給與現存制度的威嚇之觀念。部長敘述革命宣傳

之成功，第一指出在陰謀者與革命黨人中，婦女數目之多是十分可驚的。他寫道：『完全因為婦女參加的緣故，以致半個俄國都陷入革命組織之網中。』據這位部長所報告說的，二十三個革命組織中，有三個是直接由婦女支配之下。巴冷又計算，在某一個時期，因革命活動而被拘至法院的六百二十人中，有一百五十八位是婦女。這個報告繼續說，大部分『到民間去』的人，他們為每日的薪金而被僱，並且與誠樸的鄉村人同居，這些人都是屬於上等家庭的——無疑的，這是整個事件的最嚴重部分——他們的親戚不但不責備他們，反而加以同情與稱贊。

被控者煽動人蘇菲亞·巴地拉與工人亞歷克舍耶夫(Александр)的光明的辯辭——以後印成小冊子分散，以助革命宣傳——使『五十人之審判』成了有特別意義的事件；總之，這個審判在俄國教育界中掀起很大的騷動。

所有這個案子的犯人都是屬於一個組織的，牠的總部設於國外，其目的在以實際的綱領以實施巴苦寧的理論。依照這個綱領，全體分子要同時回國在莫斯科活動，那兒有一些工人與他們合作。他們有假的工人護照，在工廠中，特別是在紡織工廠中，開始活動，借此與民衆接近。那時的工人，無論男女，每日工作十六小時，住在緊閉的，污穢的房舍中，他們是最不開化，最愚蠢的人，對於社

會主義的教訓一些不能接受，假如我們想到這些，我們就知道要實現這個綱領需要如何地一種犧牲和勇敢。實際上，以超人的犧牲來作的宣傳之結果，遠不及所受的困苦。

在對於這些事勇往直前的婦女中，有我們已提過的巴地拉，還有卡明斯卡亞（Kaminskaya），李巴多維支（Ljubatovich）和麗帝亞·菲格尼爾（Lydia Figner）〔與著名革命黨維拉·菲格尼爾（Vera Figner）為姊妹〕。她們四個人帶着假證書加入了一個工廠，因為法規定了男女分隔，所以起初只能在婦女工廠中工作；女工廠的情形要想宣傳成功是不順利的。以後她們用計進了男工人的房子，在那兒大聲的讀違禁的宣傳品，並且獲得機會在工廠與旅館中分發小冊子，召集男工人們討論那時的政治問題。以這種方法，她們的確引起了工人的興趣，這些工人起初都是很疑惑的；但是宣傳的結果仍舊很少，因為工人的知識是很低的，他們接受所聽見的東西之能力也非常的小。

但是只是這些小的成功，都使這些被熱情所燃燒而不能等候勝利的婦女們，疏忽了必要的小心，因此她們自一八七四年之末加入工作的工廠經理，於第二年三月找着機會報告當局使其注意那些煽動者，並且要設法阻止私運違禁印刷品到工廠去。麗地亞·菲格拉爾和巴地拉不得

不離開工廠而逃跑，但是終被尋着了而與其他的人一齊被捕。接着施行居民檢查，發現了許多共謀者，於是『五十人之審判』開始了，有的工人也被牽連在這案子中。

巴地拉在這時候只二十二歲。她是塔姆菩夫(Тамбов)地方警察長的女兒，並且是自瑞士回來的醫學生之一。一個婦女社會主義機關——她是這個機關的活動的靈魂——因為她的煽動而與莫斯科的團體聯合起來了。維拉·菲格尼爾——她本身確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所寫的記述，說巴地拉的感化力是如何之強，對於她週圍的人，有一種暗示力。維拉·菲格尼爾與巴地拉認識是在祖利克，她們二人與其他的俄國婦女同時在那兒學醫。菲格尼爾在那時還不是社會主義理論的信徒；她批評她們，並且拒絕巴地拉的勸誘。她一再辯論一個醫生——她覺得那是她的職業——的慈善工作，對於人民的福利較之革命運動還大。就是因為巴地拉的信仰之偉大的勢力，纔能夠將菲格尼爾辯論一個一個地駁到，並且證明了：

個人的努力，對於普遍的社會環境之巨大的勢力是沒有力量……我們全體的努力不是去減輕個人的痛苦，不是去醫治一個人的病症，當我們認清了牠們的不良性質的時候，不只要

單獨地反抗社會制度，而是要在原則上反抗人對人的剝削，反抗私有財產和承繼權，除非全部都摧毀了，我們不應中止努力……。

她的猶疑不定的朋友，被這些理論說服了。

巴地拉在法院中的演辭所給我們的印象，一些也不像犯人的答辯；簡直是對現社會的熱烈的非難。巴地拉一直承認她在工人中作宣傳，在別使人她明白她的活動是反抗文化的基礎，反抗私有財產，家庭，宗教，和國家時，她以和共產黨宣言差不多感人之深的說辭來回答：

「我從未攻擊過私有財產，我確敢宣言我是私產制度的擁護者，因為我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處置他自己的勞力和由他這勞力所產生的價值……好了，現在請回答我：是我摧毀私有財產制呢，還是那些只付給工人每日工作之三分一的工價，不勞而獲地取得其餘的三分二的工業家呢？在交易所賭博，犧牲許多人而不費舉手之勞就致富了，使無數家庭因此陷入困難中者，不是那些投機家嗎？我們將工人對於勞動所得的結果的權利，視為高於一切……。

「至於說到家庭，我只問：是否是現存社會制度逼迫家中的妻子，為可憐的工資而去加入工

廠，使她們同小孩們趨於墮落？是否是現存社會制度已不可救藥了？婦女因貧窮而被迫爲娼，因此破壞了家庭，在每一個有秩序的國家中，而竟承認爲娼是合法的必要的制度，這不是現存社會制度的過錯嗎？因爲我們想要鏟除這種一切社會罪惡所由生，以致終於毀壞家庭的貧窮，這是我們的過錯嗎？……

「我對於破壞國家的罪過是非常的少……再者，我不相信個人的力量能够破壞國家。當國家陷入破壞，時常是咎由自取……換言之，因苛捐雜稅，因對工人之資本主義的剝削，及其他變態的經濟和政治的情形，而使人民陷入於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奴隸狀態，並且使他們受深刻的貧窮，疾病與罪惡，這樣就是國家替自己掘墳墓……」

巴地拉在法官前的演說辭是俄國自由運動的宣傳福音，其勢力一直到恐怖主義方法順利進行之時；她的結論說：「我的尊貴的法官，無論我的命運如何，我不向你求救，並且也不希望赦罪。任你對我如何行刑；我絕對相信，像這樣的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很清楚的，這是時代精神的產物——不能以壓逼方法來中止住的。或許牠可以暫時被耽擱，但是，牠復活之後更要強盛了，這個程序不斷的進行，一直到我們得了最後的勝利……迫害我們！我的貴人們，你們現在有物質的勢

力，理想絕不能以武力來壓迫的！

巴地拉與她的同伴一樣的判罰苦工。但是女犯人以後改爲充軍至西比利亞。巴地拉自西比利亞逃後，於一八八一年回返俄國；但是那時的情形已改變了，她覺得那兒沒有她的地位，於是出走國外，因爲她不能忘掉她所受的痛苦，於一八八三年自殺。

她奮鬥的同伴白蒂·卡明斯卡亞也很悲慘，她在放逐期間瘋了。許多有勢力的人爲她緩頰，終於被釋放，但是太遲了。在她回去治療的途中，卡明斯卡亞服毒結束了她的生命。

這次審判所給與全國，尤其是給與青年學生的永垂不朽的印象之表示，由一個未來的『拿羅德拿亞·瓦爾亞』（Narodnaya Volya）會員沙羅娃（Salova）的記述中可以看出。她在那時還是一學生，她的自傳中寫道：

在法院的罪人席上——與工人並列的——是學生和青年的女子，他們捨去了門第的特權，加入工廠，以期帶光明到黑暗的界域中去。他們所造成的印象是有力的，高尚的，對於我們有絕對的重要。畢業考試要到了，我們都考慮到將來，並且問我們自己：『我們將來要到什麼地方

去！我們將來作什麼？」許多男學生離開學校開始去學一種手藝。雖然他們並未提及這件事，在我們這小團體中，我們很清楚地看清了他們的目的。我也決定了步「五十人之審判」中的婦女的后塵。我決定到農村中去工作。

維拉·非格尼爾以一種同樣緊張力寫道：

這個案子喚起了各方的同情。這些婦女的犧牲——她們爲要加入工廠作苦工而捨棄了她們的特權地位——她們信仰的純正，和她們的堅決，引起了普遍的稱贊。許多人認她們的活動爲神聖的天職。雖然開始就受了挫折，但是黨已經得着精神的權威了，不是牠已經博得爲信仰而奮鬥的殉難主義之聖光了！

這個案子在當代的文學中也有反響。瀕死的尼克拉梭夫敬獻了一些有力的詩句與革命的女英雄，遠遠地隨着這種行動的圖該尼挨夫，後來寫了一篇散文詩『門檻』(The Threshold)

以尊崇俄國的女革命黨——這篇著作不斷的刺激俄國青年學生。這篇詩的起始，是一個巨大建築物的背景，在牠打開的門後面是無盡的黑暗……但是有一個俄國女子站在門檻上。她將要邁過這個革命的門檻。一個精靈警告她，說裏面有危險與痛苦等待她。但是她說她已經一切都準備好了。

「你準備去犯罪嗎？」

這個女子點點頭：「也準備去犯罪。」

「你知道你也許有一天失掉你現在所有的信仰，並且發現你是誤入歧途，無代價的犧牲了你的性命。」

「我也知道這個，但是我還願意進去。」

「傻子！」在她後面的聲音罵。

「聖人！」從別處來了一個回答。

在「一百九十三人之審判」中——其中的分子就是以前所提到的「查科夫茲團」——有三十八個女犯人，爲全數的五分之一。這個審判一直到一八七七年纔開始，差不多的罪人到那時在監獄中已經關了三四年。在這案件中，他們的勇敢和堅決的態度，獲得了普遍的同情與尊敬。其中有幾個拒絕作任何辯護，或者拒絕回答任何問他們的話。這些所謂「抗議者」的一部分，同樣的有婦女。

重要犯人之一是布楞斯科夫斯卡亞 (Breshkovskaya)，她是俄國革命的祖母，以後在國外很著名的。她「到民間去」並且贊成恐怖主義的方法，後來又轉變成社會革命黨。她是一個卓絕的演說家，並且有百折不撓的精神，雖然憲兵寸步不離地跟着她，但是她視環境所需裝成一個廚婦或者一個農婦，走遍了全俄，爲社會革命黨創始人熱蘇尼 (Gershuni) 所組織的「戰鬥組織」招募新分子，她對於熱蘇尼的影響也非常的大。

政府對於布楞斯科夫斯卡亞的革命運動特別加以注意，因此只有她一個婦女在「一百九十三人之審判」中判處四年西比利亞礦中苦工。但是，在年限將到之時她逃跑了，再被捕之後，又送回去加了二年半的刑期，於一八九八年回至俄國西部，她在那兒又開始了革命工作，以後又在

國外活動。一九〇七年她六十二歲時，又因回國與法律挑戰，而被放逐到西比利亞，她在那兒住着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在『查科夫茲團』中，培羅夫斯卡亞是一個最強有力的，最能克己的角色。許多年來，她在革命黨中一直居領導的地位，並且得她們無限的信任。無論什麼事發生，她自己總是擔任最危險的職務，與監獄中正在設法逃跑的同志通消息的人，也是她。因為她天生是堅毅的，沈默的，勇敢的，鎮靜的，所以同志們都屈服於她的堅強的意志。她的經驗，她在一切重要事件中的威權之下。

她努力從事於接近民衆比任何人都早，她到特未爾（Тверь）去調查當地的農民情狀；在那兒教一些小孩子，與鄉村人民非常接近。以後她學習了衛生遊行人員的工作，她往各處旅行——時常是徒步——去爲鄉村小孩種痘以防天花。在以上所說的和往來聖彼得堡的旅行中，她得與思想相同的人接觸，這些人中就有領袖舍里亞包夫（Шельябов），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以後成了她心腹之交。她因爲推動革命這個觀念所鼓勵，所以對於她的計劃是不疲倦的。『查科夫茲』之所以到民間去作宣傳，是因爲她的提議與鼓動。她是第一個人看出農村運動之重要，因爲她相信，『如果不與農民接近，沒有一個黨派能够在俄國成功的。』她被捕之後充軍至西比利亞，但是

在旅途中，她又逃回到聖彼得堡，並且不猶疑地又開始了她的活動。『一百九十三年之審判』中，有幾個保釋了，但是他們又與她團結，借她的努力，恢復組織。

克魯泡特金寫道：『這個樸實的婦人，自尼發(Нева)河中汲水，頭上包着頭巾，着的布衣，穿的男人的靴子，誰也猜不着她是將軍的女兒，是貴族婦女。』這個貴婦因為什麼不生活於她的上等社會中，而有這種內心與外形的轉變呢？這個答案就是那時俄國革命黨的相似傳記中之不同的一種：她是聖彼得堡市長的女兒，他是一個純粹的俄國地主，不但鞭打他的妻子，並且教他的幼兒也這樣作，蘇菲亞自小就受她父親專制之壓迫，因為他十分虐待她；她受家庭環境的壓迫，很早的就起了反抗。她原來在家中讀書，後來進入聖彼得堡的女子部，漸漸地認識了『查科夫茲團』的人；她加入了革命運動，當她父親以懲罰來恐嚇她時，她立刻脫離了家庭，實行生死的奮鬥，大規模地反抗壓迫。

一八八一年五月一日，亞歷山大第二被暗殺死了，這件事是培羅夫斯卡亞所作的。她不但將炸彈帶至那個地方去，和預備一切暗殺的事，並且在最後發命令的也是她……培羅夫斯卡亞不顧她同伴急迫的勸告，不顧威嚇她的危險，事後還留在聖彼得堡，一些不想到逃走。舍里亞包夫被

捕了，自然與其他的三人同判死刑；因為無法逃走，所以她希望和她的同志一起死。在俄國她是頭一個政治犯上斷頭臺的，與四個男人一同死了……。

在執行前數日，她寫了一封信給她平生最愛的母親：

……因為你，我深深感到不安，我親愛的……我一些也不悲傷我自己的命運，只是靜靜地等牠的來臨：因會我知道這種命運遲早要來到的……唯一使我痛苦的事，就是你的悲傷，我親愛的……我現在不要說我是如何的愛你了。你知道，自幼年時候你就是——現在還是——我的最高尚的，最熱烈的愛的對象。但是我希望你強振精神，不要和我生氣。你要是責備我，是我唯一感覺殘酷的事……。

在這位意志堅強，富於果斷的婦人身上，最後發現了像這種婦女很少有的特性——表現女性的特性：在同一告別信中，她要求她母親：『給我買一條領帶和帶鈕扣的硬袖，因會在行刑時我要縛緊我的衣服……』

在這個時期，俄國革命活動的中心，是一八七九年所創立的『拿諾德拿亞瓦爾亞』（意即人民的自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是一個恐怖的團體，在他的黨綱中，將『米爾』（Mih）——鄉村會社——作為未來組織的單位。二十九個會員中，有十個婦女。除了培羅夫斯卡亞之外，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維拉·菲格尼爾，她的一生，記載在她的日記中（英文節譯本：一個革命家的日記），這本書甚至在西歐，都有很深的印象。在俄國，一部書有六本，其中有一本是詩。從她的自傳中，我們知道她不像培羅夫斯卡亞那樣，她享受了一個快樂的，光明的孩童時代與青年時代，不但有快樂的脾氣，並且是一個多方面的天才藝術家。她是拒絕自瑞士回國的俄國醫學學生之一。不久，她作一個衛生遊行人員，與她姐姐——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過她——一同到民間去，在自治機關之下工作了三個月。關於她生活中的這個短時期，她後來寫道：『這三個月對於我是一個嚴厲的試驗，人民物質的痛苦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但是人民的靈魂我一些也不曉得，至於說到宣傳，我從來未得着機會開口……』』

與維拉·菲格尼爾個人經驗相並的，就是『到民間去』的運動之普遍的失敗。一八七四年的春天，這種運動普遍全國，但是到第二年的秋天，就鬆懈下來，因為許多同志們都被捕與監禁了，

其餘的因怕當局的迫害，都自鄉村中逃走。不過更壞的，並且是整個運動的不幸，就是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對於工作結果的過分的奢望，現在是失望了。剛自外國回來不久的維拉·非格尼爾描寫這時的情形如下：

許多人都捨棄了一切的希望；起初好像是易於實現的綱領，並未產生所希望的結果。我們已經正確的抓着問題，並且以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獲得信仰，這種確信已經破壞了，愈是想在人民中宣傳熱心的人，其所感的失望愈大。過去的已經破壞了，未來仍舊是茫茫然……。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到民間去』的人們，現在轉到恐怖組織上去了，這個爲巴苦寧所極端反對的革命行動之新信仰，較之『到民間去』的運動還受歡迎，還傳播得快。這個『拿諾德拿亞瓦爾亞』恐怖黨，數年來，由於牠的大膽的事業，牠的不怕死的暗殺和擲炸彈等事，不但使俄國，就是西歐亦陷於不斷的騷擾中。但是在一八八一年暗殺沙皇的事發生後，這個革命團體也同樣地破壞了。差不多的分子都被捕了，一方因分子的被捕，一方因鏟除亞歷山大第二的希望未完成，

所以這黨也失掉了牠的勢力。

維拉·菲格尼爾在革命運動中已有十年，後來的四年，她是恐怖機關的活動分子，也是簽字於沙皇及其大臣之死的保證書的人，這時恐怖機關執行委員會只有她一個人是自由的。在暗殺沙皇後的二年多，她都未被捕，並且在查科夫作煽動工作；一八八四年，因為一個後來自首的同志之詭計，她落於警察之手了。因為不希望再有婦女殉難者，所以死刑減為二十年的徒刑，監禁於著名的什律塞堡(Shlisselburg)監獄中。一直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她纔得到自由。她出獄後還是不減當年的熱心，準備再作新的事業，並且又開始她二十年前所留下的工作。她現在還活着，已經八十多歲了，安居在新莫斯科，她是已往奮鬥時候的悲壯的女英雄的最末一個。

與她們齊名的，另一個式樣的俄國革命婦人，就是維拉·薩索里支(Vera Sasulich)，她是單獨行動的刺客。她確是屬於革命團體的，但是暗殺特累波夫將軍(General Tropov)這件事，是她一人作的。她所屬的革命組織『土地與自由』(Syemlya i Volya)比較『拿諾德拿亞瓦爾亞』還組織得早，在『到民間去』的運動失敗之後，就是在一八七七有兩個大審那年成立的，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定了這個名字，根據鐵的紀律與陰謀的技術，定了她們的綱領。這個組織的任

務就是鏟除復活的反動勢力，和以革命的恐怖主義來反抗政府施於革命的恐怖主義。在那個時候復仇的事是很多的。在大審判中之一百九十三人，有三十四人死於獄中，十二人自殺了，三十三人瘋了。當警察總監及聖彼得堡憲兵司令特累波夫因為一個政治犯對他行禮未十分恭敬，就鞭打他時，其餘的革命黨人中，憤怒的情形變為十分地緊張而達於最高點。這件事普遍的知道了，革命團體決定要對這件事復仇。人們甚至有從南方來的，宣稱他們準備鏟除特累波夫。

但是，維拉·薩索里支最先下手，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舉事了；她因為憤怒與同情，決定自己替那個無保障的犧牲者復仇。關於這次的暗殺，在她的日記中有片斷的記載；以簡潔的字句描寫她那時果決與內心的經過。她和她後來充軍到西比利亞的好友科倫基那（Kolenskina），詳細的討論這件事（有記載他們如何的抽籤決定誰去作這件事的）；她計劃如何的裝一個請願人，往警察總監那兒去，走到跟前再開槍射擊。

……我似乎覺得十分安靜，只是惱人的沮喪。不是因為我要與自由生命告別了；我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我的生命已不是生命，只是一種過渡的情形，這種情形愈快結束愈好；我一想到

明天，或想到警察總監要走到我面前時，我就有難以言喻的痛苦……我不疑惑我的確切的成功；我相信每件事必定會進行很順利，並且一些也不難，一些也不可怕——但是我是痛苦。我沒有預料到有這種感覺，但是並不是興奮，無寧說是疲乏；我甚至想睡覺。但是還未等到我睡着時，這個夢魔似的感覺又來臨了……。

天明了。維拉·薩索里支穿上新衣戴上新帽，與他的朋友告別，立刻出發了。

……在警察總監的辦公處，有十幾個請願者聚集在那兒。一個穿得很襤褸眼睛哭紅了的婦人坐在我旁邊，求我替她看看她的呈文，是否有寫得不妥的地方。在那呈文中，用字有錯的。我帶着這個婦人到一個職員那兒去，請他照顧她。我的聲音與平常一樣，一些也不露破綻。我自己很高興。昨晚使我痛苦的那種夢魔似的感覺，現在去得不留痕跡了。沒有東西使我沮喪，就是擔心是否每件事可以按着計劃進行……。

副官領她坐在請願人的前排。不久，特累波夫帶着兩個隨員走進屋子來了。「你呈請的是什麼？」「我要求一個道德證書。」

特累波夫用鉛筆潦草地寫了幾個字，又轉向站在維拉·薩索里支旁邊的婦人。

……我已經將手槍捏在手中，正要開板機……我又停止了。我的心死了。我再開板機……一響，一聲叫喊……立刻人們衝到我跟前，打我——我如何地時常像這樣幻想啊！但是實際的情形不同；那時有一個靜的時間。也許只有幾秒鐘，但是我很清楚的感覺到的。我將手槍摔開了，站在那兒等着。

忽然在我週圍有了騷動。請願者都各處奔散，警察自各處飛奔到我面前，捉住我。「手槍到那兒去了呢？」「我摔了，在地上。」「手槍，給我那手槍！」四面都這樣叫喊。

立刻有一個人站在我前面：圓瞪着眼睛。從大張開的嘴中，發出來不是喊而是怒吼的聲音，一雙粗手，屈着手指，來攬我的眼睛。我以全力將眼睛閉上，這雙手只抓着我的雙頰……騷亂發生了，他們將我摔在地下，打我。我所預料到的事都發生了。只有攬我的眼睛這件事未預料到。但

是我是臉從下臥着的，所以眼睛是無憂了。使我十分驚異的，就是我一點也不覺得痛苦……直到晚上，我被帶到監獄中時，我纔覺得疼痛……。

兩個月後，公開審問刺客，這個案件太引人注意，所以不能祕密的處置。在法院上，維拉·薩索里支簡單地，坦白地承認她因為什麼要有這種行動。「我覺得這件事——鞭打政治犯巴哥里包夫 (Bogolyubov) ——不能就此過去了而不留一些痕跡。我等着有什麼事件發生。但是人人都

不動，如其這樣就沒有東西能阻止特累波夫或者其他的專制者再作不良的舉動。於是我決定了以我生命的代價，來證明沒有一個人應該以這樣方法來屈辱一個人類而不受懲罰的。我不能找着別的方法來使人注意這件事……以一個人的手去害另一個人類，這確是可怖的，但是我覺得無法逃此……。

薩索里支，一個軍官的女兒，那時已二十有九，並且沒有一些婦女的美色，陪審官出乎政府意料之外地將她釋放了。在法庭中，有公務人員及上等社會各階級的代表，同時法庭外又有羣衆聚集在那兒，這個判決受了熱烈的讚許與歡迎，就好像是公理戰勝一般。但是各門都有憲兵把守，要

將她捉住再送回監獄裏去。在她的朋友與沙皇的臣奴中，發生了短短的爭執。她終於逃去，接着就出國了。

所有這些提到的及許多未提到的婦女，一個跟一個地自我的眼簾中走過——一個女英雄的時代，不是，是一個女英雄的『朝代』——修波丁（Sudoin）姊妹，里巴托維支（Lyubavovich）姊妹，菲格尼爾姊妹等，她們可以稱爲俄國革命的大聖人，因爲她們以深刻的熱誠，信仰，不怕死，來爲一個理想奮鬥，而一些也不屈服。在革命黨人中，男子有被不能忍受的環境所威嚇，而跑到另一條戰線去的。但是，俄國革命的婦女，就沒有這種失敗的情形。她們生活的記載，非常地動人。她們的精神，時常因爲批評，激怒，和反抗的勢力，及在奮鬥中而興起。給與她們的任務愈大，對她們的希望愈多，則她們自己的力量，她們受苦的能力，她們內心的準備愈大。她們的受苦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蘇俄奮鬥的婦女與她們是同出一轍的。其不同之點就是：已往單身的女英雄，以超人的能力，受百般的痛苦，以破壞過去；現在是整隊的活動婦女——『勞動之女英雄』以同樣超人的能力，以建立未來的新生命，並爲新世界而奮鬥。

這些革命婦女都非常的年青；有的還是非常顯赫與美麗，並且有藝術的能力，而在知識與靈魂方面又天賦甚厚（如維拉·菲格尼爾，和路德米拉·沃爾幹斯坦（Ludmila Volkenstein）），內心又溫柔，因此，她們能為個人的生活創造快樂。雖然她們有強烈的能力去享受，但是她們與革命男子一樣，對於個人的，肉慾的因子，視為低於宇宙與人類的愛，一切的事都在宇宙與人類之下。兩性間的互相關係之特有的貞節與純潔，給與俄國這一代及下一代的知識階級以良好的風紀，就是使西歐人時常發生誤會的俄國學生界的友誼關係，也受了好影響，這種貞節與純潔的兩性關係，至今還存在蘇俄男女的關係中，這也就是時常引起外人的迷惑的來源，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俄國革命的男與女，彼此是朋友與同志，他們經歷了一切的危險，困苦與饑饉，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假如必需的話，他們一起冒死上斷頭臺——甚至在他們彼此戀愛之時（例如蘇菲亞·培羅夫斯卡亞和亞里亞包夫）。他們的人數，不但時常增加，並且自七十年代以來，是一個囚犯之不斷的，受折磨的鏈環，一年接一年的達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在地理方面，形成了全俄數千方哩的網線，自尼爾金斯克地方（以後包括沙克黑林（Sakhalin））的外拜喀勒（Trans-

Prilia)直達西歐——一個無數環子的鏈，牠的數目不斷的增加。

在莫斯科的『卡脫喀與西爾卡中央圖書館』(Katorg and Syika, 意思即西比利亞礦中的苦工與充軍)，十多年來都沒有多少人知道，只有創辦人容易進去，牠的性質與革命博物館不同，與革命圖書館不是平行而是補充的性質；牠是無以倫比的。假如你一步一步走過那些陳列室，你可以看見那偉大精神的人類之一部，和堅忍豪勇之表現，這些只可以和早年的基督徒之自動的犧牲精神相比擬；自各方很詳盡地，很美觀地收集許多材料：人像，監獄和局部的相片，著名的什律塞爾堡，聖彼得，聖保羅的監獄內獄房的各種相片，統計表，圖案，遺書，及其他文件，遺物，模型，刑具，一切的腳鐐鎖鍊，和盡力收集來的其他東西。誰能看見數十年來那些無數的受虐待的，那些在監獄中瘋狂了的，那些因疲勞而死的，還有那些自殺的人而不觸目驚心呢？當一個人看見那緊身短衣之一種時——那是硬皮或鐵作的，有一個親身受過的人描寫說那『比受鞭打還痛苦十倍……』——誰又不膽戰心驚呢？甚至看見雅庫茲克(Yakutsk)及別處的轉移站的泥房子，和因殘酷而出名的『卡脫克』及東倒西偏的監獄之各個木型或者很簡單的圖畫，或者看見那些在西比利亞或堡塞中的用以單獨監禁那些無期徒刑的犯人的監房或模型，誰不因此而戰慄呢？

當一個人看到一八八九年卡拉悲劇 (Kara Tragedy) 中之犧牲者的相片與她們的墳墓的相片時，沒有不被恐怖所克服的，這件事在當時轟動全俄。阿母爾 (Amur) 區——包括卡拉海附近的「卡脫爾喀」的分處——的總督科爾夫男爵 (Baron Korff) 到彼巡察；那兒關了一個女政治犯科瓦爾斯卡亞 (Kovalskaya)，她時常與獄吏爭執，並且提出抗議，當這位趾高氣揚的紳士走進獄房中時，她坐着不動，他命令她站起來，她回答說：「我被迫至此，因為我不承認你的政府，因此在牠的代表之前，我不願站起來。」立刻命令將這個女人送到更荒涼，更北方的弗爾克尼——勿丁斯克 (Verkhye-Udinsk) 地方去。科瓦爾斯卡亞 一些也不知道將有什麼事發生，在半夜深更將她自板牀上從夢中拖起來，她的同獄者不甚驚駭；她衣服也未穿，由幾個獄吏與兵士在監獄長命令之下，將她領出去，終於運走了。

對於這次的非人道的舉動之反應，就是其餘一部分女犯的絕食，男犯人接着也加入了。結果犯人與獄官間的關係更壞了，新的尖銳化的爭執又起來了，那時有一個婦人叫拿蒂西達·喜熱達 (Nadyeshda Sigida)，她在丈夫死後不久帶着兩個小孩被流於此，這事發生之後，她打了一個政治犯所要求撤退的獄官的耳光想使當局者恢復他們的意識。但是伯爵科爾夫發命令：「讓

三百無赦。』事後她被禁於單身監房，接着就病了。不願犯人中的興奮，不願醫生的警告說如此鞭打令實行則他就不負責任，甚至不願獄官的猶豫，這位阿母爾區的小皇帝一些也不搖動……。

喜熱達昏迷地被送至普通的監獄中來了，在那屋角裏還有幾個送來的同志。在整夜迷糊地叫喊她的母親與孩子之後，到第二天早上就將她自己自痛苦中解脫了，一個僅僅二十六歲的婦人。

幾天之後，她的三個獄伴，不知在什麼地方得着些毒物，隨着她死了：這三人就是馬麗亞·科瓦勒夫斯卡亞 (Marya Kovalovskaya)，拿蒂西達·斯米尼茲卡亞 (Nadyeshda Smirnitiskaya)，和馬麗亞·卡里西拿亞 (Marya Kalyushkaya)。在科瓦爾斯卡亞提走之後，科瓦勒夫斯卡亞接着就以她自己及其他二人的名字，寫了一封遺書，結尾說：『……我們三個婦女，留在這監獄中，找不出方法來為我們同志所受的虐待與恥辱來復仇。我們唯一自己可支配的報仇方法就是我們自己的死……』許多在卡拉的其他男女同志，都為同一的原因而服毒。但是因為這毒物的效力不足，『僅僅』七個人因為卡拉悲劇而自動的犧牲了他們的命運。

『卡脫喀西爾卡博物館』是僅由牠的創辦人來管理的，這些創辦人就是『波里特卡脫爾

桑社』(Politkatorshan Society)的社員，他們在蘇俄組織一個普遍全國的團體（有五十三個分社），在他們的雜誌『卡脫喀與西爾卡』(Katorga i Sylka)上，發表了許多絕妙的文學方式的傳記。在男女領袖中，那些純潔沈靜的人格，那些眼光有神而帶沈思的好領袖——其中有的經歷不下二十年的『卡脫喀』——在這今日不斷的緊張的俄國和在五年計劃的時期，給我們的感動，就好像另一個永垂不朽的世界中的人給我們的感動一樣，的確，這上一代的『拿諾德尼基』(Narodniki)，『拿諾多瓦爾茲』(Narodovolzi)，和恐怖黨活動的時候，大半在俄國還沒有真正的無產黨和馬克斯主義者的時代，他們被現代俄國得勢的馬克斯主義者所非難，認為他們的觀念是資產階級的觀念，他們並不十分被重視；但是，是他們的身體，他們神聖的熱情，打下了俄國今日的基础。凡來到這個博物館的青年人，由他們的長輩領着環遊一週，使他們了解俄國革命史，這些青年人都是他們的後代子孫。因此，這些青年人對於四壁上所寫的字更應努力：『羣新戰士隨着你，準備鬪爭和死……』

這個偉大的團體『波里特卡脫爾桑』的又一特徵——一切俄國革命黨中的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他們的友誼，同伴，團結的意識；這確實是他們生命的主要推動力。這種團體的最高意

識之現存的證據，就是「紅十字」(Red cross)這是一八八一年創立的一個絕好的機關，牠盡力於減少無數革命黨——流犯，罪人，和流落在外之人——的身體與精神的痛苦，就是俄國中不同情於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積極地幫助牠——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情形。我們要說這個佈滿全國和普及國外的組織之工作，大半是由婦女來推動，這是無可非議的。其他幫助犯人逃走的事，也差不多是婦女的工作。我們讀維拉·非格尼爾的著作，知道那些監禁終身或徒刑數十年的人，如何地自深深的幽禁中，掙扎到自由。她說她自己離開禁閉半生的什律塞爾堡的監獄是如何的困難，因為還有七位男同志困在裏面，如何她的「忘了哭的眼睛」也不禁流淚了。

關於路德米拉·沃爾幹斯坦 (Ludmila Volkenstein) 的犧牲與無私的事，她的同志們以為是一些奇蹟；她於一八八三年因為宣傳的活動和謀刺查科夫總督的生命而判處死刑，以後又「被赦」了，在什律施塞堡監中，與維拉·非格尼爾同住了十二年；以後又轉至沙克黑林島，於一九〇六年，因領導海參威的水手示威而被槍擊。當她在監獄一年半之後，她被允許與非格尼爾散步，知道這種「特權」不是個個囚犯都能享受的，沃爾幹斯坦勸她的共患難的同伴，一概拒絕這種特權，非達到一切犯人都有同樣的權利不可。這種自動捨棄女囚犯所有唯一的娛樂的舉動，繼

續了一年半。在維拉·非格尼爾的日記中有以下的記載：

沒有比沃爾幹斯坦更仁慈的人。她主要的特性，是無限的『熱情。』『我們都需要熱情，』這句話是她所喜歡的口頭語，她的靈魂是如此的溫柔，她對於一切生物的愛是如此的強，以致走路時都小心，怕踏死小蟲子……但是，假如一種理想受了威脅，或為權利而鬭爭時，則她的溫柔，她的和藹，就與絕對不可屈服的固執相合……。

十二年中，這個婦人，既得不着丈夫與孩子們的消息，又不知道在自由中的親愛的母親的消息。

因為這種特性，這些十九世紀俄國婦女為自由而奮鬥的豪勇之結果，使俄國婦女成為革命的靈魂。薩索里支(Sassulitch)和卡拉悲劇中的例子，可以解釋人類頌揚的最高點，對於這個，那種自甘放棄權利，那種視人如己的意識，都可因為需要而喚起的。但是對於這種事的擴充，牠在日常生活可以發現；對於牠的偉大的精神水準，這些貴族婦女可以在最困難的，不可想像的環境之

下，渡過她們的日常生活——這些事在最近由「波里特卡脫爾桑」出版的革命婦女的記事中都記載得有；她們消磨了許多年的生活在女「卡脫喀」裏，關於這個她們也記載得有。讀了那些簡單的敘述而不覺得起尊敬，或者不在精神上屈服於她們的仁慈超越的偉大之前者，是絕對沒有的。

序是維拉·非格尼爾作的，她以自己豐富的經驗寫道：

許多監禁方式中，我覺得最痛苦的，印象最深的是公共監房。在單身監房中，只有一個意志，只與法律和獄吏對抗，這些獄官以饑寒，以物質和精神的器具來破壞或者屈服囚犯的意志。但是在公共的監房中，就有二十或三十個同伴的意志，這些意志絕對不同，有弱的，有猶疑不定的，有喜怒無常的，有不講禮貌的……。

我相信，如果在單身監房中禁閉許多年後，神經健全而不瘋狂，是不可能的。但是居留在公共監房中許多年後，而神經還健全，我看只有有偉大的克己力的人纔可以，或再使他重新受教育……。

經過如此的人格和深刻的精神經歷之克己的訓練，在馬爾茲夫（Malisov）的『中央婦人監獄』中有三十上下長期的囚犯；在一九〇七—一二二年之間，不下於六十多女犯走入這個獄門。

在這些婦女的個人描寫中，在她們的自述中，使我們回想到二十世紀初葉俄國反動的最黑暗的時代，如何的一種在社會上，在人類上，在種族上不同的生活，一貫地在我們眼前演過她們差不多都很青年——有十八個還未成年，未到二十一歲，有三十七個在二十一與三十歲之間，只有十二個過三十歲的——假如我們問她們如何地生活，她們如何地在馬爾茲夫卡（Malisevka）監獄中渡過她們長期的歲月，我們得着以下的回答：

我們實際上是住在一種公社中……一切的包裹書籍和我們所得的錢（有人能按月得二十五個盧布，有的一文不名）都是公共的財產。除了衣服之外，包裹裏的東西都平均分配，在我們之中，有人能夠將一小塊糖分成三塊……。

無論我們如何盡力的想，都不能想到有東西能引起我們的不和睦，雖然我們的社會地位

不同。在這一點，我們的共同生活解釋了未來社會生活之一方面……這種從有小資產階級風味的一切之完全的解放，這種存在於自由生活中人的隔膜之完全的排除，都能使一種意外地純潔親密的伴侶之道易於發展，這種伴侶之道是根據共同的知識興趣和在自由中不易得的正當的友誼的……因此，在我們離開馬爾茲夫監獄長期之後，我們還繼續感覺和馬爾茲夫的婦女比任何人還要親近……。

在這個馬爾茲夫監獄婦女的小世界中，求知識佔了她們主要的生活，就如同十九世紀中葉普遍於全俄而後來在蘇俄成爲巨大的規模一樣的情形，一種對於知識與文化不斷的渴望。在這個地方，各種不同的學問都研究，始於讀書與寫字，擴充到最複雜的哲學問題。

在尼金斯克的「卡脫喀」中，我們之內有二十四個婦人是半文盲或者進過初等學校。她們學俄文，地理，算數等科目，有許多離開「卡脫喀」時所得的知識好像她們是在學校讀書到十六歲似的。自然，這要數年嚴格的，緊張的教導。有團體教授與私人教授，因爲我們之中有許多

人是進過中等學校或者是大學肄業的（過半數），所以一個學生有好幾個教師……。

「卡脫喀」的政治犯，自外面得着許多書籍，於是，在很短的時期中，一個有價值的有系統地收集的，和收藏七八百本書的小圖書館，漸漸成立於荒涼的西比利亞監獄中；除了婦女所讀的法文女子書信之外，還有許多研究的書籍，大半是哲學的：文得爾班（Windelband），黑克爾（Haeckel），開諾·斐西耶（Kuno Fischer），愛文納里西斯（Avenarius）等人的書，大家都熱心的研究討論。有時婦女的熱心是如此之大，以至有兩個婦女一旦被允許離開西比利亞監獄時，她們非常地不高興，因為她們將沒有需要的書以繼續她們來尼布茲（Leibniz）的原子理論之研究。在此，人們多注意於哲學而不重社會科學，這是值得注意的。關於社會科學的書，監獄當局不允許拿進去。有的囚犯更熱心從事於研究數學，我聽說有的狂熱者，他們研究的心是如此之緊張，甚至當半夜在他們的夢中，都在思考題目。在婦女「卡脫喀」的回憶錄中，有以下的記載：

書籍對於我們開了一個理想的新世界……未解決的問題，一再地出現在我們之前……。

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自修都開始工作，開始用心思，我們認識了第一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精神的素養，受徹底謹慎的考驗，如此方能將我們的哲學，建立於穩固的基礎上，一個石塊靠着
一個石塊……。

我們這一代青年，都成爲革命黨了，因爲這個運動自動而熱烈地督促我們……當我們自由的時候，我們只是很急促地爲實際應用的目標得着充足的理論，因此，我們許多之取得黨員資格，完全是由於機會，或者由於朋友及我們接近者之感化力。我們『卡脫桑基』(Katorshanki)這一代，自然與早年單身的英雄不同，他們必須以偉大的努力與奮鬥來發展他們的革命觀念。關於我們的成功，據說是因爲我們深深地覺得我們的準備不足以達到目的，因此一切無條件地表示的意見，在我們之中都被認爲是極壞的方式而立刻就要受到排斥。在知識與道德方面，當我們更深的努力於思考與探求時，我們順便考察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反者的整個思想的陣容……因此，我們研究尼采(Nietzsche)，多斯托耶夫斯基(Dostoyevsky)，聖經，印度哲學，梅德林克(Maeterlinck)，巴斯卡爾(Pascal)夫拉提密爾·索羅維俄夫(Vladimir Solovyov)，托爾斯泰(Leo Tolstoy)和美累什科夫斯基(Mereshkovsky)……這是十分有趣的事，並

且能使我們自另一個立場來觀察事件，以刺激我們的思想活力。只有那種不顛倒於一種單獨抽象的困難之人，並且不論結果如何而能施行他們的理論在實際生活上之人，纔配稱為真正的信仰社會主義者與無神論者……。

結果，別人最簡單和最自然的行動，都要受支配，甚至他們所取的每一步驟：

你幫助我工作，將你的一小塊食物給我，試想你賜給我如何一種仁慈……。在這種事中，沒有隱藏着一種虛假的仁愛的痕跡，或輕視一個同志，甚至希望在自己或別人的眼中擡高自己嗎……？以這種方法，凡一切出乎尋常的個人的，無私的事業，都要試驗牠的真假與純潔……。沒有一種名譽，一個簡單的威權，能够逃過這種分析……。無疑的，這是一種健全的，青年的，盲目的熱誠，一種正直，一種絕對道德的純潔之熱烈的追求……。但是因此發生了許多慘事和失望；發生了無數的不加思考的判斷……。

當我們讀了這些話，不禁聯想到蘇俄現代強迫施行的嚴格的道德法典，想到許多次的殘酷的清黨運動，這種清黨時常發生，對於任何人都是毫不容情的，這種例子就證明今日顯著的特徵，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存於俄國人的天性中。

在結束這一章之前，我們要提到外國婦女在俄國革命中所佔重要的地位。我只論到猶太女人，她們的地位很重要；在尼科拉斯第一時代，她們完全被排斥於公共教育之外，但是，當亞歷山大第二改良案實行後，俄國開始允許婦女受教育，她們是先進的女學生。在七百五十個考進聖彼得堡女醫科的女學生中，有一百六十九個猶太女人——這女醫科只成立十年。以後她們更進一步地被虐待：在亞歷山大第三時代，禁止猶太女學生留居在聖彼得堡，她們註冊為妓女，以購買讀書的權利，因為只有妓女在此纔有居住權；她們之起來反抗專制主義，不是無因的；因此，這些犧牲者的墳墓，如同所說的一樣：『將要自巴黎蔓延到聖彼得堡。』

熱斯亞·黑弗孟 (Gessya Helfmann)，蘇菲亞·金斯堡 (Sofya Ginsburg)，阿格·納唐孫 (Olga Natanson)，都是猶太革命婦女的主要人物，並且在某方面可以說構成那種『使那些雖然有天賦，但是不活動的俄國羣衆發酵的酵母，又因為兩種性質的調節，增速俄國自由奮鬥

的過程』(愛姆非體特羅夫(Амфитров))，她們所表現的悲劇與命運，就如同那些偉大的俄國革命婦女一樣。俄國婦女爲她們後來的女同胞指示了將來的道路，猶太女子西西里亞·古麗維支(Cecilia Gurevich)也有同樣的事——普雷卡諾夫(Plekhariov)派之俄國馬克斯主義者達赤(L. Deutsch)說她是頭一個馬克斯婦女——她遇着達赤的時候，正是他自『卡脫喀』回來時，那時俄國革命的歷史，已經發生了新形式。

二 赤色十月之前夕

在亞歷山大第二被刺之後，毫無準備的亞歷山大第三登基——嫡親太子已於成人之後死了。波克羅夫斯基(POKROVSKIY)在他的俄國史上寫道：

假如必須以徹底的恐怖來刺激新沙皇，那種目的不能達到。因爲這個可憐的傢伙完全沒有腦子：他叫喊，一方面同意於那些說俄國必須有憲法的人，同時又同意於那些說俄國如果有了憲法必至崩潰的人；他給與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命令，因此，他的大臣們只有等待他恢復意識

那個時候。但是，這個沙皇的恐怖，成爲較之亞歷山大第二初臨朝時的『仁慈』還沒有用。

一八八七年，亞歷山大第三，在教育總長的報告上塗上著名的幾個字：『不再要教育！』最暴虐的政府的恐怖，在普雷未(Pléve)——他後來被暗殺了——指揮之下，反動勢力也開始慶祝積極的歡宴了，並且用每種可能的方法，包括對於猶太人的殺戮，以引開人民對於實事的注意力。出版檢查比已往更嚴格。那時的政治問題，只能以伊索寓言的方式來討論。西比利亞也不相宜於『政治犯』了；他們都送到沙克黑林和更荒涼的地方去。進求學的機關更是困難，限制到最低限度；同時女子大學院也關閉了。但是，因爲婦女求學的熱心並未減退，所以大批的女學生又都開始上外國。與以前不同者：以前她們到瑞士去學醫，以便『到民間去』並且爲『以民衆的力量來幫助民衆』之奮鬥打下基礎——這個試驗已經失敗——現在他們都到德國去，在那兒，西歐勞工運動之知識的領袖——利普克內喜特(Liebknecht)，培培爾(Bebel)，考茨基(Kautsky)——非常地活動，並且俄國的青年人在那兒可以從事於研究政治科學。

那時的沈寂，不過是表面的。在餘燼之下，火焰還是在燃燒，大半聚集在瑞士忍受饑饉的俄國

政治亡命客，於一八八三年秋，組織了第一個社會民主的「勞工解放團」；以苦心募集起來的錢，印刷革命小冊子和傳單，非法地散布於俄國。這個團體的主要人物是俄國馬克斯派的理論的創始人普雷卡諾夫，他說俄國已經成爲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了；還有維拉·薩索里支，她那時正住在瑞士，也以特別的熱心，從事研究馬克斯與昂格斯的主義，這時她已是四十歲了，第一次執筆開始寫文章，在俄國馬克斯學說上佔很重要的位置。

那時有一個從俄國去拜訪她的人，描寫她所住的房間：「傢俱甚至比普雷卡諾夫的還壞，大桌子上鋪滿了練習本和書，還有大量的香煙頭。在窗臺上有一個酒精燈和一個咖啡鍋子，維拉伊發諾夫娜（Vera Ivanovna）每一點鐘都從這個鍋裏，替我們倒濃黑的咖啡……」據說薩索里支那時候只依工作與咖啡而生，她自己與達赤的通信，訴說她自己的生活 and 寂寞，並且哀悼一個人不能爲現在而工作，只是爲一個渺茫的未來。

「……如同一切俄國高雅的知識分子一樣，你知道我從前整天什麼事都不作……現在我於清晨兩點鐘之前是不停地寫東西……好幾個月我不同一個人說話……我差不多每月

至日內瓦去看喬治（普雷卡諾夫）……時常與他討論事件，結果他已解決了一些問題……我的生活就是這樣下去，沒有伴侶，不讀新聞，或自己沈思……」

整整十年過去了。自國內來的消息，漸漸地明白表示國內已經產生了勞工運動，起始是由最早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發動的。俄國的確又被秘密之網布滿了，這個發展很快的勞工運動的組織者，是以前巴苦寧的信徒，和「拿羅多瓦爾茲」後者現在宣佈信仰馬克斯主義。

假如我們回想七十年代富於個人犧牲運動大半是知識階級的工作，又回想到「拿諾德尼基」以巴苦寧所謂的「天生的革命者」農民——他的鄉村組織「米爾」被認為是未來國家的細胞——之助而猶不能使革命成功，這個變化是完全可以了解了。只以恐怖為革命工具的「拿諾多瓦爾茲」也不見成功。因為他們兩派出生早了數十年，不能夠煽動農民與新生的工人階級無抵抗力的羣衆。再者，知識階級對於勞工運動之重要也缺乏了解：「拿諾德尼基」認近代的工業工人與農民沒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工人比較地有接收性。「拿諾德拿瓦爾亞」甚至不知道如何的創造羣衆運動；只是從事於煽動個人，因此在八十年代之中，他就消滅了，在工人中一些痕跡

都不留。自然，對於女工人也有同樣的情形，雖然我們知道那些主要的革命婦女努力於自沈睡中喚醒工廠的女工人。當俄國革命的馬克斯局勢之前，在工人婦女中甚至一個值得特別提到的名字都沒有。

僅只因為進步的工業化，所以這種變化發生了，上面所提到的俄國化的馬克斯主義之深入，也由普雷卡諾夫和他那一派的人所達到了，舊有的革命運動分散了的勢力，也以復活的熱誠附從他們。與『俄國社會民主黨』(Party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連合起來，他們自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之間，出版他們的雜誌『勞工』在工人中不斷地施行活動的宣傳，那時的工人，因為進步的工業化，已經由封建的農奴制度轉到現代化的勞工奴隸了，這時從這些馬克斯主義者那裏，知道外國有所謂保護立法和工作時間的法律規定。在這個早年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中——順便提到，這個黨是一個布爾加(Bulgar)人所創始的——，有少數知識階級婦女佔很重要的地位，我們以前所提到馬克斯主義者西西里亞·克麗維支也包括在內，她在女工當中發散違禁的文字。其他的一個社會民主團體繼之而起，雖然他們不久就解散了，但是一代的有無產階級意識的，社會主義的勞工羣衆漸次發展了，他們在知識階級領袖之下已經開始工作了。個人

的名字也有顯揚的了。

現在馬克斯主義之勝利的進行，在沙皇的帝國開始了，自然沒有機會發展。俄國雖然是比較落後的國家，但是有許多緣故能使社會主義的種子，在這個肥沃的土地上產生豐富的收穫。俄國知識階級較之其他國家，有比較好的準備以接受社會主義的理論，因為馬克斯的理論是從黑智爾的結論出發的，而黑氏的哲學在俄國是很熟習的，並且在俄國人的腦中，辯證法那一派的學說已經有三代的歷史了。同時，城市工人較之其他國工人也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教訓，因為俄國落後數十年的工業資本主義，將資本主義早期的現象跳過去了，逃避了過渡階段，建立了無數巨大的工廠，工人羣衆不但由於無限制的剝削，並且由於集合生產的過程，而訓練成階級意識的羣衆。因此，在大戰之前，有幾個具備先進資本主義之特徵的工廠，已經成爲革命的策源地了，而俄國的工業工人，雖然他們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國家中其數目並不多，然而近代工業無產階級的純粹的代表者。

在九十年代之初，這個運動沒有什麼阻礙。這時在聖彼得堡有一個真正的工人組織，有二百個工人階級的分，由社會民主黨和「拿諾多瓦爾茲」領導。在這個組織中已經有一些女工人

了，她們不久在運動中取得重要地位，終於在數十年的奮鬥路線中保留她們的地位。在早期的婦女工人中之著名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女裁縫工人叫格麗哥利娃（Grigoryeva），她於一八九四年被捕，判五年徒刑送至東西比利亞，一九〇一年，她是薩拉托夫（Saratoff）地方的工人委員會的活動分子，又復被捕於一九〇五年，在俄得薩（Orsk）與社會革命黨共同工作，又被監禁。格麗哥利娃是在聖彼得堡一個私生子孤兒院長大的。此處所提到的事是值得注意的，這個孤兒院是被認為革命黨的策源地。聖彼得堡的社會主義的工人婦女，有一羣是孤兒院中的同伴；一部分是在別處工作，一部分是在院中。

我們要知道婦女對於早期的社會主義組織之影響如何的強大，在諾林斯基（Nolinskyi）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來，我這裏引證的是塞德堡門（Zederbaum）所著的『俄國革命運動中之婦女』

我們的新的女同志，給與這運動以新生命。婦女射出精力，同時對她們的敵人享受階級射出憎惡，而為他們對於母親那一輩婦女所作的惡事而報復。她們有許多與思想相同的工人結

合，一直奮鬥到今日。因此，她們成爲一代新工人的母親，最重要的就是她們在困難的時候，減輕丈夫的責任，有的自己擔負歷來我們男人獨自擔負的事。

在以上的字句中，表現婦女與社會主義的工人合作之重要，他們現在漸漸知道在他們的生活中，婦女是他們的同志，是他們鬭爭的伴侶，以前他們不但要與階級的仇敵鬭爭，同時在家庭中是漠不相關而又缺乏了解，因此消耗了他們的精力於家庭鬭爭之中。

一八九五年，在聖彼得堡有了一個『勞工階級解放戰鬭聯合會』(Figh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列寧也是其中會員之一。因爲羣衆組織增加的精力，所以這個戰鬭組織能於第二年發動了一個三萬職工的大罷工，甚至遙遠的省分的工人，都加入此次的罷工，結果有了一個著名的實際上的成功，就是縮短工作時間。全體的青年馬克斯主義知識分子，都屬於這個戰鬭組織，牠是在較成熟的社會民主黨指導之下。執行委員會中有四個婦女，其中之一就是拿地雪達·克魯普斯卡亞(Nadyeshda Krupskaya)，她以後成爲列寧的妻子，又是他奮鬥中的助手。

克魯普斯卡亞於八十年代之中畢業於文法學校時，正是俄國反動最利害的時候，她離開學校後，對一個舊的而又時常翻新的問題求解答：『將要作什麼？』這個時候是不宜於尋求了；在『拿破德拿亞瓦爾亞』失敗解散之後，差不多的知識分子，對於革命運動之成功都失了信仰。代替托爾斯泰的屏棄武力的理論而發生的，是人們所信服的『小事業』（Small deeds）的理論，這種理論於社會活動是有限制的，但是適於現存的統治的。當她研究教育原理時，克魯普斯卡亞認識了許多不同的激烈團體的人，於是起始鄭重地研究馬克斯，自一八九〇年至九一年，在聖彼得堡的『斯摩楞斯克工人學院』（Smolensk Workers College）教書，她在那兒於工人當中作馬克斯主義的宣傳。如同其他的工人學校一樣，這個『斯摩楞斯克學校』是無產階級工人和社會民主黨組織天才之蓄藏處，所以革命運動不斷地增加其新勢力。

列寧也是同一時代，在這造出克魯普斯卡亞的學生的工人團體中活動，在她的回憶錄中關於這個時代有以下的記載：

一八九四—五年之冬，我已經很熟知夫拉提密爾·伊利支（Vladimir Ilyich）了。他正

從事於尼夫斯基門 (Noviky Gate) 外的工人研究團體。我在這一區已經在「斯摩楞斯基星期成人夜校」 (Smolensky Sunday Evening Adult School) 教了好幾年的書，對於工人階級的生活，非常熟習……這個「斯摩楞斯基學校」有六百學生……工人們對於這個「學校的女管理員」表示無限的信任……有一個患肺病的紡織工人希望這個教員有一個好的未婚夫，因為她曾經教過他們讀書寫字……又有一個工人，他是一個宗派的信仰者，消磨他一生以尋求上帝，他現在很滿意地說他僅僅在大齋節（記念耶穌於荒野間之禁食，在復活節前四十日間）之時，纔知道完全沒有上帝。現在一切事都變順利了。因為再有比當上帝的奴隸更壞了，你不能對他作任何事。但是是一個人類的奴隸比較容易些，因為還可以奮鬥……一個一條腿的兵走近來說：「你去年所教他讀書寫字的米卡爾 (Mikhail)，已經為工作的疲勞而死了；當死的時候，還想着你，叫我替他問你的好，並希望你百年長壽。」有一個沙皇和牧師之驕傲的擁護者的紡織工人，給與一種警告說：「小心那個黑的傢伙，他在那兒不住地巡劫。」一個年長的工人辯駁說他或許不能不作一個教會的長老，因為他很討厭那些牧師的欺騙民衆，應該讓他們去清清楚楚地看看一切事情。但是他絕不信仰宗教，並且充分了解發展之情形。

屬於我們組織的工人……不盡以同樣的眼光來看一切的女教員。他們分別教員精通我們團體的工作到何種的程度。假如他們認出一個學校女教員是「我們的人」他們必定以言語或其他方法使她也知道他們。譬如，在討論手藝工業問題時候，他們可以說：「一個手藝工人不能與大規模的生產對敵。」或者他們要插入一個主要的問題：「一個聖彼得堡的工人與一個阿康哲爾（Archangel）的馬施克（Mushik 意即農民）有何分別？」之後，他們必定要對這教員施一個眼色，並且用特別的方法向她點點頭。

這個時代克魯普斯卡亞的學生，有許多後來在俄國勞工運動和革命中佔很重要的位置。她自己在學校工作五年之後就被捕了，判三年徒刑充軍至西比利亞。政府允許她的請求，不將她送到耶尼塞伊斯克（Yeniseisk）所轄之烏法（Ufa）去，而送至西比利亞，與列寧那時所充軍的地方是一個村鎮；她那時與他正式宣佈訂婚。

以後列寧在牟尼克（Munich）出版了他的『伊斯科拉報』（Iskra 意即火星）——薩索里支這時也在牟尼克，他稱她有「透明純潔」的性質——以後又在倫敦出版；克魯普斯卡亞隨

着他在外國，作黨內的編輯祕書，直到一九〇三年。她不知疲勞地工作，維持與俄國各團體之複雜的，陰謀的，重要的關係，我們不能在推敲『伊斯克拉』中所宣傳的觀念，來對她過分地尊崇。一九〇三年會議之後，黨內分裂為孟雪維克（Mensheviks）與布爾雪維克（Bolsheviks）兩派，克魯普斯卡亞保留着她布爾雪維克中央的書記的地位，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

同時，俄國勞工運動與婦女在運動中的重要，一年一年地增加。亞歷山大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y）說：『階級的健全本性，逼迫婦女們去擁護罷工，婦女自動組織與領導工廠暴動的事，也不在少數。』在一八七二年莫斯科，和一八七四年聖彼得堡的紡織工人的勞工騷動中，女工也參加活動。在夫拉提密爾（Vladimir）省的紡織區阿里科沃—蘇耶沃（Oryekhovo-Suyevo）之著名的勞工暴動中，領袖者是婦人，這次暴動使政府答應禁止婦女與兒童夜工。總而言之，我們值得注意的，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初，一再煽動俄國無產階級罷工與工人暴動的主要的浪潮，大半都發生於紡織工業中，因為在紡織工業中，工資較少的女工佔多數。無疑的，我們要將那一時期的經濟與政治鬭爭的大部分功績，歸之於婦女，不是言過其實的。

九十年代，俄國工人的工會與革命策略發展了。一八九六年的紡織工人的罷工是一個關鍵。

但是較早在一八九五年，俄國勞工運動的歷史記載了一次罷工，就是所謂「拉弗爾門之暴動」(Revolt of Laferme)。「拉弗爾門」是女煙草工人的工作。起因是由於宣布減低已經減到無可再減的工資。這一次又是婦女勇敢地向前，第一次組織一個團體。她們不但打破了工廠的玻璃窗，毀了機器，並且抵死地反抗警察，直到叫來了救火隊，將救火皮帶向着她們，纔四散逃走。這是很重要的。此次罷工是羣衆憤怒的暴發的事件；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對於整個的行動完全不知情，這完全是婦女自己所作的。

一八九六年歷史上紡織工人的罷工，也是由於婦女發端的，她們和男人一起打倒了器具，離開了工廠。一八九八年，馬克斯韋爾(Maxwell)和巴爾(Ball)的工廠主，想施行更壞的工作條件及減低工資，引起了罷工，但是這些工廠都是有組織的。

在工人與警察間，發生了工人以後稱爲「求公平的鬭爭」。有十五個人被捕了，帶至法庭之後，他們拒絕辯護人的勸告，不求訴於沙皇，其中有四個婦女，她們參加了很重要的部分，這次也與警察鬭爭。有許多婦女被鞭流血，其所表示的勇敢與果決，不亞於男子。

三年後，發生於阿布科夫(Obukhovo)工廠的，有六千工人的著名的「阿布科夫防護」

(Obukhove Defensive)，其情形更嚴重，犧牲者更多。他們抵抗騎馬的憲兵軍隊和警察的共同合作，經過五小時，軍隊們都自由的開槍。附近紙盒工廠的女工，趕來幫助他們，她們圍裙內帶着石頭，是她們和她們的小孩從路旁拾起來以抵抗攻擊的。消息立刻傳佈到一切工人區域，流血的鬪爭一直相持到深夜，並且還有要發生更嚴重的暴動之虞。自得當局暗示，壓迫停止了，並且宣稱準備作某種讓步。

在參加鬪爭的三十七個被捕的人中，有兩個十八歲的女孩。有一個帶去審判。雖然她很年青，公共檢察官對她宣布了很重的罪，因為被告在頭審中自己承認她的行動是經過詳細的考慮的，她明白她的責任，她是由於與工人的同情而動作的。她判處三年的監禁。這個『阿布科夫防護』——也稱爲『什律塞爾堡區之鬪爭』——第一次證明了工人在急需情形之下，不但能與警察對敵，並且同樣能對抗軍隊，並且證明了在工人與國家軍隊間之巷戰，不是因爲失敗而終止的。在聖彼得堡的無產階級中，留下了長時間的痕跡。在俄國革命史中，這次婦女居重要地位的鬪爭，直接地領導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鬪爭。

勞工運動的猛烈的增長雖然由於俄日戰爭而受了阻礙，但是在一九〇五年之始，牠更激烈

地發生了；因為辭退了四個工人，引起了聖彼得堡的浦提羅夫（Putilov）工廠的罷工，結果這次的罷工出名了，並且立刻遍佈到城市的一切工廠。一月九日——以後在歷史上稱爲「血的星期日」——加蓬主教（Pope Gapon），由於他所接近的工人所鼓動，使這巨大的罷工成了俄國空前的示威。帶着聖像，沙皇的像片，這個巨大的羣衆，這些男女工人——工人的妻室兒女母親也跟着——的行列，到冬宮去向沙皇請願。羣衆受了一排槍……沙皇和他的政府所有誠實的每種痕跡，都在這幾個鐘頭之內抹去了，當天在聖彼得堡的發西里—阿斯特羅夫（Vassilyi-Ostro）區，第一次築起了防塞……那早上，一個婦人在熱烈地參加爲『聖彼得堡工人血的洗禮』那一天的準備中，向前來作一個演說家——克累尼娜（Karolina），一個女工人——對她的聽衆說以下的話：『各位母親，各位太太！不要阻止你們丈夫和弟兄去爲公平的主張而犧牲他們的性命。我們一起來！假如他們攻擊我們或者開槍打我們，不要哭，不要傷感，作看護婦團體！這是一束紅十字，縛在你們袖子上，但是不要在他們開始射擊你們之前。』這些簡單的話，引起了婦女的熱情，有一個親眼看見的人說，她們同聲一致地回答：『我們願意和你一起走。』一千餘人因爲無恥的奸謀而犧牲了性命。其中有婦女與小孩。有一個叫着柏提徹夫斯卡亞（Berdichevskaya）的婦人，站

在木柵上參加巷戰，受了四槍，第二早晨死了。在死之前，她再三地說：『我在木柵上這件事，我一點也不後悔……』

聖彼得堡的屠殺，引起了全國憤怒的吼聲。巨大的，兇險的，氾濫了一切生物的罷工浪潮，挾着威嚇，不但掃蕩了工業中心，甚至及於很小的村鎮與居留地。政府竭力地以武力壓制這運動。但是在這一年中，各處還是繼續不斷地發生暴動：在里加（Riga）和華沙（Warsaw）有開槍掃射的事，伊梵諾沃—沃斯尼新斯克（Ivanovo-Voznyessyensk）的紡織工人也受了射擊。但是戰艦『波太門金』（Potyomkin）的叛變和俄得薩（Odessa）的總暴動纔是這次事的最高峯。

我們自愛伊生斯坦（Eisensteina）的偉麗的影片中，很熟知這些事。所不很知道的，就是一位婦女茵娜·斯密多維支（Inna Smidovich）所擔負的重要事務。自九十年代以來，她一直是『戰鬥聯合會』（Fighting Association）的執行委員，在克魯普斯卡亞去國之前，她是列寧的『伊斯科拉』的書記，並且在俄國祕密地分散這個刊物。

一九〇五年，斯密多維支正在俄得薩，她在兵士與水手當中，作很危險的宣傳，她裝着是一個『兵士的女孩』，在兵營中，駐防所和兵士的酒店中遊行。她不久對於兵士有了驚人的影響。一九

○五年之末，當騷擾整個的塞巴斯托波爾（Sebastopol）的軍艦『浦魯特』（Prut）叛變時，她在數千兵士與水手的集會中，作煽動的演說。她因此在城裏成爲著名的人了，當這次叛變平定後，她不得不在很大的危險中，自克利密阿（Chimera）逃走。

這個婦人的鎮定，由於她在一九〇二年因爲帶着違禁品『伊斯科拉』到俄國，在基輔被捕，又從憲兵手中逃出來這件事，就可以證明。在到法院的途中，她要求守她的憲兵允許她上警察站的院子中的廁所。當守衛兵在門着的門外等她出來時，她以輕快的速度，脫下值錢的皮衣和披風，結一條手巾在頭上，換上穿在裏面以備隨時應用的『貴婦』的衣服之下不值錢的短衣，離開了廁所。這個改變是如此之快，她的外貌是如此之不同，以致憲兵們都拿她當作另一個人，毫不加干涉地讓她走了。等到這個計策發現之後，已經找不着斯密多維支的踪跡了。

我們知道，歷史的前進，在俄國已不能阻止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年後之同月，終於根本地推翻了舊俄——總罷工之後，俄國之羅曼諾夫皇朝的最後，最微瑣的尼科拉斯第二，發表了一個宣言，其中允許賜與人民一個憲法。包含在憲法中的讓步，的確很少，但是那些讓步使鬭爭的新方法成爲可能，並且造出許多機會使勞工運動得以利用牠們。

假如我不稍稍提到與勞工運動有關的婦女運動，則我以上所說的婦女在俄國勞動運動中之地位的敘述不算完全。在一九〇五年之前，甚至在稍後一些時候，婦女運動還很和諧，左翼婦女在那時候表示她們是很急烈的，很革命的，雖然她們的資產階級態度是漸漸變為單純了。但是在國家工業化前進時，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勢力一天一天地強大時，已經發現於西歐各國的分裂，在俄國也勢所難免。因此，在沙皇時代的俄國，也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後者漸漸失了牠的勢力，同時前者漸漸地普遍在羣衆中。無產階級鬭爭的要求，代替了純粹婦女的要求。一九〇七年，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女工人，開初次會議，女工上臺演說，她們不但注重她們與資產階級婦女之不同，並且宣稱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與社會主義旗幟下之革命鬭爭是一體的。保護婦女勞動，對於母親與嬰孩有利的工作，婦女政治平等權等等要求，首次在此討論。革命勞工黨與婦女運動之關係，同樣熱烈地討論。

資產階級婦女中之左翼集中在「婦女政治會」(Women's Political Club)，她們在聖彼得堡成立了四個婦女工人團體。但還是不能阻止無產階級婦女自歷來和衷共濟的婦女運動中

退出去。因為這些差不多可稱爲『自修的會社』的婦女團體是很受歡迎，於是社會民主黨的婦女計畫在一九〇七年開始成立她們第一個團體，名稱是『婦女工人互助社』(Society for Mutual Help Among Working Women)。這個社是由婦女支配。一九〇七—八年的冬天，一部分女煽動家，受了黨的命令，叫她們去勸說無產階級婦女，來作革命的階級鬭爭，她們起始在這個社的社員——三百左右——中活動，社員雖然有男人，但是大半是女紡織工人。這羣煽動者中的領袖，就是未來蘇維埃的外交家亞歷大拉柯倫泰，她於一九〇七年被派至斯圖加特(Stuttgart)的『社會主義婦女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Women)去。在會中，講演，討論女工的集會等，不出警察規則之範圍內者，都舉行了。後來，因為反動的新潮，這個社被封了。柯倫泰在她所著的『俄國勞工婦女運動史』(History of the Women Workers Movement in Russia)中說：『但是牠的活動，很清楚地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在普累特契斯卡亞(Predtychenskaya)這個社團中，在俄國無產階級婦女的廣大羣衆中，爲革命的階級宣傳打定了基礎。』

一九一三年三月，由於紡織女工的煽動，在聖彼得堡慶祝了婦女節，這些紡織女工人，自始至

終都是革命的挺進隊。在俄國勞工運動史上，這一天是俄國工人婦女在國際勞工運動上取得地位的一天，普拉夫達（Pravda）對於牠寫熱烈的文章，甚至國會也作冗長的演說。並且正式的給與婦女國際一封賀電。

第二年，在莫斯科，薩馬拉（Samara），薩拉脫夫（Saratov）等地方，都慶祝婦女節。在聖彼得堡，一直到現在還存在的雜誌『拉波特尼查』（Rabotnitsa 意即勞動婦女），乘此慶祝時機，第一次發行了，聖彼得堡工人第一次舉行巨大的遊行——這是一個莊嚴的示威，接着又舉行羣衆大會，會中高唱革命歌，在這莊嚴的城市的街上，第一次飄揚着紅旗。最後由警察將遊行示威的人驅散了，並捕了一些參加遊行的人。

世界大戰發生於俄國工人正在作革命鬭爭事，戰爭的前幾年，妨害了勞工運動。但是由於戰爭所給與這個巨大帝國的民衆的痛苦，與饑饉所生的憎恨，革命運動反暗地裏得着了新勢力，並且準備作新的進攻。這一次又是俄國勞工婦女首先表示羣衆的憤怒。『一九一七年二月的國際婦女節，是俄國革命的第一個偉大的歷史的一天，』牠推翻了專制主義，並爲『紅的十月』作下準備。杜洛斯基（Trotsky）寫道：『屬於資產階級的，因革命而受損失的律師與新聞記者，消費了

無量的墨水以證明二月革命所發生的，不過是裙帶的革命 (petticoat rebellion)，以後又繼以兵士的叛變。」但是杜洛斯基又說：

事實上，二月革命是始於下層的……是由於最受壓迫的，最受蹂躪的無產階級——紡織女工，其中無疑地是有兵士的妻子——自己一致的意志所發端的。蔓延的麵包線 (bread lines) 供給了最後的刺激。這一天有九萬男女工人參加罷工。鬪爭的方式，採用示威，集會，與警察衝突……。婦女羣衆——不盡是女工人——蜂湧到市議會去要求麵包……。婦女節在熱情與沒有犧牲中，成功地渡過了。

一個親身經歷者，描寫婦女在那歷史的二月二十三日（舊曆二月二十三日即三月八號）的情形：

勞動婦女，由於饑饉與戰爭，將她們驅於絕望之中，她們以自然力的猛烈，像能毀滅一切的

暴風那樣地衝來了。這個充滿了由於數千年受壓迫所生的憤怒的勞動婦女的進行，是使二月革命的大火焰燃燒的火星，這次的革命將要推翻了專制主義。

一星期之後，『普拉夫達』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爲『偉大的一天。』

在大戰之前，無產階級國際早已宣布三月八號爲國際婦女節。一星期以前，培德羅格拉德（Petrograd）當局，想要阻止勞動婦女慶祝這個節日。因此引起了衝突，首先發生於浦提羅夫工廠，這個衝突使示威變爲革命了！『革命的第一日——也就是婦女的一日，』勞工婦女國際的一日。一切光榮都是屬於婦女的一切光榮都是屬於國際的！『婦女在她們的那一天，首先踐踏培德羅格拉德的街道。』在莫斯科，時常是婦女在左右軍隊的態度：她們進入營房，勸誘兵士參加革命，兵士也就服從她們。一切光榮都是屬於婦女的！

在接着的『震動世界的五天』中，俄國婦女對於她們的歷史的任務，對於她們革命的因襲

信仰，都保守着忠實：

她們跑到哨兵線比男子還勇敢些，拿起來福槍，懇求，差不多是命令：『放下你們的刺槍——跟我們來。』那些兵士很興奮，很慚愧，彼此交換不安的服色，猶疑不決；有的人首先決定他的意見，一面很羞愧地舉起刺槍放在肩上，一面向前進。隔膜打開了，一種快樂的，歡迎的呼聲：『快哉，』響徹雲霄。兵隊降服了。每處都有辯駁，責備，祈求——革命又前進了一步（杜洛斯基：『俄國革命史』）。

由此我們看到俄國婦女向着達到新俄國那條長的，荆棘遍地的路，那條革命的路走，關於這點，我在此已經簡單地敘述了牠的最重要的階段：由於使得她們的男同志慚愧，大膽，不迫死的勇敢，她們的眼光是注意於超越奮鬥與流血的犧牲之上而向她們招手的未來。

那個未來——已經成爲俄國今日的現在——如何牠給與了俄國婦女一些什麼？牠完成了她們多少希望？這是本書以下要依次解答的問題。

第四章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與婦女解放

一 列寧與勞工婦女

……在培德羅格拉德，在莫斯科，在城市和工業中心，甚至在鄉村中，無產階級婦女在革命中很莊嚴地經過了試驗。沒有她們。我們不能勝利或者幾乎不會勝利。這是我的觀念。她們已往是如何地勇敢，她們現在還是如此！試想她們所受的困苦饑寒，她們誓死忍受，因為她們要去建立蘇維埃，她們希望自由，希望共產主義。是的，我們的無產階級婦女的確是偉大的階級戰士。她們應當享受欽佩與愛慕。再者，我們必須承認，就是培德羅格拉德的「立憲民主黨」的貴婦們，在與我們對抗中，也比她們的年青的貴主還勇敢些。

——列寧

「每一個廚子都應當去學習治理國家。」列寧這句似是而非的話，現在差不多已有一半是

真的了，在俄國婦女史中——自然不是單單的俄國婦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翻開了一頁新史。列寧在另一段中說：

……假如我們不包括婦女在內，要取得民衆使其趨向政治，是不可能的……爲我們的運動，爲我們的鬪爭，尤其爲社會的共產主義的變化，我們應該取得城市與鄉村中無數的勞工婦女。如果沒有婦女，就沒有真正的羣衆運動。蘇維埃政府所開始的工作如要達到勝利，不是需要數百的婦女參加。而是要無數百萬的俄國婦女共同努力……。

又說：

在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要參加政治必須有特別的訓練，即使在最前進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婦女參加政治都是很少，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但是，我們使每個勞工婦女都能接近政治，這是我們的任務……。因爲在私有財產及土地工廠私有制度取消之時，地主與資本家的

勢力就破壞了，政治的責任對於勞工羣衆就會成爲很簡單的，並且是人人可以參加的。

一年以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第一次舉行『全俄無產階級勞農婦女大會』(The Russian Conference of Proletarian and Peasant Women)，差不多有一千二百個代表，代表蘇俄近百萬的勞工婦女。

主要是由於勞工婦女本身，發動了這個大會的觀念。開了一個特別辦公室來籌備一切，在莫斯科與培德羅格拉德的工廠中，舉行了許多次會議，宗旨在介紹大會的任務與目的給工廠的婦女。因爲要喚醒各地的婦女，派了許多煽動家到全國各處去，她們不顧潛伏在各處的白俄衛隊所給與她們的危險，她們的任務很光榮地成功了，並且在各處得着熱烈的響應。

在一九一八年，當內戰仍在進行時，當我們仍在與饑寒及空前的荒災奮鬥時，當我們仍須去打倒各處的敵人時，就是在這種危機中，無產階級勞農婦女大會召集起來了。無數的勞動婦女，自遙遠的工廠和鄉村中，帶着她們的怨愁，痛苦，疑惑和大大小小的掛慮，來赴會。她們都要聽

列寧解釋因爲什麼十月革命之後和平還未來到，因爲什麼饑寒還猖獗於全國。那些毫無經驗的婦女羣衆，一些也不知道社會主義建設之路是如何地艱難，如何地遙遠，不知道要克服多少阻礙之後，纔能達到無產階級最後的勝利。勞工婦女對於這次的大會有無限的希望……尤其對於和平的問題希望得着解答……。在實質方面，她們希望知道在什麼時候纔能得着麵包與煤火。甚至關於她們個人的生活。她們的 *жизнь*（新生活）的問題，都不斷地發生。社會主義化，兒童教育，食物價值等問題都提出來了。黨組織了一個革命婦女羣衆挺進隊，並且指導她們做建設工作。

以上是一位蘇聯最有勢力的婦女紐麗哪（*Nurina*），對於紅色的莫斯科所舉行的俄國解放後的婦女第一次公開大會報告之結論（『爲新社會奮鬥中之婦女』）。

在第一次無產階級勞農婦女大會中所通過『蘇俄勞工婦女之職務』這個議案中，其注點是：因爲婦女解放的情形，恰和整個無產階級之解放所需要的情形相同，所以勞工婦女的問題，沒有脫離開整個無產階級之問題而單獨解決的必要。

因此，在蘇維埃中，不需要組織特別的婦女團體。「組織是由於我們的意識形態來決定的。共產主義婦女沒有特別的組合。一個共產主義婦女屬於黨而成爲一個黨員，就如同一個共產主義的男人一樣，有同樣的義務與權利。在這點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黨內必定要有機關，工作的團體，委員會，或者無論你喜歡叫牠們爲什麼的一種機關，牠們賦有特殊的責任去喚醒婦女羣衆，使她們與黨聯合，永久在黨的勢力之下。自然這就是說，我們要在婦女羣衆中進行有系統的活動。我們應該訓練那些已經覺悟的，使她們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爲無產階級奮鬥而工作，並且應該充實她們。」這些列寧所說的話，現在已見諸實行了，婦女不久組織成了這種機關，以她們自己的方法來工作。

同時，在男子羣衆中也實施一種有力的煽動，使他們明白婦女享有平等權之重要，及婦女參加建設工作之意義。列寧在與克拉拉·西特金（Clara Zetkin）的信中，對於這個實際政治家的任務，有以下的意見：

很少的人，甚至在無產階級中，能够想到：假如他們幫助「婦女的工作，」他們能爲婦女減

輕多少的勞苦與疲倦，實際也是救了她們。不，那是與「男子的權利與尊嚴」相矛盾的，男子是應該享受平安與舒適的。婦女的家庭生活，使她每天犧牲在無數極小的瑣事中。古時貴族男子的權利，還是暗中存留着。在客觀上說，他的奴隸乘機爲她自己報復。也是暗中地。婦女的落後，她們對於男子的革命理想之缺少了解，在奮鬥中都能減低男子的快樂與果決。她們就像極微小的寄生蟲，不知不覺地在破壞，在腐蝕，很慢地，但是很確實地。我了解工人的生活，不僅僅從書本上得知的。我們在婦女羣衆中要做的共黨主義工作，我們在他們之中要做的政治工作，包含訓練男子之最大的努力。我們要徹底鏟除舊時的貴族與主人的眼光。在黨中和在羣衆中。這就是我們政治工作之一部，其切迫的需要，就如同我們要徹底地在理論與實際中，訓練男女工作同志，在勞工婦女中，實施我們黨的工作一樣……。

在首次婦女大會閉會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都附設有特別委員會，以便在婦女中鼓動與宣傳，其責任就是組織有系統的吸收新黨員之工作，處理集會，演講，和出版特別刊物等事。因此代表會議在蘇聯就組織成功了，牠後來成爲一個固定的會議，關於牠，我們以後再講；並且

一些資產階級國家——如德、英、芬蘭、美——在一九二四——七年間，盡量模倣。這些會議到現在充分地證明了牠們的價值，牠們是無產階級勞農婦女在實際政治方面之教育的方法，並且是黨與羣衆間之重要的鏈鎖。

此後婦女以一種緊張的，驚人的活動，開始工作。「在與共產黨和工會合作中，無產階級專政自然努力於克服男女的反動態度，毀滅陳腐的，非共黨主義的心理基礎。男女在立法中應受同等的待遇，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在各方面找得出使男女平權在實施上之真實的努力。我們給與婦女在社會生活中，在行政中，在立法和政府中以地位。我們爲她們開辦教育課程與教育機關，使她們在工作和社會生活中更充實些。我們設立公共廚房，公共食堂，洗衣房，補綴處，兒童公育所，幼稚園，托兒所，及各種方式的教育機關。總而言之，在我們的綱領中，這一項是很重要的：一個單獨的家庭之家事和教育的職能，必須交與社會。在這種情形之下，婦女纔能自家庭奴隸生活中解放出來，纔能脫離丈夫的支配。在社會中，她們能夠按照天才與興趣，自由發展她們的能力。兒童比在家中，有更好的發展環境。我們在世界上有最進步的保護勞工婦女的立法，這種立法是由有組織的勞工代理人來施行。我們設立產婦院，婦嬰院，開辦看護嬰兒與孩童的課程，舉行產婦與嬰兒福利的

展覽會，及與此類似的事項。我們盡量努力減輕孤苦的和失業婦女的痛苦……。」

自從列寧在莫斯科『克累姆林』(Kremlin)的書室中告訴克拉拉·西特金這些話之後，已經十二年過去了。就是在這同一的『克累姆林』中，二百五十年前，婦女是被幽禁在她們的『閨闈』中的。蘇維埃宣布男女平權後，一共只有十五年。以下幾章我將要提到這十五年來所成就的事業。

二 『革命的女兒』

十月革命使婦女享受男女平等的權利，自然所給與她們的義務也是與男子一樣。因此，自始在前線上，在烏拉爾，在高加索，在西比利亞，在烏克蘭(Ukraine)，及在任何擁護革命成功的戰線上，都有婦女。在這種情形之下，大軍中也有了婦女，她們與紅軍一起，爲在內戰中新得的自由而戰爭，手上舉着來福槍，共同去忍受嚴厲的困苦。

婦女在戰時作看護婦已經成了很普遍的觀念。引人注意而出名的是克倫斯基(Korenky)的『婦女營隊』，甚至列寧對於牠都加以相當的讚許。但是，現在婦女受了『塔瓦里西支』(To-

Varishchi 卽同志的意思，俄文對於這個字沒有女性的稱謂）的熱情的洗禮，她們在「十月」的戰線上做紅色的兵士和偵探，做鐵甲車的駕駛者和革命裁判所的書記，做紅軍的看護婦，騎兵和機關槍隊兵，甚至做司令官。在婦女歷史上新的而又空前的事實——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戰線的女英雄都不能匹敵——就是在一切的行伍中，在一切的部隊中，她們都是很勇敢地堅守她們的防地，並且知道如何死於戰場。

關於俄國和其他國的知識階級所接受托爾斯泰的非暴力和容忍政治仇敵之理論，其立場要到如何的程度纔適合於階級戰爭的觀念，適合於無產階級獨裁和恐怖的必需，這自然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無論如何，這個問題不在此討論了。「你不能以一朵薔薇之蕾來解決革命」——我這樣地被列寧格拉德（Leningrad）的一位勞工婦女所教訓，她在階級鬪爭中頭髮都已變灰白了，並且已升到「勞工女英雄」（heroine of labor）那一級了。讓每一個人自己決定她這句話是對，或是錯。

俄國革命史仍然記念到無數的「革命的女兒」，她們自工廠中，鄉間，和留居地成羣結隊地走出來，當科尼羅夫（Kornilov）之戰時，單單自列寧格拉德到前線去的勞工婦女，就不下二十萬。



Title Page of the Soviet Russian Women's Journal Robotnitsa

(With Portrait of Lenin)

蘇俄婦女雜誌「拉波特尼查」之首頁

(附列寧肖像)



Petrova, A Woman Member of the Red Army
(Decorated With the Order of Red Banner)

佩特羅娃 一個女紅軍
(佩有紅旗獎章)

她們有許多就一去不返了。

那時有一個在布地翁尼 (Budyonny) 軍隊中作騎兵的女子叫波卡特 (A. Bogat) 的，在人物研究的選文中，描寫內戰時的婦女們，說她們努力參加爲無產階級獨裁的鬪爭，並且因此犧牲她們的青春。

波卡特以單純的熱情和靈活的描寫所告訴我們的事情，是非常的動人，並且使我們想起基督以前時代的俄國婦女之有口皆碑的勇敢，她們穿上男人的服裝，與她們的丈夫一起與羅馬人戰爭。

一個沙馬拉的鄉下青年女子叫頻尼科娃 (Pinyikova) 去到前線，穿上紅軍的制服，拿上來福槍，以伊梵頻尼科夫 (Ivan Pinyikov) 的假名，加入了紅軍。伊梵頻尼科夫的勇敢，時常使他的同伴驚服。他經過無數的戰爭，幫同擊退了許多次敵人的攻打。伊梵總是身先士卒，近卡利科夫斯基 (Khar'ykovsky) 的地方又有一次大戰。這次是一個長時間的戰爭，兵士們都精疲力竭。敵人不惜軍火槍彈就同雨一般地落在戰士們的身上，死傷愈來愈多了。進攻一再失敗。部

隊起始搖動了，戰士失掉了自信……類尼科娃火速地衝向前，並且大聲疾呼：「啊，同志們，勝利是我們的！」她風馳電掣一般地經過他們之中。大家同聲的答應：「好呀！」一心同意地向前進攻……敵人敗退了。

因為類尼科娃成了出衆的兵士，她被派去受機關槍隊兵的訓練。在她完成訓練之後，立刻又回到前線……

她的勇敢的事業很多——她們那一隊的勝利也多……
在與哥薩克兵隊對敵中，她誓死不屈，終於被害了……

另有一件勞工婦女的事件，她加入偵探隊，被敵人所俘虜了：

她被拖至白軍參謀部中。軍官的金質肩章。輝煌在燭光與火把之下。

「紅軍的司令那一個部隊？一個布爾雪維克，來呀，兵士們！剝他的衣服！搜他！」
她的衣服撕開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在襤褸污穢的衣服之下，隱蔽着一個女子。

粗而雄的聲音，堅實的構造，一切都像一個布爾雪維克的司令。

他們開始審問她。她來自那一個部隊，誰指揮這個部隊，他們有否軍火，什麼時候他們希望援助，等等問題。問題非常之多，但是她一個也不回答。

審問繼續了很長的時間，因為他們想從她得些消息。她受了三天三夜的苦刑，打得半死，並且不吃東西。

參謀人員又來了，又開始審問。這一次用的是和藹的笑容，勸誘，並且允許她自由。她還是不為所動。

再打她，將她幽禁起來。第二天——新策略：以槍決來恐嚇她，打她。問她關於紅軍的消息。在她眼前槍斃她的同志。她相信應該輪到她了。終於不能自這個受苦的婦人那兒得着一些消息。

白軍兵官狂怒了，令人打她七十五皮鞭。在打了十二鞭之後，她昏死過去了……

他們讓她活了，因為遇着這樣堅毅的婦人，在敵人還是頭一次……
以後她逃出來了。

我偶然在第一騎隊參謀本部遇着普羅特尼科娃(Plonikova)〔波卡特在另外一段這樣地敘述〕。我早已聽說她是第十九騎兵團的女英雄之一。但是，我所想像的她與實際的人完全不一樣。她的身量很小，並且是瘦而且蒼白，胸前佩着紅旗勳章，她一半還像一個小孩。只有她的光明的眼睛，燃燒着果敢與堅強的意志。

她曾經參加許多次的攻擊。近哥薩克的耶哥利茲卡亞(Yegorlytskaya)村之戰，對於她有特別深刻的印象。

敵人有力的兵勢，使得第十九騎兵團的一部敗退了。已經疲乏的兵士散亂了。只有普羅特尼科娃鎮靜。她騎在馬上，自前線的一端飛奔到另一端。所到之處，都燃起了男人的熱心……

在緊要關頭，她策馬前進：『開槍！』她帶領着全隊向前。敵軍擊退，紅軍帶着他們受重傷的同志，走出火線。

波卡特引述西比利亞報紙『紅鐘』(The Red Bell)所載關於科爾查克(Kolchak)進攻時死了四位女同志的報告；在她們作偵探的活動中，被白俄捕去害死了。一個在場的人描寫索

麗娜(Sorina)同志之死如下：

天黑下來了，我們都坐在那兒，等着知道今天應該輪到誰了。

他們時常是在半夜被叫出去。這一次也是如此。在關閉犯人的船的甲板上，忽然有一種反應的腳步聲。牠們很快的走近了。我們的心停止了活動，在我們腦中，閃過了一個問題：「誰該輪到誰了……？」

在暗中發出來一個低的，粗暴的聲音：「索麗娜快些出來……。」

但是這個驚人的，仍是一個小孩的女子，那時正在睡覺，在她醒了之後，開始鎮靜地脫她的衣服。在這寢室中不久聽見了低聲的啜泣，她的同囚者的眼中充滿了眼淚……。

脫了她所有的衣服——除了底衣——之後，她交與她的朋友，並且說：「請你交給我母親……。」她於是披上她的斗篷，向着我們說：「同志們，不要哭。我去死了，但是我確實地知道我爲什麼死的。蘇維埃勢力萬歲！你們也許可以由我們的同志救出來。但是我不能再見他們了。再見！」

既不流淚，也不抱怨，她安詳地走上甲板，一邊走一邊向我們說：「再見！」

他一去不返了。第二天有一個衛隊告訴我們，當她死前在衛隊處時，她脫掉了斗篷，交與站在她最近的白俄衛兵說：『告訴我的母親和同志們，軍中的雜役隊侮辱了我，拿鞭子打得我半死……』

像這樣的婦女，紅軍的女兵，是很多的，她們燃燒着熱情，好像只有婦女，母親——或者只有俄國的婦女——纔能夠如此。她們大半是貧農和婢女，是貧窮中之最貧窮的，她們特別殘酷地受困苦命運中之雙重的壓迫。她們以前從未脫離了惰性與被動，現在覺悟了，第一次意識到她們的人性，她們覺得應該不惜任何犧牲以擁護牠。只有少數人名留傳後世。但是她們的生活多半都差不多，在一切情形之下，是一樣地視死如歸。

在這些『無名女英雄』中，也有的不是俄國婦女。在編輯這敬獻與那些女英雄的『革命的女兒』中〔克拉斯納亞·諾威 (Krasnaya Novy) 1923〕有述及一個德國女子的：

喀拉克 (Kulaks) 指着她說：『這兒有一個共產黨！』

他們早已露出了如狼似虎的牙齒。匪人們，畜類們，非人的獸類們捉住了她，拖到冰凍的馬房。審問開始了：『別的共產黨在什麼地方？』她什麼也不回答。那一晚上他們拷問她……黎明時，這個農婦利·盧特（Lea Root）被害了……。

利·盧特是她那個村中（佛爾加（Volga）日耳曼人的區域）的執行委員會的分子，並且是食物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的羅薩·盧森堡（Rosa Luxemburg）作一個勇敢的革命兵士而死了，』日耳曼的農民說，他們並且追悼盧特同志的死。

當內戰時，蘇聯有六十三個婦女佩有『紅旗勳章。』大半這些不十分年青的，由於她們的勇敢而出名的女兵們，因為她們所受之非常困苦而早亡了。在『戰鬥婦女團』（Women of Fighting Ranks）團員中，只有二十三個『克拉斯諾斯納米昂基』（Krasnosnamyonski 即佩紅旗勳章者），她們都負有重任。

這個團體的主席，是一個哥薩克婦人，叫彭乃·維西乃科娃（Panya Vishnyakova）她原來是一個勞工婦女，自一九〇三年以來就是一個黨員，因為她在抵抗丹尼金（Denikin）之戰中有特別功績，所以得有『紅旗』。她在莫斯科研究馬克斯主義，並很熱心地讀德文，『如此纔能使她自己對於世界革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代表主席（deputy chairman）是布勒（Bulle）同志，她是一個美髮的，神經過敏的，女性很重的婦人，她是立陶宛人（Lithuanian），以前在政治部（Political Section），現在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她胸前佩有『紅旗』的星。她知道每一個她的戰爭同僚，並且能告訴我她們每一個人的仁慈而可愛的故事。

『紅旗勳章』會員佩特羅娃（Petrova）原來是一個礦工的妻子，年已六十左右，在西比利亞游擊隊中服務。她在早年讀了一點書，生了九個孩子。在內戰時，她差不多近五十歲了，她訴說她的母愛感情與公民感情如何地衝突，最後決定不顧一切加入軍隊。他們拒絕收納她，但是她終於得了允許。她化裝成尼姑，借此傳送重要的文件，因此作了許多重大的事。在契塔（Chita），她設法混進了敵人的司令部。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她得有『紅旗勳章』。

據布勒同志說，在偵探隊中和機關槍隊中，有不少的『紅旗勳章』會員有一個槍手馬拉賽。波波娃 (Marusya Popova) 加入軍隊時，是一個年青的，不識字的鄉下女子，她對於機械感覺特別的興趣。她不久學着了讀書寫字——紅軍在蘇俄今日成爲最大的政治學校 (Polit school)，在這個學校中，教授各種功課，包括農學，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影響——一九三〇年，波波娃不但完成勞工學院的課程，並且畢業於 V. D. S. 這是一個較深的師資訓練班。

巴特利基娃 (Patrikeyeva) 也是一個『紅旗勳章』會員，並且是前線的兵士，她參加內戰時是一個紅軍的看護婦。她是一個斯文，美髮，而有一個『天使的聲音』的尤物，但是她鏟除了一個敵人的偵探，因此獎以『紅旗勳章』。有一次，被白俄衛隊所捕，他們在她的前額上刻上一個紅星。她終於設法逃跑，回至前線，在工廠中工作直至一九二九年，現正求學於勞工學院。她最大的痛苦就是她前額上的殘跡。

『紅旗勳章』會員羅塞麗·沙莫羅夫娜新姆萊支卡 (Rosalia Samoilovna Syemlyachka) 是很得人心的；她是一個猶太女人，並且受過兩個勳章：自前線得的『紅旗勳章』和『列寧勳章』。這就是『勞動紅旗勳章』，『凡改進和簡化國家的機械，與經濟組織中之腐化政治者，以及與不

良管理，和不負責任等事的奮鬥者，」都授以這種勳章。除了這個自一九〇二年就在黨中工作的新姆萊支卡之外，還有一個得這勳章的，就是「Л. П. 局（勞工與農民視察局）的人員，在這個局子中有許多婦女在那兒工作。

雖然沒有明白禁止，但是今日的紅軍中，實際上已沒有婦女——因為她們的生理，不允許她們「與男人一樣」；只是有時在實際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中有婦女；有五個婦女在司令部的後備軍中，她們都是經過軍事專科的訓練的。「革命的女兒」已成歷史上過去的人物，因為生命要使蘇維埃的婦女去擔負別的新任務。

三 廢除宗教儀式的結婚

當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克倫斯基政府八個月的執政時期，對於教會和婦女與兒童的地位，一些也沒有改動；而列寧在一九一九年的勞工及農民婦女大會中說，蘇維埃政府是勞工政府，所以關於婦女的立法，在取得政權的頭幾個月，就有急速的改變。

使婦女處於附屬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是一毫不容保存的。我的意思是指那些剝削弱者和貶抑婦女地位的法律；就是那些關於離婚，私生子，和婦女要由孩子的父親供給的權利等等法律……在民主共和國中的確宣布了平權，但是隨在——在民法和關於婦女在家庭以及離婚的地位的法律中——我們都可發現不平等和降低婦女的地位之點。於是我們說：這是侮辱民主政治……在徹底掃除歷來立法上所給與婦女之不平，來實現民主的觀念方面，蘇維埃政府比較任何國家，甚至最進化的國家，都要努力些。於是我再說一次，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種民主立法，對於婦女所做的，能夠有蘇維埃政府在成立的頭幾個月中所作的一半……。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與二十日列寧所宣布關於「解除婚姻，與公民婚姻，小孩，登記」等法令，是代替沙皇的婚姻法之蘇維埃法典，牠極端地反對根據不平等和不可解散之婚姻觀念，反對承認男子為家長，反對給男子以強迫定婦人的國籍，住所，姓名，和決定小孩如何受教育等等的權利。這個蘇維埃法令廢除宗教儀式的結婚和離婚，認為合法的婚姻者只有公民婚姻。在公民

登記之後，新夫婦可以當作他們自己的私事隨意在教堂結婚。所定的原則，在夫妻之間是絕對的平等，分享財產，並有彼此扶養的責任。因此，在任何時間，只要雙方有一方願意，就可自由離婚；再者——這是特別進一步的改良——嫡出子與私生子間之不同的權利完全廢除了，不登記與登記結婚所生的孩子完全平等。這個結婚法完全適合於作工的及有職業的勞工男女。

一九一八年根據列寧法令的『關於生產，結婚，和死亡的登記，結婚，家庭，保護』的法典，在大多數是農民的蘇俄，也根深蒂固地建立起來了。公民登記處也漸次成立，這是俄國一種特別的改良，在俄國歷來除了宗教的登記處是沒有這種地方的。據人民內務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the Interior）的記載，在一九二四年的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三個月中，登記的有一、三八三、六三三項。這就是表示一年有過五百萬的登記者。在同一時期，結婚登記而不用任何宗教儀式的，在莫斯科是百分之七十一。『宗教的認可』在結婚者之三分之二的認爲是多餘的——的確在都會纔是如此；在鄉村中情形又不同。

雖然『登記』結婚的方式，在起初認爲是新社會對於婚姻制度的讓步，但是不久婚姻關係就進入了一種新形勢。這個結婚制度，在革命頭幾年的蘇維埃社會中，對於兩性關係，是有很不良

的影響。因爲只有登記的結婚，和有根據的父系，纔能使婦女有權要求離婚的贍養費——這種權利，在沙皇時代是完全沒有的。又因爲這個法律只是當一家之主不願供給他的妻室子女，或者一個丈夫遺棄他有孕的妻子的時候，纔發生效力，在其他情形之下，男人是不負金錢責任的。

在蘇俄有一時期，有無數被遺棄的妻子時常在漂流中，尋找她們小孩的父親，他們是想躲避自己的責任。同時，貧窮的婦女，千方百計地使一個較富的男人和她生一個孩子，她們可以較好地由「三分之一」來供養她們，所給她們的贍養費比她們的工資所入還多，這種情形也不少。在那一個時候，法院所受理的這種「贍養費的追逐」(alimony hunting) 的案件之多，不下於父親遺棄妻與子的訴訟。

但是這個困難的過渡時代許多不良之點，還有其他的因素。除了反抗以前的環境的自然暴力之外，第一就是連年不斷的內戰，接着又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這的確不能給禮教和道德以良善的影響。隨着一九二一——二年的大饑荒又來臨了，貧乏的人口許多殖民至國外；全家和所有一個地方的居民都被迫而離開家庭，去到別的地方找一些麵包皮。在路上有時可以看見母棄子，夫棄妻的情形……有的婦女，賣了她們的小孩，以苟延殘喘。饑饉的人口和無依無靠的小孩，真不可勝

數。他們週圍的危險愈大，後來的一代人民變爲愈殘忍，兩性的關係變爲更野蠻更放蕩，而人們的責任心愈弱……。

以後接着來的——新經濟政策時代——更擾亂人民的思想。因爲在前幾年放任了的饑饉人民的一切殘酷的本能，現在那些收括錢財的人的本能又被刺激起來了，因此蘇俄享受了一時歷來所未有的繁榮。對於在災難時候所零落的婦女之需要，一天一天地增加。她們又招搖在飯店酒樓和咖啡館中，酒也出賣了。沒有東西能抑制人類的本能，在鬭爭共產主義時代，是以嚴苛的軍事統治來壓迫這些本能的。離婚與法律之誤用，甚至在鄉村中，其數目都有巨大的增加。於是，時常被誤解的「自由戀愛」就如同革命方式之被誤解一樣地開始增加了。

第五章 新性道德法典與理論

一 「自由戀愛」之被誤解

在戰亂共產主義時代，大部分的新興人物，都認為兩性的關係，是完全根據生理的基礎。男女間之每個親密的接近，只是私人的巧遇，與喝一杯水以解渴的行動，是不分上下的。

三年之後，內戰停止了。但是性之無政府狀態——大半由於於內戰所致——還是繼續下去，因此發生了一種新文學。其中之一就是柯倫泰夫人 (Mrs. A. Kollontay) 所作之小說『三代之愛』 (Love in Three Generations)，這本書世界知名，並引起了很多的誤會，因為現時還有引用牠的，而牠所論及的問題，又早已經發生了變化。

第三代是革命後的青年人。女主角西尼亞 (Shenya)——她是代表作者來說話——回答她的兩性關係的觀念如何這個問題，大意如下：

「性的生活對於我不過是生理的愉快。我隨着我的心情而改變我的愛人。有一個期間我有孕了，我不知道誰是這個小孩的父親，並且我也不在乎。」她又說：

當一個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還未等到和他發生戀愛時，我就與他發生肉體關係，這也許會使你驚異吧。你必須要有閒暇纔能談戀愛。但是我沒有時間。我們生在有重大責任的時代。自然，有時也不十分忙……好吧，有一個人特別引起你的注意。但是要講戀愛，你知道，實在沒有時間！因為當你覺察出戀愛時，他已經被派至前線或者換到別的地方去了。或者——有時你自己十分忙，甚至就將那男人忘了。因此，你們在一起而又感覺快樂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這些時間一些也不約束你……

『工蜂的戀愛』(The Love of Worker Bees) 集子中的柯倫泰的小說，在蘇俄引起普遍的反對。在沙爾金德教授(Professor Saikind)著名的性道德十二誡中，第六誡是：「戀愛應該是專一的。應持久而不應變換。西尼亞的哲學是一種病，而不是階級意識。」同時有一本未被翻譯



The Soviet Diplomatist, Alexandra Kollon'ay

蘇雜埃外交家亞歷山大拉·柯倫泰

的書叫『沒有櫻桃花』(Without Cherry Blossom)也很出名，這本書是男人——羅曼諾夫寫的，牠比較地受歡迎；主角是一個青年的女學生，描寫她第一次與一個男子發生親密的關係如下：

我們之中沒有愛情，僅有性的關係。因為我們以為愛不過是心理的領域，只有生理纔有權存在……。女孩子們與她們男同志的關係有一個月，或者一個星期，有時碰巧只有一夜。任何人要在生理的經歷外尋找愛情，認為那是滑稽的，可憐的，愚蠢的……。

現在這個女孩，遇着一個引起她注意的男子，他們第一次的見面，就發生了春之醒覺。這個女孩自己在街上買了一束櫻桃花——在北方是象徵春的——她由於溫暖的夜色的馥郁和自己的青春而沈醉了，於是在很高的希望的心情中，去到那個男人那兒。只有他們兩人……。

她的春潮的希望如何的實現了，在她給一位朋友的信上說道：

甚至當我們愛的時候，我們婦女不能一直達到我們最終的目的。對於我們，主要的時常在

最後。第一我們必須被一個男人的聰明，天才，他的精神，他的溫柔所感動。這就是我們因為什麼希望結婚，不是完全為生理的關係，而是為別的……。

但是這個男學生的環境關係，使這個女孩的希望失敗了。這個青年的要求和感情之猥褻，與他的外表環境一樣的粗率。這個女孩繼續說她的故事：

因為黑暗，所以一點也看不見那間空無所有的，無人照管的房間。因此我可以幻想我第一次找得快樂的環境，是值得發生這件事的。但是我希求的是人類的溫柔和人類的撫愛。我感覺必須要承認這個男人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屬於我的……。

我拿手掩着我的臉，站在那兒不動有很長的時間。他似乎是在猶豫。但是他忽然衝口而出地說：『好，幹嗎想這樣久，我們只是糟踏時光……。』

他的話使我不痛快，我退後了一步。但是他在果決與煩惱的情緒中，緊緊地抓着我的手：『魔鬼因為什麼在作祟！』

我拒絕他，想自他的擁抱中掙扎出來……但是太晚了。

當我們起來之後，他首先開了燈。

「拿開燈，」我在痛苦與畏縮的恐怖中，哭着說。他很驚異地看着我，聳着他的肩，將燈滅了。他不到我跟前來，開始去急急地整理牀鋪：「瓦尼卡 (Vanyka) 的牀……否則他立刻就可猜到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恐怕遇着那個學生的同伴，這個女孩自後樓梯走了。她走了，永不再回來了……。

對於這個學生只不過是一個巧遇，他連想都不想這件事。他甚至對於那個女孩都不隱瞞地說：「結果時常是一樣的，不管有沒有櫻桃花，」當她整個的靈魂希望愛情的時候，他對她說這種話。他摧殘了這個愛，就如同摧殘她胸前的花一樣，一些也不用思索與猶疑。

在這新興的一輩中，也有努力要在支配他們的性生活的無政府狀態中，找出一種理論與知識的根據，並且使可怕野蠻的性觀念，走到正軌。

男子的性生活純然是私人的事，與他人無關；年青的人這樣說，因為他們要防止國家來干涉。

又有一部分人提出一種意見，說婦人不過是播種生產的田地。同時在其他省分的第三派將馬克斯的論題更改了——雖然他們從未聽說過夫拉德（Frad）的理論——說意識不是由於別的而是由於性來決定的，同時提出來一種理論，說無產階級的愛，必須像「工蜂的戀愛……」雅羅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關於這個題目寫道：「假如甚至在有階級意識的同志中，因為馬克斯對他的妻子忠實而稱他為「鄙俗之人」（Philistine）則我們發現另一些同志的意見以為共產主義的家庭生活必須像工蜂的愛一樣，是無足為奇了。」

二 列寧對於「一杯水的理論」之見解

因為要及早防止所有這些錯誤的悲慘的結局，列寧於一九二〇年在與克拉拉·西特金的談話中，發表他的意見如下：

「青年人對於性問題的態度，自然是「根本的，」並且訴諸理論的。有人說他們的態度是「共產主義的，」「革命的。」他們自己也很誠實地相信是如此。到了我這種歲數，沒有什麼感動了。雖然我決不是一個莊嚴的節慾者，但是一般青年人——有時是老年人——的所謂「新的性生活，」

依我看起來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妓院的擴充。這一切對於我們共產主義者所了解的自由戀愛是毫無關係。無疑地你是熟知資本論的，其中說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本能的滿足，求愛的滿足，其簡單與不重要，就和「喝一杯水」一樣。這種「一杯水的理論」已經使得我們許多的青年人瘋狂了，十分地瘋狂。牠已經毀壞了無數青年男女。這種理論的擁護者，說這是馬克斯主義的。我不需要這種馬克斯主義，不需要這種自牠的經濟基礎，直接推演出來社會文化的上層構造中一切的現象和變化的馬克斯主義。事情不是這樣的簡單。有一位夫利德利赫·昂格斯 (Friedrich Engels) 以前曾以史的唯物論來論及這件事。

「我以為出名的「一杯水的理論」是完全反馬克斯的，並且是反社會的。不只天然中之要素，就是文化——不論高低——中之要素，在性生活中都發生作用。昂格斯在他的「家族之原始」(Origin of the Family)中指出來，普遍的性衝動發展成爲個人的性愛是如何的重要。總之，性的關係，不單單是社會及經濟環境和脫離了文化而完全根據生理立場的物質要求間之互相作用的表現。牠必定要以唯理主義，不是以馬克斯主義，去努力追溯這種關係之變化，一直探索到與世界思想隔絕的社會中之經濟基礎的過程。自然渴了必須要解渴。但是，是否一個常態的人，在常

態情形之下，會躺在污濁的路上自水溝中喝水呢？或者甚至自一個許多人用過的油膩邊沿的杯中喝水？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社會的方面。喝水的確是私人的事。戀愛還包含第二者，第三者，一個新生命也許因此而生。這是關係於社會一部分的福利，是對於社會的責任。

「以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身分來說，我是一點也不同情於這『一杯水的理論』，甚至牠儘管標榜得十分好聽，說是『戀愛自由』。並且這種解放既不是新的又不是共產主義的。你們必定記得在中世紀末年時代文學中宣傳的『心之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heart)吧。資產階級實行起來，表現是一種肉的解放。在那時宣傳得比較現在還聰明些；至於說到實行方面，我就不能判斷了。我不是借這種批評來宣傳節慾主義。這種情形不會發生於我的。共產主義不是介紹節慾主義，而一部分是要由於完成戀愛以達到生活與活力的享受。但是，我以為在性的事件中之過度，不但不能得着並且還會減少生活與活力的享受。在革命時期，這是很壞很壞的……」

「青年人特別需要生活與活力的享受。健全的遊戲，體育，游泳，徒步旅行，每種的生理的運動，多方面的知識興趣，求學，研究，考察，及普通所能之事！這一切比那些關於性問題的不斷的講演和討論，以及享受生活上的精粕所給與青年人的益處是更多。健全的身體，健全的精神！既不作和尚，

又不作同·朱安 (Don Juan) 更不是半途而廢的製作物——日耳曼的「鄙俗之人」……。

「革命需要我們的勢力之集中與增加。在羣衆及個人的雙方面。我們不能容許德·安農齊俄 (D'Annunzio) 的頹廢男女英雄所認爲是常態的沒有節制的痛飲情形。沒有節制的性生活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是墮落的現象。無產階級是新興的階級。牠不需要酩酊來作一種麻醉劑或者一種刺激。我們不要性的沈醉如同不需要酒精一樣……。」

好！一切青年人對於性問題的謬誤與不正的態度，不能再比這個反駁得更明白與坦率的了。其他黨的領袖，包括婦女在內，也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參加意見。著名女革命家，列寧一九二五年所辦的普拉夫達之幫手斯密多維支寫道：

我們無產階級的青年，對於性關係的問題，大部分有了十分不合適的觀念，這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青年們似乎以爲性問題之最原始的觀念就是共產主義的觀念，以爲凡是超過適合於一個霍屯督 (Hottentot) 人或者更原始的人類的東西，都以爲是含有小資產階級的特性，是對性問題的資產階級的態度。

斯密多維支繼續敘述幾點新的，未成文的「性之理論」，目的是要揭發其中的悲慘的謬誤的成分，將牠們總括起來列舉如下：

一、每個青年共產團的團員，每個勞工學院的學生，和其他沒有經驗的人，能够並且可以放任他們性的衝動而不加制止。因為某種未知的原因，這是被認為一種不可非難的法律。貞操當作小資產階級的特性而被排斥了。二、每個女青年共產團團員，每個勞工學院的女學生，和其他的女學生，當她要選擇男性時——我不敢說什麼時候這種非洲的情感在我們北方人中發展了，——她們必定要滿足那個男子的希望，否則她就是一小資產階級，不配稱為青年共產團員或勞工學院學生，或無產階級學生。於是這個奇異的三部曲的第三而又是最後一部來臨了：灰敗憔悴的女孩子，她自己覺得要作母親了——帶着孕婦的苦痛的表情。「在墮胎批准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Sanction of Abortion) 的接待室中，你可以看出來許多這種在青年共產團的戀愛事件中受痛苦的故事。

終於事件達到最高一點，所有這些「熱烈的問題」——戀愛，結婚，家庭等問題，教育與學校問題還不在內——在各方面中，都成爲公開討論的題目，並且長時間不得停息。

包含各種問題的不記名的調查表，分發與各城市的學生，調查他們的性生活。

所得的答案，表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大部分的學生的戀愛事件，尤其他們第一次的戀愛，大半都是受戰鬪共產主義時代之影響，而他們的性生活與戀愛無關。許多人又附帶以不同的字句寫着與柯倫泰同一的觀點的話：「我們沒有時間講戀愛，我們的時間不允許我們作這個。」

共產青年團的報紙「孔門索摩爾斯卡亞普拉夫達」(Komsomolskaya Pravda)繼續不斷地登載一欄書信與通訊，都是討論這同一的問題。

前一代的先輩，他們是性衛生的研究者和專家，在那時所發表的意見與列寧相同，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委員塞摩西科(Syemashko)在給青年人的一封信中，將他們的意見總括於下：

同志們，你們已經進了 V. D. S.（即大學校之縮寫）和技術專門學校去研究學問。現在這就是你們生命中的主要目標。你們的一切衝動與觀念都要克服在這個主要目標之下，因此你們時常要捨去一些享樂，因為那是損害你們的主要目標的——研究，和希望訓練你們自己作一個建立新國家的有意識的助手——所以你們應該在每方面都要將你們的活動屈服在這個主要目標之下。因為國家現在還是太貧窮了，不能擔負你們的供給，小孩的教育，和父母的贍養。因此我們奉勸你們：繼續努力！

與這種希望恢復青年人的性生活於康健之途的熱心討論同時並進的，就是在男子當中，熱心努力作其他更帶教育性的指導。目的是要指示對婦女的新態度，婦女不僅是性吸引的目標，並且在新社會中是與他們同等的。同時又勸告青年婦女去保持她們自己的地位，不要容忍男同志的性的無政府狀態，以取得他們對婦女和對人類的尊敬。

三 一萬萬六千萬人討論新婚姻法

一九二五年十月，當性問題與奮的辯論巨潮達到最高水準時，另一個更大的巨潮又掩過了牠。

自從採行了『生產，婚姻，死亡法典』以來，已經有了七年的經驗了，法院的實施，和新生活的簡單方式之繼續發展——這種生活方式影響結婚與家庭——指示現存的婚姻法，在某幾點上有修改的必要。因此，在第十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人民司法委員會提出一個草案『關於婚姻，家庭，監護的法律之編纂』來討論，這是適應需要的。

庫爾斯基（Kul'skii），那時的人民司法委員，他的責任是要說明他所提出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的會議中之草案的，他的開頭語是引列寧的話：

「法律的確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只用法令而不用別的就可使我們滿意的。但是在立法上，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以使婦女的地位與男子平等，在這一點，我們應該得意的。今日蘇俄婦女的地位，就是自最進化國家的立場來看，也可以說是近於理想的。雖然如此，我們還當這不過是——自然是——一個開始。」

庫爾斯基於是又轉到根本問題，指出新舊法典不同之點，他說：

「第一，登記的作用與意義已經改變。

「第二，自物質方面來說，不登記的結婚與登記的結婚，是有同等的立足點。

「第三，保護嬰兒的條款，在婚姻由於離婚或單方的明白的表示而破裂了的情形之下，是更增強了勢力。

「第四，施行相當的保障於婚姻契約上，結婚是需要相當程度的考慮，

「最後，關於雙方的財產的條款也已更改。」

出乎一般意料之外，這個新草案，在執行委員會本身的工人與農民的代表中，發生了熱烈的批評。結果，決定將這影響全國人口的重要關係的草案，在實施之前，交與全國討論。這個討論有兩個目的：第一，使人民對法律及包含在法律中的問題的態度，更爲明瞭；第二，這個討論，可以借信仰的力量，來鏟除仍舊存在的保守觀念，尤其在農民中間的舊觀念。

全國都因爲這個問題而深深地震動了。在無數的討論會中——自大城市的無數的工人的聚會，以至農民閱讀室中的小辯論——這新草案的各種的觀點，一再地加以討論。人民委員會所接的這種聚會的報告，不下六千，但是所舉行的辯論會的實數，自然還不止此。

討論的中心點，就是：一個不登記的，即所謂「事實的」的婚姻，與依法登記的結婚是否在法律上有同等的效力。新法律的擁護者，首先聲辯在問題發生的時候，蘇俄有十萬上下夫婦，他們的婚姻在實際與形式上，絕不異於正式的契約婚姻，只是沒有登記；因此，法律為登記的婚姻所定的合法的保護——這個對於妻子尤其重要——自然不應不顧這些「事實」的婚姻。

有許多對於這個觀點反駁的。有人謂新法律也許會鼓勵放蕩的行為。在回答這種反對論調中，極力辯護說那種放蕩的行為，在資產階級國家，和有守舊與反動的立法的國家中之虛假的刑法檢舉之下，就是不更多，也是一樣的普遍；又極力辯護說為新法律所要保障的婦女之有效的保護，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但是新法典中之其他的條款和更改——離婚，贍養費和婦女的財產等等問題——也是激烈地辯論着。農民的反對比工人還堅決，尤其對於新法典規定婦女的家庭事務與男子的工作應該有相等的地位之條款，反對得更厲害。因為在那個時候，鄉村的家庭較之城市的家庭是一個更大的經濟和家長制的單位，關於財產的情狀，由於各農戶彼此間的通婚，已經成了很複雜的情形，以至如有離婚或一個人要退出公共農場時，在全部財產中，很難於決定相等的分配。

在這一點，執行委員會的第一次公開會議中，就有人發表疑問。執行委員，工人卡爾梯西夫 (Kartyshev) 引證以下的一件事，以解釋他的意見：

「……一個鄉村的孩子，叫文尼卡 (Vanyka)，不過十八歲，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擦他自己的鼻子，與一個沈着的年青女人結婚，她一開始就說：「我喜歡自己作菜；我用不着一個婆母你分家吧。」

「但是文尼卡得不着他那一分家產，因為他還不能工作。」

「於是，他的妻子離開了他，結果，將最末一匹馬，最末一隻鵝，最末一隻羊和最末一隻母雞，都依照法律出賣了，農場因此破壞。這種弊端是要防止的。」

關於贍養費的問題：

「……假定我有一個兄弟，他是一個青年人，在布地翁尼軍中作戰。他很幸運的有兩個妻子，每個妻子都有他所生的一個小孩。別人如何能替他給離婚贍養費？」

「法律必須訂明白了，每個麻雀都是一個自立的鳥，而每個男人必須擔負他自己的責任。」

在「波里特克尼克」博物院 (Polytechnic Museum) 所舉行的辯論中，公訴員克里林科

(Krylenko) 說：

「我們關於婚姻和家庭的法律。在我們舊生活中，差不多算是耕一片處女地。在革命之後，我們立刻廢除宗教的奴隸制度，禁止沒有權利的人干涉婚姻關係。因此，公民婚姻登記，引用來作達到這種目標的工具。但是，自從宗教的婚姻失掉了效力以來時常發生的問題，又掀起了：婚姻登記之必需，重要，和用處，到底根據什麼呢？」

「於是，我們不得不聲明，只能引出極少的論辯來擁護婚姻登記。我們要問，國家因為什麼要知道誰同誰結婚呢？是為便於統計的緣故嗎？不，這並非重要之點。最重要的設想，只是為反抗宗教式的婚姻與保護小孩和經濟上較弱一方的利益。在這一點，關於婚姻與家庭的法律之新草案，第一條就取消強迫婚姻登記。因此，婚姻登記只成了一種形式，以便易於保護雙方和兒童的福利，並且只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

「但是假如一切未登記的同居都算是結婚，結果恐不免有多妻制的可能。這種可能實際已存在了，雖然是極端的不希望有，不過蘇聯的法律並未禁止。要以刑法和禁止來反對這樣的事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對於多妻制度，在不許已婚的人再作婚姻登記這一段中，表示了我們的

態度。

「我們愈走近社會主義的制度，婚姻愈可自各種表面的責任——包含經濟的責任——中解放出來，並且可以變成兩個人當中的絕對自由的結合。在國家不能擔負撫養小孩以前，無論如何結婚還是一種由法律批准的經濟契約。但是當國家漸漸使婚姻成爲一種自由結合時，則法律只有保護那未犯重婚的弱者。這一條自然不應用於那些法律所要保護他們利益的小孩們，不管他們的父母彼此的或與第三者的關係如何，法律是一律要保護他們的。」

在愈來愈激烈的討論中，柯倫泰夫人對於贍養費問題表示她的意見。她以爲婚姻與家庭問題，鄉村與城市的工人應該有不同的應付，因此，新法律根本就錯誤了。她說：

「法律的確使不登記而與一個男子同居的婦人，與依法登記的妻子有相等的地位，但是牠忽略了因鄉村的困難環境和城市中的貧窮所生的偶然的關係。因此，在任何環境之下，而要使性的婚姻關係就法律方式的軌範，是不可能的——當俄國還有工人的收容所，還有缺乏住屋的問題，還有許多漂流沒有人管的半大的孩子們時。」

柯倫泰夫人於是倡議，由全體工人捐款，作爲全體保險的基金。在她所寫的「公款或個人贍

養費』(A Common Pot or Individual Alimony) 一文中說道：

個人的力量似乎作不到的事，由於聯合的力量也許成爲可能的事。供養小孩與母親的總保險基金，應該由小量的捐款聚集而成——譬如最少每年兩個盧布——這自然應當分等級。收入愈多，所捐與保險基金的愈要多。以這種方法，六千萬成年的捐款人，總數應該可捐到一萬萬二千萬盧布。如此，這個經費可以用來設立育嬰院，產婦院，供養不能工作的母親，撫育她們的小孩，一直到一歲大，以後按照經費之多少，一直養他們到三四歲。

這個提議雖然差不多全體反對，但還是公開地辯論。又來了許多女工人寫的信，一如在俄國所發生的其他問題一樣。以下是幾個例子：

拉特尼科娃 (Ratnikova)、巴拉諾娃 (Paranova)、沙卡羅娃 (Sakharova)、伊昂諾娃 (Ionova)、女工「來自特里阿克哥納亞·門紐費克打拉 (Tryokhgornaya Manufaktura)」

廠」。

柯倫泰夫人的提議是不接受。如果這種稅實行了，男人一定要完全失掉了他們的羞恥，而流於普遍的淫佚。因為男人一知道他不再怕「三分之一」，他一定不會與一個婦女住上一個星期，就棄置不顧了。她之於他，不過一個喚鳥的口笛，當他吹厭了時，就扔到一邊了……此外，假如他已經給了差不多半盧布的稅，於是他的目的，第一是不會再給，而至少要糟踏五十個女人。

柯倫泰說婚姻登記了就算合法。但是誰要那證書？假如我的丈夫愛我，就是沒有簽字他也會長久和我在一起。但是假如我不能使他快活，他也不會顧及這不值錢的東西。

在我們的意見，一個小孩假如父親不管牠了，就應放在育嬰院。在那兒牠可以適宜的撫養起來，父母都應繳牠的撫養費。母親也應該出費，這可以給她一個教訓！她可以稍微檢點些！每個人都痛罵：「那些男人！那些男人！」但是假如婦女不要如此，她永遠不會生小孩的。

加夫里新娜 (Gavryushina)，拉孫諾娃 (Rasumnova)，朱開耶娃 (Chukayeva)，岡查拉克 (Goncharuk)，施朱金娜 (Shechukina)，蘇拉耶娃 (Sulayeva)，德特科娃 (Dyetkova)，女

工人（丟卡特工廠）。

……現在的婚姻應該如何的組織呢？

人民內務委員會，人民司法委員會，和柯倫泰同志等三個草案中，在我們的意思，只有人民司法委員會（*Narkomyust*）的，纔是為我們勞工婦女謀福利。

人民內務委員會的草案，只承認登記的婚姻纔是合法的。假如這個草案成為法律了，自然又有嫡出與私生子，而舊警察廳的名稱又要出現了：『生活在非法的關係中。』

我們相信，在九年期間，將舊時的環境之棺，已經緊緊地釘死了，這種言詞是不容復活了。但是人民司法委員會的草案完全取消舊有的結婚方式，使登記與不登記的結婚，在法律之前有相等的地位。關於贍養費，也完全顧到婦女的福利。依照這個草案，父親應該付相當的費用，以供給他遺棄的小孩。

柯倫泰同志的草案，是完全不滿意……一個人如何能論及所有人的普遍的課稅？只有一個人與生一個小孩有關，與其他的人又有什麼關係？這是社會的一種何種事件？事情是很簡單的：『假如你是父親，你就應該出錢！』

梅蘇耶娃 (Myeshuyeva) 羅蘇克 (Roshuk) 科茨里金娜 (Kostikina) 特拉特萊阿娃 (Trutnyova) 卡沙文科娃 (Kusa'yenkova) 尼科拉娃 (Nikolayeva) 三] 新娜 (Parshina) (勞工學院學生)。

……這正是我們屏除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偏見的時候：一個婦人是否是登記結婚，這不是沒有關係的嗎？假如兩個人同居，目的在乎建立一個家庭，這就是婚姻。

假如兩個人都簽了他們的名字，低頭站在書記的前面，這一些也不能鞏固他們家庭生活的「基礎」。

在這一部分的計畫，柯倫泰自然是對的。但是在第二部討論到贍養費時，那就還有商量的餘地。

因為什麼一個被遺棄的母親，要成為社會的累贅呢？這種幫助，只能使人回想到「馬麗皇后基金」的「慈善」。同時，如果這「三分之一」只有有十個盧布 (Chervonyet)，母親自然不能用來撫養她的小孩。假如這種「基金」能够供給一半小孩的撫育費，這必定很有價值的。

但是，最好的還是贍養制度。因為假如一個男人以花言巧語和熱烈的情感來騙了一個婦人，而給她生了一個小孩，他是應該付出他的「三分之一」的。他也許要小心免去第二次的三分之一。因為甚至三分之一也是一個痛苦的經驗。

新婚姻法之普遍的討論，經過了整整一年：無疑的，第一，一萬萬六千萬人民自己制定他們的法律，不是由於選舉的代表，而是個個人發表他們的意見。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草案第二次提到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時，在最後要採用之前，又發生了激烈的論辯，最後一次的各種不同的意見衝突。哲西卡·斯密斯 (Jessica Smith) 出席了這次會議，在他的「蘇俄婦女」中，他詳述道：

……在「克累姆林」(Kremlin) 的宏麗偉大，金碧輝煌的皇宮的大廳中……舉行這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坐在長形帶商業性質的桌前的代表……有許多婦女。一個結實的農婦，有一個寬而溫和的臉，頭上包一張漂亮的「普拉脫克」(即肩巾)，腳上穿着氈靴子，以一種莊嚴而又自然的態度，走到主席團的地位去。

差不多的代表都是俄國人，但是其中也有蘇聯自治共和國代表——如薩韌人，巴什基人（Bashkirs），開西人（Khirghese）……。

在提出新婚姻法的訂正的草案時，卡爾斯基解釋登記仍然保留作為最妥的婚姻方式，因為牠是法庭進行訴訟的確實證據。他說：『但是我深深地相信，我們使事實上的婚姻在各方面都與登記的婚姻相等，完全廢除後者這種時候是會來到的。既然登記時常是保持紀錄所需要的，於是牠只在統計方面紀錄事實……。』

卡爾斯基將自全國各地來的關於這個法律的討論報告總括起來。拿阿康哲爾·古培尼亞（Archangel'ski Gubernia）當作最落後的鄉村區域，他說古培尼亞的每一個村都考慮了這個問題，百分之四反對法律中的一部分，同時城市的人口則完全贊成……。

接着發生的辯論是與一年以前一樣的熱烈……共產黨員里任諾夫（Riazanov），攻擊事實結婚的立法。他說：『我們聽說這個草案是達到理想的共黨主義社會的步驟，在這種社會中，結婚的關係是不會受任何強迫規定的限制的……我大膽說，在這些共產主義的宣布中，沒有一些共產主義的意識。當我們達到一種共產社會時，一切的階級，一切的壓迫都消失了，同志

們，我們要問我們自己：結婚是否是兩個兩隻腳的動物間的私人關係，而這沒有武力工具的社會是無權干涉的？我們更要問，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十年中，還能以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混亂的草案來加諸於我們嗎？……我們應該教訓我們的青年共產黨人，使他們知道婚姻不是個人的行動，是一種有深刻社會意義的行動，是需要社會來干涉與規定的。他們應該知道，在社會的眼光中，這是一種批准的方式……這種法律所有的結果只有混亂！」

當這個演說辭受人歡迎時，同時又受了譏笑，一個鄉村婦人很利害地說，不能對里任諾夫同志的觀念與以真誠的注意，因為他是在唱歌，而他自己既不需要登記，又不需要實際的婚姻……。

於是一位婦女代表莫羅娃 (Морова) 發言：

「同志們，我是一個樸質的人。當我一看見這草案，我非常生氣，革命已是第十年了，男女的平等已經成立了，而這一條（妻子沒有隨着丈夫走的必要）還包括在我們的法律內。我想，是否有提到這一條的必要？因為什麼要說油是油膩的？……但是，這好像是我錯了。好像在我們之中，還有人以為一個妻子應該隨着丈夫走，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同志們，這是太過分了吧！」

在討論期間，男人遺棄他們的妻子，逃避付給贍養費，在夏天與一個婦人結婚以得一個收割的幫手，到秋天就離婚了，這種事愈來愈多——實際上，新法律的整個辯論就是為保護無助的，弱的一方。

終於莫體什 (Mojish) 同志——他是自西比利亞來的一位巨大的，多毛的莫赫克人 (Moujnik) ——忍無可忍了：

「在各方面男人都是該受咒罵的！」他衝口而出。「但是家庭破裂時，總是女人的過失……她看見丈夫漸漸老了。一些年青的小伙子。吹吹唱唱地在她們跟前。她拋下三四個小孩，離開她的丈夫，和一個青年人逃跑了。總之，現在的時代，婦人作許多壞事。她們時常跑到哲諾不德爾 (Zenobdel) 那兒去，並且毀謗她們的丈夫。在那兒，全體婦女聚集起來，而她們的丈夫什麼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受了侮辱了！」

四 蘇俄婚姻法

「婚姻，家庭，監護新法典」之討論，經過了一年多。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實施了。

假如我們要估計蘇俄新婚姻法之社會及經濟的倡導的影響，那末在討論牠各別的條文之前，大概地鳥瞰支配沙皇時代婦女地位的情形，必定得益不少。順便提及在俄國未革命時代，一個原來是她丈夫的財產的妻子，是登記在他的護照上的。因此，爲某種原因她需要自己的護照，尤其當她要離開她丈夫的時候，悲劇時常發生，她成了她丈夫的專制意志的犧牲者。因爲依照法律，要給她護照，必定要她丈夫的同意。公民結婚，就是依照本國的法律而在外國舉行的，在俄國也不生法律的效力。

法律只承認宗教式的結婚。男子在十八歲以前，女子在十六歲以前，或者在八十歲以後，是不許結婚的。婚約要依據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假如訂婚而無他們的同意，「犯罪」方面要有八個月的徒刑，並且剝奪承繼權。再者，與猶太人或異教徒結婚，是禁止的。

今日蘇維埃的公民，讀到舊俄法典中之「自婚姻而生的權利與義務」時，就好像看見中世紀的古跡一樣：

一〇三 夫婦必須同居。(一)凡引起分裂之行動，皆在禁止之例。(二)丈夫如有遷徙之事發生，爲妻者皆應隨行。

- 一〇七 爲妻者必須尊丈夫爲一家之主，對彼應愛戴順從，在家爲主婦，對彼慇懃崇拜。
- 一〇八 爲妻者之要務，即順從丈夫之意志；但對於父母之責任不因此而消滅。

司法家〔夫拉恩德(Frend)〕『蘇聯之民法』(Civil Law in Soviet Union)〕指示出來，自這四條所產生的丈夫的權勢，實際的確沒有多大的。丈夫之稱爲『家長』與妻子之稱爲『家主婦』是對等的，同時，並沒有法律的批准，以強迫妻子有服從的義務，並且丈夫也有與妻子和諧的義務。這整個的法律，只能認爲影響十七世紀道德法律之精神的遺跡。

與現在仍舊施行於一切資產階級國家的婚姻法一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舊俄婚姻法，主要是使妻子屈服於她的丈夫，成爲他的附屬品。這種法律是沒有生氣的，充滿宗教精神，並且差不多是違犯一種生活需要。而一九一八年的蘇俄婚姻法，第一個目的是鏟除宗教婚姻，更近的蘇俄的婚姻法，是根據新的，熱烈的，衝動的生命之經驗，尋求解放婦女，使她們享受絕對的平等的確如牠的擁護者所說，牠是達到真正解決的第一步，第一個嘗試，根據進一步的實際經驗，還有修改的餘地。反之，在資本主義國家，死的法律居先，兩性的同居反要來遷就牠，在蘇俄，生命創造他自己的法律，在一種新的，健全的，鼓舞的文化視爲合適的態度中，使牠的詳細節目完善。

在其他各方面，蘇俄的立法，有幾條是很合理的。法典的弁言說：

爲規定自根據新革命生活的婚姻，家庭，監護等而起的法律關係這個目的，爲保護母性及嬰兒的福利的目的，爲使夫婦在財產和教育兒童方面處於平等地位的目的……。

在這種『規定』任務之外，國家概不施行警察和道德的監視；國家對於牠的公民的同居或生子的事，在任何方面都不自尋煩惱，『一切性與性間之關係，是私人的事件』這是認爲最高的原則。婚姻在蘇俄不但是通俗化的，並且與國家無關；這是純粹的公民的契約。婚姻法無寧說是一種標準，是指導的，而不是法律，只有在發生爭議的時候，國家——以最高法院爲代表——纔來干涉。按照此時施行於蘇俄的法律，登記的結婚，與『事實的』不登記的結婚，在法律上是絕對平等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在離婚的情形中——就是在有了衝突而需要國家調解的時候，——『事實的』不登記的結婚，第一要由法庭來證實，而登記的結婚則是無可非議的證據。

依據第十二條，法院承認不登記的結婚，必定有以下的證據：『同居的事實，合組的家庭的存

在，將婚姻關係通知第三者的書信或其他的文件，根據環境的物質的互助，兒童的共同教育等等。』

法律中之條文，第一是用來保護妻子的，對於較弱的妻子，法律希望給她一種保護，使她不致爲城市丈夫的管家婆，鄉村丈夫的農場的奴隸。決定婚姻之存在與否的主要因素，不是結合開始的形式，而是婚姻的重要性質；但是根本的原則是：『只有一切持久的同居，纔算婚姻，』任何暫時的結合都不在內。

因爲婚姻是私人的事，所以沒有明白禁止多妻制。但是第六條明白表示國家贊成並且提倡一夫一妻制，因爲在這一條規定，已有登記婚姻或事實的未登記婚姻之存在，不能再有第二次的結婚登記。這種直接反對習俗的多妻主義的規定，在不屬蘇維埃的東方人民的自治共和國的法典中，是特別的注重。譬如在基爾歧斯（Kirghizia）宣佈了一紙特別法令，使多妻制成爲刑法的罪犯。重婚在蘇俄的確不受懲罰，但是當需要國家來干涉時，對於掩蓋再婚的事實，或在登記處造虛假的證據，都是要受懲罰的。像這種性質的處罰，在蘇俄是很多的。

因此，通奸也不受處罰，因爲這是夫婦間的私事，蘇維埃國家，只對威脅蘇維埃的法律制度和

危害社會性質的罪犯纔加以制裁。同樣的，夫婦間之性交——所謂對於婚姻約束的忠誠——是私事，因此，如「娶妾」、「私生子」、「違法的關係」、「有罪的一方」、「通奸」、「現行犯」等等觀念，都是沒有的。

蘇俄的婚姻登記，並沒有附帶的儀式；只是由雙方自由招請友好及親眷出席。反之，在資產階級國家，訂婚之前，必須要行許多的儀式，在蘇俄，這種情形已減到最低限度了。婚姻登記的條件如下：（一）雙方必須達到十八歲的結婚年齡；（二）雙方出於自願（但是雙方不一定都要到登記處）；（三）必須交納證明；（四）雙方必須以文字聲明彼此都知道康健狀況，尤其對於花柳病與肺病。

兩個結婚的人中，如有一個是白癡或者精神不健全，在蘇俄法律之下，是不許登記的。

不同輩的直接的近親，或者嫡親及異父母兄弟姊妹等，都不許作結婚登記。在其他任何的親族關係中之婚姻登記皆不禁止。但是，如同前面所說，如果已有登記或不登記的婚姻存在了，則不許再作第二次登記。

凡願意登記者，必定要向 S. A. G. S.（生產結婚死亡登記處之縮寫）陳述男女任何一方的住址。於是，經過審察證書之後，雙方到「婚姻登記的桌子」旁邊——離婚，生產，死亡登記的

桌子也在一個地方——在那兒有一個特別管登記的人員（大半是婦女），去報告自己以前有過幾次登記的或未登記的結婚，以前有幾個小孩子。假如有一方因為病了不能來，登記可以在他（或她）家中舉行。再者，雙方必須聲明婚後他們自己所要用的姓氏，因為依照蘇俄的法律，丈夫在婚後可以採用妻子的姓氏，反之妻子也可採用丈夫的，或者雙方保留原來的姓氏。

於是登記員要告知婚姻法中有關的條款，並告訴他們作虛假陳述的處罰；婚姻登記於是成立，登記處將這個登記讀與雙方聽，他們與登記員一同簽字。假如雙方願意，登記可以在證人前舉行。但是，假如結婚雙方都是不識字的，必須要兩個證人簽字。婚姻登記是不要費用的。假如要結婚證書，工人只須兩個盧布的印花稅，其他的人需十個盧布。

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第八條，妻子不一定要採用丈夫的籍貫，可以隨自己的意思，由一個簡單的手續，丈夫也可以用妻子的籍貫。同樣的，小孩子們的籍貫和姓氏也可以協議解決。這也是一個包含婦女平等權利的原則。

第九條允許夫婦雙方自由選擇職業。家庭的共同行動，是互相協議的事。一方改了他（或她）的住址時，不強迫他方也隨着走。這些條款，表示了法律如何徹底地保護夫婦雙方的獨立，並且企



Registration of A Marriage in the Moscow S. A. G. S.

莫斯科 S. A. G. S. 中之婚姻登記



A Workerman Has His Diverce Registered

一工人作離婚登記

圖指導婚姻走上伴侶之途。

關於雙方的財產，蘇俄的立法認為婚姻是生活與勞作中之伴侶，所以夫婦間是絕對平等的。在原則上規定，凡婚前所得的財產不屬於公共的（甚至沙皇時代的婚姻法，都不像許多歐洲國家，而是承認各別的財產權的，並且承認妻子的監護權，但這不是因為牠的進步精神，而是希望保護封建國家中的有產階級）。反之，在結婚中兩人或一人以工作所得之財產，是算作共同的財產。分配是由法院決定的。新奇的地方就是：別國所不承認的家務事，其價值與其他的工作相等。這個目的，就是要防止濫用婦女勞工的弊害，這種弊害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在農人中是很普遍的：一個男人在夏天收穫時候與一個婦人結婚，到了秋天又遺棄了她，而不給一些報酬。但是在爭議發生時，分配是由法院來決定的。這些條款對於登記或未登記的婚姻是一樣的實用。只要婚姻繼續下去，雙方是必須互相供給的。

在蘇俄，因為要與整個的婚姻法之合理的，一致的構造符合，所以婚姻的解除也非常地簡單，反之，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近代婚姻法中最難解決的事。恰如婚姻之開始由於雙方的同意一樣，當雙方不願繼續同居，婚姻就終止了。不是國家來辦離婚，而是由於他們自己決定。國家只記下他

們的決定，辦理法律上的事務。

在蘇俄是沒有離婚訴訟的，不需要什麼離婚的原因；婚姻可以在任何時候，由於雙方的願意，或僅僅出於一方的希望而解除的。希望離婚的一方，不用任何進一步的解釋。離婚與結婚一樣，認為是私人的事，所謂犯罪的原則，對於蘇聯的法律是完全無用的。於是，在離婚方式中，沒有什麼犯罪方面，沒有切身的詳情的討論，沒有彼此的誹謗，這些都是時常發生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婚姻糾紛中的。最高法院某次宣布「法院在離婚案件中干涉任何方的行動，都是絕對誤解蘇維埃法律的原則。」

在蘇俄，離婚登記也非常地簡單——只要雙方對於這件事同意。離婚夫婦必須到 S.A.G.S. 去，並繳納結婚證書。假如結婚時沒有證書，雙方必須以文字證明他們是已婚的，並且指出結婚的時候和地點，或者——假如那是一個未登記結婚的問題——自法院取得一個結婚證明，只要有以上所提的證明，就可取得這種證書。解除婚姻與結婚一樣，雙方都應聲明他（或她）以後用什麼姓氏，假如在這一點未得着同意，於是每方都保持婚前的姓氏。登記員將這個離婚登記讀與他們聽，他們都簽了字——於是婚姻就算解除了。

離婚登記與結婚登記一樣是免費的。假如需要一張離婚證書，只有兩個盧布的印花稅。凡沒有失業補助金或公家的幫助的人，連印花稅錢都不要。

當不是協議而是一方願意離婚時，情形比較複雜些。在這種情形之下，S. A. G. S. 在離婚登記三天之內，以規定的方式，將離婚的事實通知對方，假如對方的住址不明，登記處也在三天之內，在『伊斯維斯提亞報』(Isvestia)上登出一個廣告，這個費用是由希望離婚的那一方付與，差不多要十六個盧布，但是工人，僱員，紅軍人員，和貧農，則減低。

在婚姻解除之後，再結婚是一些阻礙都沒有，所謂等待和哀悼的時期，在蘇俄是完全沒有那末一回事。離婚的夫婦，彼此又可結婚。法律不規定蘇維埃的公民可以結婚或離婚多少次數。

婦女的經濟獨立，在蘇俄是認爲當然的事，法律的條款，只實用於獨立的，有工作的婦女的環境；只有貧窮而不能工作的，或者貧窮能工作而失業的一方，纔能自另一方要求贍養，這一方無論是夫或妻。但是並不是終身贍養，在一九一八年的蘇俄婚姻法第十五條規定了期限：自離婚之日算起，不能工作者，期限一年，失業者，期限半年。對於離婚供養的數目，不能超過通常失業補助金。如果離婚事件發生了，必定要解決誰來擔負小孩的教育及撫養小孩這個問題。假如已經有

了協定，就將牠記在離婚登記上，每人各執一份抄本。假如有什麼爭執，或者不履行協定而訴諸法院，則判斷只顧到小孩的福利。照習慣是將小孩留交與母親，一直到八歲。有時既不交與父親，又不交與母親，而放在育嬰堂中。父母雙方，按照他或她的經濟，而與小孩以補助。

蘇俄婚姻與家族法中的最良之點，就是對私生子問題的態度。一九〇二年以前的俄國，私生子既不屬於父親，又不屬於母親。一九〇二年以後，與西歐國家英德法等國的情形一樣，私生子雖不屬於他父親而是屬於母親的；資產階級的家族法中關於「私生子」這一段，是最殘酷的，簡直可以稱之為侵害小孩的法律，而不是保護小孩的權利的法律。蘇俄法律，自始就不以合法的婚姻而是以血統的關係，來作法律關係的根據，因此，將「私生子」的觀念也一併廢除。

一個男人是應該平等地為他的後人安排，這是根本的原則，因此在蘇俄對於小孩無所謂『雙重法律』（Double law）暫時同居而未婚時所生的小孩，與已婚所生的小孩是絕對的平等，尤其關於要求扶養與承繼父母這一方面是絕對平等。

但是，假如父親不承認他的小孩又如何呢？第二十八條又規定——又是要減輕未婚所生的小孩之困難情形的——未結婚的母親，可以在分娩的前三個月，將她的妊娠報告與有實力的

S. A. G. S.——以便在生產之前解決事件——詳細地敘述受孕的時期，小孩父親的姓名住址。第二十九條規定，那稱爲是父親的男人，由 S. A. G. S. 通知，在通知後一月之內，可以自由在法院反駁那個母親的陳述。假如他不如此作，就是他已經默認了他爲父的資格，就當他作爲父親登記了。但是他可以在一年之內，控告那個母親的不實的報告。

假如事件在法庭中解決了，於是母親和假定的父親，雙方都要說絕對忠實的話，否則就要受懲罰。

假如假定的父親反訴，說那個母親同時與好幾個人發生關係，不知道那個是真正的父親，於是，依照一九一八年的法典，引用『索羅門的判斷』(Solomon's Judgment)，這就是說，所有有可能性的父親，都要擔負生產和撫養小孩的費用。但是爲小孩設想，也許他以後在這種『集合父系』的情形之下，精神上要受痛苦，因此最近的法律只承認一個父親，最富足的一個。烏克朗的家族法，在這種情形之中，規定對於贍養費，由幾個人共同負責。

第六章 母性與兒童

我們希望根據共產主義的基礎，建造我們的生命，將我們的整個的閒暇，專心用以發展我的知識能力。因此，我們除了『勞動之宮』（Palaces of Labour）之外，還要有一個光明的『母性之宮』（palace of motherhood）。

——維拉·蕾培蒂阿娃（Vera Lebedyova）

母性是婦女之社會職務。

兒童是生命之花。

——蘇俄格言

你在世界上任何處所看見的孕婦與兒童，沒有比在莫斯科，在蘇俄，在整個的蘇聯再多的了。

人口的增加，估計每年有三百五十萬；不久，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將要充滿了首先見着革命之光的人們。這種事實及其含義就是：這種增加不僅是年青而有活力的民衆之自然生產力的結果，並且是有系統地實行人口政策之第一個實例與模範，我們必須記住的，第一是蘇維埃國家與社會所施行以影響生產率的法律，第二是保護母性與兒童的法律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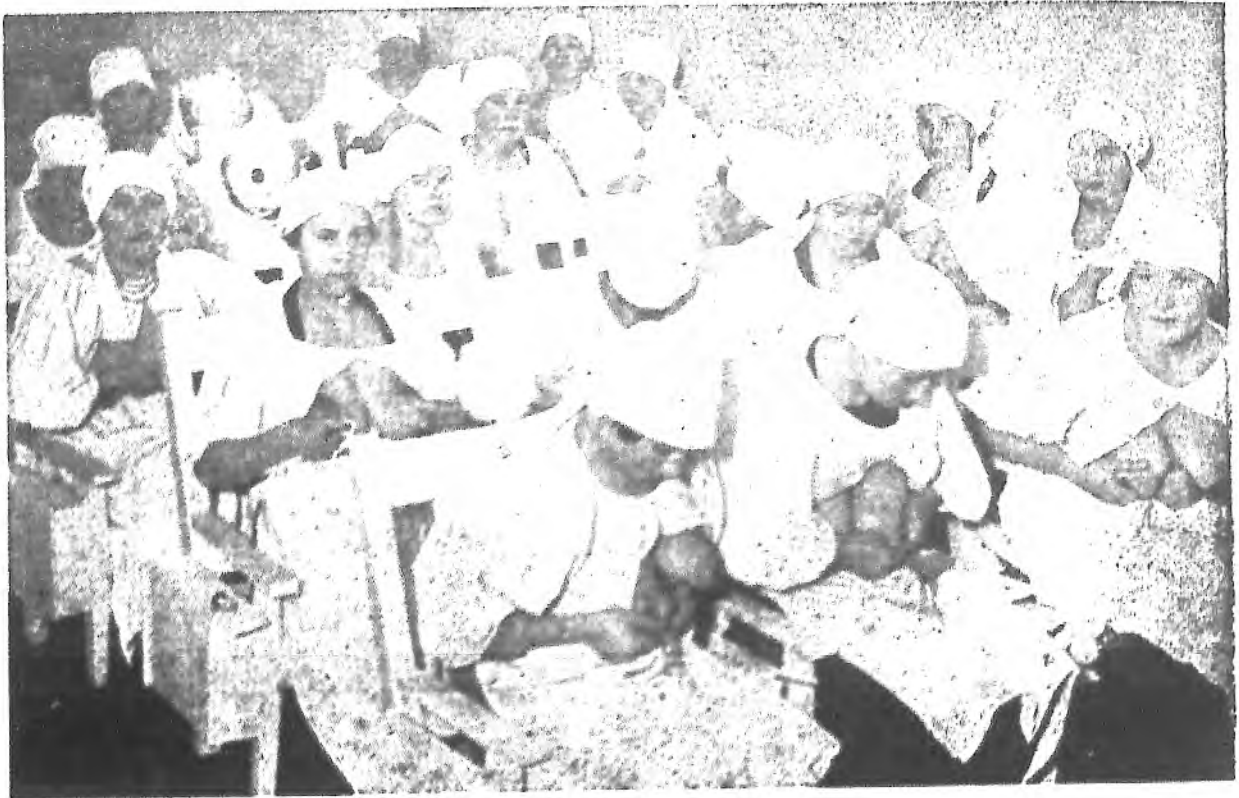
一 生產節制與生育過剩

我們可以說：在生育統計中所顯示出來的俄國人口增加與社會的共同意志和個人意志是一致的——在人類歷史上，這也許是第一次——並不是天賦本能之盲目的統治的結果。國家不但不允許並且實際鼓勵的生育節制之宣傳，和墮胎的法律之承認，表示生育本能之普遍地有計劃的合理化，這種事現在只有蘇俄有，蘇俄是第一個而又是唯一發展這種事的國家，其他對於這種事要施行權威的國家，認爲以一切有效的方法以控制阻止意外的妊娠和天賦生產力的節制，以及節育的宣傳，是牠的職務；總之，如果需要的話，甚至以處罰的方法，強迫人口的增加。蘇維埃關於這方面的立法，使人口每年增加三百五十萬，牠所採的方法，是與其他國家相反的，自這種立法所

得的經驗，與其他的『布爾雪維克』的經驗一樣，是有普遍的歷史的意義的。

因爲好奇心，或許因爲極端的勇敢，外人對於蘇維埃國家預防受孕及人工流產之節制生育的態度，已有充分的討論，因此，於此再重新討論是多餘的。大家都知道，預防的宣傳——生育節制辦事處還不在內，這種機關在蘇俄以外其他國家也有，牠是對於預防的交媾之各種問題，給與知識與指導——是由於無數的講演，影片，和分發解釋的小冊子等方法來進行的，這種小冊子，在蘇俄街上，以幾個『科裴克』（Опейка）就買得到的。

一般人很少知道『預防物製造所』的工作，因爲這個地方人們不易進去看。這個製造所成立了七年，是附屬於莫斯科婦嬰保健會（Moscow 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and Infants），這是世界上唯一的組織；在二十個醫生指導之下，進行對於預防的交媾及阻止受孕的方法等問題之科學的研究。一直到現在，在這個製造所中，已經借着各種設備作了無數的試驗。幾年以前，設立了一個製造預防物的小工廠，牠每月所售出的物價，一九二七年只有二百五十盧布，到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七萬盧布。現時蘇聯的預防物是很缺乏的，需要超過供給。爲要補救這個缺點，製造所現在已經在進行最後一個試驗。這個試驗證明所謂『擺阿拉克丁』（Biolakтин）



In The Mothers' Milk Centre

在 母 乳 處 中



Greeting To The Pioneers In All Countries

祝 賀 各 國 之 先 鋒

的奶油作的而又非常便宜的東西，爲一般人的方便，是絕對沒有害的，在實用中，是一切防止受孕方法中之最好者。

這個普遍到鄉村的預防交媾的宣傳，目的是要使墮胎成爲多餘的事，以鼓勵實行「預防而不要墮胎」這個口號。不管國外人民對於蘇俄的推論如何，俄國官方還是相信墮胎是有害的——允許墮胎並不是鼓勵墮胎——並且很認真地努力減輕牠的危險。同時蘇俄承認存在所有資產階級國家的懲罰，和法律禁止墮胎，是達到目的之最不良的方法。於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將沙皇時代墮胎的懲罰廢除之後，就採用了很受誤會的承認墮胎的法規。這是婦女運動所要求的婦女保持自身權利之第一次的法律承認，並且可謂爲蘇俄建設意志成功之一。

法准墮胎實行如下：每個婦人都可自由墮胎，只要她有許可證，手術就可在公立醫院施行。如果要取得墮胎許可證，本人必須要申請負責這件事所設立的委員會「阿波爾塔斯·特羅卡」(Abortu-Troyka)這個「特羅卡」由一個醫生，兩個女職員組織而成，這兩個婦女，一個代表公共衛生委員會，一個是區蘇維埃(社會的細胞)的代表。照例也有個社會法律顧問委員會(Social Juridical Advisory Commission)的人合作。稍微付給些手術費——除非有特別的情

形纔完全免費——這種手術費是按照收入之多寡而定，但是莫斯科那些收入很低的婦人，是免費施行手術的；發給許可證是根據康健，優生（例如產母年齡太小），社會，經濟等原因，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形纔受拒絕，尤其是當施行手術的地方太擁擠的時候。人工墮胎的原則如下：第一，婦女第一次的妊娠不應墮胎；第二，一個婦女在一年內，不得施行二次以上的墮胎；第三，妊娠不過三日期限。每一個實情都要經過考察，探知牠是否急切需要。有許多的生產不能由墮胎來解決，而要由社會的環境來決定。此種有關係的環境主要的是社會的或經濟的，而更慘的是居住的環境，生活的程度，孤身產母的貧窮等問題。施行手術的，在城市中差不多是十八到二十歲的女子，在鄉村中是三個小孩以上的三十至四十歲的婦人（小孩過多是鄉村中最大的社會問題）。

對於婦女打算將不願其來臨而來臨的結果除去的希望，國家一些也不加以阻止，但是委員會還是努力以道德的勸告和積極的幫助來預防不負責任的墮胎。新蘇維埃共和國的一條不成文法——不僅僅是一條醫學上的定則——規定每個婦女至少必須孕懷她第一個小孩，一直等到生產，自醫學上的立場來看，妊娠是婦女所必需的。在其他情形之中，竭力給與救濟及尋求生活，以除去懷孕的困難。

因爲醫生的專門技術的高明，以上所提的墮胎院中之人工流產的技術，由於死亡人數的稀少，和國外醫生到這個機關來研究人工流產的方法這兩件事，證明了已經達到別國所難於達到的地步。再者，在莫斯科又設立了一個同類性質的機關，在西歐是沒有的：「療治不完善的人工流產」的診視所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開辦了，計劃是收自產婦院和救濟會送來的八十個病人，給與長期的有規則的治療。

去參觀一個俄國的墮胎院是值得的。當我去參觀莫斯科離我很近的一個的時候，第一件使我驚奇的事，就是在那兒的墮胎婦女之多：在兩間不大的房間內，有六十左右的病人。人工流產委員會一直工作到深夜，但是以最大的努力，也只不過僅僅將工作辦完。據說在春天和民衆節日之時，是特別的擁擠。很明顯地，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只有十三個墮胎院是不夠的。

在每一個墮胎院中，有一個診療室和一個手術室。婦女經過身體的檢查，並有負責者的允許，由巡迴醫室送到這個地方來，施行手術之後，留院住三天至五天以等待恢復，如沒有別的情形發生，十天之內就回去工作，這是法定的墮胎的假期。

走過正在檢查的屋子，試驗室，和灌浴室——一切都是非常地簡樸，但是在衛生方面是無可

批評的——到了接待室中，未經我的要求就給我穿上白罩衣，然後將我領到手術室去。醫生們在那兒（有四個女的），助手戴上橡皮手套，穿上消毒的衣服，器具自正在沸騰的水中取出來。光景與西歐的簡樸的手術室一樣，同樣有來沙兒（Lysol）水和其他藥品的氣味。

那時正有兩個病人並排臥在手術檯上，兩個女醫生和她們的助手還有一個男醫生正在施行手術。很少用麻醉劑——只施用於神經過敏的婦人。有一個婦人靜靜地躺着，並且與醫生閒談。另一個不時輕輕地呻吟。這種手術使人不禁想起拔牙的事，整個的手術，不過經歷五分鐘。然後立刻就將那婦人收拾好放在輪牀上，其中的一個，推過我面前，十分的慘白，但是很快樂地笑，一邊推過去，一邊和我作滑稽的談話。新消過毒的器具又預備好了，醫生們洗乾淨了手，又輪到其他的病人。每一個婦科醫生，一天施行約十個墮胎的手術。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有十七萬五千施用手術的（在某一個墮胎院中，就有五萬五千）。

在兩天前經過手術的婦人，睡在一間空氣新鮮，十分清潔的房間中，在手術完了之後，立刻就放在並排的牀上；有的在看書，有的很熱心地在與她的鄰近談話。我與其中的一個交談——其他的人很感覺興趣地聽着——她告訴我她是第四次施行手術，並且盛誇女醫師：「每處都應用女

醫生她們比男人作這件事是比較地不痛苦，比較溫和與細緻。產科不應要男子！」這個機關的女醫生告訴我，有人經過十五次的手術。但是平均是七次，有的女人一年有兩次或三次的。她解釋這種事發生得多的緣故，也說是由於缺乏預防的方法。

法律承認人工墮胎後的十二年經驗，使蘇聯所採行的方法受很大的歡迎。這個法規無論如何已經揭開了以前秘密墮胎的黑幕，並且將無知識的墮胎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莫斯科婦嬰保健會墮胎部的指導員斯博士（Dr. Gens）告訴我們：「科學的工作，數年來，已經證明在醫院中墮胎是絕無危險的。在二萬五千墮胎中，只有一個死的。在西歐諸國，死亡的數目為百分之一至二。在德國，每年有一百萬施行人工墮胎的，至少有一萬婦女死在手術中。在蘇維埃，假如不承認墮胎為合法，則每年有三萬的死亡數。假如這是實情——實在是無可疑惑的——在過去的十年中，蘇俄已經救了三十萬婦女，同時在這個期間，德國許多的婦女都遭罹了不幸。事實勝於雄辯，一切的解釋都是多餘的……」

自從承認合法的墮胎之後，仍舊嚴厲處罰非法的墮胎手術的案件，在蘇俄自然減少了。依醫生們一般的意見，在俄國今日是沒有刑事的墮胎案件：像這樣，法律已經完成了牠的目的。

國外的專家，以爲蘇俄的「墮胎的流行病」要引起生產率的減低和人口低減，這是杞人憂天。蘇俄的生產率增加，達千分之三十七（在西歐文明國家，只有千分之二十以下）。人口低減的威脅，合法墮胎的巨大的影響，是毫無可怕的。在俄國並沒有墮胎的流行病，甚至連暫時的都沒有；譬如，在俄國，一九二四年，一百個生產中有二十七個墮胎的，同時，在柏林，有百分之五十四。其他國家的立法者，必定要同時記着人口的統計，和貞斯博士所說的話：「在蘇聯，不管立法如何，墮胎的數目比較是最少的；蘇俄是實行墮胎最少的國家。」

蘇俄婦女不斷地用她們墮胎的法律權利，但是一些也不危害人口的增加，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不能過分重視前面所提的宣傳，說生產小孩不但是社會的機能——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有機會還要提到——並且是婦女作公民的責任。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健全民族婦女之健全生育本能。由於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理由，理想的條件在此已於某種意義中實現：凡希望得到的小孩——「生命之筵席上受歡迎之客」——纔能邁進這世界，這就是那些不是因爲「防育技術中不可挽救的一點壞命運」或者「失於檢點」而生的小孩。凡要放棄她作母親的社會機能，與不願完成她公民責任的俄國婦女，是不要爲這世界生育兒童的。但是大半都盡了這個責任，並且

不用強迫（在西歐還以強迫生育爲神聖的）。只要顧到她自己的健全的本性，她自己是希望有小孩的。此外，俄人非常熱愛小孩，他們對於小孩之愛，是他們的天性，這是由許多動人的事實來證明的，這種愛——不管技術的發展，機械化，美國化——仍然與他們的天性接近，在意義上，還是他們自己的孩童時代。

嗣續問題的歷史就是母愛的證明，甚至列寧的立法都不能抵抗這種愛。起初，革命的立法是反對嗣續的。一九一八年的蘇維埃法典，禁止承繼自己的私生子或別人的小孩，以防濫用童工和其他的糾紛。但是生命是較強於法律。『普萊馬徹斯特沃』（Примачерство）收養小孩的機關，實際上與嗣續小孩一樣，現在還存在着的；當內戰之後，接着一九二〇—一年的大饑荒，流離失所的小孩，簡直不可勝數，立法機關不能也不應該不顧到人民嗣續小孩的立法。關於這一點，的確有很大的讓步，所以在婚姻法中關於這事的條文，立刻就施行了。引用了許多的保障條件；序言上說，嗣養必須注重小孩的福利而不管寄父母；養子與寄父母間的年齡必須有適當的差別；凡成年的人，不能被嗣養；十齡已上的小孩對於嗣養必須取得他本人的同意，二十七條又規定，第三者因爲小孩的福利，可以呈請取消嗣續。

雖然如此，雖然居住情形是不可想像的壞，雖然人民的生活程度是一些也不滿意，但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家庭的保護』在蘇俄是有很深的基礎，所以孤兒和棄兒的數目漸次減少。他們好像嗣養的小孩，自托兒所將他們寄居在各家中，一直到四歲。我在列寧格拉德（Leningrad）的婦嬰保健會聽說，時常有人嗣養男孩時，同時也要一個女的，反之要嗣養女孩的，同時也要一個男孩。在新俄，常時地，普遍地都不缺乏熱情和社會競爭，我聽說有一對無產階級的夫妻，一次就要了三個小孩：『因為我們的責任是要幫助國家。』當這些小孩交與寄父母時，同時也給與衣布和一個搖籃或一個小牀，並且由巡行的看護到寄父母家裏去視查。再者，小孩如不是由親生父母撫育，必須兩個月帶他們到『嬰兒福利處』（Infant Welfare Centre）去一次。

像這種嗣養的方式，是一般地受歡迎。小孩子在家庭環境中，較之在最好的機關中還好，現在實行付與窮苦而打算將小孩送至育嬰堂的父母以撫養費相等的錢數。負責者不願將寄養的小孩，交與已經有小嬰孩的父母。但是，凡已有長成的小孩的家庭，是更好。以上所提的列寧格拉德的機關，於一九二〇年一年中，就以嗣養和家庭保護的方法，寄出了三百個小孩。

雖然有節制生育的宣傳，有承認合法的墮胎，生活程度又是如此地低，但是生產率還是不斷

地增加，這個事實是由於偉大的母愛，和蘇聯的嬰兒福利工作，尤其應歸功於俄人對於嬰兒的喜悅，和施與人民的道德的勸告。我們要進一步研究這種可以稱之為蘇維埃統治下之主要財產的福利工作。

二 婦嬰保護

爲便於比較起見，首先簡單地一看俄國革命以前的保護婦嬰的條規。

俄國在一九一二年以前，簡直不能說有什麼母性之保護，和什麼母性爲婦女職業之法律的承認。後來活躍的勞工運動增長了，設立了勞工保險基金，工廠的婦女要繳納她們的工資之百分之十二，她們所得的代價，就是在分娩之前，有兩個星期的假，分娩後有四個星期的假。其他非工廠婦女——尤其是農婦和從事農業工作的婦女——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享受不到任何的法律保護。

我們必須承認，一切都落後的沙皇政府，沒有這種立法，並不是十分的罪惡昭彰；因爲美國那時還不知道什麼爲母性之法律保障，甚至在進化的瑞士，雖然自一八七八年就有了不付工資的

生產假期，但是十九世紀以前，對於生產是沒有保障的。現在西歐各國的保護母性的法律，還是遠不及蘇聯，蘇聯在婦女分娩前後，都給與八個星期的例假，並且是付與全部的工資，而德奧波蘭等國，產後只有六個星期的法定假日，英比丹麥意大利等國，則只有四個星期。

但是，俄國以前最不好的，就是助產的設備。依據可用的統計，只有百分之五的產婦，享受醫生或產婆的幫助。在革命之前，俄國城市的產科是非常之少，還有一個大家都承認的事實，就是鄉下的農婦，生產時沒有任何的幫助，就生在馬廄中。

對於嬰兒的不注意，也如同對產婦一樣。保護嬰兒的幾個機關，完全由於慈善團體或醫生的私人創設。模倣法國的所謂『一滴牛奶』(Drop of Milk)這個組織，於一八九三年，第一次設立於基輔；一九〇一年，彼得堡，俄得薩繼之設立。在各省中，地方自治政府單獨設立託兒所與產婦院。一九〇六年在基輔第一次開辦嬰兒康健處；一九一一年，在莫斯科有一些像這類性質的顧問處，但是在『布爾雪維克』革命之前，全俄這種設立的總數只有六處，而革命後的三年中，增加到一百九十三處。在一九〇五革命那一年，在鄉村中只有幾百設備不周的託兒所，在城市中最多只有五十個衛生處。這種情形反映在嬰兒死亡數字中是無足為奇的，沙皇時代的嬰兒死亡率比歐洲

任何國家都高，簡直可以與亞洲最落後的國家相比擬。一九一〇年，在俄國有二百萬小孩——三分之一強的嬰兒——在一歲之前死了（已往二年中，蘇聯的嬰兒死亡率減少了一半以上）。一部分自然是私生子與棄兒，他們的數目達到五萬。在莫斯科的孤兒醫院，每年收的孤兒有二萬，他們由寄養的人家給與無知的農人，因為缺乏醫學和衛生的指導，死亡的數目非常地大。的確，製造慈善家在舊俄時代是一件很發達的職業，並且我們可以自一九〇〇——一年聖彼得堡孤兒醫院死了差不多九萬，即百分之四十三的小孩這個事實，可以推知在家庭中小兒死亡之多了。有的地方，嬰兒死亡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雖然在鄉村區域有許多困難的環境，但還是要去克服牠，蘇維埃政府在勝利之後的兩個月中，建立起了保護婦嬰的制度，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法令——其目標我們已經熟知了——宣布：『生育小孩是婦女的社會職務。』於是，這個宣言成了領導的觀念，牠的精神影響了一切解決『婦嬰』問題的法令，在列寧寬宏而有系統的鼓勵之下，牠成爲有思想的，和諧的制度。這個問題，始終是公共衛生當局以及蘇維埃一切經濟社會組織之進步的綱領中的最重要的部分。革命之後，沙皇時代之衛生機關，馬上取過來附屬於人民社會幸福委員會（People's Com.）。

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 在這個時候，是在柯倫泰夫人指導之下；因為她的鼓動，舊俄時代所未得有的保護婦嬰機關的組織，開始工作。兩年後，事件進步得如此之快，以致保護婦嬰成爲國家的重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維娜·蕾培蒂阿娃——她是一個醫生，又是教授，繼續領導這個衛生工作有十年之久，因此她作了驚人的服務——出席於第一次全俄勞工婦女大會 (All-Russian Conference of Working Women) 並且討論母性爲婦女所盡之社會服務這個問題的原則，她的演說辭中說：『婦人生小孩所做的工作與一個工程師築路一樣的重要——因為她所生的小孩以後也許是一個土木工程師，而去建築道路。國家需要小孩，所以應該爲他們制定法規。不要以爲國家顧到母親之生產和新生的嬰兒，以及國家之抵抗嬰兒的死亡，是施行慈善事業。不是；如其那樣，那國家是爲牠自己着想，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爲你的。因爲你爲國家所遭受之生命與康健的危險，不能以錢來補償的……我們現在所擔負的任務，就是訓練母親作一個公民，並且使勞工婦女自掛慮小孩中解放出來。歷來都說母性是一種嚴重的折磨，一個小孩是上帝的鞭子。現在一切都變了……』

除了這一般的要事以外，還有更迫切的，實用的，對於活躍的行動給與果斷的鼓勵之事。假如

婦女要在生產過程中取得地位，要參加建造新社會的工作；那就要使她們擺脫照顧小孩的工作，以求一個職業。因此，起始就對列寧的口號『自家庭奴隸中將婦女解放出來』及將婦女自撫養兒童中部分地或整個地解放出來的要求，一併加以注意。現在，每人都正在以可能的精力，從事於完成五年計劃，因此每一個人都不應游手好閑，這個巨大的計劃的成功，最終要依賴婦女之扶助與合作，因此，問題是非常切迫了。

在蘇維埃取得政權之後，立刻保護婦嬰的有計劃的制度之綱領就出現了。一九一八年，已經有好幾百婦嬰健康機關了。牠們都是與治療和預防的機關很接近，這些機關要想自受孕時，間接地或直接地由於母體來影響蘇維埃兒童的生命。國家婦嬰保健會普遍的分設，已經造成了蘇聯公共生命的主要部分，沒有這一部分我們簡直不能設想蘇聯的生命；這個事實表示在現在所努力的復興運動中，婦嬰保健會所佔的重要地位。『保護婦嬰，是達到新社會主義的生活之道』——這是官方的箴言，同時，在勞工婦女，尤其是鄉村婦女的生命上，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這個全國巨大的保護母性與兒童的組織，因為是自人民公助委員會 (People's Committee of Public Assistance) 改到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的，所以放在莫斯科國家婦嬰保護科

學會 (Scientific Institu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and Infants) 的管理之下。在列寧格拉德也有一個同樣性質的會，女醫生門德勒娃教授 (Professor Mendyleva) 爲首指導。在這兩個機關中，凡一切關於婦嬰的生理學和病理學的問題，都由專門家和小兒科醫生拿來當作科學研究的題目；對於小孩的飲食，照料，衣服的指南，爲全蘇聯計劃好，並且作一種設備以訓練適當的助手，產婆，和教師。

保護孕婦和產婦的幸福機關，一半是預防的，一半是指導的。牠的效力是自保護母性的法律條文而來的，這種條文，是任何國家的康健的設備所望塵莫及的。我們上面已提過，每個婦人在分娩前後都有八個星期的假期，在漸漸減少的女雇員中，減少到六個星期。現在，在孕婦工作前後要作血壓試驗，以便考察工作對於孕婦的影響，自其結果中推出實際的結論，這件事於規定假期的法律條文尤其重要。

每個保險的婦人和保險工人的妻子，都由國家給與嬰兒的設備，並給與津貼，使她能哺乳她的嬰孩。還有許多保護孕婦的法律，及視查那些法律是否實行之特種負責人——工廠勞工保護委員會，勞工稽察員，勞工代表等。一個孕婦在工廠中所做的工作必定是較輕易的，不得勞工稽察

員的同意不得辭退或調遣她。孕婦與乳母是不許作夜工，她們的工作，遲一點鐘開始。此外，規定乳母每三點鐘有一個休息的時間，以便餵她們嬰孩的奶，凡有五十個以上女工的工廠，必須爲這個目的預備一個特別室。其他限制工廠青年婦女的工作和禁止重工的法律，都是對於婦女在母性中所盡之服務，有遠大眼光的讚助，並且是保障有健康的後代。

助產在原則上也是免費的，牠與蘇聯的一切送藥服務一樣，現在已經發展成爲巨大的組織了。在所有的莫斯科，列寧格拉德，和其他省分的分設處，有許多醫藥顧問處，待產婦和一般的婦女不但到彼去受免費檢查和詢問關於婦科的一切問題，並且以演說，傳單，小冊子和講演來指導婦女——總之，以各種方法，爲母性的任務作準備。自然這些地方都是很擁擠的。在等待的時候，以易於了解的衛生講演和問答等來使人們不致感覺寂寞，在一部聽衆中，表示十分地感覺興趣。候診室，接待室的牆上，都貼掛上圖畫，統計表，傳單，以解釋花柳病和肺病。

在某一時期，一個孕婦必須再來受檢查。在七個月之末，醫生給她一個證明書，拿去交與她受僱的地方，她於是開始了合法的假期。當她妊娠中及生產後的一年，不能辭退她的工作。

產婦院的數目是漸漸增加，在西歐所不知道的婦嬰寄託所(Homes for Mothers and Child-

Phob) 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這種地方，無人照顧的產婦，可以渡過她產前兩個月，產後兩個月——就是她們整個的假期——的時光。因為要使這種寄托院像家庭和舒適起見，以鮮花及其他適當的裝飾品來點綴這些房間——在蘇聯是很普遍的，在此你可發現產婦除了哺乳她們自己的小孩以外，還照顧那些沒有母親的小孩。在此，「每個蘇維埃女人，除了作她自己小孩的母親之外，還要作所有工人農民小孩的母親」這個格言的意義，比之在「母乳處」(Mothers Milk Centres) 實現得更多些。除了作很輕的工作之外，婦女在此還要學着讀書與寫字，和受最重要的「文明習慣」的指導，每個產婦，在她離開這個寄托所時，一方覺得她的小孩有了安全的庇護，一方覺得她自己經過了一種求學的過程。這使她感覺得更自由，更獨立，更有把握，對於她當前的新生命是更有準備。有許多產婦，受僱為這些寄托所的小兒看護，她們時常以真愛的精神，來執行她們的職務。

「指導處」(Advisory Centres) 在蘇聯很發達；在工業中心地，牠已經撫養百分之百的小孩到三四歲。一九三一年有三千處，而一年以前只有二千處。牠們是康健組織的基礎，其活動是認為最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牠們所作的宣傳，有的婦女一定不知道她們的法律的權利，並且不知應用，這些組織能够使單身的產婦在分娩之後，照着牠們的指導的和康健的活動而行事。所有的

指導處，都附設『奶房』（milk kitchens）。此外還時常開展覽會，以視覺的方式，指示關於助產，照料小孩，保護產婦與嬰孩之重要點。

指導處這種制度，是根據巨大的基礎而組織的，並且深入民衆。聯邦中所有的工廠，如每種執行，工業，職業等機關，選出相當數目的男女代表到每區的各文化團體中，他們負責管理這個指導處及學校，托兒所，和產婦院。這些代表與他們的區蘇維埃的代表合作。他們的保護產婦與嬰兒之活動中心，就是指導處，其他在區當局支配之下的一切這類性質的機關都附屬於指導處，聯合成爲一個團體。指導處的醫務部與全體代表，組成一個『改良勞工及生活程度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Labour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女代表的職務，一方防止捨棄嬰兒，一方注意那些不得不單獨負責撫養小孩的孕婦，照料她們，在適當的時候，將她們安置在爲孤身產婦所設的寄託處。因此，一九二七年全聯邦教育機關中的棄兒的總數，只有八千左右——現在無疑是更少了——這種事一方要歸功於法律取消私生子與嫡生子的區別，一方也要歸功於代表們的教育功作。在這些寄託所的嬰兒死亡率，比之從前自然是小得多（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只有百分之五·二），這是因爲小孩們不被製造慈善家的

工業所利用，並且因為有的都交與城市工人作承繼的子女。

再說一句關於指導處的話，其中有巡遊指導處，為鄉村，國家農場，集合農場等處服務。這些巡遊指導處在一個地方最多只留二月，並且使牠們的活動適應地方情形。這些指導處的活動，除了給與醫藥衛生的知識之外，還包括諮詢社會和法律的問题。那些附屬於指導處的，由法律專門家指導的『社會法律諮詢處』(Social and Juridical Consultation Centres)的職務，是去補救婦嬰的貧苦，尋找不負責任的父親，幫助贍養費的訴訟，為產婦設法找工作，為嬰兒準備奶食。在這些指導處中，解釋蘇維埃的法律，預備一切文書，幫同提出訴訟，給與口頭上的或文字的知識。

在莫斯科婦嬰保健會的『社會與法律辦公處』費一早晨的時光，就能得着許多關於蘇俄保護婦嬰的知識。在一間衛生絕無可批評的樸素的房中——有人要到那兒去，必定要脫去自己的上身衣服，穿上一件白外衣——通常有兩三個婦女，坐在一隻中號大小的桌子面前，還放了幾把椅子。有一個是實際的顧問（律師），還有一個看護，再一個就是『改進勞工及生活程度』的地方委員會的代表，她代表社會分子。假如一個婦人頭一次來商議事件，必定要作很長的問答，其他的人就只是進一步的考問了，因為常來的總是那些人，並且限於一個特定的區域。

在婦女接待室中，是很擁擠的。有一個當值的女職員告訴我：「生育力於今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不能適當地達到每個婦女的希望。」她們輪流着進來。我只隨便選一件事來說：

一個未長成的，襤褸的，憔悴的母親，自己還是一個小孩，抱着她的嬰孩，隨着她母親進來了。她不過十七歲，是化學工廠的工人。結婚後八個月，她的酒徒丈夫與她離婚了。但是因為房屋缺少，使他們不得不繼續住在一間屋子裏，當她哺小孩的奶時，他要勒死她，並且恐嚇說要「收拾那小孩」，省得給牠的贍養費。那小孩只有三個月大。

「因為什麼你不去施行墮胎手術？你那時想什麼？」

「當我去的時候，那是太晚了……。」

那個青年母親的母親，是一個徹底吃得好的，純粹資產階級的代表，很明顯地是一個狡滑的女人——她在頭上帶了一個紅巾，表明她是同情於新統治——每當她女兒開口時，她總要以她尖銳的聲音來插嘴：「想想她的社會地位吧！」但是，實在她什麼都不在乎，只是要擺脫她的女兒和小孩以及那位離婚的丈夫；她不能以弄死那小孩來恐嚇她的女兒。

那位年青的母親似乎很失望；她搓她的雙手，對她的小孩也是很暴躁……。

顧問竭力安撫她：「相信我，我們盡力替你設法。否則我就不擔負這個工作了；這個小孩可以放在托兒所去，並且我要監督牠父親給贍養費。你相信這個吧。我們也許找一個奶媽，或者將你連同小孩送到寄托所去。但是不要聽你母親的話。她是太饒舌了。並且不要打你的小孩。如何能傷害這樣一個小動物呢？我們一定要幫助你，你不要着急。你也許可以在別的比較衛生些的工廠找着事。請你安靜些，無論如何不能再打你的小孩……」

另一件事：

一個母親手裏抱着她的小孩。她第一次來。二十五歲。原來是工會會員，但是現在是一個「管家婆」。結婚二年，離婚四個月了，她同丈夫是協議離婚的，他現在集合農場作事。每月他有一百五十盧布的薪金，付與小孩的費用每月三十盧布，小孩差不多一歲大小。

「我來只是為找一間屋子……」因為現在有五個人住在一間廚房裏，原來是她與丈夫同小孩一起住的。顧問有一個確實答覆，說一定要為她設法……

一個青年的，慘白的，美髮的婦人，帶着一種疲倦的表情，哺着孩子進來了。這個指導處已經熟知她了，因為她時常來，那個雖然很年青，但是對這些不幸的婦女就好像親愛的母親的顧問，以下

面的話迎着她說：

「我一看見你心裏就如同刀絞似的。你小孩現在好嗎？還沒有答覆嗎？你自己到「托拉斯」(Trust)去找你的丈夫；我給你一個條子。」

「我不能再像這樣下去；我是陷於絕境了。」

「那嗎，我來設法將你安置在單身母親的寄托所吧。我們能很容易的替你找着工作，並且將你的小孩放在一個托兒所。但是一間屋子——這是很困難的。」

「假如我沒有小孩，我能馬上去做家庭的工作。這種工作是很多的。但是帶着一個小孩是沒有人要你的。」

她們兩人的談話就好像是好朋友。小孩四個月了，不斷的哭叫。這個還不會讀書寫字的母親，很溫和地看着牠，拿奶給牠吃。

「一個暴躁的小孩。」

「怎樣能不是呢，當你自已餵牠奶的時候，自己時常是不安的……。」

另外兩個母親衝進來了。兩人都帶着小孩，住在夜廠(night shelter)內。有一個有重傷風，聲

音都啞了：

「我來是爲小孩的奶。奶不多了，並且愈來愈少……。」小孩的父親在軍隊中，那時正在佛爾加。在莫斯科時，他是住在兵營裏的。她也想找一間屋子。她在工廠中作整理工人。這時所需要的顧問看護來了，她看看那婦人，歡迎那小孩說：「你這可愛的傢伙——我的心肝！」

再以下的一個婦人是一個妓女，碰巧生了一個小孩。那個小孩是十分的污濁，差不多是赤身的，看起來非常可憐。他們拿來一些手巾，給牠穿上一件外衣，看護婦帶着小孩走了……。」

一個原來是女僕的婦人進來了。「他」住在同一的房間中。「我同他住在一起」——這就是那小孩。她也是在夜廠中，要想找工作。「現在找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這個小孩……。」

這個婦人是個半文盲，又沒有一點知識；她講她的故事：「牠的父親現在一個月給二十個盧布，現在牠有三個月大了。我同他住在一起有三個月，現在我時常到公事房去找他。他現在同另一個婦人住在他家，我不知如何是好。」「下次你再到他那兒取錢時，設法找個證人在那兒，我們可以控告他。如果只有你們二人在那兒，不要接他的錢。我們給你的是很正當的勸告……。」

最後，一致的慶祝：一個婦人帶着小孩進來了，她不但在此找着了工作，並且小孩也在托兒所，

自己本人則住在合作住宅 (co-operative dwelling) 裏。她剛聽完關於蘇俄法律下之婦嬰權利的講演來，她並且曾經參加過爲母親組織的社會競賽；意思就是指絕對依照小兒的睡眠，哺乳，出外等的規則。她今天來此的原因，是要謝謝那兒的同志們，還要徹底地看看關於婦嬰的展覽。我們一起走出這個地方。

在半路上，我們在一個以燈光布告關於爲母親的訓誡的黑板前止步了。每一天的每一小時，母親們都能自醫生與看護婦那兒，得着關於她們爲妻爲母的知識，並且也能受着關於小孩的衛生，醫藥，社會制度，法律權利等事的教訓。引人去看這些訓誡，每次的方法都不同，時常能引起絕大的興趣。

在其中，一個新的標語引起我的注意。一個圓臉好看的嬰孩，向他母親說：『請你細細地看那陳列，研究出如何纔能好好照管我。』有無數像這樣的標語，多少都帶些藝術性質。『沒有東西能够替代母乳與母愛；』『母乳沒有壞的；』『假如父母不能撫育他們的小孩，國家可以擔負；』『爲母親們創造優良的環境，保證國家將來的興盛；』『一個小孩吃牛奶等於一個婦人餵牛的奶；』等等。

人民衛生委員會，除了印刷格言書，小冊子，傳單之外，不斷地出這種標語，唯一的目的就是以各種方法，指導母親們如何去養育健康的小孩，如何使她們自己健康，這些印刷品自指定的地點，散佈於蘇聯的各地，牠們出售給這世界上最愛研究的民衆，就好像熱糕點一樣地受歡迎。

在這個包含好幾千項目——標語，照片，表解，模型，表冊，圖版，解剖，以及其他照料小孩的事等等——的陳列中，我如以前一樣地看見每種東西。那些來看的婦女，有時與丈夫一起來，她們一羣一羣地被領着去參觀。自那個牆壁到這個牆壁，自那個玻璃框到這個玻璃框，她們看見人自胚胎到了子宮，到生而為小孩的發展的實際情形。莫斯科的婦嬰保健會的陳列中，有一項特別有趣的，就是各種舊時的德意丹麥的藝術家的翻印作品，那些聖母讓小孩自一個角中飲酒，那是被指示出來是有害的。同樣有趣的，就是參觀人的登錄；與其他蘇聯的展覽會和博物院一樣，此處也是歡迎在他們所預備的本子上，批評記錄他們的印像與希望。我打開牠，讀最後的一頁：『無疑，這個展覽是非常好並且有益。女領導者的解釋也很好，並且很清楚。我要叫我的妻子明天馬上就來。這個展覽對於我和她都有很大的興趣。我在此第一次得着許多真實的知識。工人某某。』

工業城市中的指導處，與分會合力來做如上所說的巨大工作，此分會其中有許多女工代表；

鄉村的情形又不同，自然是比較簡單。在鄉村中，婦女——農婦與農業工作婦女——也組織保護婦嬰的委員會，但是她們最重要的衛生工作的表現，就是托兒所，嬰兒院，在鄉村中這些都有驚人的發展，因此，在蘇聯一國所獨有的夏季托兒所也產生了。牠對於鄉村勞工婦女的重要，也與在工業都市中一樣，使婦女減輕她們照料小孩的責任，並且使她們自由出來工作，列寧說這些托兒所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細胞，他提議將托兒所有計劃地發展於全蘇維埃國家。他要求凡是一切有女工的工廠，都應當設立有訓練的醫生與看護的托兒所。現在，在所有的工業中心，都有工廠托兒所，地方托兒所，在鄉村的集合農場與國家農場中，都有上面所說的夏季托兒所與季節托兒所，以後又有兩種：勞工婦女團體之黃昏托兒所，和爲作夜工的婦女的小孩的夜晚托兒所。

幾個數目字就可指示出來蘇俄托兒所的增加數目：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工業區的托兒所自三萬三千三百七十四處增至十三萬處，夏季托兒所，得集合農業婦女的幫助，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自十三萬五千處增至一百五十萬處。一九三二年，又加倍了。這種增加證明了自革命以來，托兒所已經成了每一個工廠和工作所以及集合農場與合作農場的重要部分，並且證明了列寧一起始就看出牠們的重要之正確。在蘇俄任何工業建設，任何經營，任何集合農場，任

何機械廠，任何集合事業，要是沒有這種托兒所，簡直是不堪設想。在各種的小孩機關之外，還有訓練母親的學校，因此，將來蘇維埃的公民纔能很早地習於活動，自信和衛生等事，而為共產主義的教育立下基礎，教育一個人熱心去擔負社會的責任。

托兒所除了這個一般的官能之外，鄉村收穫時期所開辦的，期限只三月的夏季托兒所，又有特別的職務。在俄國從前，與其他國一樣，在美麗的夏天來時，嬰兒死亡率照例就增高了。在俄國又有其特種的緣故：在夏天的時候，農婦必須要在田中工作，她們專心一意地從事於收穫，將她們小孩，甚至嬰兒都留在家中無人看顧。但是現在當收穫時期，可以將她們的小孩放在托兒所；上面已經提過，這種托兒所所有三百萬之多，已經在許多次的聚會中，將托兒所的目的解釋與鄉人聽。

要說夏季托兒所之設立，改革了整個鄉村生活，這的確是不錯的。不但僅僅指農村人口生活中的改革，並且是生活之精神與態度的改革，尤其是在集合農業經營中。譬如集合農場的婦女，她們不需要在分娩前一刻還要到田地去工作，損害小孩與她自己的健康以求得她們的麵包。

新時代的暴風雨，吹過俄國的鄉村；牠不但自後面吹來，有時是一種很強的頂頭風。這種新生活的先鋒，是自托兒所中吹出來的。蘇俄共產黨第十六次會議的議決案宣布：

就托兒所，幼稚園，學校，和治病機關來說，我們必須以集合農場婦女之獨立的社會主義的活動為基礎，對於新生活施以民衆教育，因此，我們可以不遲延地為集合農場的婦女們照顧小孩，以期在收穫時期減輕她們的工作。

這些話都是擔心五年計劃之不能成功，並且在那個時候，當局看清了麵包問題之能否解決，大部分有賴於集合農場與國家農場中數百萬俄國婦女的合作。要努力實現五年計劃而不算計她們，就好像不將主人翁算在內——無論如何精確，數目要另計算的。

現在每種制度都是為鄉村與城市婦女着想，為她們成立了一個發達很完備的保護母性與兒童的制度。他國不能比擬的衛生組織，最近的將來，又要有所發展了。例如現在每一個車站都計劃設立兒童特別室，在等待火車的時間——有時要好幾天——他們可以由最近的托兒所的醫生與看護照料。第一個設有淋浴，熱水管，兒童廁所的這種接待室，最近已經在莫斯科開辦了。據說在弗爾加船上開設巡迴育兒所的計劃，也在考慮之中了。

最近還有一個近於實現文化五年計劃之遠大的設計，就是由國家來擔負撫養兒童。自一九三二年之夏，蘇聯大部分的——假如不能算全體的——四歲以下的兒童，都由國家來養育，這是公共衛生委員會的責任。因為要達到兒童養育之社會化，於是計劃在每一個婦嬰指導的乳房附設一哺食處。在一九三二年之末，蘇維埃國家中就有一千處這樣的哺食處，容有四萬兒童的莫斯科婦嬰保健會中附設的一個，也包括在內。在起草計劃中，特別對工業中心加以注意。這種哺食處是為整個的地方服務，又設立地方托兒所，育嬰室，幼稚園等。假如這偉大新奇的計劃完成了，蘇俄現時的兒童幸福，是已經盡善盡美了；兒童保護與兒童整個生命的社會化，達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於是為兒童福利而進行的奮鬥，是以反抗對於母性與兒童的疏忽為目的。我已經說過，這一切都為的是要使兒童一有知覺，就感覺他是在社會之中，並且是其中的分子。此處不再說牠的重要了。自托兒所到育嬰室，再到嬰兒學校，然後到幼稚園一直達到他入學的年齡（七歲）。在幼稚園，他的共同工作的教育開始了，尤其使他注意生產工作。預備一切玩物，所給與他的器具必定是關於機械的，實用的。四歲大的蘇維埃公民，知道如何用錘與鋸，並依照他的力量以做實際工作，這是當然的事。



· Nadyes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

(Linin's Widow)

拿地雪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盧普斯克亞

(列寧之寡妻)

總之：國外人——有時蘇俄自己的人民——對於這些計劃的成功，儘管有疑惑的，但不能不承認蘇俄保護母性與兒童的決心遠非他國所能及的。更有一件無可置辯的事：在蘇維埃紅旗之下，國家與社會來擔負責任，一代新興的男女，甚至在兒童時代，就與其他國的大不相同。

我和朋友住在建築合作社的房子裏時，冬天看見從頭至尾裹在皮衣或其他冬衣裏的小東西，在白而柔的如氈子的雪上，跳跳躍躍好像蟋蟀，無論天氣如何冷他們都不怕，我是不勝驚奇。

在莫斯科的公園與樹蔭下的椅子上，坐滿了年老而閒暇的祖母，有的是母親，姐姐，女看護——碰巧你還看見男子——推着她們嬰兒，一邊眼睛還要照顧在那兒遊玩的小孩。

當我們那位小朋友加利克（Galik）中午中止了他對抗反革命者的戰爭，或者剛自兒童委員會散會回家時，溫度正是零下三十度（「爸爸老，是冷得發抖！你猜他怎樣想？他想我會凍死吧？真的，我不喜歡我有這樣一個爸爸。他自以為是個男子漢；他小時一定從來未跳過」），他身體是熱的，紅的雙頰，發光的眼睛，坐在那兒吃他媽媽所預備的午飯，我拉着他問他近來如何，他總是有許多話告訴你。

例如他要告訴你一月二十二日是列寧的忌日，雖然列寧死時他還未出世，但是他完全知道那件事的經過：『忽然一個很長很長的號笛聲，在許多工廠中叫起來……每人都馬上停止工作。各個工作室發了很長笛號……屋子都震搖了，人們甚至在街上站着不動……這個時候，列寧就死了，他是一個領袖，打倒沙皇的革命領袖……沙皇不是好人……於是郵差手上拿着電報東奔西跑：『列寧同志死了……』電車都停了，火車也半途中止，『克累姆林』忽然一個大炮響了：『咚——咚……』』

他立刻又向另一個人說：『你叫我和你一起到外國去，我可不願去；我不是一個赤黨嗎？』有一次他面紅筋漲地跑回來了。『怎麼啦？』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八歲的盧阿寶愛上了八歲巴里克，她寫了一封情書——她剛學寫字——與他：『親愛的，我的寶貝……』『講戀愛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沙皇尼科拉斯的時候已經過去。『這件事辯論得很激烈，最後決定處罰盧阿寶，三天之內，不許到遊戲場。』

一九三一年之夏，我在佛爾加船上過了一個星期，船上有許多大小不等的小孩和孕婦。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兩個新蘇維埃的公民又出世了。牠們和產婦一起在第二個碼頭就上岸入產婦院。

在斯達林格拉德(Stalingrad)，我有兩個小朋友，一個五歲的麗麗，一個是八歲的哲娜，我告訴她們那兩個嬰孩如何自佛爾加河帶上了岸，她們覺得很有趣。

哲娜那時正好指派為學校的先鋒隊(十四歲以下的共產黨青年團的初步階級)，她告訴我她是衛生委員會的職員，她的職務是監督課室和她的小同學手的清潔，假如有人受傷，她要找碘酒，繃帶，藥棉等物。

假如哲娜允許了作一件事，她不惜任何犧牲都要作到，她還要宣布「列寧的誓言。」我問她列寧的誓言與普通的誓言有什麼區別，她說：「譬如一個小女孩對人發誓，以後又失信了。但是假如她發的是列寧的誓，就沒有這種失信的事發生了。」哲娜又教我許多先鋒隊的詩和兒童歌謠：

(一) 列寧，祖父伊利支

親愛的祖父伊利支——

我們都是些小孩子，

我們能够知道我們的道理；

蘇俄婦女

二一六

對於你所說的，

我們完全能熟記。

人民奮鬥的領袖，

請來聽我們的誓語：

我們要作勇敢的戰士，

完成你所領導的革命，

親愛的祖父伊利支。

(二) 列寧 (Lenin Boys) 進行曲

(A)

列寧童子，

請聽訓誡，

服務社會，

出衆超羣。

(B)

列寧童子，

勤讀爾書，

專心服務，

服從紀律。

(C)

學問淵博，

誨人不倦，

努力現在，

愛惜光陰。

(D)

列寧童子，

第六章 母性與兒童

準備一切，

問心無愧，

永矢爾志。

甚至大人都能自蘇俄的兒童得着許多知識。在莫斯科招待我的一個女朋友告訴我一件故事，有一天她在一個沙皇時代很荒涼的小村中視查幼稚園，她要看看廁所，站在門口的小孩不讓進去：「喂，太太，你不知道規則嗎？你要進來先要脫了你的外衣。」這件事不禁使我想到沙皇時代的成人，也很少注意衛生的規律的……。

第七章 戀愛結婚與家庭

……我看見她漸漸走遠的影子，因寒氣而瑟縮……我想喊出來：『回來吧，和我在一起，我會溫存你，不捨棄你！』但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她也許會誤會這是戀愛，因此我緘默了……。

——波格達諾夫(N. Bogdanov)

一 昨日與今日

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青年所取之偉大領導的地位，能够像蘇俄的青年的。在此，舊有的傳說都成了事實。甚至在沙皇時代，青年人就已經是新思想的領袖。而『學生』與『知識階級』，『革命黨』等觀念，認為是一種東西。

從俄國青年男女革命家的生活與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彼此間的性問題已不成其

爲問題了，他們是朋友，是同志，是奮鬥中的侶伴。他們彼此間的行動毫無拘束，而只是向同一的理想走，心理分析家說這是羣衆心理的昇華。

俄國的青年，是國家情形之極端可靠的寒暑表，在他意志的變動中，可以看出國家一時期與一時期變動的情形。俄日戰爭的失敗，和一九〇五年革命撲滅後之普遍於俄國的反動，使青年人大失所望。他們自政治上轉向私人的興趣。此時新的預言家得手應心了。這就是馳名國內外的小說『山寧』(Sarin)成功的原因，那時牠所持的性自由之虛假革命的理論，使得每個人都瘋狂了。在這本書中，拋棄了一切舊觀念，青年人相信無拘束的性自由的新福音，他們對於所用的熱誠，與對於其他事一樣。在青年人中，性的無政府狀態繼政治的無政府狀態而生了。這些青年人，大多數來自中等資產階級。沙皇政府當局，並非不歡迎這種轉變，所以任這種狀態自然發展而不加以干涉。一直到阿齊巴舍夫(Artsybashev)的小說在國外被沒收了，而同時『山寧團』的團員又公開地變爲戀愛派——這種現狀在俄國歷史上不時發生——聖彼得堡的警政當局，纔設法制止這種新流行病。

『山寧運動』(Sarin movement)只是像一曲插戲，不久就消滅了，但還是引起了一個革

命的新浪潮。擁護者是工人多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十月革命之前的領導者——他們的
重要地位漸次增長，同時，他們將政治勢力的鬭爭，取來置於他們的支配之下。

後來的青年人又復自色慾的觀念中解放出來，徹尼舍夫斯基所說的話『拋棄色慾的問題
……』。現在的讀者對牠不感覺興趣，『我們又聽見了。這種話與五十年後柯倫泰所說的『你必須
要有時間纔能談戀愛。但是我沒有時間，』是相對照的。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大戰時候，俄國與其他各國一樣，因戰爭而引起了性的悲慘的結局。男
女分離了，俄國的農村缺乏男子，都市與鄉村，同一樣產生了男女的新關係。因為各處之缺乏男子，
所以道德，婚姻，家庭的法典，都懈怠了。夫婦忠實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與俘虜講戀愛的事，到處
發生，前線的軍隊，都在那兒等待解放的一天。

這種戀愛事件——結果是道德之總墮落——在他國也是一樣的猖獗。但是在俄國還有另
外的原因：俄國婦女對外國人的態度與俄國男人對外國的一切之過分的尊敬是完全不同的。俄
國男子與西歐人的這種關係，是完全由於他們自己覺得文化遠不及西歐人，而婦女則是完全由
於感情色慾的衝動。除了外國人能引起她們消魂之外，事實上俄國的婦女比其他國的婦女是更

女性化，她們需要溫存，需要更優美的性關係，而她們的丈夫是不了解這一套的——在一般男人中，他們是野蠻的，粗暴的，她們本能地要追求這種慾望，正巧在偶然遇着的外國人身上發現了。據十六七世紀住在俄國的外僑說，俄國的婦女，雖然深閉於閨闈之中，並且認非正宗教徒為異教者，但是外國人也不是十分難於接近她們的。由於婦女特別為這種事定出一種道德的法規這一點看來，證明這種事一定時常發生。近代俄國還有這樣同一問題。

無數的德奧兵士，雖然大戰數年中，在俄國飽經作俘虜的艱苦，但是他們並非完全缺少異性的安慰。因為俄國鄉村中兵士的妻子的道德標準，是盡人皆知的；她們在家庭與農場中所作一切的男性工作，一方使外人欽佩，同時她們也被視為不足恥，因為她們並不保守婚姻的約言。

在大戰時，鄉村中只有小孩老年與無能的男人留下了，婦女一天一天地顯得增加，於是外國的俘虜就來代替她們丈夫的職務。在麗蒂亞·賽非里娜 (Lydia Seyfullina) 所寫的小說中，牠的女主角說：

無論我是如何愛我的丈夫，他走時我是如何痛哭，他走了以後，我還是照樣的「娛樂」我

自己……就是他回來時殺了我，我覺得他也是對的。但是，我仍舊不願虛擲了我的青春。據說從前的婦人，守數十年的空閨都不嘆一口氣。我們是太懦弱了，不能如此……青春的熱血——這又如何的說呢……他自己一定也明白這個……我知道他也離不了一個婦人。他也許還染上了憐病。有這樣病的男人已經不少了。就是那麼一回事。甚至他會打我，使我成一個殘廢的人，我們以後還是好好的住在一起。假如他因怒而殺死了我，他以後一定要後悔的。因為我是一個好工人而又強健……。

世界大戰，將昔日的道德觀念拋諸混亂之中，因此，接踵而至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內戰，使道德的墮落，在俄國有不堪設想的程度。這次戰爭是所謂『同室操戈』。除了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受到鼓勵的殘忍以外，又加上同類相殘，特別是階級中根深蒂固的仇恨，他們之間有不共戴天之勢。因此，紅黨與白黨間所採之方法，甚至比用以對外國人的還要殘忍不人道。戰士們無拘束的本性，是更無法約束，他們的性的嗜好——死神追隨左右——是時常以極端的殘酷的方式來發洩。因此，強姦敵人的妻子，認為是戰爭武器之一種。

「布爾雪維克」紅軍中的女子，她們在前線上努力戰爭，有自兵士升為司令者，她們享有特別的保護和男同志的尊敬。但是因為是婦女，她們的地位也是很危險的。

聰慧的蘇俄新聞家拉里薩·利斯納 (Larisa Reizner) 她曾經於內戰時在前線作戰，不幸早死，在她的日記本上，記載着一個婦人的內心發展，這個婦人是她在戰後於南俄的礦中遇見的。在她們兩人談得知心的時候，那個女子告訴她：在她飽受了幼年時代困苦之後，她加入了紅軍，去為自由而奮鬥。在軍隊中，所有的男子都盡力保護她：

……她在戰爭中纔如花一般地開放，長得像一株苗條的白樹，有灰色的頭髮。她有自己支配的報紙，自己的偵探隊，自己的制服，自己的來福槍，自己在戰場中奪的馬匹，她在隊中的地位，她第一次的受傷——總之，一九一八那個偉大的一年所給與她一切東西，補償了她不快樂的已往，她小時住的那沒有窗戶的頂樓，她為打破了一個茶杯而被扣除了全部薪資的兩個盧布，為她的男主人在黑暗中摸了她的胸部而被女主人驅逐出來等等的苦處……。

有一個晚上——是進攻的前夜——她那個部隊的司令官叫她去說：「薩霞，假如你真真

爲革命的話，假如你願意……，『沒有等她回答，就在地板上將她強姦了……』

她不是爲她的童貞失於一個她所不愛的男人而悲痛，她所不快者是關於這件事要對她的接近者撒謊……她爲戰爭而犧牲了……。

有的婦女認爲這種『準備作性的犧牲』是她們軍事職務之一，因此並不以此爲一個問題。我在列寧格拉德時，自一位美髮藍眼，外表很美麗的婦人，聽說到過這種婦女，她原來是一個紡織工人，內戰時加入戰線，現在與她丈夫一樣地在很高的執政地位。當我在她的公事房閒談的幾個鐘點中，她接見了好幾個她屬下的男子，給他們以命令與指導。她末了對我很簡單很坦白地說：『我也是這種婦女之一；在那個時候，這是當然的事。簡直沒有時間去考慮……』

在後方軍隊中，這種作自我犧牲的婦女也很多，就如那些在後方給與精神上幫助的農婦——『綠婦』(Green Women)。格拉德科夫(Gladkov)作的小說『水門汀』(Cement)中的達霞(Dasha)也是這種『革命兵士』之一。她丈夫離開她去抵抗白黨，她也因爲內戰和愛她丈夫與小孩的緣故，自『管家婆』變而爲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婦人，她一方又要爲她丈

夫與小孩維持家庭。她在內戰時，在後方帶消息至反革命軍隊屯駐的山中去。她的革命同志們時常暗地裏與她來往，以探聽消息。

……在她生命中是頭一次與別的男人接近，但是她心中沒有什麼對她丈夫不忠實的，並且不是很勉強的。當她想到這件事時，她並不後悔，這事就好像敵人的偵探和槍彈一樣的是一種危險工作。有許多老同伴，留戀着她而不肯回到他們駐紮的山上去，他們甚至哭泣。他們真心一意的哭着說：『達霞啊，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要去過像一隻野獸住在森林裏那種生活……』

愛我吧，我快要死了。假如你愛我，一切的恐怖我都不怕了……』

的確她也有退縮的時候。但是終於自己作了犧牲。這種犧牲在她整個的生命中又算得什麼呢？而這一時的犧牲又能給男子以力量與勇敢……。

三年之後，內戰停止了。青年人在這危急存亡的過渡時代是如何的情形，前文已說過一部分了。『自由戀愛』之被誤解，一九二〇——一年之可怕的饑饉，接着的新經濟政策時代，足以敗壞溫柔的禮節，那時在性關係中所普遍流行的情形，是非常混亂的。青年人彷彿完全失掉了他們的忍

耐。於是革命的領袖和國家出而干涉，他們是代表『國家的良知；』他們鑒於已往的革命經驗，當俄國還正在革命的熱浪中時，色慾問題是極不關重要的。

列寧對克拉拉·西特金極力諷刺戰後流行於德國的討論團體，那些團體只注意性問題。他對於那些『眼光只注視性問題一如像印度聖人眼光只注視他的肚臍一樣』的人，表示疑惑。他說青年運動，因對性問題之摩登態度與過分注意性問題而受了損失。他深信革命運動，還有許多比給與羣衆以性知識觀念要重要得多的任務。同時他鄭重地聲明他不是一個『嚴厲的節慾者』，共產主義與節慾主義是無關的，而青年人是需要生命與活力的享受。

『布爾雪維克』老前輩的這種抗議，國外很少知道，有的人較列寧還進一步，差不多是宣傳節慾的理想了。那時最熱烈的就是『蘇聯婦女之社會化』的無稽之談，這件事在當時不斷地縈繞在一些人的腦筋中，尤其是在有反蘇維埃之宣傳的地方。終於性問題的巨潮漸漸退去了，蘇俄的新興一輩青年，是革命的保護者，他們負有重大的使命，性問題對於他們似乎不是一個問題。俄國人的性生活又進到非色慾的形態了，其歷程比已往是更徹底更普遍。像革命先進者那樣男女之間絕不發生問題的性質，到如今成了俄國羣衆們普遍的情形了。所以有如此的變化者，要歸功

於五年計劃。

二 共產青年團中之情形

當五年計劃第四五年的時候，當蘇俄中之一切私人 and 精神的進行都要以五年計劃為歸依的時候，性的關係是如何呢？尤其是建造新俄國和在經濟與文化奮鬥前線的青年的性關係如何呢？他們對於人生改變了的態度如何地反映在思想上呢？

這些降生在新社會制度中的青年們，完全不明白已往的事，他們承認新制度與新習俗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不了解已往是與現在完全不同的，並且不知道像蘇俄這種生活外還有別種的生活。有些觀念，例如道德與罪惡等，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青年是健全的，快樂的，整個地被他們的世界所包圍，以他們的工作，他們所遇着的事為快樂。一切的任務，無論是如何困難，對於他們不過是遊戲，是娛樂。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問題，不知道什麼是複雜，世界在他們的前面是簡單的，清楚的；總之，『大海也不過浸沒到他們的膝蓋。』

我要鄭正聲言，包括蘇俄全體青年的共產青年團，並非完全是一個調和的團體，其中至少可

分兩部分。佔優勢的一部分是工業以及農業工人的子弟，他們在教育機關，大學校，和工廠中，都享有特權，他們總是走在前面，既不受偏見之累，又無因襲的信仰。在他們之中，又分都市與農村的工人。但是，勞工之機械化，和一切新發展之深入農村生活，使這種分水界漸漸消滅了。其他的一部分是已往的中等階級和知識階級而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子弟。論年歲，他們的確是新青年，但是因為他們來自舊觀念佔優勢的環境中，所以他們的精神習慣時常暴露舊觀念的遺跡，雖然新的環境與觀念支配了他們，然而他們對這些環境與觀念的態度，是吹毛求疵的，疑惑的。但是，這種情形，一如其他的矛盾現象，漸漸地消滅了，自現在復興期間的重要來着眼，我們可以說，這一代新青年，是一個果決的統治的因子。

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候，性問題在青年人生活中，是沒有多大重要的：因為他們要想別的事，沒有時間討論牠，並且還有許多其他的事要做。破除迷信，毀壞已往，在過去數年已經結束。與需要最大努力之重建人民生活這件事同時並進的，就是兩性間之互相關係又恢復到健全的狀態，由此又發生了一種新性道德的制度。的確，牠的結果如何，還不能預測，但是牠的根本特徵，已可概見。趨於極端的事自然還未完全消滅。不久以前，人們時常問：「你有一個共產青年團的妻子嗎？」

回答是：『沒有，我有我自己的。』最近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普拉夫達』報，接到好幾封通信，一種是關於濫用新家庭法典的，一種是要根據舊有的道德來規定兩性的關係；這個報紙對牠們的解釋說：『黨內的輿論，不容每個人都借口共產黨並非僧尼制度，而就此作淫佚的事。』同時牠又對那些保障新家庭法典過甚了的人，給與暗示說：『布爾雪維克不應與羅馬舊教混而爲一。』結果牠同時要應付兩條戰線：反抗『回教』與『舊教』。

今日蘇俄的公共生活，差不多沒有注意性問題的餘地。一切猥褻，墮落，淫佚，腐敗的事，借舞臺，影片，音樂亭，及猥褻文學以迎合人民低級趣味的事，在文學中，在印刷品中，在舞臺上，都沒有了。生活的環境是非常的健全與純潔。在歡樂日，在俱樂部中，以及一切社交的集會中，你可以感覺到同樣的空氣。好像是奮鬥的熱誠，已經戰勝了性慾。我們時常聽見男女青年說：『我們已經習慣於我們的社會活動，沒有牠們，我們一定要感覺沈悶。因爲現在我們是不注意私人的事……』再者，關於性問題的新文學沒有再產生了，戀愛的衝動與私人生理上的慾望，都被社會的情感與五年計劃的思慮所克服了。甚至歷來熱心對民衆的性問題之指導，現在都已經減至了最低限度。不久以前，是『生理學』戰勝了『心理學』，現在『社會學』代替了生理學的地位。『社會學』的同質二形

性，是較生物學的同質二形性爲強；『莫斯科的社會衛生專家巴特克斯教授（Professor Batkis）曾經在私人談話中提到這種情形。

蘇俄現時處於各方威脅與包圍中，生活是非常的嚴厲，困苦，窮乏，青年需要嚴格的軍事訓練，因此，共產青年團中的男女兩性關係，不但是自然的，友誼的，並且是嚴正的，客觀的。戀愛或者任何性的浪漫主義，都深受非義而認爲是資產階級的意識。蘇俄的青年再沒有比怕人罵他『小資產階級的戀愛』更甚了，因此他們甚至完全不承認有戀愛。一九二七年時，在俄得薩所做之男女學生的調查，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大的意義；回答是否有所謂戀愛這個問題時，他們的意見都差不多：『我不能回答你是否有所謂戀愛這個東西。你十分清楚一般人所說的戀愛那個東西是沒有的。』

『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因爲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戀愛。』『我不承認有戀愛，那只是一種習慣。』

一切的『櫻桃花』，一切的慫慂獻媚，賣弄風情，講求戀愛，懇切之求婚，及訂婚之繁文縟節一概廢止。感情與生活一樣的理性化，機械化，並且根據計劃來規定；在建造新生命的熱烈奮鬥中，將這東西都束之高閣了。又因青年喜歡誇張，有的人生小孩都有五年計劃。阿勒夏（Olesha）的戲劇『情緒之共謀』（Conspiracy of Emotions）的主角說：『我們不需要愛情，不需要神祕給我們

一個工廠來作寢室！一天出產兩萬性的行爲！」

我們可以拿蘇俄輿論對某一些在別國認為無害的事的態度，來證明人們，尤其是青年人們，如何地認真清理兩性的道德與兩性的關係。例如，共產青年團在他們的家裏或者俱樂部裏所安排之夜會，都認為是犯過。關於這件事曾經發出調查表徵求意見，大部分參加這種夜會的人，都反對這種惡習的流行。

外國簡直不懂得這是什麼惡習。在青年俱樂部的『紅角』(Red Corners)中，雖然青年人的態度是很灑脫，但是與美國的專講接吻與擁抱之夜會相較，又是不同。最不循正軌就是女子們飲酒的習慣，她們以為這是男女平等的享受。但是政府嚴厲地反對這種以及其他過分的事，其中包括近代式的跳舞在內。我遇見一位醫生對於跳舞大發牢騷：『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工廠學校的夜跳舞會，我簡直看不慣那種雜亂的情形。使我最生氣的，就是當樂隊奏簡單樸實的曲調時，每人都打呵欠，並且拍手拒絕按照這種調子跳舞。』

當局現正計劃以『同志法庭』方式來籌設特別青年法庭，以防止侵害無產階級性法典，特別要防止性的放縱。

生活的物質化，軍事化，機械化，和標準化，以及乘各種機會將運動精神應用到社會生活的競爭中，以引起打破紀錄的野心——由於這些事，蘇俄產生了一種新女子，她們外表是男性的。一看見她半軍人式的衣服與舉動，她簡單式樣的頭髮，她愉快不拘束的態度，她自信的行為，她緊張的表情，她有時不很文雅而參雜着流行口頭禪的言語，就知道她是一個共產青年團女團員。你時常聽見她們說：『那是小資產階級意識；』『我不是圖該尼挨夫小說中的小姐；』『那是倫理的，那是非倫理的；』『一個非所求的因子；』『你簡直是要完了』等等話。

脂粉與化裝都受了輕視。一個女共產青年團員，不喜歡以任何方法，表示她是一個女性。抽煙與飲酒的事並行，不過政府勸青年人戒除這種嗜好。假如你看見女孩子們，穿着制服，肩着來福槍，在人羣中按着勝利的曲調拍子開步走，她們與男子們簡直沒有分別，你就懂得詩人斯維特羅夫(Svyetlov)所說的：『勞工學院的每個女學生，都像改了裝的貞德(Joan d'Arc)。』

假如有機會，女孩子也同男孩子一樣磨拳擦掌。某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戲散之後，一直坐談到深夜兩點，她十七歲的妹妹，是一個共產青年團，在我正預備要走的時候，自外面開會回來了；她面紅筋漲的，外衣也未扣，手捏着拳頭。問她開會因為什麼這樣晚纔回來，她告訴我們：

在尼發(Neva)對岸的會散了的時候，最末一次到家的電車已經沒有了。她同其他的兩位同志決定走路回家。在深夜中，這三個女孩子被幾個男子所包圍。她們既求不像從前的女孩子一樣地遇着這樣的事求救於人，又不逃跑，就同這幾個青年男子打起來了，一直打得敵人逃走爲止。這就是她因爲什麼回來得如此晚的原因。這就是共產青年團中的女孩子們所受的軍事訓練。

當我將西歐中等階級的女孩子們如何的消磨她們的時光——大戰以後，雖然已經進步了——她們的腦筋都充滿些什麼，這些事告訴這個女孩子和她的朋友時，她們張着眼，好像不懂我說的是什麼。

在蘇俄，不但在教育方面實行男女同學，就是在生活的其他部分也是應用這個原則，因此產生一種自然而又健全的空氣。女孩們什麼都不怕，她們不知道虛假的羞恥，不知道躲躲藏藏的事。兩性間一切虛假的隔閡都打破了，男女很自由地談一切事。小孩們很年幼時就告以生活的事實與性問題之沒有什麼祕密，也許因爲如此，女孩子們還能保留着純潔，這是一種「內部免疫性」的方法。男女彼此隨意拍肩，但是沒有彼此擁抱的。「擁抱有什麼好處？」一個女孩子客巴(Катя)問，她是十分驚奇；她好像不能分清意識的感覺與肉體的感覺，就好像大地接收雨同雪一樣。青年

人甚至很隨便地同母親談一切事。我有一次到一位女朋友家去吃飯，遇着以下的事：當另外一位朋友對着她說，她看起來很年青，簡直不相信她有十四五歲的女兒，她回頭對着她的女兒開玩笑地說：「你看我不久就要作祖母了。」那個小女孩回答說：「你不久真要作祖母了，因為婦女不產生她第一個小孩是很壞的。」

在格拉德科夫的名著「沈醉了的太陽」(The Drunken Sun)中，描寫一個在俄屬利維埃拉(Russian Riviera)療養院中養病的十七歲的女共產青年團員。爲五年計劃的需要，她因過分工作而生了病。在這個唯蘇俄所獨有的療養院中，這女孩馬拉賽(Marrusya)認識了一個男子，假如這件事發生在法屬利維埃拉，就成爲一幕愛情的悲劇了。但是在此事情是如此發生的：這個男子，他是一個高級政治執行者，幾天之後，就逃回去照常工作，而馬拉賽給她當隊長的那個先鋒隊寫了一封信如下：

朋友們！這兒簡直是一個地獄，我非常想念你們。我不能等到我應該離開這個亂七八糟的地方的時候了。我以後永不再回到這個瘋人院來。這兒有許多黨員與青年共產團員。我同一

位已往很重要的同志同屋住；她在我出生前五年就入了黨。你由此可以想到她是如何地良善，如何地了解民衆。她的眼睛有毛病；那是由於放逐而起的。她爲工人與農人受了許多折磨。她是笑口常開，如同我們的先鋒隊員。此外還有一個青年共黨團員叫亞夏·馬興（Yasha Masin），我同他成了知交。他是一百二十分的聰明。只是他的脾氣不可捉摸，這也許因爲他太疲倦的緣故。他害的是神經衰弱病（psychosthenia gravis）。這就是他可原諒的地方。他的頭部與肩部都起痙攣。看見這種痛苦真難過；真可以駭着你。但是不要緊的——不久就會完全好。一個人應當爲那些絕對可憐的工人犧牲。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之成功與否，完全依賴他們。體貼那些教訓你們的同志，並且接近他們。我不再寫別的了，否則這封信就要成爲一篇小說了。但是所有的同志都值得對你們提起的，例如蔡克娜（Chaikina），她是女權黨的黨人，拿與我們共同奮鬥的男子視爲仇敵，而不當作同志。她時常饒舌，在這些地方她是很不應該。這兒還有一位重要的公務員，就是阿卡屠耶夫（Akutyev）——我簡直不能描寫他。他有那樣的一種精力，他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家，他應當在中央政府——在人民委員會，或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他有一個弱點。他的確是太疲乏了，希望在青年人中恢復他的康健。我們怎樣能幫助他呢？他以為如果

我像個瘋子那樣在他跟前跑跑笑笑地，他就會好。我到沒有什麼不願意，但這是我的能力所作出的嗎？這兒也有不良分子：討厭的流氓——和青年共產黨。黨內容納這種東西，真是羞恥。但是我並不怕他們，不久以前，我將他們其中之一，打了一個嘴巴。

朋友們，這兒的風景是非常的偉麗。假如作得到——我不願意走了。那個海呀？朋友們啊，那真是活的。那簡直像一片藍天，不過牠是在地上的。星在其中閃耀，雲在其中漂浮。當巨浪滔天時，她展開了，彷彿是很坦白的，但是當水平如鏡時，牠又是神祕不可解的了。但是牠總是不斷的歌唱與呻吟。而在牠發了雷霆之時，你就會覺得有一個巨大的羣衆，旗幟飛揚，聲徹雲霄地在那兒示威。朋友們啊，我簡直不能去描寫這個海。你能描寫革命嗎？

就此停筆。我寫得够多的了。不久我就可以勉強回去和你們見面，我們又可以跳我們原來那種舞蹈了。我在此盡力設法治好我的病……他們甚至以一種噴射器來使我受痛苦……當他們用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像牛那樣叫喊。

真是寫够了！順便將我的吻與擁抱帶給你們，我比任何人都愛你們。準備！我是時時都準備好的！

這就是格拉德科夫小說中的女主角所寫的，也就是現時流行於俄國的話。一半是黨內的口頭禪，一半是青年對工作之熱誠與對生命之確有把握的表現。

麗蒂亞·賽勿里娜 (Lydia Seyfullina) 的戲劇『伴侶』(The Companions) 頭一次在莫斯科舞臺露演，與這本小說差不多同時代。主角有兩個，一個是文學家，他整天困惱在如何將他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藝術與實際灰色單調的生活調和這個問題中；另一個是他所愛的女學生馬霞 (Masha)，她是女作家沃里娜亞 (Volyntaya) 十七歲的女兒，在橡皮工廠作事。馬霞——代表新婦女，在蘇俄文學中，其直言不諱的性情，是無與比擬的——愛上了這個詩人尼古拉·雪維里阿夫 (Nikolay Shevel'ov)，他比她大十五歲，並且有妻有子。馬霞與尼古拉不久就要同居了。下面的一幕，是他和馬霞在馬霞的房中當着她母親的談話，她母親正忙着寫稿子的時候，尼古拉進來了：

尼古拉：早安。馬霞上那兒去了？

沃里娜亞：她在洗澡。假如你願坐就坐一會兒，不然就請走。總之她會使我們出去的。

尼古拉：也許不至於叫我出去。

沃里娜亞：這我到不敢保。我不十分了解我的女兒，但是我總知道一些（她在稿子上塗抹了些東西，輕輕自言自語）。「舊時代的命運之間答體文。」……不是。

尼古拉：你在這兒寫東西嗎？

沃里娜亞：因為什麼不在這兒寫呢？在我思潮來時，我在什麼地方都寫。在大街上，在家裏，只要我一高興——立刻就寫。

尼古拉：你可以自韻文中說出這個來……你是怕落伍吧？

沃里娜亞：是的，我有些怕。

尼古拉：擔心你要趕不上時代吧？

沃里娜亞：是的。但是並不在乎這個。我不要……

尼古拉：因為這是緊張生活。而你喜歡舒舒服服地過日子。

（馬霞進來）

馬霞：這也十分對！在所有人的祖先中，我母親的是值得欽佩而又是一位青年的祖先，長壽

與興旺。媽媽，我允許你在此。

沃里娜亞：謝謝你。

尼古拉（很可愛的樣子）：近來好吧，小馬霞。

馬霞：你好，你好。我忙得很。媽媽，我要同你談話。

尼古拉：不同我談？立刻並且不要旁人在此打擾地談？

馬霞：我昨晚想過了：也許你就是我所需要的男人，也許整個的事都是無聊。

尼古拉：讓我們單獨談這事吧。

馬霞：或者我們彼此求了解，否則我立刻就要將你忘到九霄雲外……。

尼古拉：心裏也不想念嗎？

馬霞：啊，好吧，我的心，我的靈魂整個將你忘了，魔鬼知道這是指什麼！總之，你去吧，這就夠了！

尼古拉：你不應該如此對我說話。在你，也是能說不能行。

馬霞：不管能不能——既然是如此，提他還有什麼好處！你離題太遠了！差不多迫死了你的

妻子。不可救藥的小資產階級。

尼古拉：沃里娜亞太太，我要單獨和馬霞談話。

馬霞：一點也不要（沃里娜亞以手揮他們走遠些，再往下寫）！這件事就是如此了，這次的談話很够使我不痛快了，並且擾了我的清夢。

尼古拉：你不爲我想想嗎？

馬霞：啊，是的，也許爲你想得太多了。你因爲自己的利益不說理由就離掉你的妻子。你這老腐敗，不作工……討厭！

尼古拉：我有一個兒子，我非常的愛這個孩子。

馬霞：愛他，誰阻止你？但是你因爲什麼總是帶着他一起？

尼古拉：因爲我是他的父親。

馬霞：他的父親——這不是什麼理由。這是在受孕的時候纔有意義的一條項目。

尼古拉：我一條項目我所愛的兒子——他是我的後人，並且是——我自己的後代。

馬霞：好，我不同你爭辯；後代，這是很要緊的。一些有病的，白癡的父母——不勞你的駕。

尼古拉：請想想，她會不許我去看我的兒子。但是我要教育他成人。

馬霞：她因為什麼不許你去？你簡直沈入於不可救藥的小資產階級的觀念中了。舊的——中世紀的觀念！你自己解決這件事吧。革命的時候，我纔七歲。我不能過舊式的生活。

沃里娜亞：這正是困難之點，不幸你是屬於兩代人的。

尼古拉（暴躁狀）：母親來搗亂，這不是歷來的不良習慣嗎？我以為她如爲她女兒着想，也許可找着一位好配偶吧？

沃里娜亞：這倒是真的，我雖不是什麼很有道德的女人，不過我也不是——一個搗母，更不是岳母（退場）。

馬霞：現在完了，尼古拉。使別人不高興這就夠了。總是亂喊，總是沒有意義地喋喋不休——這是爲什麼？

尼古拉：馬霞，我愛你。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不幸。我看你是想得太認真了——你是極端的愚蠢。但是我不能捨掉你。啊，我的親愛的禍水（他熱情地抱着她，瘋狂地吻她）！啊，這個發光的眼睛，這個充滿青春的容貌！

馬霞：住了，讓我走吧……啊……。

尼古拉：你也吻我了，更熱烈，更有情！你懂嗎？我親愛的！

馬霞：讓我走吧！我沒有時間（她拿雙臂緊緊地抱着他的頸項）。可羞啊，你這傻子。親愛的

……最親愛的……（她吻他）。

尼古拉：你終歸是愛我吧？你的母親勸你，說我太老了。但是你——是我的？你愛我嗎？

馬霞：好了，好了——你大十五歲——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每個人遇着這種事都要想想。

尼古拉：但是你愛我嗎？你不會離開我吧？我們永遠不會分離吧？

馬霞：你是什麼意思——永遠不？

尼古拉：一輩子永遠不離。我不能離開你！我可以犧牲一切——我可以忘掉我的妻子與小孩，而我們永不分離。

馬霞：任何事都是可能的。不要談將來的事。我們是結合在一起了嗎？

尼古拉：又來了？安靜些！吻我，安靜些！

馬霞：讓我走吧（她用力將她自己掙扎出來）！當我們接吻的時候，我好像失了知覺似的。我有些頭昏；你懂得那個嗎？我以前曾經與別的男孩子接過吻，但是那是不一樣。

尼古拉：那就是愛情啊！

馬霞：嘻！够了。不要再往下說了。這正是我到工廠的時候，去作工，去開工人會議。對於這個，你還需要清醒的腦子。

尼古拉：馬霞！今天我們一定要在一起。我從來未像這樣精神不振。

馬霞：你聾了嗎？什麼？我告訴你一百二十遍，說我今天沒有功夫。

尼古拉：但是我們以後要常常在一起了。幫助我下個決心……

馬霞：你又來那一套了。我已經聽够了那些話，我沒有閒功夫來講這種不健全的衝動。達庭

卡 (Tatyanka) 在二月一號要離開她的屋子，假如你願意，我們可以在二月中我第一次假期時搬進去。就是這樣辦。

尼古拉：就是這樣嗎？

馬霞：還有什麼呢？還要牧師？我們也不用到登記處去。你可以到工廠裏來。假如你要著作，你必需懂得生活。

尼古拉：假如——我的妻子要殺死我呢？

馬霞：不要胡說！她也沒有瘋，也沒有病。傻子已經將我媽媽氣走了，這半天這老太太不知上那兒去了（退場）？

尼古拉：啊！多麼愚蠢啊（抓的他頭髮，咬他的牙齒，搖着頭去了）！

馬霞（在幕後）：你看，他已經走了。來呀，來，我要你來（她將母親的手拖出來了）。現在，找些吃的吧，茶涼了，這是昨天的。

沃里娜亞：假如你喜歡，我可以熱熱牠。

馬霞：假如你不太懶的話，就這樣做吧。

沃里娜亞：自然也可以喝涼的。

馬霞：你是我的母親——這不是嗎？恰恰像我。不願爲吃的忙得亂闖闖地（她們都坐下）。聽，你也許要驚駭。

沃里娜亞：我早就受够驚駭了。我不能再受了。

馬霞：我要你指導。我對於那個人應該如何辦法？

沃里娜亞：好吧，真的……我恰恰像你。我也不知道如何辦好，小女孩。

馬霞：告訴我一些什麼。那是爲你，也是爲我。媽媽，請你告訴我，那個他們稱爲——愛的東西，曾經使你痛苦過嗎？

沃里娜亞：你看，小東西，我是——他們所稱爲的那種輕佻的婦女……自然只是爲這一點。但是，我的上帝……（她站起來）。

馬霞：沒有上帝。

沃里娜亞：沒有一個人確實的知道……。

馬霞：停止你的小資產階級的談話。你會使我對你失掉尊敬。

沃里娜亞：不，你不會因此輕視我的。我的輕浮只是外表的。我有好幾個男子——愛人，丈夫，隨便你說他是什麼吧……我很容易又將他們忘了。

馬霞：我的父親呢？

沃里娜亞（很驚異地看着馬霞，不過在她與馬霞四目相視的時，立刻又鎮靜下來了）：我不久也當成別的男人一樣地將他忘了，不過他是一個偉大卓絕的人。那些男人，一個接一個都是碰巧和我相遇的。我注意他們，並不是爲別的，只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你沒有

愛情，不時會覺得寂寞的；別人還以為我是滿足我的慾望……你現在還不懂得這個呢。

馬霞：我並非一個圖該尼挨夫小說中的女子。

沃里娜亞：我確實知道你未讀過圖該尼挨夫的著作。

馬霞：我記不得了；也許。

沃里娜亞：不是『洋紗小姐』的態度，能將你自罪惡中救出來，而是一種健全的人生哲學和解放了的母性。啊，是的，我和所愛的男人有交接，但是我不能與他長久相處。我現在並未墮落，因為我對創造工作的詩，有偉大的愛。

馬霞：媽媽，我很悲哀。你看，我像一個傻子那樣陷入愛情之中，但是當我與他談話時，好像我說的是韃靼話，他說的是法國話。彼此只在猜對方說的是什麼。啊，知識分子，他們會使你難過得要死！

尼古拉的妻子，亞歷山大拉·巴夫羅夫娜 (Alexandra Pavlovna)，她是前一輩婦女的代表，走進馬霞的屋子，想勸馬霞捨棄了她的丈夫。她對着奪她丈夫的女孩開鎗，未中。馬霞奪過手鎗，

將暈過去的巴夫羅夫娜喚醒。

馬霞：振作起來。喝點水吧（亞歷山大拉·巴夫羅夫娜坐到一隻大椅中，雙手掩着臉。幕後大聲騷擾：開鎗了！有人開鎗嗎？有什麼事嗎？馬霞開開門，向着過道中說）我的手鎗偶然走火了。沒有人，沒有人受傷。

巴夫羅夫娜（擡起頭來，聲音因爲悲哀而甚低）：我不幸未打死你。如果打死了那就是一個解決，雖然很可怕的。

馬霞：對於我是最可怕的……去死……可怕……可怕……因爲什麼？你……這樣的卑陋！打死我，要毀了我青春的生命（她張開雙手，像一個小孩那樣不住的哭）！

巴夫羅夫娜：一個小孩……唉，你可以作我的女兒……你的青春的生命……你還有一個青春的生命……而我呢？這個男人就是我一的一切。我已經憔悴了。有一時他要離開我，過一時他又不離開我了。我簡直計無所出。上帝也許不允許你真心的愛他！並且我要……（她跪在她的腳下，抱着她的雙膝）將他給我吧！自你將他驅逐開吧……走吧！你有……

啊你還有你自己整個的生命。

馬霞：不要擾我！請起來。我什麼東西都不要。我現在什麼東西都不要。不要愛情（她將她拉起來，放在椅子上）！現在我只能聽見這個好消息：我還未死！我的腳可以動，我的眼睛可以看。我幾乎將她們完全……完全失掉了……但是我並未受驚。沒有！我對你很抱歉，但是我不能對你撒謊。我自己要過細想一想。假如尼古拉之於我，是像他……好像是可愛的……總之，如果他對於我的生命是需要的，我就不能放棄他……不……但是我不會如此的害愛情病的。去犯罪，去刺殺一個非仇敵的人，不是一個叛逆者，而是一個同志！永不！而我的生命又非兒戲。這個生命之對於每個同志之寶貴，與對我自己一樣。不在任何情形之下，我都不會作這個事……。

在馬霞作工的橡皮工廠，她與蘇科羅夫（Sokolov）之間，有一段對話，他與她的年紀不相上下，在她未認識尼古拉之前，對他很好。

馬霞：我來晚了。沒有時間啦。正在開會。不害羞，蘇科羅夫，幹嗎又作無味的紛擾？讓我安靜些。

蘇科羅夫：你是什麼意思——無味的紛擾？

馬霞：我看你對我愈來愈作些傻事。你在工作中，送小紙條給我。這是不許的。這是流氓的行爲，蘇科羅夫。

蘇科羅夫：一個人不是石頭作的。馬霞，我承認那是錯誤。我不再犯了，永遠！但是你之於我是太重要了。你好像爲我而創造的。

馬霞：我不是爲你而創造的，根本就不是創造的。你時常想到我們接吻的事。但是我立刻就將他忘了。我只是要作你的朋友。

蘇科羅夫：因爲什麼？

馬霞：因爲另外有一個人。

蘇科羅夫：很好！我要將那個人的腳斫斷。

馬霞：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態度。不是開玩笑——後天我們就要同居了。

蘇科羅夫：怎麼一回事。好，假如是那麼一回事，於是……（忽然暴怒）誰……是誰？

馬霞：你怎麼啦？瘋了嗎？

蘇科羅夫：我問你他是誰。你告不告訴我？

馬霞：不。改日再說。等你說話像一個人時，否則……。

羅科羅夫：什麼，我又不是一个野獸。不過我覺得怪，如何會使你如此。你一定不說，我就走了

……。

馬霞：就是雪維里阿夫，那個詩人，就是那個……。

蘇科羅夫：他……他什麼，他三十多歲了。一個老頭子。

馬霞：我覺得他年青。這個與你沒有關係。你連看都未看見過他，就說他是一個老頭子。他是
很漂亮的男子，正是我喜歡的那種男子。他也許不到三十。是一個年青人。

蘇科羅夫：當一個人到十九歲時，不但成了人，並且還作了父親，這就是他們現在所謂的年青嗎？但是這到是無關宏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是一個錯誤……。

馬霞：什麼？

蘇科羅夫：是的，在你那方面看，這是一個錯誤。我爲你我二人不快。你如何能想到如此一件

事他在你很早以前就出世了。他是已經十分地老朽。我不是指他的身體，也不是指他的年紀。有許多人很會保養他們的身體。我是指他的精神！我們不提社會生活，有了這種老朽的精神，你能在家裏建設你自己的生命嗎？我為你難過，小女孩。你的壞運要到了。

馬霞：你膽敢對我用你的殘忍的憐恤！我會為我自己決定，不用父親，不用母親，不用上帝。除了我自己之外，對任何人不負責。我並非易於打倒的人。你的憐恤？這樣一個傻子去你的吧，我的孩子，為你自己去哭吧，因為我不愛你。不要為我可憐。

蘇科羅夫：那並不用如此的急急。不——不。我會馬上另外找着一個女孩。不要忘了七點鐘去赴橡皮套鞋工人會議。你因為愛情的事，也許有那麼一天連這個都忘了。

馬霞：你說什麼？你這流氓！我曾經誤過一次會嗎？

這幕戲的結果，是馬霞終於離開了尼古拉，因為他與她的個性不合。

三 新婦女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之下作生活奮鬥的蘇俄新婦女的種種意見，我們不免要問這個問題：這個新婦女是否較之其他時代和其他地方的婦女，在個人生活中是更滿意些，更快樂些？這個問題是很難於答覆的，因為馬霞太年青，假如我們更進一步去觀察她，她不是現在的而是未來的婦女，因此，我們必定要等她的成熟。關於與她同樣的婦女羣衆，年紀不相上下或者大一點的，我們現在只能說：雖然一切都可自由，外表的阻礙也掃除殆盡，不過每種事仍是變動不定，因此，我們不能認爲一切的發展是已經完成了，在蘇俄中的矛盾傾向，是比別處更甚些。

我前面已經指出來這些矛盾的傾向的來源。在此不妨再來談談。這種傾向，在俄國男女對性問題的態度上，達到了極峯，這個問題較之在其他國中，更是歧路百出。因爲愛情是俄國大部分婦女之中心內在的經歷，這是與世界其他婦女一樣的；她們外表雖然是男性，而內部則完全是女性的，非常易於動情。雖然俄國青年是主觀的，但兩性間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上面所提俄得薩學生的調查問題，男學生都不承認有愛的存在，而百分之五十的女學生，至少承認她們的性生活是由內在的力量——愛和感情——而發生的。俄國婦女的生活，較之帶女性而意志不定的男子是更形活躍些，有力些，有意義些——「女性」是優於「男性」，這是無可非議的。這句話可以如此解釋：

俄國的男性生活，是社會的和倫理的成分佔優勢，女性的生活，是個人的和藝術的成分佔優勢。一個俄國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美術家是不堪設想的，因為他先有了一個陳舊的傳統觀念；因此，大戰時掃除之俄國的「未來」派，包含許多活動的怪物；無產階級詩人邁雅科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就是其中之一，他後來自殺了。他於一九一三年，還穿着花格的袴子和黃馬甲，在莫斯科街上擾攘不安。俄國男子的活潑健全的感官，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愛情和精神上的性生活，他們是不了解的，也許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對於婦女的內在生活，沒有方法來琢磨。因為和他們的天性是不相近的。俄國的男人對愛情是缺乏幻想。外國人對於俄國女性有許多好機會者，不單是為他們之善於裝飾，一半也是為這個緣故。

結果，我們時常聽見住在本國之蘇俄外國專門家的妻子的悲哀；與大戰時一樣，她們以為自己是被遺棄了。情形更壞而致於不可收拾的。就是俄國婦女，也與在大戰時一樣，感覺自己是被她們的丈夫所遺棄；在經濟與蘇聯各方的戰爭上所繼續之困苦艱難的奮鬥，是九死一生的關鍵，因此，每人都陷入這個羅網中。再者，蘇俄的男性，在炮火之下，已經精疲力竭地經過十八年的戰爭，精神是十分緊張。除了在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內戰，和大荒年中所受身體與精神的過分的困苦外

——蘇俄人民忍受痛苦的力量，較之任何國家爲大——又加以後來五年計劃的巨大的需要，和對外來干涉的恐怖；所表現超人的勞作，已經減低了俄國男子的性的活力。俄國男人，與女人一樣，容易衰老，據醫生說，他們在四十至五十之間，大半就無心於愛情了。

一直到現在，俄國因爲輪流不斷工作制，工人是沒有一致的休息日，也沒有星期日，沒有暇日；又因爲住屋的困難，要單獨和一個人在一間屋子，或者兩個人在一起享樂的機會都沒有。俄國的婦女，在原則上雖然不承認，但是實際上與每個婦人一樣，是需要一種的求愛方式的；就是現在一半生活於未來中的婦女，也是如此。她也需要體貼，溫存，撫愛，在她的心中，不知不覺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對於愛情豔遇的希求。但是她處的世界是缺乏幻想的；個人的成分，男人，愛情，都只佔很小的地位——因爲缺少時間與機會；這些差不多是沒有的，並且只有『小牀』，因此，無數情感的生命，尙未醒悟的婦女，渴望一種東西來解救她們內在精力的緊張，她們將一切的力量，熱情，自我犧牲，情感，保留着的女性的情火等，施之於技術的範圍而成爲超羣出衆的婦女，爲五年計劃而犧牲。她們作了許多近乎神跡的事，就好像革命中的婦女一樣；她們是現代俄國勞動史詩中之首要精華，是新神祕的創造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每年也有幾個星期的假期，這個假期多半消磨在起自黑海東南隅，一直到克里米海西岸止的可愛的海岸。格拉德科夫，在他所作的『沈醉了的太陽』中，描寫這個碧海的波濤聲，上面覆着透明黃金色的天空，空氣充滿水草和貝殼類的香氣——人們在此休息，他們簡直是要『快樂死了。』尼克爾波克爾 (Knickerbocker) 說，這個地方的陽光，是不關五年計劃的，所有愛情的理論觀念，在這三四個星期中，一概忘掉了。在這個紅色的利維埃拉時，人們都穿上他們最漂亮的衣服，不再喊他們的口號。他們自旅行囊中取出脂粉和化妝品，自心的深處將每年十一個月未用的情感發洩出來。他們在海岸上浴於日光中，在晚上浴於次熱帶的月光中。他們的感情是有詩意的，他們彼此作放蕩的事，而加入熱烈的愛情戰。這是男人性的要求——只是性的衝動，還說不上愛情——與婦女隱藏的愛情的戰爭，這種愛就好像整年祕密地開着的一個花球。但是，在愛情戰剛一起頭，而假期已滿，不得不等待來年的機會。

這種情形對於那種熱血的婦女——俄國婦女自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是太不能使她們滿足了。因此，紐米羅夫教授 (Professor Nymilov) 的書『婦人之生物的悲劇』 (The Biological Tragedy of Woman) 出現在這婦女沒有社會經濟的悲劇的國家中，是不足為奇的。馬克斯學

者，不承認有這樣一個理論。性學專家沙爾金德教授（Professor Salkind）說：『性問題從來未認爲牠是一個純生物學的問題。』無論如何，紐米羅夫的書，在蘇俄不久就銷售了五版，而蘇俄的婦女，的確覺得她們生物的悲劇是比較別國的婦女爲小，因爲蘇俄的節育方法，法准墮胎，和全部的法典，減少了這種悲劇。

紐米羅夫接着許多男女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辯論的信。他將一些信發表在俄文最後一版的附錄上。其中婦女所寫的，沒有一個是不承認生物的悲劇的。但是有許多婦女說她們在爲人妻母之中，得着了最大的滿足。有一封信上說：『悲劇倒是有的，不過不是那樣的可怕。』『自己作了很大的犧牲，以使她所愛的男人快樂，這是許多婦人認爲銷魂的事。』另一封信寫道：

我同意於你，說婦人的生活是一齣悲劇，一齣可怕的悲劇，尤其是生小孩的事。但是，除了我們整個生活中繼續不斷的艱難困苦之外，在某一個時候，我們還情願爲一件事而犧牲我們自己的生命，就如同生小孩子的事吧。你是一個男子，不能想到母性所得的快樂。隨便你稱這種是天性或者其他的都好，這的確是如此的。婦人所經歷的最大的快樂，就是頭一次作母親。我還是

一個處女，但是我坦白地說：我要有一個小孩！

除了這種普遍的問題以外，特種的俄國婦女問題也提出來討論。紐米羅夫的通信中，她們訴說男女兩性對愛情的態度有差別，說男子當着性行爲的時候，是缺乏節制，並且很輕浮，女子以此爲苦。「男人們應當鎮靜些，不要以那種應受處罰的輕佻，虛擲了他們的「愛情」；這種話是通信中所常見的。有一封特別引人注意的信上說：「我們不是受「生物的悲劇」之苦，而是苦於男子」的「卡門斯特屋」(Khamstvo)——這個字，在俄國是指粗魯，凶猛，野蠻，殘忍等觀念，換言之，就是指最不文明的事。實際上這種話是捉到了問題的中心點了，因此，我們可以說：現時俄國婦女的悲劇不是生物的，而是生理的。

反之，在歐洲是苦於兩性的過分的文雅，過分的區別，因此，發生一種俄國未有的現象（例如 *psychopathia sexualis*，在俄國人是不知道的，我對於幾位莫斯科的人民法官，還要和他們解釋強奸與謀殺的合併行爲），和俄國人講戀愛，時常要陷入無靈魂的性交，僅僅是滿足一種慾望，而無高尚的個人的慾求。男人對於這種情形覺得很滿足了，女人稍有不同。因此，蘇俄婦女任何權

利都有，只沒有權利作再進一步的意識中之婦女。當她們正是含苞初放的時候，男人已經認為她們是敗柳殘花，無可留戀的了。因為在她們丈夫的眼中，年紀的標準，既不是互相精神的深入，又不是妻子逐漸增加的愛，而只是純粹性的吸引力與性的愉快。

假如將來的文化五年計劃中包括兩性關係之文化的提高，則於俄國的婦女是一件很好的事。波格達諾夫在他的小說『第一個情婦』(The First Love)中所說的話，可以拿來作一個座右銘，他說：『……我主要的希望，就是男孩子對於女孩子的行動應該謹慎些，留心些，而女孩子自己——亦應如此。』

四 新式結婚與家庭

蘇俄男女結婚很早。因為結婚的必需條件不是財產而是雙方的工作能力，因此結婚是非常的容易。結婚的事，並無什麼特別的意義：『我喜歡你，不久就有一間屋子空了，我們可以搬進去，』男孩子有時這樣說。或者：『讓我們的力量聯合起來，我們一同到莫斯科去。』這樣就解決了結婚問題。無所謂未婚的夫婦，無所謂訂婚，在早先，彼此相稱，常不冠以『密斯』等字，而只稱名字或小名。

假如雙方願意登記，她們就到 S. A. G. S. 去。登記員常常是很忙的，你們必須魚貫而立地等着。當你們在那兒等待的時候，一方可以注視牆上的標語：

爲妻與母者注意！

在你登記之前，不要忘了與女醫生（婦科專門）去商量以下的事：

（一）性衛生，

（二）節育，

（三）未來的小孩，

（四）醫學上的指導。

離婚與結婚者注意！

請至性指導處。

在 S. A. G. S.，你可以看見許多不同的夫婦，自十八歲以上，自如今的「貴族」青年工人，

到差不多不忠實的『原來的資產階級。』在這擁擠的辦公室，不免喜氣溢洋。凡來登記的，都穿上他們最漂亮的衣服，新近梳洗好的頭臉，看起來是清潔而快樂。有一次我到莫斯科一個S.A.G.S.去參觀，看見一對登記的夫婦。男人說是五十一歲，女人是三十六歲；他坐着而她站着；女登記員問：『你們以後用誰的姓名呢？』這位像博物院的陳列品的老古董的男人，連正眼都不看他的妻子，回答說：『自然用我的名字。』但是大多數的婦人都用她們原來的姓名，以致你不知道誰與誰結婚，這倒是省卻了無味的閒談。又有一對青年夫婦在那兒登記。那個男子穿的一身皮衣，無疑是屬於統治階級的，登記員照例問他的問題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二十四或是二十五歲。這個時候，女登記員拿一片紙給他看，說：『你今天恰巧二十五歲了。』『新娘』一直在打電話，蘇俄一切辦事處的電話，非經特別許可是不能用的，當她打完電話之後，她的登記手續也完畢，就算結婚了，而得着一紙證書。

現在登記的人愈來愈少。『因為什麼我要叫他們將我的憑照弄得很髒？』這就是我問一個辯護士他是否是在S.A.G.S.結的婚，他的回答就是如此。我一位朋友家中的家庭助手，是一個已經有孕的婦人，大家勸她去登記，她問：『因為什麼？』『以後如果那個男人遺棄你，你可以得

着贍養費呀。」她對於這句的回答是：「假如他是這樣的人，他應該付小孩的撫養費，至於我是什麼東西都不要的。」

在一個星期天。我最後一次去參觀莫斯科中部的一個 S. A. G. S. 婚姻登記的辦公室非常擁擠。有的夫婦只好在大廳中或樓梯上等待。我走到隔壁的離婚登記辦公室去，那兒也有一個生死登記的桌子。

在離婚登記室，牆上沒有什麼標語，是比較空洞些。只有一些面帶憂容的憔悴婦女，穿着日常的衣服，坐在那兒，她們是剛自工作場中而來的。我與其中的一個談話。她立刻開口說：「你看，現在每天離婚的人有多少。這都是因為結婚太容易的緣故啊。因此，所以遺棄的小孩非常的多。」我後來知道她二十八歲，原來是一個家庭助手，結婚十一年了，有三個小孩，她的丈夫是一個腳夫，二十九歲，她發現她丈夫和其他的一個婦人相愛，她責備他，他回答說：「誰叫你總是叫我吃涼食呢？」「你每天散步清晨三點鐘纔回來，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拿熱的東西？」「我對他說：『你爲你自己尋快樂，我也要爲我自己尋快樂了。因爲什麼只有你能如此呢？』這就是自由的結果！」

於是他們到 S. A. G. S. 來取消他們的婚姻。要他每月付六十盧布的三個小孩的養育費

（他全部的薪金只有八十個盧布，並且供給他妻子六個月。

這個女人繼續再和我談話：「我對他說：『我照顧小孩，而你供給他們的食物。』」他說：「我不願意。」我說：「好，我們到法院去解決吧。」我今天就要送傳票去，我再也不理他那一套詭計了。我永不再登記了！結婚至少應合於法規……。」我回答說：「現在正是如此。」「一點也不是，」她反駁我，並且繼續往下說：「在一兩天之前我來作離婚登記的時候，有一雙夫婦也來離婚。男的五十一，女的四十九。有六個小孩，有的都早已結婚了……你對於這種事如何說法呢？這不是瘋狂世界嗎？」

同時，自結婚登記室中發出很大的聲音，一直鑽入離婚登記室。發生了什麼事，我打開門，我看見那女登記員，紅着臉向着圍擠她的羣衆嚷：「同胞們，我現在至多再登記兩對人了。其餘的請回去，明天再來。我也是個人呀！我現在簡直沒有辦法了。現在已經五點鐘了，我做過了我的工作時間，這是第三天了，但是我並沒有酬報。幹嗎大家都湊在一起結婚？我不能再幹下去了。今天比每天更多。可怕！好像大家都瘋了似的。這是什麼特別好日子嗎？好，我知道了：今天是星期天。在星期天結婚是老規矩啊，但是現在我們沒有星期日，你們要記住這個。至多再登記三對……。」

但是還有一打以上的夫婦在廳中等着。沒有一個人預備走。恐怕那位可憐的女孩今天又要作過了辦公時間，也許一直要到她明天的休假日（六天一星期）。

俄國的新婚姻法雖然有許多方便之處，但是離婚的並不比別國多。也並不比別國雜亂。

我們不能自統計方面來確知蘇聯結婚的夫婦，有多少人是利用離婚之方便的，因為離婚與結婚有許多是事實而不登記的。但是有兩件事的確清楚：俄國在大戰與革命後的離婚流行病的確不如美國。並且在復興的時候，和人民的生活入於正軌之後，離婚熱已經中止了。再者，婦女的獨立與自立的增加，使夫婦間衝突漸次減少。

此外，蘇維埃還發生了一種「復興一夫一妻制」的運動。蘇維埃的立法，雖不特別規定一夫一妻制，但是牠是贊助這種原則的，並且很注重結婚的道德意義，牠是不承認暫時的同居為婚姻。這種實際的贊助一夫一妻制已經證明了是有機體的東西，這一點更其有意義。蘇俄青年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由幾次人民的自決可以看出來，四分之三的青年要堅持保守絕對的一夫一妻制。許多的記錄與家庭規則，表示蘇俄的細胞組織的青年公社（Youth Commune）的立場。公社都反對一切偶然的，暫時的關係，以為只有永恆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纔是正常的，「根據兩個互相

親愛的人之共同的意志與精神的和調。』公社中的習慣，夫婦的衝突如要引起離婚的事件，這個衝突就要付之公開的討論，假如一方有要離婚的嫌疑，必定加以審問與考察。

但是，這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並不是已往的制度再經過革命的期間而又復活了；無寧說是根據革命的法律而發展的，並且是基於新道德的展望。蘇維埃的一夫一妻制，不僅只是紙上文章，而又是重新構成的靈活的形式，反之，在別國，一夫一妻制形成了一個刻板的構架，生活時常有衝突牠的範圍之威脅。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要結束的事，在蘇維埃國家剛起始，不過是一個新發展之出發點。蘇俄證明了一夫一妻制，是自然而然地依據社會倫理與自然科學的原則而產生的東西，牠之深入人心，就如同法律禁止殺人一樣。最近關於結婚問題最有研究的林齊（Lindsay）說：「我們的種族的經驗，似乎證明了兩性的關係，以一夫一妻制為最適合於人類的需要。我的確相信，由於牠天賦的優點，將來是會佔優勢的——假如有機會。」

因為這個緣故，尤其因為俄國婦女的一夫一妻制的成見普及之故，所以離婚在法律上雖然很容易，而並未破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原則，並且在混雜性交流行中，道德的革命，已經使婚姻發生永久性。同時，新婚姻法的宣布，在已經工業化的農村，還是引起了無限的騷動。『因為什麼蘇維

埃政府，允許丈夫遺棄他們的妻子？」農婦以很生氣的聲調像這樣問。

但是婦女都由於指定的婦女會社（每個村蘇維埃，必定至少要有一個女代表）謹慎地訓練利用她們的權利，不久她們都知道如何的實用牠了，就是在離婚事件中也是如此。革命之後，要求離婚的差不多是妻子一方面，就是現在，妻子提出離婚的，也站百分之六十，這是值得注意的。

蘇俄的法律雖然沒有注意離婚的原因，沒有研究因為什麼兩夫婦要捨棄他們同共的生活，但是我們要小心觀察，就發現很客觀的，私人的原因，多半屬於政治的。這種原因，在革命的頭幾年中尤其多，當兩夫婦的政治觀點不同之時，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現在蘇俄的人民，十分慣於政治，所以不同的政治意見不致起多大的衝突了。有時兩夫婦起初對於政治意見不同而離婚，雙方後來的意見又一致了，他們能取消他們已經登記了的離婚，而言歸於好。

以下的事常常發生：丈夫是在外做某種工作，他覺得 he 自己是偉大的新社會的一分子，而和他在家中管家烹調照料小孩的妻子離婚了。這個原來是管家婆的妻子，現在不但是要維持她自己，並且整個改造了她的生活，經過幾年獲有薪資的工作之後，這一對原來的夫婦立刻覺得他們並不是十分隔閡的。在許多實例中，證明了不是丈夫比他們的妻子進步，而常常是妻子的精神的

發展勝於她們的丈夫。

科發里阿夫 (Kovalyov) 在他所作的『婦女生活，婚姻，家庭之史的發展』(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fe, of Marriage, of Family) 一書中，指出俄國今日主要離婚的原因如下：

革命為無數的羣衆，無數被壓迫者打開一條到政治舞臺的路，他們有機會享受文化的修養，去做正在國中進行的巨大的創造工作之活動分子。無疑地男人是較女人易於參加些……因此，發生了許多衝突：丈夫是一個『負責任的工作者』，他沈溺在普遍的政治生活中，而妻子仍然保持革命以前的無知無識，她的興趣的範圍不出物品的市值，廚房，和照料小孩子。

還有同一性質的衝突而又是另外的一種方式：丈夫在外面作事，回家來看見家裏亂七八糟，因為妻子也在外面作事，他於是去愛一個屬於已往的官吏，商人，地主階級的『洋囡囡』，因為在他整天工作疲乏之後，她能够使他在家中舒適。

這就是過渡時期的兩種家庭衝突的方式，一種是由於妻子過於注意家事，一種是由於妻

子努力於文化和社會工作，或者是求她經濟的獨立。

蘇俄的離婚人數，漸次減少，因為雖然當時誤解自由戀愛者甚多，但是婚姻的道德內容並未完全失掉。再者，五年計劃雖然產生不可避免的困苦，但是婚姻契約的責任意識漸漸增加，因此離婚者漸漸減少。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說蘇俄的婚姻已經進到一般的穩定，並非言過其實。我們不要忘了，戰後普遍於歐美的婚姻的危機，在蘇俄已比別處先得解決。在其他的國家中，婚姻問題又引起了各種的建議，接着討論試婚（experimental marriage），三角婚（triple marriage），伴侶婚（companionate marriage），而在蘇維埃已經有了一個漸次成熟的新婚姻方式了。

這個新婚姻方式，和蘇俄其他普遍的情形一樣，是根據兩性的平等權利的，這不但是經過法律的承認，並且也實行於日常生活中。就是因為這個權利的平等，蘇俄的婚姻纔能實現林齊之理想的伴侶婚姻，這位美國婚姻的改良者，解釋這種婚姻為「合法的婚姻，法律准許節育，並承認沒有小孩的夫婦協議離婚權。」但是我們知道蘇俄的立法已經更進一步，離婚既不用協議，又不一定是要沒有小孩。同時，在蘇俄纔可以說這種伴侶的婚姻是實際地存在的，雖然林齊只承認蘇俄

的這種婚姻只是已存的社會事實。只有在俄國我們纔能找着真正的伴侶婚姻。與時代精神無論是如何地調和，如果帶着宗教婚姻的因襲觀念，則夫婦之間的共同奮鬥與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資產階級國家的夫婦，也有由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努力而結合的，這是一種例外情形；而在蘇俄這種例外反是一種定則——這就是大大不同之處。

當我最末一次在佛爾加河上旅行時，在輪船上我注意到兩個青年人。一個漂亮美髮處女似的婦人，樣子好像是女共產黨員，和一個青年男子，也很漂亮，頭上帶着玲瓏刺繡風行於蘇俄的靛靛帽子。我猜他是勞工學院的學生。每次當我到甲板上去散步的時候，他們總是在從事於學問上的辯論，或者在看書。有時他們也下棋。在蘇俄，下棋不認為是一種娛樂，而是一件正經事，牠提倡精神的健全，因此與其他事件一樣，包括在五年計劃中的。以後，他們兩人站起來時，手攜手地散步，好像兩個很要好的小朋友。

我不知道他們是已婚的夫婦呢，或者是一起預備考試的學生。在我與他們認識之後，我纔知道他們結婚已好幾年了，我真不勝驚異，他們的婚姻是合乎理想的，他們共同的志趣是研究植物學，因為他們二人都是科學化的農業學家。他們對於我的驚異反倒表示十分的驚異。他們告訴我，

他們在列寧格拉德住時的那個集團中，所有的結婚都與他們一樣，因為那種共同生活就是蘇俄的新婚姻方式。

這種伴侶式的婚姻，自然要妻子不但享受平等的權利，並且是經濟獨立的，纔辦得到。俄國的婦女在經濟獨立中有兩種成功的意義。第一就是能維持她自己而不用男子的幫助；再就是家政的獨立，她們自照料家務與教育兒童中解放出來，因為這兩件事不是她們真正一生的工作。因此，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關於這事，我們以後討論生活的狀態時還要提到的。

克拉拉·西特金對列寧說，有的不良的共產黨人，以為男人幫助家務事是有失他的尊嚴；但是蘇俄婚姻中，在這一點上已有相當的進步。在蘇聯城市中，漸漸地看見丈夫推着小孩車在妻子旁邊走，或者抱着嬰孩（這不是像巴黎的男子對女人獻慇懃）。妻子如果在外作事，丈夫也漸漸作家務事。假如夫妻都在家，他們二人分擔家事。有的夫婦定了一張日常工作表。有一晚，我到一位很著名的公共衛生專家那兒去，他叫他的妻子替客人倒茶，而還請求原諒；但是他還不十分機巧。又有一次，我和一位地位很高的女職員，自人民委員會她的辦公室中，坐她的公事汽車到她家裏去。當我們到了她家時，我發現她的丈夫作好了晚飯和小孩們正在等我們。這個丈夫是一位無產

階級作者，也是一個家庭工作者，與其他蘇聯的丈夫一樣，不以赴店中購買日常家用用品，作飯，和照料小孩子等事爲失了他的尊嚴。

她的經濟的獨立，她的集中的意識，和不要男子幫助而能作事的感覺，都是蘇俄婦女的進步，並且在她的生活中打開一條新路。有一位鄉村婦人說她自己的事：她和丈夫住在一個公社裏。在她上醫院去生小孩的時候，他馬上又與一個女共產青年團員同住了。他的妻子兩星期之後，帶着她的雙生子回來，一點也不猜疑，後來知道他因爲什麼不在那兒了。接着召集了一個會議，開了「同志法庭」，她的丈夫去和那位女共產青年團員一起逐出公社。但是妻子與她小孩還是住在這公社裏，她工作，求學，發展她的精神，她覺得非常快活。過了不久，丈夫和那個青年女子住厭了，要想回到他妻子這兒來，他的妻子在與公社的大會商量之後，給了他以下的回答：他必定要經過一年的試驗，纔能提出來他重反公社的事。一年的試驗期過去了，現在這一時破鏡重圓的夫婦，是公社中最適合，最快樂的夫婦，並且是其他人的模範。

婦女有她們自己的工作，她們是自立的，並且能意識到她們自己的力量，因此，她們認識了她們的人性；在復興工作中並與男子積極地合作。婦女漸次獨立的程序，在外國也是自由發展。但是

在蘇聯中，這程序是由於歷史的前進而推動的，並且在整個發展中佔一個地位。這個程序甚至在蘇俄也是有激動與衝突。婦女的情感世界——作一個婦女的生活——與她的社會活動之衝突，已往的與現在之衝突，也許在蘇俄比在其他國家還利害些。這就是蘇俄文學所常採用的題目，並且以各種方式來描寫牠。有兩個著名的例子就是指示這種衝突如何的解決——一個贊成做社會工作，一個贊成戀愛。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格拉德科夫的小說『水門汀』(Cement)中的女主角達霞(Dasha)是一個堅毅不屈的婦人。在她丈夫出走之後，她經過了一個很長的發展過程，得着了許多知識和無產階級的意識，並且專心於她的新社會工作，因此，她完全成爲另外一個婦人，並且已經作了母親。她將小孩送到一個托兒所去，當愛她的丈夫共產黨格萊挨布(Glyeb)回家時，發現他的妻子是他的新朋友，新同志時，他深深地感動了，他以一個丈夫的資格去接近她，她拒絕與他在一起。因爲她不但是發展而失掉她原來的自我，並且忘了她早年的夫婦關係；她不能容忍妒忌，在她的新自由，新目的，新工作中，也不容有一些阻礙。她留下一封信就離開了她的丈夫：『建立我們新家庭的時候終要來到……格萊挨布啊，愛情仍然是愛情，不過牠需要一種新關係……當一切的事都

了結而平靜了的時候，我們再想這種新關係如何發展……。」

第二個例子，我們可以拿孫密翁諾夫（S. Semyonov）作的小說「納達里亞·達波娃」（Natalya Tarпова）中的女主角納達里亞·達波娃來作代表；她的故事證明了這個問題在蘇俄是如何熱烈地討論着。這部小說共有兩本，頭一本於前幾年出版的，與蘇聯其他的書一樣地第一版立刻就賣完了。在其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並未作答。在第二本未出以前約一年左右，蘇俄人們的閒談，就是推測在這個女主角的靈魂中，到底是責任的意識抑或是女人的情感得了最後的勝利。因此這本書的成功的原因是不難於了解的，第二本比第一本銷得還快。二十四歲的納達里亞·達波娃，是一個技術精良的工人的女兒，她是一個有能力的共產黨員，並且是大工廠的工廠委員會的書記；她受過中等教育，非常的聰明伶俐，而有一種使男子一見就愛的吸引力。納達里亞·達波娃努力達到自由與創造的工作，時常謹慎與男子維持一種獨立的關係。

當她自家庭約束中解放出來之後，與一個黨中同志發生了戀愛，他爲她捨棄了原來的妻子。她也許愛他。但是她從未自戀愛觀點來想過她與他的關係；她只依照普通的意見來看這件

事。八個月之後，達波娃捨棄了這個男子，因為他由於天賦的情感，對她說了幾句溫柔熱烈而又妒忌的話。這樣一種態度她認為於她的人格有損，她離開了他，決定以後要更小心些，要避免持久的關係。達波娃以神聖的熱心，堅持她的決心，她自己也覺得滿意。好幾次都幾乎要發生關係，但是她懸崖勒馬，不使這種事連累她的精神。

不久，達波娃遇着了一個她的敵對階級的工程師，他對她的觀念和建造蘇俄的熱誠，並不完全了解。他是第一個使她覺得她是一個婦人而愛男人的人；她簡直不能抵抗這種感情，但是她還是以全力來奮鬥，因為與這個男人發生關係是與她的工作和她的人生哲學是矛盾的。這一次，達波娃不是抗拒那個男人，而是抗拒她自己。在這個婦人的靈魂中，這是一個堅苦的奮鬥，『對於她自己的弱點，是無限的羞愧，』這個奮鬥是她的責任意識與一個相等的強烈的情感間之掙扎。

但是作者一直到小說最後的幾句話中纔將這個問題解決了，他描寫這個婦人如何的終於勝利了，如何的走到那個男人的跟前，閉着眼睛向他說：『生活是如何的美麗啊……』『當她張開眼時，一切使她生活艱難痛苦的事都不見了。沒有羞愧，沒有恐怖，沒有疑惑與猶豫不決，對於世

界的一切沒有悲苦的憎恨……。「我來了，」她輕輕地說，她握着卡普盧克(Gabrukh)的手，熱情地放在她微開的口唇上……。」

像納達里亞·達波娃這種婦人一樣地堅持她的工作，而不屈服於一個男子，在現在的蘇俄是很多的，在文學中是將她理想化了。

在普拉脫希金(Platoshkin)所作的小說『在途中』(On The Road)一書中，描寫俄國另一種婦人：有兩個安馬孫(Amazon)女子，一名麗娜(Zina)，一名凱蒂亞(Katya)，她們主張自由戀愛的理論，她們不作任何男人的妻子。彼等甚至不承認有戀愛這種感情。在她們的意思，以為男同志不應該講戀愛，女同志也不應該生小孩子，因為戀愛會使人作奴隸（尤其是婦女）；家庭中所包含的興趣與責任的小範圍，使家庭成爲一種奴隸制度，使夫婦陷入於閒談與爭吵中，並且引起愛舒適的心而捨棄社會工作。麗娜和凱蒂亞所指的自由戀愛(free love)並不是戀愛之解放(freedom from love)。她們憎惡戀愛，認戀愛是她們的陷阱，因此努力以狂烈的感情來破壞牠，壓抑牠。麗娜說：『我的朋友，戀愛是比結婚還壞。假如你結婚了。還可離婚。』『戀愛是使人墮落的，使人屈服的……有許多聰明人時常因為戀愛而變爲一個傻子，一個好的社會工作者會因此

而變成一個無用的東西。」她們向戀愛宣布了無情的戰爭。

自由戀愛的領袖們之憎恨家庭比之憎恨戀愛更甚。「你一結了婚，你就算完了。你本來是一個人類，你一結婚就不是了。你替自己掘了一個坑，將你自己關閉在裏面，和小孩們坐在那兒，吮你的手指頭，」這就是麗娜說的話。

這種代表蘇俄極端派的安馬孫婦人，在實際生活上是沒有的，大部分有安馬孫性質的婦女，都是熱情的，女性的，她們借健全的母性的良知來補償她們在愛情與家庭上的損失。較安馬孫婦女還活潑還多的婦女，就是那些未結婚的母親。不喜歡與男子過共同生活，而又不願放棄作母親的快樂的婦女，慢慢增多了。不婚的母性（unmarried motherhood），將要成爲一種制度了，這有好幾個原因。

有時婦人因爲已經有了孕，決定要生一個沒有父親的小孩，這種情形是不得不如此，並非她們的本意。婦女的過剩，在蘇聯是普遍的情形，有的地方確實感到缺乏男子的痛苦。有幾個紡織區，甚至在沙皇時代就是女多於男，現在差不多完全住的女人了，例如以前的省會特未爾（Tver）在蘇聯因爲牠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婦人而著名，她們都在紡織工廠作事。因此有許多笑話，說一

個男人無論他是如何地不成才，但是在那兒都可以得着很漂亮的女人，他是被認爲『生產的機器』這真好像俄國的『祖母鳥』(Island of Grandmother)漸漸形成了母系制度 (matri-archate) 一樣我有幾個莫斯科朋友證明我這種印象就是俄國人也有。

第二種不結婚的母親，就是那些控告男子失了父職的女人，因爲經驗豐富所以這種人也不少。雖然蘇俄的男子絕對不能逃避贍養的責任，但是法院中的案子，還是以父系與贍養費以及家庭的糾紛爲多。時常聽見女子被男子強迫打胎，在男子付了手術費之後，整個事就算了結。當小孩生了之後，父母間的爭吵是較前爲多。幾年以前，有一個學生里巴克 (Rybak) 因爲他的小孩的母親要他付贍養費，而法院又允許她的要求，他將她勒死了逃到外國去，而終於難越法網。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難了解許多婦女起始就不認她們小孩的父親，心甘情願地自己擔負撫養小孩的責任，忍受一切的痛苦，但是同時也沒有人分享她們爲母的快樂。因此，當你問一位母親，她的小孩的父親是誰，你時常可以得着一個奇怪的回答：『這沒有關係；小孩是我的，我撫養牠。』

我有一位在巴庫 (Baku) 作醫生的朋友告訴我一件事：有一位叫克里莫娃 (Klimova) 的

女水利工程師，是他在基爾歧斯去辦公的旅途中遇見的。一天晚上，他自夢中醒來，發現他的車房的下鋪位有兩個婦人，因為鋪位不能容兩個人的重量，所以折斷了，這就是他認識她的起因。在這個婦人知道他是一個醫生之後，第二天克里莫娃就來請教他。她有一個正在吃奶的小孩，而她現在做了有資格的工程師，出來作公事的旅行；她自然不願放棄這次的旅行。她所要知道的，就是假如她暫時不餵奶，是否她的奶會沒有，而她的小孩因此是否要受痛苦。她在旅途上是騎馬的，將她的小孩放在一個大口袋裏，但是不能按時給她奶吃。「你的丈夫呢？」他是在別的地方作事。「你認清了這種事會產生什麼結果嗎？」自然啊。但是婚姻假如還要顧及這一點，則婚姻一些價值都沒有了。無論如何，出來作這次的旅行是比留在家裏與丈夫在一起還要重要些。

自然有許多未婚的母親，以真真俄國的方式，造一種「絕對需要」(absolute demand)的理論，並且誇張這種理論。在莫斯科，我遇着一個很出名的政府女公務員，她很坦白地說，除了已有的三個小孩之外，還要九個——共合一打——但是她要每一個小孩有一個父親。這位男子，除了生殖任務以外，對於她不但漠然無關，並且是她生活中的累贅。但是她所以要不同的父親的緣故有二：第一，她不願有任何持久的關係，第二，她愛各式各種樣子的小孩。自然這純粹是個人的理論，

甚至在蘇俄也沒有什麼反應，贊成這種理論的人，在莫斯科也認為是奇人。未婚的母性，是由於廢除嫡生子與私生子的分別而生的——別的地方沒有的——這種觀念，對於住在俄國的外僑婦女有很大的吸引力，並且有一種感染力，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些造成婚姻革命的變動，自然將家庭置於完全新的基礎上。在此我們要分清沒落腐化與開始創業之不同。家庭分解的徵候，在蘇俄與在其他資產階級國家是一樣，不過蘇俄分解的進行是更快些，所以徵候是絕對的明顯些。在蘇聯，婦人之加入職業與生產，比任何處都多，這是使家庭崩潰的最大的影響。因為工業化的結果，家庭之為各別的經濟單位，於是失掉了牠的存在理由。維持家庭的道德與經濟基礎的官能也漸漸喪失了。在蘇俄，因為生活社會化的緣故，這一切都是以一種緊張的方式而發生的。

因此，昔時的男性家長制的舊式家庭，在蘇聯是壽終正寢了。無疑地，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制度，也是從根本上發生了搖動。但是，在這些國家中，雖然崩潰的現象已經是很明顯了，而牠們的立法還是堅持着男性家長制的家庭的夢想；在蘇俄，則自始就是隨着事實的歸宿而前進的。因此，蘇俄的家庭崩潰的事實，是沒有人要反駁牠，掩蓋牠。

這種崩潰過程不但普遍於城市中，並且及於農村，在十月革命以前，農村家庭，是很堅固的單位，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都不能影響牠。關於這一點，沃爾弗孫教授（Professor Wolfson）在他所著的『婚姻與家庭之史的發展』（*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中說道：

假如我們打算要研究蘇維埃農村的家庭關係的各方面，我們先要表明出革命產生了結婚與離婚的自由這件重要的事實。這件事使青年們自家庭的全權監護之中解放出來。家長制的傳統觀念認為選擇婚姻是雙親的特權，現在這特權也落到青年人手中了。在以前妻子是附屬於丈夫的，現在也獨立而擺脫了終身的約束。

這些『新權利』剝奪了父母為子女選擇配偶的權力。在革命以前的農村中，自由婚姻是非常的少，而在蘇維埃的農村中，則是非常普遍。

在革命以前，農村中也有帶本地風光的，舊式的調情。自有史以前，農村中的青年男女，一起參加所有的夜會，討論會等等。這就是普通的求愛的方式，這種婚前的調情，時常促成正式的婚

姻。

但是假如這種調情的結果，使一個鄉村女子生了一個私生子，這不但是自身極端羞恥的事，並且有辱於全家。因此而常引起自殺的事；所以這種事是周密地隱藏起來，假如有了小孩，生出後就將牠弄死，或者棄了。

自革命以來，結婚以外的關係，是一種自然的事。有時她們也以原始野蠻的方法墮胎，但是多半是讓小孩正式生產，而進行贍養費的訴訟。婚前的關係，也不像革命以前那樣引起很大的恐怖。一個女子生個小孩，並不以為是羞恥的事。

革命所給與鄉村家庭中的影響，就是青年人有選擇婚姻權，對於獨立自活的鄉村婦人，婚姻不是終身的奴隸，而是隨時可以解除的關係。

所有這一切的分崩的現象，只不過表示問題的一方面。在蘇聯，家庭一方是崩潰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基於更高的計劃而重新建立起來。科發里阿夫寫道：「家庭的衰落也許是痛苦的，但這是表示一個大的進步。因為婦女之參加經濟過程，分化了資本主義的家庭，而促進新式婚姻與新式

家庭之產生，這無疑地是歷史的辯證法。『家長制家庭的小單位，已由新的和更高尙的家庭代之而興了；在過渡時代，我們已經能看出這種路線。』

俄國的發展，自某種意義來說，已經爲這種歷史的變遷打下根基了。當十九世紀之末，在俄國就有一種擴大的家庭組織，有的地方，與現在的鄉村公社很相像。克拉斯諾比阿羅夫（Красноб. Яков）描寫這種由數輩組成的大家庭之組織如下：

這個組織有十所房舍，在當中有一個大的建築，外邊有梯階通達，這就是全家的食堂。桌上鋪着白桌布，圍着一大盃甜菜根湯，坐着二十五個人吃飯，有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的家事都由女人來做。夏天，成年人們都到田中去工作，留一個老婦人在家照料小孩。另外一個替全體作飲食，還有一個燒所有的火爐。這個組織中的衣食，是自給自足的。實行分工合作。每一個人作他自己的事，而每個人又抱怨說他是替別人作事。

由此，我們知道在革命以前，俄國人的家庭觀念，已經超出狹隘的家長制的團體了。在有史以

前，隸屬於一個較大的社會這種觀念，與俄國人的良知和天性是很相近的。天賦與俄國人的彌賽亞（Messiah）的性質，使他們在歷史前進中，與一切的人類，與整個世界一起去經歷一種深刻的一致。

教育兒童的職務，自家庭移於國家或社會的手中。國外人談到『兒童之社會化』和他們談到『婦女之社會化』一樣的熱心；兒童完全和牠們的父母隔絕，因此促進了家庭的分解。像這一類的計劃有一時是的確在考慮中，不過就是那些共產主義者加以反對。列寧夫人克盧普斯卡亞（Krupskaya）在這時候有一種提議，她說在小孩生下來之後，立刻送到在社會主義指導下的托兒所去，這種托兒所後來可以發展成爲『兒童市』（children's city）。

父母的愛是不能制止的；這種愛應轉變到一個新方向，於是對於父母與兒童會發生從來未有的快樂。那些不願捨掉他們的小孩，將牠們送至兒童市中去，的勞工男女是對的。另一方面說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兒童的教育是應該由父母與教師分擔的。

克盧普斯卡亞同時提議，在每一個新建築的房中，都建立兒童部，父母在空閑時候可以照料小孩，同時受訓練成爲教育者。

在蘇聯，已經證明了兒童是家庭的關鍵，並且使家庭重新建造在一個更偉大的基礎上。父母的權威的確差不多都推翻了。蘇俄的兒童，差不多都以名字稱父母，如同新詩所說，『以父親的眼光來對待他們的父親。』父母之無限的威力與權勢都取消了，就如同在家庭中丈夫對於妻子的壓迫與剝削一概廢除一樣。

歸結起來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自大戰以來，我們只聽見婚姻的破產與家庭的崩潰，而在蘇俄，我們至少可以說，婚姻與家庭的新方式是開始發展了。根據丈夫之經濟的優勢與法准的特權而建立的家長制度的家庭，是決定了牠的死運而失掉了牠的活動力。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清楚了新式婚姻與新式家庭是一種什麼形態。牠們是完全根據兩性之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平等。在西歐，最近有人以爲母系制度（*matrarchate*）是避免婚姻與家庭危機之方法，在美國這種發展的傾向，已看得出來了；而在蘇聯，婦女的地位已經達到前此所未有的優越，有人甚至以爲這種情形是立刻可以進到婦女統治，但是除了安馬孫式的女子和不婚的母性以外，是沒有

新母系制度發生的象徵。蘇俄新婦女的前進，在某幾方面，也可以認為是繼續基督教以前時代的發展，在古詩與歌謠中我已經盡力尋去一些這種發展；但是並不能表示這種繼續是母系的傳統觀念之復活，而是在戀愛，婚姻，家庭種種互相關係中，最後一步的廢除男性支配女性的發展。

第八章 賣淫之廢除

我們加入生產過程的勞動婦女，應該表現我們的血氣……我們既擲身於普遍的羣衆中，應該以適當的精神來合作……我原來是賣笑街頭的人，但是在工廠中沒有一個人取笑我，我也不掩藏這件事。同志們，坦白地承認，反能得別人更好的待遇，因為別人會說：她是飽嘗困苦的（節錄一九三一十月三十一號，在莫斯科舉行原來是妓女而現在是勞工的婦女第一次會議的會員講演）。

一 沙皇時代的賣淫

一九一三年，即革命的前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普拉夫達」報（*Rabochaya Pravda*）第一期，有列寧的一篇文章如下：

不久以前，第五次反對販賣婦女與兒童國際大會（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ainst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在倫敦舉行。出席的有公爵夫人，伯爵夫人，大主教，牧師，警官等大人先生們，他們都大放厥辭，並舉行許多次宴會，與盛大的官方的款待會。他們對於賣淫之害，發表了多少的高論啊！

這些風雅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所提出廢止賣淫的方法是什麼呢？主要有二：宗教與警察。他們以為這是反對賣淫最安全的，最可靠的方法。一位英國代表，誇口說他在國會中提議，以笞打來處罰這事；這就是反對賣淫的摩登的『文明的』方法啊！一位加拿大的女代表，極端地贊成以警察和女警察來監督墮落的婦人，但是當有人提出提高工資的問題時，她表示女工是不值得再提高工資的。接着又有一位德國牧師極端反對現代的唯物主義，他以為唯物主義漸漸地深入民心，煽動自由戀愛。但是當有一位奧大利代表想要自賣淫的社會背景——即勞工階級的貧困不幸之環境，童工之剝削，不能忍受之條件等——來討論這個問題時，他被敵對的呼聲所壓制下來了。

在這貴族的，資產階級的會議中，他們如何地炫耀討厭的資產階級的假慈悲啊！這些慈善

事業的賣藝者和警政的贊成者，忽視了貧窮與不幸，他們聚在一起要反抗貴族政治和資產階級要維持的賣淫！

在列寧以前，培培爾 (August Bebel) 在他的名著『婦女與社會主義』 (Women and Socialism) 中，指出來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賣淫與警察，軍隊，教會，和資本主義的經營等一樣是一種制度和這個『社會制度』有關的，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警章，這是一種可恥的監督娼妓的條規，一個婦女不幸作了娼妓，那她只有一輩子被這娼妓制度束縛着，她只是像一件物品。五十年前，英國約瑟芬·巴特勒 (Josephine Butler) 倡議廢娼運動，斯干的那維亞纜首先正式廢除這種警章，接着德國，捷克斯拉夫，英國，比國，荷蘭等國都步她的後塵，取消這種警章。但是所有的國家，並未徹底地取消，於是就成爲帶危險性的半途而廢的策略了。

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中，也施行預防的政策：例如提高同意的年齡，保護未結婚的母親與兒童及類於墮落的婦女，普及教育與訓練，做兒童福利工作，設立托兒所，照顧委員會 (Care Commit. etc.) 等。爲要成立保護母性聯合會而作的性的改良，也有同樣的趨勢。但是這些無關宏旨的方法，

並不能達到問題的中心，因為這個問題是深深地藏在社會與經濟環境中，非要握着這個社會問題，不能得着最後的解決。

假如我們將革命以前的資本主義的俄國情形，與現在比較，就明白一切了。與其他的資產階級國家一樣，完全因為婦女缺乏權利以及她們經濟不能獨立，使她們成爲妓女。一八八九年八月一日俄國所作的娼妓統計，表明百分之八三·五的娼妓，是因為極端的貧窮而出此的，彼得堡省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一八九七年第一次全俄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八·四的女人，自己經濟能獨立；其餘的婦女都是依賴於人的。根據工廠視查人的報告，莫斯科在一八八五年，工廠女工的工資，在二十個部門中，平均每月只有九個盧布，男工人平均每月十八個半（查科夫區的工廠男女工人工資的比率是一樣的，不過工資是更低些），雖然二十世紀之初，食物價值已經漲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一九〇三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工廠女工工資不過六到八個盧布一月（見巴喜特諾夫（Pashitnov）作的『俄國勞工階級之情形』（The Situ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Russia））大戰發生不久以前，在俄得薩的二萬六千男女店員中作了一個調查，平均的工資，男人是每月三十四個盧布，女人是每月十三個盧布，有三分之一的婦女每月不到十個盧布。煙捲女

工，工資最低，每月只有一兩個盧布。在這種無希望的經濟情形之下，無怪乎許多婦女，以性來代替她們的工作，流為娼妓，以苟延殘喘。

同時我們可以說，工廠女工，雖然她們的工資不能維持生活，但是因為她們的階級意識漸漸發生，所以能不至流入娼寮之中；家庭的女僕，因為她們處於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中，所以在思想方面是最落後的，百分之六十五的娼妓，多來自這類女人。

縫紉女工變為娼妓的百分數，較女僕為少，但是比工廠女工還大四倍半；因為她們也是受女僱主的虐待者。女工中作娼妓者，以煙草工人為多，因為她們的工資最低。

沙皇時代，也是用警察管理制度來反抗賣淫，就是用所謂的「警章」。數目字指示出來俄國的娼妓比任何資產階級國家還多；在大戰以前，只是聖彼得堡一處的登記的妓女就有四萬之多，而在維也納只有三萬。這種警章，於一八四三年，當尼科拉斯第一時代出現於聖彼得堡；其中包含對於妓女每星期作一二次強迫的身體檢查，情形是非常地可慘，假如發現她們有病，必須隔離，在警章支配下的婦女，都有一個所謂的「黃執照」(Yellow certificate)給她們，以易於區別，不得警廳的同意，她們不得隨意遷移。再者，她們必須住在指定的地方，與一般人隔絕。因此，她們漸漸地

不知如何工作了，結果，就如斯圖密爾博士（Dr. Stürmer）在一八九七年聖彼得堡所舉行的抵抗花柳病會議席上所說：『這種黃執照，差不多使一個女人不能再加入工作生活中去。』

耶利斯特拉多夫（Yelistratov）教授，在他作的『一九一七革命前之俄國賣淫制度』（Prostitution in Russia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7）中，指出來俄國的警章，也帶着階級的偏見，而極端壓迫極貧苦的婦女。因為根據這個警章，只有下等妓女——就是來自女僕與工廠的妓女，纔受檢查。牠是只實用於『平民』，因此，『上等階級』和『出自名門』的妓女，是不受警廳之支配的。受警察管理的條件，不問她的行爲如何，只要是貧窮的，衣服不整的，住處不好的；這更足以表明這種警章的階級性質。

在俄國文學中，有許多關於暴露在這種情形下之濫用警權的地方。論到俄國革命前的警章與收容所的制度，使一個妓女終身脫不掉她的娼寮生活，並且受許多不堪其苦的社會情形的壓迫。因為依據華沙的規章，一個妓女必須要病重了纔能自由，並且還呈驗由兩位醫生簽字的執照，而還要等一年以後；如果依據明斯克（Minsk）的習慣，要到死纔能得着自由。

對於這種警章之不滿，由於取消運動而更增加了，當八十年代時，克隆斯塔特（Kronstadt）和

尼科來挨夫 (Nikolayev) 的警察監督，被控指與娼寮主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作了兩次驚心動魄的審問，因此對此之不滿意，更形緊張。這種不滿意，頭一次表現在一九一〇年聖彼得堡舉行的反對販賣婦女與兒童全俄大會中。這次的會議，因為莫斯科的工人代表出席而引起了騷動，他們的領袖印刷工人巴夫羅夫 (Pavlov) 是一位代言者，他說了以下的話：『在現存的經濟制度之下，我們沒有希望免除所謂賣淫制度這個可怕的罪惡，這是要予國家的機構以致命的影響。我們開這個會議，也並不能療治賣淫制度的已潰爛的傷痕，因為這個傷痕只能以鏟除階級的分劃與工人自己的努力纔治得好。但是我們以暴露賣淫制度之深刻的原因為我們的職務，我們可以說，賣淫制度是由於工人缺乏經濟與政治的權利而產生的。』

自然，當時工人在這次大會中，不能得着任何贊助，他們於是只好不再出席以後的會議。這次的大會一致決議呈請政府立刻關閉所有的娼寮，但是，其失敗的情形，與一九一三年婦女進步黨聖彼得堡分會之呈請國會取消警章和關閉娼寮，一樣的失敗。

二 蘇俄制止賣淫

蘇維埃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廢除警章的特別法令是必需的，並且發表了一個工人與被剝削者之權利宣言，又宣布廢除人與人的任何剝削。

「一個女人既找不着工作，又無人照管，這種事實就是賣淫制度的根本社會原因，」這是那時衛生委員會委員塞摩西科(Syemashko)所說的話，這句話以後成爲蘇俄的一種口號，並且指示出鏟除這種罪惡之路，同時在實行上也證明這句話是正確的。

十月革命之後，當戰亂共產主義時代，不分男女，只要能工作的，都強迫工作，這種環境是不宜於賣淫制度之發展的，而對於娼妓之需要也降到零度，因此，蘇俄的娼妓實際上是絕跡了。自然，這種成功，一部分也由於政府的努力；政府一方將那些要逃避強迫工作的妓女，與其他的寄生分子一起送到「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去，一方制止那些龜奴與娼寮主，他們的人數已是大大地減少了。總之，以各種的努力，建立一種反抗賣淫制度的特別組織。

一九一九年附屬於人民衛生委員會花柳病部的第一次抵制賣淫制度委員會。和第二次附屬於人民社會福利委員會的，都未完成積極的工作。

內戰停止了，同時轉變到新經濟制度，這是使賣淫制度發達的好機會。經驗證明了純粹經濟

問題的解決，和婦女政治的平等，還不能達到完善的地步。雖然婦女的工資與男子平等，但是大多數的婦女表明她們是落後的，不熟練的，因此感受失業之苦。賣淫制度的必需條件日漸普遍——同時飯店咖啡館的重行開設，開放酒禁等，都與娼妓的需要有密切的關係。人民內務委員會，計劃設立「道德民團」(militia of morals)，以制止這種現象，但是蘇維埃的輿論極端地反對。克拉拉西特金，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在伊斯維斯提亞(Izvestiya)報上發表她的反對的意見如下：

……我們要問是否這個「道德民團」是一種能夠影響康健情狀的方法……根據別國的經驗，我要反對這件事……要是說沒有警政的干涉，娼妓與花柳病會更易普遍，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而又是武斷的……一切「道德警政」(police des mœurs)所施行的方法，無論是如何公道的設計，如何圓通公正地實施，都不能夠影響賣淫制度之社會的根基……因為「道德的警政」並不能減少娼妓的需要與供給；這種方法能作到的，只是外表上的改變。僅有使牠發生的經濟與社會環境消除了之後，纔能使娼妓之供給與需要廢止……

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廢娼運動的基礎，見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伊斯維斯提亞報』上所登人民衛生委員會花柳部所作的通告，牠是間接直接地反抗賣淫制度的。

這個通告的宣言如下：

自十月革命之後，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徹底的改變了，娼妓也漸行消滅。所以然者，除了工人之經濟解放這個原因外，還有以下的基本原因：就是全體婦女之社會的解放，結婚的新方式，婦女之參加各種活動範圍，擴大的宣傳與教育工作等。

漸行消滅的娼妓，因為新經濟政策之施行，又慢慢地增加了。我們不斷地聽到自全國各處傳來的關於商業性質的賣淫制度，關於祕密的罪惡中心，關於娼寮事業等等的消息。破壞社會生活的賣淫制度的浪潮，又漲起來了。同時，與這種制度相隨而起的現象——花柳病——也一同增加。

爲要引起地方當局的所有機關對這件事的注意，而使其極力防止這個罪惡，我們有以下
的建議：

(a) 在裁撤人員，辭退婦女時，要加以特別注意——凡關於準備不良和無經濟抵抗力的婦女，都要特別看待（就是要顧及那些沒有近親的婦女，沒有住處的女孩，有孕的和有小孩的母親）。首先保護這種婦女的福利者，是勞工保護處，勞工聯合會，婦女處等機關的責任。凡應用於這一部分之不加思考的方策，都能驅那些最窮困的婦女於娼寮之中。

(b) 建立工業與農業的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以僱用那些沒有工作的，未受訓練的婦女。

(c) 在職業學校中，保留一些空名額，以改良婦女的職業資格。

(d) 設立失業婦女的收容所，以救濟婦女的窮困。

(e) 發展流離失所和窮困兒童的福利。

(f) 擴大宣傳與教育工作，開導工人使他們明白賣淫的性質，告訴他們，娼妓是如何地不可接近，共和國的工人去接近娼妓是如何羞恥的事，並且指示他們接近娼妓所得的危險。

以上的方案，都是防患於未然，以阻止賣淫之發展的。同時，設法以抵制已存的賣淫制度，似乎也是必需的：

(一) 凡在工人易於接近淫蕩生活，和婦女易於驅入娼寮的地方，都要嚴格地加以督察；革

命以前所施行的督察的方法，不但不能保護婦女，反而會壓迫她們，這是應該絕對取消的；例如對於妓女的蹂躪，虐待，強迫檢查等等。在任何情形之下，反抗賣淫之運動，不應該淪而為反對妓女的本身。

(二)對於娼妓的媒介者，教唆者，和娼寮的主人，無論他們是如何地掩蓋他們的真像，都要以最嚴厲的執行與司法的權勢對付他們。

(三)設立免費治療花柳病的機關，使凡有這種病的人都能受療治，更好是設立施藥所。因為要使所有的活動能直接反對賣淫，及解決地方上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地方蘇維埃應該設立反抗賣淫的特別機關。

附設於人民衛生委員會的禁娼中央機關，應該包含一個直接與地方蘇維埃合作的組織。地方執行委員會，地方職業蘇維埃 (Provincial Trade Soviets)，和婦女會等的緊急工作雖然有許多，但是反抗復活而發展很速的賣淫的罪惡，也是急不容緩的工作之一。在勞工國家中，不容有賣淫制度之存在。

因為要特別注意這個通告中所提的「在任何情形之下，反抗賈淫之運動，不應淪而為反抗妓女的本身」這句話，所以禁娼中央機關——成立於這個通告發表之後，是與人民內務委員會合作的——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對於禁娼的軍事性質的團體，頒布了一道訓令。以下就是訓令中的幾個重要之點：

(一)所有禁娼民團的主要活動，是要鏟除娼寮的中心地，因為這是娼妓發展的原因。

(四)民團必須要以堅決心來尋找娼寮的中心地，但是如要傳妓女來作證時，不應該虐待她們。

(五)不要忘了，婦女之所以墮入賈淫之中，都是因為她們的物質或其他的環境不良所致，每個民團的工作人員，在執行他們的職務時，必定要遵守一切的禮貌，無論如何不許對婦女粗暴。

成績很快地表現出來了。自一九二四年四月到一九二五年四月的一年之中，搗毀了二千二

百二十八個娼妓的巢穴（根據布隆乃爾（Bronner）教授所作的「賣淫與廢娼之方法」（Prostitution and the Methods of Abolishing it））。花柳病藥房的工作也有同樣的成績，這是抵抗花柳病的一種組織，牠特別注意娼妓，因為她們是花柳病傳播的最大原因。由於他們的衛生委員會，這種藥房作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凡是來求教於他們的民衆，他們都熱心教導，並且詳細調查他們的性生活；他們對於青年人指示性衛生，作很詳盡的統計與科學的研究。他們又注意無產階級的輿論，在莫斯科與各省組織反娼的週刊與三日刊，以民衆教育的文學，宣傳花柳病與賣淫的社會意義。

又時常表演「關於妓女的司法訴訟」這種戲劇，以引起民衆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有一次表演一個妓女傳染了一個到她家去的工人（妓女與工人都受了公共的指責，鴇母受了嚴厲的處罰），以後在拉波卡亞·該斯塔（Rabochaya Gazeta）報上，開了一欄專為討論這個表演的，因此來了許多的通信。有的信繼續地發表了許多天，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由中央蘇維埃的一篇文章，結束了這次的通信。這篇文章的內容如下：

「關於一個妓女的司法訴訟」這個題目，我們得了許多工人的來信，他們很興奮地討論這個時代之不健全的問題。有三個人被判決：一個妓女，一個工人，一個搗母。一致同意於嚴格處罰搗母。那是應該的。我們必須毫不容情地反抗蓄娼；刑法規定了有期徒刑與財產充公，作為蓄娼的懲罰。所有我們的通信者，都關心到這個娼妓和工人。他們其中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的通信者之中，沒有一個說這妓女耶夫多基莫娃(Яковкина)的處罰是太輕；有人以為太重了。我們的意見也是如此。我們雖然是反對賣淫，但是在失業問題未解決之前，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處罰的觀念。妓女所要負的責任，就是傳播花柳病。但是我們也只能使她負一般婦女在同樣情形之下所應負的責任。她犯罪的程度，是由被傳染花柳病那個人是否知道她是傳染者來決定。

妓女耶夫多基莫娃似乎是沒有思想的人。她完全與工人階級不接近，甚至未登記為工會會員，並且永遠未聽着關於花柳病的講演，也許毫不知道她是要傳染的。因此，我們覺得對耶夫多基莫娃的處罰是太嚴厲了。法院的判決應該是如此的：「釋放耶夫多基莫娃。叫她到花柳病藥房去受療治，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的內容也要以字面通知她，這一條規定傳染花柳病的處

罰，並且使她知道，以後如果再傳播了花柳病，她是要受嚴厲地處罰，因為她是明知故犯。」

但是大家的注意都集中於嫖妓的工人。大多數都以爲他的處罰是太輕了，同時也有擁護他的。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俄瓦德（Овощ）同志的辯護：「公開地責備一個嫖妓女的工人，是不必需的。只要賣淫一天存在，就免不了有對於牠的需要。」格利笙（Гришин）對於這個辯護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說：「供給因需要而生；假如沒有人尋找娼妓，賣淫制度自然不會存在的。」共黨青年團員安德烈（Андрей），根據無產階級意識說：「工人所當受的處罰，應比耶夫多基莫娃所受的要重些，因為她是因爲失業而淪爲妓女的。但是這男人應該有更多的階級意識；因為他是一個工人。」格利笙和安德烈是對的。娼妓不是以人身體來表示的貨物嗎？與別的物品一樣，置諸市場以招徠僱客。假如沒有人買牠，牠也就銷聲滅跡了。俄瓦德同志連這點根本的真理都不知道。

庫倫科夫（Куленков）同志也贊成這個理論，他的辯論是根據男子生理的需要的。但是讓我們來提醒他，生理的需要不但男子有，婦女也有的；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將對於婦女特有的道德法律取消了，同時我們要指示出來說，認節制性慾爲有害的種種傳說，都是沒有根據的，因

爲醫學的研究已經證明了節慾與身體的構造無損傷。在人身的構造中，並沒有特別的性慾的精力，人只有一種精力，假如精力有餘，我們可以將牠引用到別的方面去，我們沒有時間去追求妓女：我們有許多當前的要務。

憑我們以上所說的，就要承認購買饑餓的耶夫多基莫娃的身體的工人，他的行動是有意識的，因此他所犯的罪，是應受比她更嚴重的處罰。關於耶夫多基莫娃與嫖她的工人，我們應該說：這正是雙方彼此交換的時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假如每樣事都允許「較強性」(Stronger)譯者按：指男性)去做，假如他們的犧牲者爲男人所作的罪惡而代過，假如女人不願羞恥與犯法，爲饑寒而出賣他們的身體，而在蘇埃國家中，這種購買人身的男子都是要受懲罰並且將他們的名字登在黑籍上。依我們想來，在「關於妓女耶夫多基莫娃的司法訴訟」中，最好是不要公開的指責這個購買她身體的人，而將他的名字公布在他所工作的布告板上。這樣一種處罰，比司法的判斷還要來得有恐嚇的效力些。

在一個勞工共和國中，必不容娼妓之存在。假如我們努力鞏固我們的經濟陣線，一方去除失業，一方是使工人了解購買人身的不正當與羞恥，則賣淫制度可以漸形消滅了。

同時另外還有一件公開的通信值得介紹：這是妓女唐麗亞 (Tanya) 與禁娼中央蘇維埃的通信。在這個信中，她抱怨蘇維埃；她說，標語的確是說「反抗賈淫，不能以反抗娼妓個人的方法表示之，」但是在實際上，所作所爲的事，都是使妓女的收入減到最低限度，差不多不能維持生活。因爲得住所之不易，所以妓女的收入，一天一天地減少，假如找着了一個住所，價錢是那樣的高，以致一個妓女的收入悉數以之付了房租。

下：
人民衛生委員會禁娼中央蘇維埃，在「拉波卡亞·該斯塔」報上回答妓女唐麗亞的信如下：

……你要求蘇維埃使妓女們平安度日，因爲她們既不殺人放火，又不打家劫寨。但是你們不想娼妓是花柳病的重要根源，是最嚴重的國民災患，就是這一點，就可使反抗賈淫成爲最急切的任務。你們抱怨說，因爲反抗賈淫，所以妓女和她們的顧客很難找着寄宿的地方，而妓女的收入也因此急速地低落——這就是表示我們所施行的計劃是正確的……。

賣淫是我們社會機構中最嚴重的病症。這是自資本主義社會下，與其他的社會病症一齊傳下來的，我們將要與其他的病症一齊治療，在我們經濟生活鞏固了之後，這種病症也許好得更快些。

我們知道，使許多婦女不得不出售她們如人人所有的寶貴的東西——身體——者，不是因為要想過奢侈的生活，而是迫於飢寒。我們也知道，反抗賣淫，使妓女的收入減低，就是間接地反抗妓女的本身。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我們的反娼運動。人羣的福利是高於個人的福利。

禁娼中央蘇維埃的工作，又進一步努力預防娼妓，使工廠和技術專門學校，為女子們保留更多的空位置。蘇俄刑法中的第一六九(a)條，一七〇條，一七一條，也是由於這個機關的提議而制定的。

在這三條之前還有三條與牠們有連帶關係的，一併引證於下：

第一五五條 凡將花柳病傳染於人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

第一五五條(a) 凡使他人陷於花柳病傳染之危機者——無論由於性交或其他方法——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

第一六九條 凡以生理或精神之強迫，或以對手在無法環境之下而強姦人者，處三年以上之徒刑。

設因強姦行爲而引起對方之自殺者，處五年以上之徒刑。

第一六九(a)條 凡強迫依彼爲生或受彼僱用之婦女與彼爲性交行爲者，引用一六九條。

第一七〇條 凡以身體與精神之勢力，強迫婦女爲妓者，無論其爲商業或個人的動機，皆處三年以上之徒刑。

第一七一條 凡開設娼寮，設立妓院，招收娼婦者，處三年以上徒刑，並將其財產之一部或全部沒收。但凡使妓女不自由而屬於彼權勢之下之娼寮主，或妓女不足法定年齡，則娼寮主之徒刑增至五年以上。

花柳病藥房所設立的救濟院(Prophylactoria)是最有興趣的,最實用的,最成功的反抗賣淫的組織。

三 救濟院

救濟院是收容所和醫藥處所附屬的工作室,其中收容有花柳病的,無工作的,無訓練的婦女,她們大半原來是妓女,使她們受療治,學習工作,以無產階級的精神再教育她們。治療好了之後,將她們安置在工廠中,使她們加入勞工生活中。

第一個救濟院,得着普遍的同情,因為其中的工作的設備是療治花柳病的,對於社會是很重要的一種貢獻;此院建始於一九二三年,是一個生產合作社為那些失業而又未受訓練的婦女而設的。現在蘇俄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牠們自己設立的,附有醫藥部與勞工部的救濟院。

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布隆乃爾(Bronner)的年報中所發表的字數,使我們可以看出莫斯科第一個而又是最大的救濟院的活動與組織(院中製造上衣與襯衣),有二百個婦人在其中找着了工作,一百五十人找着了安居之所,他們每月的工資平均有三十盧布——

那時兩餐的費用要二十個科表克。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救濟院共住

九二人

一年中陸續加入者

二七六人

有固定工作者

九八人

自願出院者

四八人

犯規斥出者

二一人

結婚者

一六人

回家者

一〇人

安置於托兒所者

五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共有

一七〇人

社會成分

蘇俄婦女

三〇八

來自農家者

一五五人

來自工人家庭者

一五人

工會會員

五八人

不屬於任何工會者

一一二人

不屬於黨者

一六四人

女共產青年團員

六人

教育

能讀能寫者

五八人

半文盲

七六人

全文盲

三六人

失業

失業六月者

五二人

失業六月到一年者

一九人

失業一年以上者

五四人

從未工作者

四五人

家庭環境

未婚者

八七人

已婚者

二九人

離婚者

三五人

寡婦

一九人

有小孩者

三四人

無小孩者

一三六人

患梅毒病者

八八人

患淋病者

四〇人

年歲

一四—一六者

五人

一六一一八者

一二人

一八一二五者

一〇九人

二五—三〇者

二五人

三〇以上者

一九人

不久以後，在莫斯科各區中，有四個救濟院，一九二八年，這四個院中共收八百九十一個婦女；根據拉斯（D. I. Lass）的統計，百分之七十六是農婦，百分之二十一原來是工人，百分之三是其他團體中人。其中百分之二十三為文盲，百分之四十六是半文盲，百分之三十一完全能讀能寫；百分之二進過中等學校。職業妓女之中，有百分之四十九有梅毒，百分之三十一有淋病，百分之十一兩種病兼有。

這種救濟院的主要特徵，就是於醫藥身體治療之外，還進行精神的復活；凡入院者，都要有整個的心理的變化，其緣故就是因為婦女自第一天入院就要自己勞作來維持她自己，因為救濟院並不是慈善機關；住院婦必需要自己工作以付膳宿費。起始作簡易的工作，那是不需要什麼技術

的，漸漸地有了工作經驗，開始喜歡她們所做的事，接受性與集中力都增加了，她們的希望也漸次增長，當她們的復興教育差不多完成後，她們不怕再墮落了，在她們病症治好之時，就可出院，以去做一個熟練工人加入工廠工作。

在這種新工作環境中，她們忘掉了她們過去的歷史，她們雖然出院，但還是在救濟院照料之中，其他的婦女組織，工會，和工廠代表會都保護她們，婦女因此而進入到一種充滿了熱誠與驕傲的新生命中。當失業還存在的時候，她們享受某種特權，以防她們失業而再墮落。

在這種救濟院中，與在其他的蘇聯的組織一樣，不用說是要施行模範教育（exemplary education）的；並且努力鏟除政治的文盲，婦女在文化上的興趣，因此在各方面發展。在救濟院中的婦女——禁止稱呼「妓女」這個字，院中的醫生與職員都稱住院婦為同志——分爲各組，凡能讀能寫的，在她們空閒的時候受有規則的教練；那些不識不知的，則必須受強迫的教育，全體都要受醫藥的療治；每日工作七小時。

教練分爲兩部分——我們可以拿莫斯科最大的救濟院爲例，牠差不多是其他救濟院的模範。一種就是個人的課程部（the individual course section），此部每星期有普通課程十八小

時，每日三小時，適合於普通教育程度：有俄文，數學，地理，政治學A B C，物理學。物理課程有時借助於參觀工藝博物館（Polytechnical Museum），婦女們都非常喜歡這些課程，她們不久之後，都被求知的熱誠所感染了。

其他一種就是「團體」（Труппы）部，這一部是藝術與情感的教練。組織有戲劇團，並設有如「生活報」上所說那個形式的舞臺，在戲劇家（義務的社會工作者）指導之下舉行定期的戲劇表演。有的婦女自己已有戲劇的觀念。又有特別的音樂訓練，進行普通的音樂，尤其是那時流行於這個團體中的「西岡諾卡」（Zyganochka），這是有教育功效的。每個救濟院都有牠們自己的風琴樂隊。每月作三四次音樂表演，俄國的國樂器手風琴是很風行的。有一個特別的唱歌隊，游藝，跳舞的組織者，稱爲「馬蘇維克」（Масовик）的人，安排招待大會的一切。這位「馬蘇維克」時時拿着一個「拜揚尼斯特」（Bayanist）出來。這位在救濟院中特別受歡迎的音樂家所弄的樂器，彷彿像好幾個手風琴合奏一樣。有時也允許男子參加招待大會。到十一點之後——在莫斯科這個時間並不算晚——這些婦女就任其自由，她們彼此防守，以免濫用對於她們的信任。

團體部也排定時間去看電影；她們每天輪班去——每次七十或八十人——看指定有教育



Women Workers in A Moscow Prophylactorium

莫斯科一救濟院中之女工

價值的電影，這些電影都能轉注她們的思想，使她們用腦子，入場是免費的。在團體部中設有體育組。其中自然也有編輯委員會，在負有教育責任者的專家指導之下，發行壁報。在團體部中還有縫紉班。

入救濟院都是自願的。救濟院有一個調查處，決定入院的人。不但對於康健情形，就是對於物質與精神的生活方式，和每個入院者的外貌等，都有特別的記載，根據其結果來決定她是適於個人部或團體部。

與院女接近的各種領袖如細心注意所填寫的特別調查表，能够一步一步地考查一個婦女在救濟院中的整個發展。甚至她個人的嗜好和能力，都有詳細的記載，因此，她出院時（普通一年以後）的新形狀可以與她以前的形狀相比較，而使她再進一步的訓練與方法纔能自動地產生。由此，救濟院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換院中婦女的精神習慣。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惜用種種方法——有時甚至用巧計來引誘——以喚起她們求知的興趣，並使她們知道現在與過去之巨大的差異。這種工作是很難的，因為這些婦人——其他少數的不可救藥者不在其內，這種人有百分之三四——對於一切的智力工作都設法躲避，一提到「演說，」或「講演，」或者「消清文盲，」

或者提到正經的書，就引起她們厭惡的情感，因此很難於將她們誘入到『紅角』(Red Corner)的讀書圈中去。

莫斯科現在最大的救濟院文化教育部主任告訴我說：『假如你一旦以轉灣抹角的方法，例如以浦什金的小說『少年農婦』來引誘她們，她們以後就是對於列寧的講演辭都很注意地聽，有時甚至將她們對於牠的感想都能寫下來。』

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到莫斯科的救濟院去，在廳堂中的黑板上，看見許多答題，是那些初學者對於『因為什麼我們要讀書，我們從書中得了些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答案如下：

因為要教育自己，使一個人得着更多的學識，以後纔能夠知道她應該加入那一界，以及因為什麼要加入那一界（某某，年十四歲）。

或者如下：

我想要學一些東西；因此我晚上簡直不能睡覺。我要如他人一樣的受教育。我要明白所有的問題，在集會時我纔能回答這些問題。如何纔能知道這種事呢？我不希望別的，只要受些教育。

我想知道一切的事。我念書，但是我什麼都不懂。不過我想在書中，在報紙中，和其他的著作中，來學着懂一切的事。我雖然很用心地聽，但是現在還不能懂（某某，年二十四歲）。

又有：

我讀『二營』（The Two Camps），起始一些也不懂。但是在我第二次讀牠的時候，我就喜歡牠了。我睡在牀上讀，我什麼也聽不見，一直到我覺得不甚舒適了。我在人工燈光下讀書：因為在我讀書時，別的婦女在我的週圍作出許多的聲音，我簡直不能讀出一個所以然來（某某，年二十六歲）。

這些女人的口頭上的回答，批評，和觀察等，也很有趣，有時甚至引人發噱。例如：

有一個婦人買了托爾斯泰作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她帶回去，別人問她：「你都讀過了嗎？」「啊，自然啦。」「那嗎你都懂嗎？」「有什麼我不應懂的呢？牠說到一位公主，她不能被解放。但是像我們這種人，都是與此無關的。」

一九三一—二一年冬所訂定的幾種課程的名稱，就是對莫斯科救濟院的婦女之演說綱領，這

並不是什麼標奇立異的：

(一)有史以前時代。(二)人類的系統。(三)什麼是小資產階級等等問題。同時還領導去參觀達爾文博物院 (Darwin Museum)，行星儀 (Planetarium)，革命博物院 (Revolutionary Museum)，列寧博物院 (Lenin Museum) 等處。

還有值得提到的，就是上面所說莫斯科救濟院在一九三一——二年的二百個婦女中（她們以編織與縫紉所有的一小部收入，付她們的膳宿費，其餘的錢由她們自己花用），有三十個目不識丁的，對於這三十個人的工作是非常的困難，還有六十個半文盲。除此之外，那大部分的婦女，形成一個很有精力的婦女團體，他們都熱誠地求學問，用思想，有的希望繼續受教育，有的已經這樣進行了。有七個人受訓練預備去作公共衛生服務人員，有幾個人要從事於修築汽車路，又有幾個要為消費合作社服務的，有一個已經開始研究醫學了。救濟院當局，都竭力督促鼓勵這些希望。我再要鄭重提及的一件事，就是這個機關和其他蘇聯的同樣性質的機關中之主管者，對於其所管轄的人之了解與親睦，是值得我們無上的稱讚與豔羨的。他們並沒有例外，自醫生住院婦到很不易當的婦女民團，都是一樣的。

許多莫斯科救濟院的婦女，顯示她們有特殊的天才，這自然也在培養之列：有一個能奏很好的低音梵啞鈴（cello）（特別表演了一次三人合奏），另外有一個選出來入戲劇專門學校，還有兩個長於寫詩，我現在引一首於下：

美豔的五月，

寂靜的月夜中，

我們的娼寮破獲，

我即於此夜被捕。

珊瑚進了冷酷的監獄，

在法庭上，

他們百般拷問一個妓女。

五年的監獄生活，

你們奪去了我的青春，

第八章 曹澤之廢除

使我受盡了折磨，

不能忘的幾年監獄生活。

已往的事現在成了一場幻夢，

現在我成了國家的女兒；

人民的意志高於一切，

人民的權勢將永不斷絕。

這個國家是自由的歸宿，

在這兒不需要再對資產階級的專制折節。

做了十五年國家的女兒，

聽見了工人謳歌的勝利。

我們可以說，

這是極樂世界，

推翻了已往，

等待着未來。

我是天賦的工人的後襲，

我是蘇聯農民的兒女；

全世界的工人啊，

紅旗指示給你們前途的勝利。

在這整個教育制度之中——歷來的教育制度都是不懂個人心理學——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提高自信心，這是新形成的習慣與環境的結果。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這些可憐的動物，都是充滿了一種自卑自賤的心理。以各種的獎賞，以特別的榮譽，尤其以特別鼓勵努力的宴會——一言以蔽之，以各種各式的方法——來啓發婦女的希望，熱誠，和求知慾，有時甚至要積極地阻止她們的急進，使她們的希望達到真正的興趣上去。總之，無論她們作什麼事，無論是行動，或召集會議，或攝影，或設法感化她們的同伴，都是很熱心的。

因為蘇聯的所有的救濟院，是由別的機關來擔保的，所以每一個個別的救濟院也是某一種

別的團體的擔保者。這個莫斯科最大的救濟院是近莫斯科的一個集合農場的擔保者。時常她們成團去參觀她們照料的集合農場，她們在那兒作風琴樂隊的表演，戲劇表演等等。伴同她們去的醫生還作數次講演，她們都很受歡迎，假如必需的話，她們還幫助工作；因此，『達到新生活之途』是漸漸地實現了，並且將來有很大的希望，而這個將來已經從現在開始了。

這就是俄國救濟院的生活狀況。

一九三一年夏，我得着機會參觀維也納附近的花柳病婦女療養院；這兒也有所謂『職業的治療術和衛生』，據說這個組織，不但被外人所稱道，而且可以說是空前的，並且還介紹與國際聯盟的衛生委員會，說是值得模仿。

牠與莫斯科救濟院的比較是很有意義的，自外表初看起來，莫斯科救濟院情形很不好；因為建築既舊，而又不合用；地點是太不合適了。反之，在維也納的，有許多很合用的，富麗堂皇的大樓，四圍有許多濃蔭滿園的花圃，其中有許多的公事房，你初一看簡直像一個封建的王國，而不像一個收容墮落婦女的地方。

但是當你走進了這個設備週全的地方，你會覺得另外有一種區別：在蘇維埃的救濟院中，牆上貼了快樂的，有意義的格言，掛上列寧幼年的和其他領袖的像片，這些都好像在歡迎你；在桌子上你可以看見花草，像片和其他有趣的裝飾品，雖然很簡單，但是整個空氣表現出快樂，舒適，和信賴；而在維也納，那兒是充滿了神聖與嚴肅，是一種離實際生活很遠的象徵主義。一個基督受難的十字象掛在屋中，歡迎你的是教女（Pious sister），你立刻覺得她們與那些「罪人」之間，是有如何的一種巨大的鴻溝啊！

這些「罪人」的外貌如何呢？在蘇俄的這種機關中，她們的臉上表現出熱誠和快樂，使你立刻可以忘了其中不完善之點。在維也納的療養院中，有三百個可憐的婦女，她們是擔驚受怕匆忙的樣子——其中有許多原來是家庭女僕——帶着一種不安的，戰慄的眼光，其中一部已經變成麻木不仁了。她們共分三團：第一組是成年的，第二組是未成年的，這就是私娼，她們是由警察所捕獲，由警醫檢查斷定為有病，或有病狀的可疑的情形。第三組是那些在道德警察支配下的妓女，因此大家都認為她們是不可救藥的墮落者，並且不許她們與其他的人接近。每一組根據她們所患的病，又分成兩小組，每小組更分成兩三打人為一團，因此，纔便於按照她們的品性而將她們的同

伴分開。

此處的病人，享受着很好的待遇，就好像頭等療養院的病人一樣。爲娛樂起見，設備有四個獨立的花園，一個戲臺，一個圖書館。又有兩個手藝工廠爲練習職業。在此，婦女也可按照她們的技巧與能力自由選擇職業，因爲要使病人一方面學習，一方面自她們的工作得着一些利益，所以在原則上一切的工作都有工資的（普通至百分之五），因此她們纔能儲蓄，以備她們出院時短期間的費用。

我們知道，對於這種『道德的敗類』的教育的影響，是有許多的必須條件，據說因此是不難於喚起她們的良善的決心，並且使她們希望放棄娼妓生活。

但是俗諺云『到地獄之路亦由良善之決心所鋪成』那嗎問題就在社會是否能將這種『決心』和『希望』變爲事實。由這個問題，我們就想到了這個模範機關的缺點，牠不過是民主政治社會中之一種不徹底的理想，一種半途中止的計劃，一個生而已死的嬰孩，而這民主政治的社會又是虛假的民主政治，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法律上——總之，在各方面——的地位，比男子還要壞得多，墮胎法還在強制執行，每年中婦女因此犧牲的不知凡幾，國家不廢止賣淫制度，只

知與妓女爲難。

有一篇醫學上的文章，批評這個療養院，因爲有病的妓女一治好了就必須出院，所以牠說：「妓女住院時期，不能因她們的福利或同樣性質的原因而延長。像這樣幾個星期的住院期，爲她們的前途計，是未免太短了。」因爲像這樣的一個婦女，出院之後，病雖然治好了，但她是被擯於社會的，因爲又不習於工作，所以在世界經濟恐慌中，她成了失業者，既無家可歸，又無親朋可託，處於都市的誘惑中——像這樣一個婦人的結果如何呢，不是終歸又流於依門賣笑的生活嗎？有一「良善的決心」又有什麼用處？

四 第一次從良娼妓之工人大會

我再引一件事，來證明蘇俄禁娼運動的成功到了如何的一種程度，證明一種新覺悟了的人類和建設力量如何地自妓女階級中不斷地產生——只要一一致團結供給以必須的條件；這就是猶甚至連蘇俄民衆都不甚了然的一種事業，因爲那些創業者並不居功，而以爲是事理之當然。

莫斯科救濟院於成立數年之後，追溯牠的已往，在數年之中，有很多的婦女完全治療好了出

院，一九三二年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人找着了職業，有幾個地位很重要的，決定召集一個自救濟院出來而現在有職業的婦女大會，以便交換意見和經驗，並且接收新提議。

不像通常那樣公開大批地發請帖，這次的請帖是祕封的，並且是交與私人的，在某種情形之下，還要私下向經理方面要求為特種原因給與某一個女工的假期；因為在每一個工廠中，只與私人有關。

一九三一年的十月三十一日——外面正是狂風暴雨，就好像洪水又要來臨似的——在市民街二號的「聯合治療勞工救濟院」的禮堂中，喜氣充溢。在開會以前，全場的座位都坐滿了人，後面的人還不斷地魚貫而入。許多老老少少的婦女還繼續要求進來，有的婦女與別人大聲爭吵，這是俄國婦女在這種場合中所常有的現象。人羣中也有長着鬍鬚的高男子；後來聽說，他們都是會中婦女的正式登記的丈夫。

有幾個婦女吹着金碧輝煌的大喇叭以引人注意。她們正在調整調子（其中的罐鼓更是使人注意）；她們是樂隊的隊員。在人羣中你可以看見耀目的紅物；在許多合適的紅帽之下，你看得見聰明智慧的面容，這就是共產青年女團員。在四週的牆上，自然有許多寫着格言的紅紙條，許多

宣傳的標語，和列寧斯達林的掛像；這個禮堂原來也作為演戲之用的，在臺上的紅色主席桌上，放着一個比原來人還大的列寧半身像，以繡着金星槌和鐮刀的紅旗，圍着桌子的四週。因此，口述目睹的印象——在蘇俄這種景象是常有的——是非常的滿意：是有聲有色的，快樂的，勝利的，而又受人歡迎的。逢開會必到的小孩，在這種場合中是不帶來的。

約一百五十個原來的妓女——在俄國革命之前，在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中，她們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處於腐敗，可憐，羞恥的情形之下而無法挽救——參加她們第一次的大會：她們是復活了，是獨立的工人，了解她們自己在勞工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新的階級意識和實行職務之社會的熱誠鼓勵着她們，因此，她們之中有的當了工人挺進隊（*storna workers*）而盡了很多的服務。其中五六個工人先鋒隊有特別的榮譽而被派到一個委員會，與莫斯科蘇維埃的代表合作。救濟院的黨細胞組織的書記作主席，我算作一個來賓，坐在講臺上。

搖鈴開會，全堂鴉鵲無聲。在主席作了簡單的歡迎辭後，三百隻熱誠的眼睛，望着莫斯科救濟院的主任醫生西門雍·馬科維支（*Syemyon Markovich*）和功績顯著而又對人體貼的丹尼西維斯基（*Danishesky*）醫生，她們十分愛戴他們，信任他們，現在他們報告這幾年來救濟院的

經歷。

當丹氏報告時，這些在座的婦女都盡心注意聽，但是她們大半缺乏集中力，所以不時的騷動，他簡單而又清楚地解釋由負責調查出院婦女的女職員所收集起來的材料。他將這種婦女分爲兩類。一類是八十七個在職的婦女，其中有四十二個勞工挺進隊，三十六個做社會工作的，有三個已經成爲正式黨員，有六個在共產青年團；他稱這部分人爲「滿意的」一類。其他的一類，人數多些，並且「稍有不滿」，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三是勞工挺進隊，有一個是共產青年團，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在上課，並且還有酗酒的。

這裏所提到的一百七十八個勞工婦女中，有一百三十九個是有紀律的，她們已經接受了一個已建立好的制度，有百分之十是沒有紀律的；百分之二十一每月薪資在六十盧布以上，但是大部分每月有八十盧布，還有每月一百盧布以上的。只有一百三十八人上課的（百分率太小），有十二個人自願離開工廠，有四個因爲偷東西而被驅逐。這些婦女之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五歲左右。

其中有的婦女在工廠的行爲很好，但是在家中就令人十分不滿，她們幾次三番地喝酒，又接

收男子的禮物。講演者提到幾個特別壞的例子。但是這種不容擴張而又不希望的事件，是完全由於不適合的『集合』居住而起的，這種環境容易引起爭吵與衝突；假如房屋建築進行好了，這種事件也許可以免除。

丹尼西維斯基繼續往下說：雖然如此，但是可以說，其結果已經超出了一般的希望，假如能夠將好例子作為借鑑，則『稍有不滿的』一類人的弱點，也不難以善意來克服。他在他的調查案子中提出幾個好例子來。他並指出許多好的勞工挺進隊，共產青年團，和已入黨的分子，他說除了很少的無法挽救的婦女不滿意她們的新工作以外，大部分都很滿意，當一問到她們的近況如何時，她們一致答應說：『如魚得水！』他末後告知大家，現在救濟院已經附設了一個法律顧問處，任大家隨時應用。

這次的『討論』與其他蘇俄婦女或其他的羣衆會議相較，自然是稍形紊亂而又很主觀，但是很有精神的，而在會的性質方面，又是極其直接的。

開始有幾個婦女報名要發表意見，她們對於勞工婦女在工廠中偷東西，在家庭中品行不端，又有酗酒的這些事，十分憤怒。……丹尼西維斯基所報告的事，是很不幸的，是最可惋惜的。工人

在工廠中偷東西是最下流的事，應該當衆使其受羞辱！我們進入工廠，應該比別人作的事多，我們應該證明我們的價值……我們應該成爲勞工挺進隊以擔負社會工作！這是一個戴着小紅帽的熱烈共產青年女團員在禮堂中的激烈的話。

有兩件事令她們生氣：第一個就是影響她們很深的居住問題，一提到這個問題時，引起各方面的責難：「我還沒有寄身之所呢。我什麼時候可以得着一間屋子呢？」有一個勞工挺進隊員，她是預備黨員，每月有九十五個盧布的薪金，二年以來，她和其他七個婦女，住在一間很狹小的屋子中，她抱怨說：「我因爲什麼不能得着一間屋子呢？因爲我不說話！假如我問，他們就說：『你是一個預備黨員，幹嗎也要一間屋子？』」

第二個引起激烈討論的問題，就是：一個人在工廠中是否應該隱瞞自己是來自救濟院的：

丹尼西維斯基報告的時候，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說大部分的婦女都不願說她們是救濟院出來的，但是救濟院的婦女，不一定原來都是依門賣笑者流，她們之中也有貧苦無依，或者無處居住的婦女，關於以前所傳的花柳病的觀念，應該掃除。

一個嬌小玲瓏褐色皮膚短頭髮二十五歲上下的婦女報名起來說話，她說有一個婦女毀壞

了她同伴的名譽。『她隨時隨處都叫人注意我們是自救濟院出來的。我自己並不怕；我在工廠中作工，我是一個預備黨員，並且擔負了社會工作，我並不隱瞞我已往是在救濟院的。但是她到處告訴人，並且叫人注意，這是很不痛快的。』一個顏色美麗，帽子戴在前額的女子又說：『同志們，我現在第十工廠作事，我是自救濟院派送去的。大家都說一提到我們是救濟院去的，就使我們難過。同志們，這種說法並不確實，我一點也不以此爲恥，不過我們應該作更多的社會工作，因爲我們的責任是要使我們更好些，使我們忍受臨到我們的一切困難。八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去參觀同志法庭的訴訟，我們聽見一個勞工婦女因爲盜竊工廠的材料而被判……這正是應當掃除這種事的時候；我們都應該成爲勞工挺進隊，並且不要忘記救濟院對我們的一切好處。蘇維埃政府萬歲！』

上面曾經提過的帶着紅頭巾的女共產青年團員，自然也特別熱誠地發表了她對這件事的意見：『……當我們既投身於勞工大眾之中，我們就應該打起精神來工作……並且不要隱瞞我們是在救濟院的這個事實。因爲這是沒有什麼可恥的。反之，人們愈是注意一個女工，他們更要多照顧她一些。假如有人侮辱了她，有許多機關可以阻止那些嘵嘵之口。你不應以過去的事爲可怕……在我們一出救濟院之時，依門賣笑的舊帳算是了結。我也是來自枇杷門巷，但是工廠的人，從

未使我想到這一點，而我自己也不掩蓋。同志們，請你們不要隱瞞；反之，坦白地承認，你反可受到更好的待遇，因為人們會說：她是飽經憂患的人……他們會很快地給你住處，並且更仁慈地對待你……」

演說者在鼓掌喝彩聲中坐下之後。一位工人——她們的丈夫中的一位，站起來說話。「無疑地，有時人們對於工廠中的這種婦女的舉動不好。這種情形是有的，並且還發要生，但是直到如今還沒有有人揭發這種舉動。假如再有這種事發生，無論如何要令我們知道；我們要指示出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組織，證明我們是如何努力與婦女的貧乏奮鬥，如何鏟除從戰爭和沙皇遺留下來的生活……」

討論一直繼續下去。最後主席來說結束的話；他也是一個工人，對婦女們說了些鼓勵的話：「……最好什麼也不掩蓋，同志們，這不是什麼羞恥，而只是不幸……我們都生活於勞工階級所建造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工人們不久就會了解你們，並且我們也要幫助你們……」

時間已是很晚，並且節目上還有戲劇的表演——有一二位穿好服裝的演員，已經出現於幕後了——而會中還一致決議請我對在座的婦女，講些關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廢娼運動，尤其是我

剛自彼處而來的維也納的情形。

聽衆的興趣與注意力立刻奮起。每人都彼此靠近地坐着，演員又退入等候室，預備彈奏國際歌的樂隊也暫時停止。我立起來，對那些婦女們講維也納的廢娼運動和俄國廢娼運動的分別之簡單的敘述，這種分別是每個客觀的，沒有偏見的旁觀者所看得出來的；我特別提到在維也納的醫藥衛生等設備，以及治療與工作機關的方便；但是同時也指出他們所完成的工作，與蘇維埃救濟院成功的一部分相比，是如何的沒有一些用處；末了我說我希望在第二次會中，我只能找着在每方面都是徹底「滿意」的女工團體。

演說完畢，一些婦女圍着我，問我許多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維也納的救濟院有多少婦女，那兒是否也是不易買着鞋子，關於居住地的情形如何，文盲和挺進隊的百分率如何，我買衣服材料的地方是一種什麼樣的「合作社」，「巴黎公社」是否近維也納等等問題。有一個女人，遞一封信給我，請我將牠作為參考：

……我不能像金人三緘其口。我要告訴人，蘇維埃政府為我們貧病交加的婦女如何地盡

心。我們自街頭來到溫暖向陽的屋中，我們受醫藥的療治，不用我們費絲毫之力，就能得着現存的食物。

治療好了之後，就將我們安置在工廠中，與其他的公民有平等的權利，並且習於工作。你們也許以為救濟院從此不管我們了。其實不然。許多勞作婦女在安插到工廠之後，就有了住處。當我們的住處還十分缺乏時，關於住處這一點自然不能使人人都滿意。但是當局與醫生們，還是盡力替我們設法。

說到我自己：我進工廠七個月之後，還是住在收容所內，接着我找着一間屋子。但是我必須要有一個官方證明書和一個印鑑。他們不憚煩地替我想盡方法，終於我得着一間屋子。只有我一個人是如此的受惠嗎？並不是。

因此，我對於救濟院，醫生，指導者的種種好處，要表示感謝。教訓我們實在不是很容易的。就如同我也是鹵莽的，未受訓練的，我自己和全體職員都因此受了許多精神上的折磨。而現在我已經加入了勞工生活中，我已經有了自己的房子——這一切都是我要感謝救濟院的。因此，我捐助四十個盧布，以作救濟貧苦之『第二次工業公債』(Second Industrialization Loan)之

存蓄金。

最後由婦女們自己一致通過了一個議案：「我們委託霍爾(Hallé)同志，將我們真誠的同情和親熱的祝賀，帶與住在維也納的不幸的貧困婦女。」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莫斯科救濟院的工作婦女又舉行了一次大會，但是這次我未得出席。救濟院的教育股長將這次的情形寫信報告與我說：

第一次會中普遍的隱諱與猶疑，在第二次會議中一些痕跡都沒有了。她們以驚人的清晰與決斷來擁護她們的意見。對於個人和物質的興趣，沒有對大眾的福利那樣的顯著，也很少聽見不斷抱怨居房環境之壞的……這次的會中的發言者，差不多完全鄭重地說救濟院造就出有能力和有精神的人，增加了蘇維埃勞工家庭的力量，又說在以前的院女當中，有挺進隊工人，有「隊長」，有職業委員會的女主席，有黨員……。

信中又說：

勞工婦女參加蘇聯文化活動的熱誠，一天一天地增加。設法勸誘婦女——猶其那些直接來自街頭的婦女——去教育她們自己的時期早已過去。蘇聯的整個生命，就好像是一個達到求學的刺激物。我相信，在我們婦女界的遲緩的發展中，重興教育的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去喚起對於文化的興趣。因為當一覺到了求知的希望時，這種希望漸漸地變為一個極熱烈的求學的熱誠……在勞工挺進隊，和其他出院的婦女旅行到堤乃普羅斯特羅（Dnyeprostroy）去研究別的城市救濟院之建設工作和活動時，我乘此機會觀察到我的學生已經增加了接收的能力及對政治文化經濟等問題的興趣……。

五 最終的目標

現在我們談到最後的一個問題，讀者也許早已想到這個問題了：在蘇聯的最初時期，廢娼是

否有很大的希望？我們借重一些事實和數目字來說明這個問題。因為蘇俄沒有監督制度那一類的東西，也沒有什麼規章，所以要估計現存娼妓的數目是很困難的。不過與革命前的俄國娼妓數目相較，是大大減少了，並且還在繼續減少。一九二八年莫斯科花柳病醫院與『改進勞工及生活程度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Labor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的合作，再加以『勞工挺進隊』（Workers Brigades）的協助，作了一個調查，結果只有三千妓女，而一九一三年聖彼得堡的妓女估計約四萬，莫斯科約二萬。布隆乃爾教授，根據他估計自妓女傳得花柳病的人數間接所得的結果，也和此數差不多。一九一四年俄國都市人口，百分之五六·四花柳病患者都是由妓女傳染而來的。根據花柳病醫院的調查，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之四年間，莫斯科的這種百分數，降至三一·七，邊陲諸城市降至二六。又根據『第一莫斯科花柳病醫院』的報告，自妓女傳染花柳病而來求治的百分數，一九二四年是一九，而在一九三〇年只有九·八了。

布隆乃爾的記錄中，表示邊陲諸省傳染花柳病人的數目的減少更大：在巴那烏爾（Barnaul），在西西比利亞，所有彼處患花柳病的人都到一個本地花柳病醫院去治，自妓女傳染花柳病的，一

九二六年有八十二個，一九二八年十三個，到一九二九年只有九個。關於『第一莫斯科花柳病醫院』的數字，也是同樣雄辯的事實：一九二四年二十歲青年學生來治病的，有百分之二一·六是由妓女處傳染的，到一九三〇年減低到百分之二·八。關於這一點，一方固然是近年妓女人數減少，同時我們要想到近年來學生團體之社會組織的改變；青年無產階級和勞工與其他社會成分中之青年相較，是很少到娼寮中去的，這是由問答調查中得出來的數目所證明的。

一九二九—三〇年由妓女傳染病症的人數之遞減，與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妓女之調查所表示的事實相符合：與一九二八年之三千以上妓女相較，那時只有四百妓女了。圖拉 (Tula) 於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的二年之間，妓女的人數自四百減至二十四人。

治療與勞工救濟院的統計，也證明妓女是漸漸消滅；在早年間，這種機關對於求救助的，簡直窮於應付，但是自一九三〇年以來，情形大有長進，莫斯科五個救濟院已經結束了四個。最近計劃要合併成一個聯合的救濟院，改爲『治療勞工院』(Curative and Labour Institute)，設立在那特別爲此建築的大廈中，其中不但要擴充工作，並且要施用全新的工作方法。

假如我們追究近年來娼妓減少的原因，自然首先要歸功於失業的減少——自一九三〇年

以來，失業完全消滅了——因為失業的確是使婦女墮入娼寮的主因。不過自花柳病醫院所舉行的調查及志願隊所收集的材料來看，我們發現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就是前幾年雖然有成千上萬的失業婦女，但是只有那些完全未受訓練而又與無產階級不接觸的少數婦女，纔淪為娼妓，因此，現在我們不能認失業是娼妓制度的充足的理由。庫爾斯克（Kursk）的花柳病醫院調查的結果，也同樣證明了這個事實。這個調查表是於一九二三年分發與職業介紹所的失業婦女的。

布隆乃爾說那次分發了一千調查表，其中包含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失業的時期，另一個是問是否曾為娼妓；這一千張表填好寄回來的有四分之三，由此得出一張很有意義的圖表。百分之十一的失業婦女是從來未作過工，其餘的都是失業相當的時候；百分之二十七約六個月，百分之十九自六個月到一年，百分之二十七自一年到二年，百分之十六失業在二年以上。第二個問題問是否曾為娼妓，大部分都很簡單的答一個「未。」有三十位回答說：「現時還沒有，不過我不能擔保我將來不做。」有一個婦人回答說她正在想這件事；有二十六個婦人以十分的恐怖來否認有這種可能性：「我寧可吃槍子。」「我寧可餓死。」有一個婦人說：「假如我能想到作妓女，我就不能在職業介紹所的登記簿上有一年半的時間了。」又有一個說：「職業介紹所不容那些出賣自

己身體的婦女。」最後有一個說：「在自由國家之中，不容娼妓的存在。」只有十四五個婦女覺得她們自己要墮入娼寮之門。

這個十年以前的調查，其結論與布隆乃爾教授在『又論到廢娼運動問題』（Once More the Question on the War Against Prostitution）一文中的結論相同，就是庫班黑海（Kuban Black Sea）區的工會中之數千失業的女會員，在同年受調查，沒有一個人是淪為妓女的；這就是說，甚至在那時候，勞工婦女之加入工會和漸次增長的階級意識，對於廢娼運動有絕大的影響。

自那個時期以來，蘇俄，尤其是蘇俄的婦女，是有長足的進展。只要一個例子就可證明：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全蘇聯只有二、三九四、〇〇〇有工作的婦女，其後增至六百萬，一九三二年工廠中的女工又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其他處增加更多。

這些婦女羣衆加入了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活，在其他方面就成爲巨大的教育價值；這就是說她們『重新使自己合於資格』（re-qualify）；不熟練的家庭主婦，在工廠中重新訓練爲工人，她們對於自己的職業很是得意；在經濟和法律上她們與男子平等，因此她們成爲重建國民生活中之活動的合作者。在城市中，工廠就等於一個好的救濟院，是反對賣淫的一個工具。

這種預防娼妓的效力，同樣及於鄉村，鄉村中的婦女因此漸漸地都加入了社會的集團——國家農場或集合農場。在整個蘇聯中關於婦女的立法，其目標都是在於有系統地破壞賣淫制度的基礎。這個目的，由於進一步的保護勞工婦女，禁止辭退有小孩的單身婦女，法准墮胎，以及無數的保護婦嬰的組織，婦女收容所，婦女指導所等等來共同提倡。

所有這一些情形，在蘇維埃婦女中產生了一種無與比擬的文化。男女同學，有系統的訓練工人，訓練伴侶之道，訓練社會的責任心，以及新道德等等，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新青年，完全不同的新的兩性關係，賣淫制度的罪惡也因此消失。在新道德法典所認為是卑陋的金錢戀愛的要求一旦絕止時，娼妓的供給就會消滅於無形。

因為要使廢娼運動的預防活動的進行更形順利，所以又採取文化和教育的方式；在俱樂部，工會，青年組織，和紅軍隊中，一切的講演和辯論，大多以娼妓為中心題目，指示在工人共和國中，賣淫制度是如何地可恥，如何地不可容忍。我應該再提一提成立好幾年的「社會保護」(Social Guardianship)，牠與其他的機關共同負責在各火車站監視自外省或鄉村中來的孤身而又無經驗的婦女，照顧她們，為她們找住宿處，或者送她們回去；這種工作在預防賣淫工作中是很有價

值的，現在的工人之需要日益增加，更可達到這種預防的目的。

最近凡視察可疑的地方的責任，都歸之女視察員（guardian sister）。一般民衆都自動參加廢娼運動與鏟除花柳病運動；志願工人隊每日視察婦女與失業女僕的寄宿舍，並視察公寓，公共廁所等處；因為這些地方都是妓女聚集之所，是產生罪惡的地方，並且是花柳病的重要來源地。志願隊時常夜晚在這些地方視查，因此他們是等於在公共支配之下。國家的立法也禁止這些娼寮的各種變相的地方，這都是與缺乏住房有密切的關係。

大家認為由救濟院來做直接廢娼運動是一個弱點，因為救濟院所收的婦女都是已經有病的，所以現在設立一種預防院，以收那些將要淪為妓女的健康婦女。總之，在現階段的廢娼運動中，是將妓女分為兩種：第一種包括那些所謂「寄生」分子，就是以前所稱的「勞工的逃避者」（labour deserters），她們不能離開奢侈品而生活。第二種包括那些思想不健全的婦人。如果我們要說蘇俄還有妓女的話（莫斯科的妓女，估計最多只有七百人），那就是那些住在繁華旅館中專為接待外國人的女子。俄國一般人似乎都認為自資本主義國家而來的外國人，離開金錢的戀愛是不能生活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不過對於這件事最近也採用了很嚴厲的步驟了。對於所有

的妓女，法律規定都要強迫去作工，強迫受療治，無論她是第一種或第二種婦人。像這種方法，法律所干涉的不是關於病人的問題，而是恥於作工或反常的人的問題。其餘的人，以為蘇聯的賣淫問題已經解決，所以一般俄國人對於娼妓問題的討論，很少感覺興趣，這不能怪他們不願參加討論。

在另一方面，廢止最悲慘的一種娼妓——童妓和幼年妓的要求，漸漸增加，這件事是與難於解決的貧苦兒童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我不願在此詳細研究這個問題，尤其是當牠差不多完全解決了的現在；在不久以前，牠還是一個十分緊急的問題，許多人討論其性質及解決的方法，『在生活之檻上』(On the Threshold of Life)這張影片，就是有色地表現這個問題。全俄有許多機關是設法鏟除這種幼年娼妓的；除了為難於教練的幼年娼妓而設立的各種教育機關以外，還有兒童朋友社(Society of Children's Friends)，兒童 V. T. S. I. K. 委員會(Childrend's Commission of 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及許多兒童收容所。這些機關的工作，和救濟院之於成年妓女及收容所之於貧苦兒童是根據一樣的原則，不過這些機關的工作計劃是限制於年齡的標準，凡超過這種標準的女孩，一概不收留。此外，『幼童娼妓』大概是出現於都市中——莫斯科多於列寧格拉德——因此要鏟除這種娼妓，是很易於着手的。

在關於激烈廢娼運動的整個問題中，那些對於這個問題十分了解的人，以為是必須同時打倒嫖妓女之事。現在有一種正在考慮中的新法律，規定凡嫖妓者必定有相當的處罰，在某種情形之下還要處以徒刑，因為這種事並不只是一種道德的墮落，在關於妓女的司法訴訟就是依此辦理的；認嫖妓者為反婦女社會觀念的罪魁禍首，當他是剝削處於無抵抗地位的婦女的人。

「不鏟除嫖妓，則廢娼為不可能；因為這是一個整個問題的兩部分；」「賣淫使婦人墮落，嫖妓使男子墮落；」「對於嫖妓者不可寬恕」——這些都是晚近的標語。這個特別問題，在公開討論會中，在男女工人集會中，是時常地辯論，並且由教育機關將牠提出在青年人的前面。在一九二八年廢娼中央蘇維埃對其分機關所發的宣告中，可以見出同樣的態度：

在根據廢除一切剝削形式而重建生活的工人國家中，我們仍然找得出最消極的剝削方式：人體的剝削。這種剝削者是應該受公共的處罰……實際經驗證明了將這個問題提出於工人及學生的一切集會中而通過適宜的規則，是很有益的。凡犯了這種規則的人，就將他們的名字宣布於壁報上。凡在搜查娼寮所捕獲的嫖妓的人名都發表於本地報紙上。

職業的團體也加入這種禁止嫖妓運動，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利用牠對黨員的勢力來做這同樣的工作，認嫖妓爲反無產階級的行動。一切反對嫖妓的方案，都應用在文化五年計劃的綱領中。自人們想到娼寮的顧主這個問題以來，這些顧主到底是些什麼分子這個問題自然就發生了。從流行於俄國的兩性自由關係這一點來看，除了國外人和旅行者以外，還不很知道嫖妓者都是那種人。總之不外是那些自外省來找事而又無朋友的男子。同時，飲酒和娼妓的關係，在蘇俄的情形特別嚴重，因爲俄國人之溺於飲酒是已經根深蒂固了，這種情形使救濟院的工作也發生困難。

鏟除罪惡淵藪——在重要都市和外省中，其數目都慢慢減少了——的運動，還是激烈地進行着。有幾個是在一九三一年強迫關閉的。其重新開張的，也成立不久，至多數月，因爲在大城市中住房缺乏，時常是鄰居去報告警察。在革命前風行於俄國而又是妓女之集蒼所的土耳其浴室，也因此關閉了。廢止娼寮的奮鬥，其成功也不亞於此，按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凡開娼寮者，處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並將全部或一部分財產充公。娼寮主——在俄國稱爲雄貓（*fond-gat*），也許是

指諺語謂貓匍伏在熱湯之旁——執行放逐。

除了已經說過的那些妨害廢除娼妓的阻礙之外，我們不能否認還有許多其他的種種困難，不過牠們都是普通性質的。例如現在普遍的認做妓女爲副業；這就是說，一個女工可因此買一雙襪子，或一雙鞋，或者一張戲票，因爲衣服等物現時是很缺乏的。蘇俄僱用的許多外國專門家對於娼妓有很大的影響，這一層我已說過，他們成全了這種女性貪便宜的罪惡。許多自各國來的外僑，在這一點上無疑地是有墮落道德的影響。有人說他們第一個懂得的俄國字就是 *окупа*，這個字是睡覺的特別的意義。僅僅是好奇心的誘惑力，就使他們不能抵抗那些品性不良的婦女。但是有時也有成爲正式夫婦的。反抗這種認做妓女爲副業的方法，就是提高一般婦女的文化水準，在勞工婦女中，要特別宣傳婦女以這種方法增加收入是可恥的。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不幸，是不幸中之不幸。雖然已經設法補救，但是還不能馬上成功：這就是住房的缺乏。上面已提過，這件事是第一次出救濟院的工作婦女大會人人所訴苦的，這是婦女生活中唯一最感痛苦的。也時常是婦女再墮落的唯一原因。這種事件時常發生，簡直成了一種威脅。那些遺留下的妓女，除非她們自己是中產之家自己有房子，或者她們有固定的富足的嫖客以外，

其他十分之九都不得不在兩旁植樹的大道上，在火車中，貨車中，車站的黑暗處，闖入住宅的進門處她們所謂 *Paradniki* 那些地方作她們的『工作』後來甚至有在租賃的汽車中，真是所謂『街頭賣笑』了，但這是她們唯一的藏身處，因為她們沒有住所。但是我們要明白這不過是賣淫制度的殘燼，是由於缺乏住屋的環境而起的。

從整個事件來看，一切的預防和直接的廢除娼妓的辦法要完全成功，還要待相當的時間。但是達到最後目標的方法大部分已經施行了，這是我們每個客觀的觀察者所要承認的。賣淫在蘇俄已經呈現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形了，其最後的廢除——牠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部——並不是子虛烏有的事，而是最近的將來就要實現的。

調查表

此表由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為調查治療勞工救濟院的學生而發。

(一) 姓氏，名字，別號？

(二) 年齡？

(三) 雙親在否？父親？母親？孤兒？

(四) 父親或母親已死，死於何時？因何病症？

(五) 受何種教育？在家塾中？在別人家中？到多大歲數？

(六) 生長於鄉村家庭？工人家庭？或是公務員，小職業人，工業家，手工藝者，知識界的家庭？

(七) 生產地：省，市，州，區，村？

(八) 在莫斯科居住時間？

(九) 自何處來至莫斯科？

(十) 入救濟院前在莫斯科的住址？

(十一) 入院前之生活情形：有幾間房的住宅？面積多大？假如是單間房，有多大？屋的一角？只有一

鋪牀？曾經住過夜廠(night shelter)？否？沒有住處？假如自己有房間，是否一人一鋪牀，或與他

人共牀？屋子是光線充足，乾燥，溫暖，潮溼，黑暗，冷，在地窖中？有電燈？煤油燈？或沒有燈？

(十二) 教育：何時開始讀書？受教育的時間？是文盲？是否能讀能寫？曾否進過中等學校，或大學？是

否？結束畢業考試？

(十三) 身有一技之長否？何種技能？

(十四) 革命前的職業？是女工，是僱員，或是學生？是否與父母同居？與丈夫同居？

(十五) 十月革命後，或當做妓女以前之時期中，是女工，是僱員，是學生？是否與父母同居，與朋友

或丈夫同居？是否失業？失業時間？是否在勞工介紹所登記？是否工會會員？屬於何工會？

(十六) 家庭情形：未婚，已婚，離婚，寡居，與丈夫同居，有否愛人，獨居？

(十七) 何時自立？

(十八) 現在依何而生？依在救濟院之收入？依其他救濟金？何人所給？

(十九) 曾經被處罰否？為何種罪過？

(二十) 在多大年齡時犯罪？在何處受罰？是否下獄？幾年幾月？自判罪到現在有幾年？年，月，星期，天？

遺傳關係

親族：死於老年，飲酒，肺癆，梅毒，精神病，其他原因。

(一) 父親

(二) 母親

(三)兄弟

(四)姊妹

(五)……

(六)……

幼年生活

(一)在七歲還遺尿否？

(二)七歲以上還遺尿否？

(三)是否夢中步行者？

(四)何時入學？

(五)在校成績如何？優、劣、中等？

(六)幼年時曾否親見性交？

(七)幼年時曾否見過妓女？

性生活

- (一)何時行經？
- (二)多少日來經一次？
- (三)行經甚多，甚少，中等行經時是否痛苦？
- (四)經期幾日？
- (五)何時起感覺性的衝動？
- (六)曾經手淫否？多少日一次？
- (七)何時開始第一次性交？與何人？丈夫，未婚夫，朋友，或偶然遇着的男子？
- (八)第一次性交是否發生激烈的衝動厭惡？
- (九)現時幾日性交一次？
- (十)性的衝動強力如何：增加或淡薄？
- (十一)對性行爲的態度：滿足，淡漠，或厭惡？
- (十二)在性行爲以前，是否飲用古加鹼 (cocaine)，酒，或其他刺激品？
- (十三)是否要供養愛人？

(十四) 是否有邪念：同性戀愛，色情狂等？

(十五) 曾否懷孕幾次？

(十六) 如何防止懷孕？

(十七) 如用過墮胎手術，幾次？

(十八) 有否小孩幾個？彼等於何處生長？

(十九) 愛自己的小孩否？

(二十) 是否希望有小孩？如不希望，為什麼？

(二十一) 是否愛一般的小孩？

(二十二) 愛引誘男人否？

(二十三) 第一次為娼為何時？那時多大的歲數？和誰？是愛人，僱主，或偶然遇着的朋友？他的社會

地位：工人，農人，僱員，兵士，學生，海軍？在何處？

(二十四) 因何淪為娼妓？不幸的愛，性的要求，受奸人所算，流入娼寮，受強迫，飢餓，失業，疾病，未婚

母性，困苦，壓迫？在何種情形之下：清醒，酒醉，受麻醉？

(二十五) 交媾的次數：每天，一個星期，一月？

(二十六) 與成年人，幼年人，老人？

(二十七) 對金錢戀愛的態度：是否以此種職業為可恥，或漠不關心，或只當作一種買賣而毫無感覺？

(二十八) 家中有何人曾為妓女母親，姊妹，或別的親戚？

(二十九) 每次收入多少？每月收入多少？

(三十) 為娼是否為主要收入，或副收入？

(三十一) 曾傳染花柳病與人否？幾次？知道否？

(三十二) 本身是否怕傳染？

與酒精麻醉劑之關係

(一) 是否飲酒？何時開始飲酒？

(二) 飲酒的次數：每次，間或，繼續？

(三) 曾醉過否？是否易醉？

(四) 醉後舉動如何：快樂，悲傷，無知覺，喧嘩，或睡覺？

(五) 是否誤用古加鹼？

(六) 是否抽煙？何時開始？

其他嗜好與興趣

(一) 是否愛穿漂亮衣服？

(二) 是否喜歡看戲看電影？

(三) 是否喜歡晚上有人陪伴？喜歡赴宴會？

(四) 喜歡閱書否？何種書籍？

(五) 喜歡吃糖否？

(六) 金錢大概消耗於那種東西上？

(七) 是否蓄儲或錢完全用去？

(八) 是否厭惡一般工作？是否厭惡現時在救濟院的工作？

(九) 是否易於厭倦現時的環境？是否需要時常的改變？

性氣

- (一) 平時的性情如何：憂愁，快樂，對每件事都淡漠？
- (二) 平時是否不憂慮，亦不想及將來。
- (三) 是否以生活為不易？憂慮本身的健康，物質的繁華，和家庭？
- (四) 戀愛何人否：親戚，朋友？
- (五) 性情是否易於改變？
- (六) 是否容易受環境的影響？失敗了，失望？成功了，快樂？
- (七) 是否有時無故發脾氣？易受恐懼與怨恨的侵襲？
- (八) 是否愛夢想？
- (九) 曾經自殺否？
- (十) 對於別人的困難是否同情？
- (十一) 對同伴的態度如何：仇恨，漠然？
- (十二) 曾經幫助人否？物質或精神的幫助？

花柳病和婦女病

- (一) 以前曾經傳染過梅毒，軟性下疳，淋病否？
- (二) 是否曾有婦人病症？

知識環境

- (一) 表現自己的能力態度如何？
- (二) 是否像腦筋遲鈍的人？

舉動

- (一) 是否矯揉造作，賣弄風情，裝模作樣？態度樸實，舉動笨拙或優美？

在救濟院中

- (一) 在救濟院住多久？
- (二) 在何工廠作工？
- (三) 對於工作，房屋，飲食是否滿意？
- (四) 對於救濟院有何不滿？有何必須改良者？

- (五) 能否依救濟院之收入而生活？假如不能，例外收入是什麼？
- (六) 將來希望過那種生活？

第九章 婦女的新領域

如果沒有婦女羣衆的幫助，我們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獨裁和建設的共產主義。因此，我們要設法接近她們，我們應該努力尋找接近的方法。

——列寧

政府當局和民衆有意地努力解決婦女問題的國家，在世界上只有一個蘇維埃聯邦國。婦女的解放，關係於婦女的本身。只有她們纔能與浮士德（Faust），一齊享受『與自由人立於自由地上』的最上的快樂。

——克拉拉·西特金

自列寧以下的新俄社會政治家，都責備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主義者對婦女問題的態度——將婦女問題與社會集合體（social complex）分開——是不能達到解決的目標的。他們以

爲解決一個問題是要去結束這個問題，全人類解放了婦女纔能得解放；整個社會問題解決了，婦女問題纔能解決。沒有使全人類處於政治，社會，經濟的平等，沒有社會革命，婦女真正的平等只是子虛烏有的事。經過社會革命的國家，纔能真正地解決婦女問題，因爲這種國家中纔有真正的解放，因此婦女問題就不成其爲一個特別的問題了。「我們無所謂婦女問題，」大家都這樣說。「不過在我們國內，有所謂婦女在國家行政中，在文學美術中等等問題，這種問題就是論及我們要如何利用由革命而產生的新力量。」我們現在要來細細認清這些事實的範圍和性質。

首先要聲明的，就是蘇聯婦女平等權利，並不只是一種口號，一種煽動的工具。在國家的一切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生活的範圍中，婦女無不參加努力工作的。已往十五年的社會革命，使婦女爲經濟的建設，爲城市和鄉村的文化革命，爲新生活等而鬪爭。歷史猛烈地前進，已經並且還繼續不斷地產生自「家庭奴隸」(Domestic Slavery)中解放婦女的新環境，使她們也成爲國家及鄉村文化生活的領袖，使她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與男子處於平等的地位。

當我們想到這種進步時，有兩點特別使我們注意，其意義的重大，不但在俄國史上，就是在世界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這兩點就是：俄國男子在婦女解放中的工作，及婦女對於這個解放

——也可說是自己解放——所給的報答。我前面已經提過，一般俄國知識界認婦女是他們的同志，朋友，伴侶，將她們的事認爲自己的事——卽在生活與文學中亦如此。但是我們尤其要記在心頭的，就是在創造新時代之共同努力中的婦女，有一種由於整個歷史發展之結果所儲藏的氣魄，精力，生機，喜歡創造的性質，因此，在鬪爭中，她們勝於她們的男同志，而俄國史亦因此成爲有聲有色的了。心理的和觀念的兩極端，自然不免起衝突，尤其發生於鄉村生活的，比其他處更多。「慣性律」(Law of inertia) 的強大的勢力仍然存在，並且還有許多偏見要克服的。但是這一切的阻礙與糾紛都漸漸減少，又因婦女以巨大的犧牲，以奮發的決心，以真誠的熱情從事於她們的新任務而挽回狂瀾不少。在婦女羣衆中，其投機取巧保守固執之事，較男子爲少。凡看見她們從事於革命賦與她們的工作的人，無不以爲在短期中她們有了空前的成就，無不以爲世界的確是「人類一手所創造的」，無不以爲世界的建設如沒有婦女的前進力是不可能的，無不以爲婦女以她們遠大的文化影響將要給這新世界以一種特色，並給與她以新希望。這種現象表現在克盧普斯卡亞所告訴我的明確的敘述中，她說俄國大多數的婦女回答別人問她們是否喜歡工作這個問題時，一致地說：「我們不願苟且偷生」我還親自從一位莫斯科的無產階級女公務員口中聽來一

句關於這方面最好的話，我願將這句話拿來作以下婦女建設蘇俄新生命的文章之開端語，這句話就是：『我們心熱如火！』(We are on fire)！

一 婦女在國家與政治中的新領域

假如我們要知道蘇俄婦女參加國家行政的真相，那末首先要知道那些有天才的婦女已經佔有國家最高的地位，要知道已往的廚婦現在也可以治理國家，實際上也確有這種事。不過更大而又的確無疑義的重要事實，就是在蘇維埃聯邦中，對於使婦女參加政治生活和引起她們對於國事發生興趣的努力，是同對男子一樣。根據社會主義的理想，國家是要漸漸消滅於社會中的，蘇俄國家就是爲這個理想而建立的；牠就好像一個金字塔，牠的塔基就是男女勞動公民。

婦女實際參加行政和政治的最下層的基礎，就是自一九一九年成立的代表會議。婦女代表現在已達百萬以上，她們是由工廠女工和農婦選舉出來的，凡五至二十五個女工，五十以下個農婦都可選出一位代表。

這些代表的活動，普遍於公共生活的各方面，簡單地說，是大半屬於教育方面的工作，是走上

社會工作之路上的。例如因為她們的努力，所以蘇聯國家對於婦嬰的一切設備，能够聲震遐邇，並且人人都能利用這些設備。在鄉村中，她們設立兒童公育所，減少嬰兒死亡率，並改進市鎮與鄉村中的衛生情形。她們與各種特設機關——尤其是指導所——合作，並關心她們選民的福利和困難，不時在公共會議中向他們報告一切。她們的活動同時也有偉大的文化和經濟的意義：她們設置學課，設立讀書會，以鏟除實際的和政治的文盲，減少酗酒者，克服習俗相沿的一切偏見——宗教的信仰也算在這些偏見之中——，並引起婦女對社會工作的熱心，因此以達到新生活之路。在蘇俄的東部，這些婦女在有歷史意義之少數民族中努力工作。

在所有的工業區內，這些女代表以合理化，競賽，及激烈的自我批評，來鼓勵生產增加；同時在鄉村中，她們着手設立新公社（*commune*），採用牧畜和耕種的改良方法，儲藏五穀，送「紅色寄售物」（*red consignment*）至莫斯科，並努力收穫規定的數量，一言以蔽之，是要完成五年計劃。但是所有這些緊張的文化和經濟活動，除了實用的目的以外，還用以訓練代表和選民的政治知識的。這些工廠和鄉村中的代表，是勞工婦女與共產黨二者之間的連繫物，她們使共產黨的標語深入民間。因為統一這些工作起見，婦女代表有她們自己的雜誌「德賴各特卡」（*Delogatka*），

並且還舉行婦女國民大會。差不多所有無產階級出身的婦女，只要是負有國家行政的責任的都經過這種代表大會的訓練，她們由此得着政治知識；到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之路，必須經過這種會議。一九三一年二月的農民婦女雜誌「克瑞斯特揚卡」（Krestyanka）收到一封敘述一個農民代表的事業的信，此信就可代表雜誌的主筆所收到無數同樣性質的信：

我可以說，我這一生是求知識和求適應社會工作的苦鬪。我十八歲時結婚，就成爲一個懼神的家庭中之一分子。我一生都在不幸之中。只看見老年人的賭博，並屈服於我丈夫和公婆的意志，他們強迫我過他們一樣的生活——這就是我結婚的經歷。

我丈夫雖然是村蘇維埃的主席，但是他從來不求我的幫助，因此我仍舊還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婦人，除了家務，照料家畜，洗濯，看管小孩之外，什麼事都不知道。我丈夫以我的無知識爲可恥，既不帶我去赴會，也不使我加入討論會；他甚至不許我去赴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會。他反而還說：「你去不去都沒有關係。你是太懶太蠢了。你只能照管牛。」

我只有哭泣。不久我們的區中開辦了十二戶農家的集體農場。我們首先加入。在集體農場，

中設立了一個讀書處，因此我讀了許多書，並且知道了社會活動。

不久我被選為政治學校的女代表，並讀書室的委員。於是我明白了許多事，漸漸與黨接近。我向黨中上了一個請求書，並不斷地作社會活動。因此，村中人慢慢地都來請教我，從我這兒打聽消息，全村的人對我都與前不同了。在不久以前，他們還取笑我，現在對我也尊敬起來了。我在兩個月之前已經成為預備黨員了。

在蘇維埃聯邦國中，無數的婦女——大半為農村婦女——許多年來都在和她們的丈夫作苦鬥，這種苦鬥一直到現在還未結束，並且還犧牲了許多性命。

在已往的會議中，有許多時間都是討論這個問題，各方面都有訴苦，因為農夫根本不承認「裙帶政治」(petticoat authority)。辯論的話總是那一套：「婦人來管理我們，簡直不成話。」「我們無論如何不願服從一個婦人。」或者：「假如丈夫給婦人一頓好打，她一定不會如此下去的。」新農婦詩人奈維羅夫(Nyevyevov)的小說『布爾雪維克的馬利亞』(Marya the Bolshevik)中，一個丈夫對他的妻子馬利亞說：「假如你時常跑去開會，我會給你一頓好鞭打；丈夫

以爲「自從「布爾雪維克」黨帶來了自由主義，並且使她起了各種的疑惑後，與她同居的生活簡直是不能忍受。她在會中演講。她不再要小孩。她甚至敢說：「我的小孩已經够了。」這是做丈夫的羞恥。」

在文學中和實際生活中，其結果有滑稽的情形，也有悲慘的情形。例如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次蘇維埃大會中，當討論婦女亦應包括在蘇維埃會中這個提案時，大家聽見一個憤怒的農夫的聲音，因爲不能彈壓他，只好讓他發言。一個堅強而並不青年的農夫，急速走過會廳，跳上臺，用他的拳頭打着桌子說：「我不能讓我的妻子加入蘇維埃會。我有八個小孩。她加入蘇維埃作什麼？」

臺上的人想要使這位代表鎮靜些，但是沒有用。並且一部分的人還在稱讚他，他要求將不許婦女加入蘇維埃這一條列入議決案中。

一九二七年第十三次蘇維埃大會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一部分代表在討論一位村蘇維埃主席的農婦加入 W. T. S. I. K. 的問題時，正巧這位農婦的丈夫也在會中，他起而責備那些女代表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和我的女人離婚。」別人很驚奇地問他因爲什麼緣故，他回答說：

「我又有什麼別的法呢？假如她也是政府之一員，在必須的時候，我如何能「教訓我的妻子呢？」

有一位女代表提議將此人的反對案提出來公開討論，他又憤怒地說：「你要使我成衆矢之的嗎？我如何能反對選舉婦女到 *В. Ч. С. Ч. Ч.* 中去呢？雖然我是做社會工作的，但是人們會立刻就罵我是自私的保守者。那末在村蘇維埃中，我簡直沒有臉見人了。」

這兩個例子是非常有意義，因為牠們表示農人腦筋的變遷。在一九二一年那個農夫毫無顧忌地在公共會議中反對婦女之加入蘇維埃，六年以後的農夫——雖然他不肯放棄他「教訓妻子」的權利——雖然他覺得是一種恥辱，但他想如果他反對婦女加入政治的地位，恐怕人們一定要罵他是自私的保守者。他不敢公然的反對。

不只這一個例子，在最後一次的蘇維埃大會中，有一位女代表述說在鄉村中那些男子起初如何地取笑她「你的卑賤的僕人，裙帶委員！近來好吧，小杜納？我想不久就會有一紙命令，叫女人和男人彼此以轉流方法生孩子吧？」現在大家對她都很滿意，很恭敬地稱呼她的姓名，生活過得很規則。在城市裏，男子對婦女的態度比較好些。不過同樣也有衝突，關於這一點值得提到的事，

就是有相當教育影響的電影片子，督促男子不要妨礙他們妻子的社會政治活動。有一張說到一個囂張的丈夫的片子——片名叫『提起訴訟』(The Trial Must Proceed)，判決辭是：『現在是輪到無產階級的輿論說話』——當一九三一年秋我在斯達林格拉德(Stalingrad)時，每天映演，場場擁擠。當時我又聽人念一首風行的俄國婦女致丈夫的四行詩：

你的喜怒，我不在乎，

你的妻子並不糊塗，

你有本領。敢來打我，

你的妻子將來是代表。

農村的人已往以一種疑懼的眼光來對待女代表，所以她們起初時常忍受不良的待遇。她們活動的成績，由婦女之參加蘇維埃選舉的政治活動的增加，就可表現出來。一九二九年，蘇俄城市的婦女加入選舉的，還不到一半，一九三一年就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甚至在一九二九年，那些沒有職業的「無產階級的主婦」(Proletarian housewife)，有百分之五六·五投票的。尤其驚人的就是鄉村婦女加入選舉者之激增，在最後四年差不多增加一倍。

同時，蘇俄的婦女利用被動和自動的選舉權者，漸漸加多。在行政和統治中的婦女的數目和勢力，一年一年地增漲，雖然男子——尤其是鄉村中的男子——於這件事上的反對的確還未完全克服，現在鄉村蘇維埃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的婦女，在城市蘇維埃中有四分之一的婦女。在鄉村蘇維埃或其執行委員會中，也有不少婦女佔着領導的地位。現在蘇聯城市和鄉村蘇維埃的主席中，有五千人個婦女，而婦女在各部分工作的約計有五十萬以上。在第十五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中，女代表差不多佔四分之一（百分之二三·二）。

黨內已有無數婦女，在政府機關中，自然也有許多婦女佔着重要的地位。一九三一年，D. S. S. R. 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八十九位婦女，P. S. F. S. R. 中有一百三十七位婦女。在國家的任何機關中，你都能看見婦女居於重要的地位，同時在有的人民委員會的各種委員會中，也有工人與農民婦女作委員的。不過實在說起來，婦女佔重要地位者的數目還是不多，所以完成婦女參加政治統治的最後一步還在繼續努力：一直到如今還沒有全國婦女委員會。

在執行和司法，以及統治和行政機關中，婦女所作的事是聲名顯著的。雖然在軍隊中並沒有婦女，內戰中的赤色婦女軍也已成了歷史上的事，但是在國防預備中，她們還是派定有重要的任

務。在軍事學校中，正在訓練未來的紅軍女司令，在陸軍參謀部，還有好幾位女參謀。

在一九二七年所設立的阿索非克姆社（Осоавкхим 卽航空毒瓦斯禦防社）中，大部分的薪資僱員都是婦女。此社的目的，包括國防之準備，以及在工廠與集體化農場中對人民作現代武器與防敵戰術之指導。結果婦女在此社中形成一個特別部分，在工人和農人中做宣傳工作。她們也能加入後衛隊，或者受戰爭上的其他訓練，例如戰地電報，戰地電話等，尤其是戰地與後防醫院的工作。婦女民團之成立，差不多與革命同時代。

最後我們不要忘記婦女在蘇俄司法行政中之合作。新俄的人民法庭，沒有一個是沒有婦女的。簡直可以說整個的司法制度都有一種溫柔的，和開化的母道之風氣。積數年的經驗，證明將來在司法界更可以使婦女合作這種希望是正當的。

我在莫斯科人民法庭所費時間很多，尤其是注意於普羅列塔爾斯基·勒楊（Proletarskiy Rayon），彼處特別布滿一種由工業工人的精神所引起的健全的氣象，不比別處的充滿一些被社會斥責者（déclassés）的法庭完全相反。特羅卡法院（The Court Troika）有一個由陪審官升上來的法官和兩個陪審官；三個都是工人，普通都是兩個女人一個男人；我很奇怪，這兩個婦人

之中時常有一個以純人道的精神對被告人提出一種建議，並且時常達到了目的，我不僅一次看見這種事。女法官們的教育影響的確時常超過她們實際的責任範圍。有一次我去參觀審案，被告在那一天早晨出庭時稍為有些醉意；他是麵包鋪的一個助手，暗地裏賣了一塊麵包與他的親戚而未收錢。那位女法官對他，就好像很溫和地勸戒一個小孩：「你今天喝酒了吧？」只喝了一點。」「到底是多少呀？」「法官同志，老實說，只喝了半杯。」「怎麼啦，你在出庭之前如何要喝酒呢？我不應該聽你所招供的話。假如我聽了，我應該受徒刑。這就是說我現在審案而不聽你的口供。坐下，不要說一句話。你對於蘇維埃的勢力和人民法庭如何地缺少尊敬啊！這簡直是極端的侮辱！」在聽衆中——時常是一些家主婆和其他無關的人在那兒聽審案子——可以聽見竊笑的聲音；這個人低頭坐下，自己覺得很慚愧。審判就此開始。

莫斯科以及全國的訴訟案子，大多數是住房的糾紛。不過贍養費的案子也不在少數，我前面已經說過，有許多男人時常要想躲避，他們作父親的責任不願供養他們的小孩，雖然這種嘗試是不會成功的。

對於做父親的恐怖，在某一個時期是非常地大，有的鄉村中的青年，甚至與女子繞道而行，人

們說：「假如你遇着女子，你就得付出贍養費。」在蘇俄男子中，有一種滑稽的傾向可以解釋——有些言過其實——付贍養費的嚴重，其事如下：有兩個朋友相遇：「你的近況如何？」「壞透了！」「因為什麼？」「因為我必須將我薪水的三分之一付去供養一個小孩。」「但是你還有三分之二的薪水呀。」「一點也沒有了；我還有兩個小孩，每個小孩需要三分之一。」「那末你依何為生呢？」「我的妻子和另一個男人有了一個小孩，我就依此孩子的三分之一的贍養費而生。」自然這些女法官對她們的男性同胞的逃避責任，是一些也不會寬恕的——無論如何，蘇俄法律對他們是很嚴厲的。有一次，使得旁聽的婦女都很高興，而又給男性聽衆以一種教訓：一位青年的女法官審問一位父親，他藉口有了允許證要去養病，並且要與一位失業婦女結婚，想要求法官減少他對小孩的贍養費，這位青年法官問了以下拙笨的問題：「你以為十五個盧布就可供養一個小孩嗎？」（他原來付三十個盧布。）「你自己要去修養，並且要合一位失業婦人結婚，而以為這一點錢可以够你的小孩用，這是一個蘇維埃父親所應為的嗎？」判決自然不許減少贍養費。

我在莫斯科法庭看見很有趣的一件事：有一件案子正在進行，一個婦人想將他丈夫驅逐出家，一方因為他時常飲酒，借酒發瘋並且打她，一方又因他不付小孩的贍養費；這個男子的案件本

來就是無勝利的希望的，但是又不幸這一次整個法庭都是女人。這個丈夫已經毫無憂慮地走上法庭，看見這種情形大為驚恐，跳起來說：『都是些女人，那末我就不用打官司了！』他提起腳來就跑了。

有一位莫斯科二十九歲的女法官，當我在她樸實的家中用茶點的時候，告訴我她自己的歷史和她幾年在法院的經驗，也很有趣：她叫耶米爾楊諾娃（Yemelyanova），是一個優美的婦人，我對於她審判案件的客觀態度和審察事理的道德精神，充滿了真正的欽佩。她是一個裁縫的女兒，生在尼西尼·諾夫哥羅德省（Government of Nishnyi Novgorod）的一個小市鎮中，她家中那時已有十六個小孩，有九個活着的。在十二歲時，她當一個看小孩的小保姆，自十四歲至十六歲，她在一個鋸木廠裏，自一九一八年她加入了黨。她的父母是獨立宗派的信徒，有一天她父親看見她和一個男共產青年在一起，他很殘忍地鞭打了她一次，以至她臥牀一星期。

耶米爾楊諾娃離了故鄉之後——正當內戰之時——她到西比利亞加入了軍隊，因為她遇事很敏捷，所以被派為剿匪部隊的指揮官。那時她只十九歲。但是她已經有二百五十名兵士在她指揮之下，這些男子中——她加重這件事——沒有一人因為她是婦人而給她些微的侮辱，『一



Women Judges Hearing A Case in Moscow

莫漢女法官受審案件

個婦人對於軍隊也許有分化的影響，不過她也可以有整個的有利的效力。我心中充滿了熱誠與主張……』

她胸部受了傷，不得不退出戰場。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她當婦女組織的指導者，同時又從事於寫作，在那幾年中，在『西比利亞的火』(Siberian Fire)上發表好幾篇短篇小說，這就是利提阿·塞弗里納(Lydia Seyfulina)第一次的文學著作所登載的刊物。一九二二年，她被派在列寧格拉德法律系短期科修學。一九二三年結婚——『一件大事』——暫時回到在短期中一切都改變了的故鄉。她已經成年的兄弟都成了共產黨員，小弟也入了共產青年團，最小的弟弟是一個先鋒隊員。她的父親已經脫離了教會，做了合作社的社員，因為他的小兒子忽略了他。在先鋒隊的責任而責罵他。他從前的朋友都羨慕他，人們時常說：『你是走入佳境了，你的兒女都是共產黨員。』

以後她在圖拉(Tula)作審問官。現在她已經作了三年莫斯科的人民法庭的法官了。我又認識了她的丈夫，也是一個共產黨員，現爲 G. P. U. (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的隊長，他雖然是一個良善精明的人，但是在他妻子作事六年之後，纔被派到這種重要的位置上去。

有了兩個小兒子和一個家庭——耶米爾楊諾娃結束她的自傳說——又要去做一個需要良心的職業，的確是不易。不過她的婆婆——她的五個兒子都是黨員——盡可能地在家庭中幫助她。

在短短的休息之後，耶米爾楊諾娃又繼續往下說，在她的職業中，她審判的案子大半是贍養費的訴訟，你簡直想不到有的男人以一種如何巧妙的方法去否認他自己的小孩。以前她曾在紡織區中服務，彼處的婦人多而男子少，因此發生許多悲劇——還時常有很懶惰的男人會得着一個健美的「花容月貌」的妻子。

「這樣，一個人漸漸長大成人，漸漸老去……」這個婦人就此結束了我終身不忘的一個晚上的談話；她沈默了。

除了人民法官之外，在蘇俄還有許多女法學家。其中有的婦女的工作完全是理論方面的，研究固定的課程；其他如審問官，檢察官等，必經過短期特別的訓練以適合她們的職業，就如耶米爾楊諾娃也是如此。

我要感謝一位檢察官——她是由人民司法委員會分派來此——因為她我纔能知道莫斯

科人民法庭，知道一些問題和案件，以及與此有關係的人，我對於凡此種種都感覺很有興趣，並且因此我能窺見蘇俄生活的背景。

讓我來說另一個婦人裘比納（Gudina），她要是在歐洲的話，別人看見她衣服與外表，還當她是一個窮苦的女僕或者其他的人，總不會想她是一個政府的官吏。當一九二九年開始允許工人參加政府工作時，許多有才幹的人都從下級升格到高級重要的地位——現在這種進步又鬆懈下來了——她被派至人民司法委員會中作事；她那時正二十三歲，歷來在印刷局作排字工人。她告訴我：『一如列寧所說關於廚子能治理國家的話，我所以也自勞工而升入政府。』起初她在一個指導者之下工作——純理論的工作。但是不久就實地練習了，現在她完全了解她工作部分，並且專心於她的職務，在短短的時間，我就完全相信她作事十分認真。

裘比納以前曾在紅椅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ed Chair）上過夜班，除了她的職業以外並且曾做過許多社會工作，因此她每晚不能睡過三個鐘頭，結果有了肺病。當我二年前在莫斯科和她相識的時候，她已和一個工人結婚了，自然她是沒有登記的。『因為登記實在無濟於事的。』她有一個一歲半的小孩，但是沒有住處；全家三人住在公婆家的一間過道中。因為她不能用一位

保姆，所以當她們夫婦出去作事時，總是她婆婆替她看管小孩。母親夜裏要起來餵小孩，所以父親白天得空就洗飯巾。如此她們二人分擔照顧小孩以及其他的工作。

我前面已經說過，婦女參加公共生活的問題，在蘇俄認為是吸收大多數婦女加入政治和行政中之羣衆問題。有些居於高位的婦女有很大的才幹，這是不足爲奇的，這種現象是由於蘇俄婦女的地位而生的，不過還是依據個人的能力。雖然如此，熟知蘇俄領袖婦女，對於我們不是沒有興趣的。我舉幾個例子以概其他。

拿地雪達·康斯坦丁諾夫納·克盧普斯卡亞(Nadyes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我們已經知道她是列寧生活與鬭爭的伴侶。雖然她已經六十二歲了，但她仍然是人民教育委員會代表委員，她是一位不疲倦的著作家，演說家，革命家。

列寧死後，人們討論替他立紀念物，克盧普斯卡亞發表她的意見如下：

同志們，勞工男女們，農作男女們，我請求你們：不要將你們對伊利支(Ilyich)的悲傷變而爲對他人格上的形式上的尊敬。不要替他立紀念碑，不要爲紀念他而建立巨大的宮殿，不要安

排大的紀念會——在他生前他就不注意這些，他以為這是些累贅。請想想我國內還是如何的貧窮與擾亂。假如你們願意尊敬伊利支，你們就設立托兒所，幼稚園，收容所，學校，圖書館，巡迴藥房，醫院，殘廢院等等——最要緊的，我們能使他的主義見諸實行。

全國無數的勞工，都尊敬拿地雪達·康斯坦丁諾夫。各處的勞工與農民婦女，為她們私人的困難而求教於她，為整個社會性質的公共困難而救助於她的更多。『我如何地希望到莫斯科再去拜望拿地雪達·康斯坦丁諾夫呀！』或者：『我們必須要告訴拿地雪達·康斯坦丁諾夫納這件事。這件事我們必須問她。』克盧普斯卡亞時常感覺痛苦，因為她實在不能完全回答所有寫給她的信，也不能完全應別人的請求而去到所有的會中演說，和寫許多文章。

但拿地雪達·康斯坦丁諾夫並不因此而『顯耀』或者『偉大』，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樸素的，大公無私的婦人，每人都見得着她，她時常在過一種秘密生活的艱苦時光。當你一走進人民教育委員會她的辦公室中時，就有一個稍微曲背的中等身材的，穿着舊布衣的婦人，自辦公桌邊站起來歡迎造訪者。她光滑的頭髮一直向後梳着，一雙爆眼——因病所致——放射着仁慈智慧

之光，迫得你們自己的眼光下垂，立刻覺得受了感觸並且覺得羞愧。

她會告訴你關於她的工作，關於那些稱她爲「媽媽」的托兒所的小孩，關於那些認她爲國民之母親，國民之領袖的成年人，她所說的每件事都是那樣的熱誠，那樣的有精神，假如你不知道她的時間是如何寶貴的話，你會久聽不倦的……」

當你離開那間充滿人類同情的屋子時，你會沈入感謝與默思之心情中。

我認識在莫斯科的 V. T. S. I. M.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婦女部部长斯密多維支 (Smidovich)；她有一個俄國人特有的頭，有美麗，智慧，光輝的母性的仁慈。她在蘇俄也受一般人的尊敬，是與克盧普斯卡亞差不多的人物，她們二人同居於「克累姆林」並且是很接近的朋友；像她們這種所謂「列寧衛隊」的俄國革命婦女是漸漸看不見了。和她們一樣的人物還有雅科夫利娃 (Yakovleva)，她是蘇聯人民財政委員會的委員。她告訴我，在她那一部工作的婦女，差不多都遠勝於男子。這種話的意思並非如時常所說的「婦女攻擊男子」。

尼麗納 (Nyurina) 給我的印象是溫柔與能幹，和有意義的果決；她以前是共和國的檢察官的助手，現在是人民司法委員會以及訓練執行部的主腦機關的唯一女委員——另外有七個男

人與其他這種婦女一樣，她也是一個可敬的著作家與演說家。以前得空時她常加入勞工婦女中，現在還時常以此爲題材來寫作。她是來自知識階級婦女之一——此外還有摩羅娃（Морова），羅斯密羅維支（Росшилович）等人——除了久駐外國的女公使柯倫泰不算外，她們以前都住在外國，並在外國工作，所以多少有些西歐的觀念，雖然那已是落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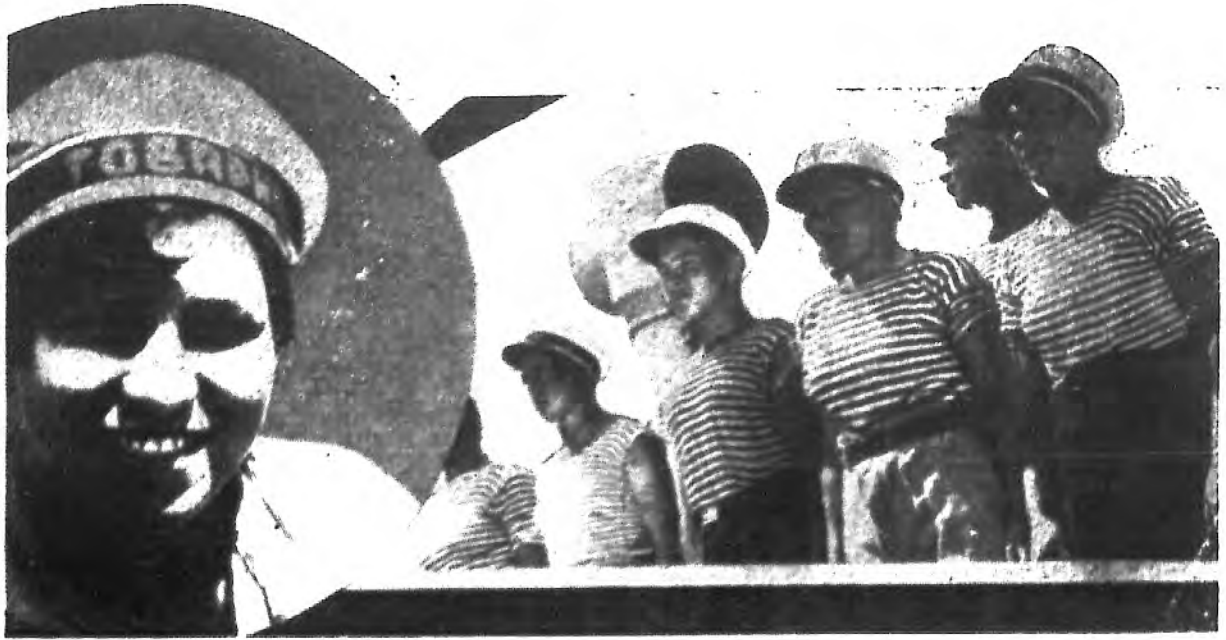
那些在政治佔重要地位而原來是無產階級的婦女，自然又是一種樣子。她們差不多與共產青年團的青年人一樣：她們生在一個新時代。即使其中有歲數稍大一些的，也不知道已往的事，因爲她們自革命以後纔覺悟到實際生活；國外的事情她們一些不知道，她們沒有傳統思想，沒有比較，沒有矛盾，沒有過度時期的文化，她們爲國家的現在與將來而建設，不知道什麼阻礙，認得清她們的目標，並且有很強的責任心。她們是蘇俄的新的，有階級意識的，不搖動的無產階級婦女，她們的外形與性質雖然沒有完全轉變，但是在主要性質上總算差不多完善的了。

我現在提到在列寧格拉德的這種新婦女中之兩位最好的，最引人注意的代表。一位就是波格達諾夫，她是列寧格拉德區的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她的出身是一位被丈夫所遺棄的洗衣婦的女兒。在她開始與我談話時，她順便說：「幸而我母親教我讀書寫字，」當十歲時，她在異鄉普斯科

夫一個不認識的人家中作婢女，自普斯科夫又到列寧格拉德來入煙草工廠，在彼工作了好幾年。她於一九一九年入黨，做了許多工作；一九二四年作一個紡織工廠的代理經理，四年後自己就作了「赤色經理」(Red Manager)。自這個「紅燈塔」工廠又轉到列寧格拉德的蘇維埃，由是——時年三十五歲——而被委任現職。

在她清潔整齊的辦公桌前，我與她對坐着，辦公桌旁又有一個小桌子，上面有三架電話機，三個鈴不斷地一齊響。牆上掛着列寧的像片，屋子看起來很可喜。波格達諾夫告訴我說：「自然我現在知道許多東西，如政治經濟，政治地理。」她看着我，像一個小孩那樣笑，接着又說：「不過我最喜歡研究德文。」

接着她告訴我關於她的工作，關於她在列寧格拉德工廠婦女中的活動，關於赤色經理的訓練，關於新「廚房工廠」關於鄉村中那些「有學問」的看護女，及其他別的事。我敬聽着她沈靜地，斷然地談着，她有一種可愛而沈着的聲音。我看着她；她全身衣黑，自然沒有帶一點裝飾品，但是看起來很和藹，溫柔，並且有美麗的手和保護得很好的指甲。在我正要起身告辭的時候，電話鈴響了——這次只有一個。波格達諾夫以一種更溫和，更熱誠的聲音說：「最親友的，是你嗎？」她轉向



Women in The Soviet Navy
蘇維埃海軍中之婦女



Militia Women of The Moscow Street
莫斯科街頭之婦女民軍

我說：『這是沙波施尼科娃（Shaposhnikova），她等着你呢。』我向她告辭走的時候，我覺得她是我在莫斯科遇着的『維地維新卡』（Vydvishenka 意即無產階級而居高位的婦女）的另一種婦人。

當我看見沙波施尼科娃，我更其驚異。她出身於平民，現爲列寧區工會參事會（Trades Co. Meeting）書記——蘇聯中只有一位婦女佔着這種地位——並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也只有一位婦女。她是怎樣一種人呢？她像什麼呢？

我先很簡單地說說她的生平：她現年三十六歲，革命以前她是紡織工廠的女工，並且目不識丁。一九一七年入黨，曾參加內戰。自一九二二年來就擔任重要職務。一九二五年完成她勞工學院的課程，並研究政治經濟。這位很好看的婦女所坐的桌上，也有三架電話機。她也是很聰明，很客觀的，能夠很快把握住每件事，正巧我遇着她召集了十五個男子在開會；她能夠完全左右那個環境，並且與他們討論緊急重要的問題；他們都是彼此你我相稱。

會散之後，她轉身來和我談話，我已經聽見整個會中的討論，她說：『你看我雖然有北方人的好的面色，是一個 *ssyeveryanka*，但我是熱血的人。我們現在都是年青的，熱血的，因爲在我們之

中，一切事都是新鮮的，你必須能很快地把握事件，並且要適應環境，而又要時常活動。」

接着又告訴我她直到二十七歲纔開始讀書，在勞工學院得有一個獎學金，她即以此爲生。她又熱誠地告訴我她的工作，告訴我急速進展的無產階級的自我評判，末了以同樣的聲音說：「我們都心熱如焚。彼此時常在如磁相吸的狀態中；我們並未注意民主主義如何地在我們之中發生，以及牠本身如何地以一種創造力而建立起來了。」

「我們文化上有進展否？」在暫時休息之後，接着問她自己。「我時常想到這個問題，並且問我自己對於這件事如何。在不久以前，我找着一張我從前的像片：一個穿着絲絨衣服的婦人，帶着珠子的項鍊，燙着頭髮——一個普通的玩偶。我每次看見這張像片時就不禁慚愧。我從前在街上走時，看見鐵欄杆時，就知道那是鐵欄杆而已。但是現在我只道那是來自拉斯特來里（Rastrelli）的。我從前到戲院去，只知看戲情如何。但是我現在注意到藝術的方式，我知道誰是培托文（Beethoven）和弗提（Verdi）——由此你可看出來我們文化上的進步如何了。」

沙波施尼科娃的辦公時間，與其他蘇聯佔重要地位的男女一樣，的確是沒有限制的。她早晨九點起有時要工作到深夜一時，所以她時常許多天見不着她丈夫的面，他也是一位重要人員。她

沒有小孩，她說也許因此工作得更好些。但是她有一個嗜好：就是體育，每天早晨到辦公室之前，她總是很熱心地去練習；因她是體育文化社的主席，所以作提倡體育的宣傳。

我以後知道，有一時列寧格拉德的婦女比其他城市的婦女進步更其激烈，這也許是因為此處的無產階級在俄國是有最長久的革命的歷史，並且是他們打下革命的基礎。但是我注意此處的高級女公務員和一般女工，比較地溫柔，並且很注意她們的外貌；這也許是因為十八世紀時列寧格拉德是皇都，完全由外國建築家建造的，牠是比較的漂亮，有秩序，歐化；而懶散的小母親莫斯科 (Sprawling Little Mother Moscow)，在早年就是如海綿那樣吸收各省的平民，所以在文化上不能與尼發河上的優美城市相比較。

但是列寧格拉德和莫斯科的婦女，以及其他大小城市的女領袖，無論她們是否還帶着頭巾——例如紡織區伊發諾佛發斯內孫斯克的蘇維埃副主席——她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她們私人的利害關係都次於主張。她們認自己不過是偉大理想的工具，她們根據一切輿論來作事，每個人都為全體負責，而全體也為每個人負責，在責任之巨大勢力之前，一切個人的野心都消弭於無形。堅決的意志，養成一種新無名之物，在蘇俄婦女中這種情形較之在男子中還顯著。

我有一次在莫斯科遇着一個婦人，她似乎是這個定則的例外，因為每一個人都竭力幫助我的工作，而她獨以厭惡的態度拒絕告訴我關於她的工作的一切。在人們回答了我所表示的疑惑後說：「我們並不是在西歐。當提到文化上的重要事件時，關於個人的一切都要拋開。」我後來聽說這位婦人是一個德國女共黨領袖的兒媳，她似乎沾染上西歐的習慣了。

不過像這種事，這些年來，在我所接近的蘇聯各式各樣的婦女中，也只遇着一次。

讓我再說一遍：蘇俄的婦女，在公共生活中，認她們自己只是服務社會的工具，並且已經證明她們自己值得在政治上解放，在這一方面，別國的婦女是望塵莫及的；她們之參加公共的生活，代表了一章新女性的歷史。

二 文化生活

「在一個文盲的國家，不能建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列寧的箴言，也就是現在蘇聯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工作的出發點。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俄國已達到她歷史的最近的現狀上了，但其文盲之多，為歐洲冠；十個人

中甚至沒有一個人能讀能寫的。對於這種專制主義，和這種愚昧無知之可恥的遺跡，必須要作一個生死的奮鬥，在這個奮鬥中，在被動方面與自動方面，大部分的重任都歸之於蘇俄婦女，現在這個奮鬥要得到最後的勝利了。在一九〇七年，甚至在城市婦女中，也有百分之十三的文盲，而現在的男女文盲的數目只有一千二百萬，除了三百萬之外，他們都是窮鄉僻巷的住民。在已往的四年中，有十五萬以上的男女學着去讀書寫字。在莫斯科區的一位婦女指導下的肅清文盲運動，在那時候是採取一種激進的性質，並且成功了：現在在城市中差不多沒有不識字的人，當一九三二年，不下於一百十萬的『文化戰士』(Soldiers of culture) 參加這種運動。

你每天都可聽見如何減少個人文盲的實例——時常由於婦女積極的合作，或由於她們的建議——和俄國成年婦女的初步教育的意義如何。在莫斯科勞工院 (Moscow Palace of Labour) 所舉行的會議中，有一個自烏拉省來的女工陳述說：『我居住在科脫夫卡 (Kotovka) 村，此村離礦地約六里，是一個荒涼鬱悶的地方，我們還沒有學校，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是目不識丁的。自然為我們派遣了一個教師來，不過她不久就走了。於是我們舉行會議，一致同意我們全體都必須讀書，並且必須有一個好教師。我將不識字的婦女的名單寫好；一共有七十人。我們要求有一

位新教師，現在我們都在念書了，我們以前一些也不知道什麼是剷除文盲。」另一個六十二歲的農婦陳述說：「不要以為我是太老了。的確我已過六十二歲，不過我生活於沙皇時代的五十年不能計算在內，因為我那時既不會讀書，又不會寫字。但是我現在甚至能替報紙寫文章了。」因此有許多以前是目不識丁的，現在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其中有的成爲醫生，農地經濟學家，和工程師。俄國民衆的求知熱是無與比擬的。整個的人民，都被貪求知識的慾望所佔領，一般人時常將俄國比作一個巨大的學校，並不是無因的——自然是世界上校舍之最大者。不論你往什麼地方看——在鐵路上，汽車上，火車站上，公共食堂和茶館中，或者在樹蔭與公園的坐椅上，人們只要有半點鐘的空閒，其他在俱樂部 and 紅角中還不計在內——你可以發現有人（女多於男）在研究書籍，或者拼字。好像他們在世一輩子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求學問，只是學着讀書與寫字。

在這個巨大的教育制度中，婦女時常是最好的學生。她們差不多都是最前進的，佔據了講演堂和課室，證明了她們比男子學得更多些，並且一齊都受了求知熱的影響。「我們無論大小都讀書。沒有知識的青年是要從工作中淘汰出來的，我們強迫他們讀書。」這是一個來自礦區的婦人在莫斯科舉行的會中所說的話。蘇俄的報紙，在不久以前登載了一件新聞：在諾夫格拉德省的一

個鄉村中，有一個家主婦與她的家庭助手訂了一個合同，說明每人每天應以一點半鐘從事於求學。這種事並非不常見。

我在列寧格拉德見着一件事：九十個青年女工誠懇地要求工廠委員會，使她們早上作工，晚上她們纔可以去上班以求知識。在羅斯托夫（Rostov）的煙草工廠中，我又親眼看見一件事：一個二十五歲上下的女工，在文化宣傳組主任前涕哭，因為她聽說她所希望插入的一班已有人滿之患。「假如不許我進去，我情願死，我要是成了一個發明家，也許我於國家很有用處，」她一邊哭一邊抗議說。

列寧對於這一點的遺言充滿了生命與活力，牠能給你很深的印象：「我們第一應當求學，第二還是求學，第三還是求學——但是必須注意，不要讓求學二字成爲死字，或者成爲時髦的口頭語，必須使牠成爲我們的骨與肉，真真地使牠變爲我們新生活的基本部分。」現在，列寧死而有知，對於他的學生們必定含笑九泉。民衆強迫教育已經施行，國家的整個生命都寄託在求學的熱誠上。在大學中專門學校和勞工學院中的學生，只一九三二年就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假如我們將初等學校，七年和九年的附屬學校——這種學校的學生漸漸減少，將來文盲消盡，則這種學

校也隨之而取消——都算在內，則民衆教育的組織中包含五千七百萬熱心的學生，假如我們將工廠學校也算在內，一共就有學生五千九百萬。

至於婦女的部分，她們入專門學校和工廠學校的百分率，有很大的增加。婦女加入羣衆而進工廠，因此，女子入工廠和勞工學校的數目，自一九二七的百分之二八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在大學和勞工學院也是一樣的情形：一九三〇年只有百分之二七·六的女生，第二年就有百分之四〇·九了。醫學校有百分之七五女生，師範學校有百分之五一，大學的其他學院有百分之三九·三。勞工學院有百分之一八·一女生，初等與中等學校的教師中，有百分之六七的女子。

自然學生的數目和研究學問者的數目，相差遠甚。除了包含在完全免費的教育制度中之成人與兒童外，我們還要計算附屬於黨的教育中之各種班次，各種工人課程，爲赤色領袖和工廠經理所設的特別班，還有那些爲自修的人設立的函授學校。根據一九三二年的計算，在這一年末蘇聯從事於學問者有八千萬人，平均每二人中即有一個受教育者，國家所規定的教育費，與前一年的四、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相較，增加到五、八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報名入各種班次的人數是如此其踴躍——婦女佔多數——以致每佈告一出，一兩點鐘之內，即告人滿。

前面所提的函授學校，是蘇俄特有的學制。包含一切科目，大半都是技術的，設總校於莫斯科。全國各處報名入校的學生——大半是婦女——領取他們的書籍和其他必須品，一切都是免費的；然後將他們所作的功課寄到指定的地方去，改正分類之後，與新功課一齊再寄回與學生。函授學校，包含自初級學校到大學的課程。不過在別方面，研究學問與實際生活之間，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所以然者，一方因為工廠研究的制度——凡未來的水力機器工程師，未來的化學家，都與其他人一樣地每天做實際工作——一方是因為很普遍的「保證人」(sponsorship)的制度：差不多每個工廠都是某學校或一個大學的 sponsor，反之，每個學校又是其他一個社團的 sponsor。俄國的學校制除了很大的益處外，自然還有其缺點。其中特著的就是偏於一方，並且有些模倣美國。例如各校雖皆列德文為必修科，但是我們還是覺得俄國的教育只以訓練技術人才為目的。不過不能就此批評，因為蘇維埃第一代的科學家，醫生，教授，土地經濟學者等等，還只是初產生的。婦女中很少這種人才，但是她們求知的熱誠足證她們的希望是漸漸增加。在三十五個為訓練這種人才的機關中，已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婦女（在工廠中有許多發明家，她們只是些女工，由於她們的自修和實際經驗而想出來一些小小改良，在完成生產過程與增加生產力方面不無小補）。

在研究工作中，婦女的人數也漸漸增加。

現時除了據有蘇聯人民之求知熱外，對於書籍和一切印刷物的感覺興趣，可以認為是讀書的熱狂，是讀書的傳染病。在出版數天之內，差不多在你還未得見之前，所有的書籍與小冊子（後者特別受人歡迎）已經就出了幾版了。假如你要在一個書鋪——書鋪之多，一時無比——中買書，你必須要在早晨去候着。消耗於引起讀書興趣的宣傳費非常之大。無論你到什麼地方，無論是站着坐着，在每一個地方，自每一個天花板到牆壁上，自橫在街上寫標語的布條上，你都可以觸目驚心地看見五顏六色的大字：『書籍會指導你如何取勝；』『在五年計劃之奮鬥中，書籍是萬能的武器；』『無知識則無共產主義；』及其他箴言。在每一個工廠中，在每一個公共辦事處，只要有十幾個人的地方，你就可以看見一個閱書處，一個『紅角』，一個讀書室，一個圖書館，萬無一失地你可以看見如下的題句：『沒有一個勞工男子或女子在圖書館之外！』假如那是附屬於一個工廠的——例如斯達林格拉德的『特拉克脫斯特羅耶』（Тракторострой）——則全國所有的報紙與雜誌都有。此外，全國佈滿了游行圖書室。此猶未足，最近共產青年團又為農村收集書籍一千萬——這也是很有意義的——其中差不多都有一個要求，請讀者將他們對於本書所談之工作

問題的意見，函告國家出版部，並註明年齡與職業。

全體民衆——特別是新近覺悟的婦女——對於印刷物的這種無與比擬的興趣，自然不是僅限於書籍，也包括一切報章雜誌。蘇維埃報章雜誌的擴充，由於婦女雜誌之激增即可想見，現在已經有了二十以上的婦女雜誌了。

蘇俄三個著名的婦女雜誌——*Rabotnitsa*（勞工婦女），*Krestyanka*（勞農婦女），*Delo-
zakatka*（婦女代表）——銷行皆甚廣，只*Rabotnitsa*就有二十五萬，牠們都每日自蘇聯各部接受許多通信。工廠婦女，農村婦女，婦女代表，家主婦，女傭人，及其他工作婦女，無論老少，無論鄉居或住在城市者，只要她們已往能勉強寫字或者是自革命以後纔費力學着寫的，都將她們的心腹傾諸這三個雜誌。在這些通信中，你可以發現許多新奇的東西，表示俄國新婦女的緊張的發展，她們內在的力量，她們出類拔萃的特性，和她們的創造力。近年來，俄國婦女，較之男子還要熱心於求知識。

甚至那些不能寫信的婦女也寫信：她們將意思背誦給那些會寫的人，雜誌上特別愛發表這種通信。因為在每一種雜誌或報紙上，都開有工農婦女通信欄，現在這種通信是很多了。

以這種方法，可以吸收羣衆參加每種合作事業，同時，他們又可借此發表意見。有時還給與回答與忠告。雜誌與新聞紙，一如蘇聯的整個構造，是一個集團的產物。

這些日漸增多的工農婦女通信者，時常將她們作的小詩，小故事，隨筆，和稗史寄去。這些簡陋的文藝作品也時常發表出來，假如可能的話，當事者還幫助及鼓勵這些新興女作家。

同志們，工人婦女通信者，讀者，將你們的詩寄到勞工婦女雜誌來。你們的詩時時將要被工人婦女通信者所讀到。那些詩文不能發表的作者，我們郵寄很詳細的解釋信給她們。你們有的詩將要在文學雜誌上發表。寄信時可不貼郵票。

因此，在俄國產生了一種新的民間詩歌；在一種技術化的，美國化的，物質化的環境中，參以寫實主義，速力，象徵，與未來的計劃，牠與俄國北方今日還未失傳的古代傳說相銜接。再者：這些相反的東西——詠五年計劃的史詩與舊式的詩歌——是如此的接近，以致在不久以前，一個已往而還生存的傑作忽然發現於莫斯科，發現於蘇維埃國家的中心。我的意思就是指那位俄國的說故



Marya Krivopolyenova

(Poetess and Reciter of Folk Epics)

馬麗亞·克利沃波賴諾娃

(女詩人與民間詩歌之背誦者)

事者兼女詩人自民間出現了，她就是祖母馬麗亞·克利沃波賴諾娃（*Marya Krivopol'yenova*）她本人的生活史，就像一篇神話故事。

一九一五年，她被發現於阿康哲爾（*Archangel*）的附近，那時她已七十有二了——是一個丐婦，她從這一村流行到那一村，一半背誦一半唱她的傳奇的妙詩給人們聽，以求一飽。在那俄國北方希奇神祕的地方，自然，風景，和人民的生活，都與美打成一片。在那兒，有一個時期好幾個星期分不出晝夜；在那兒，你可以看見在廣闊閃耀的河上高起的木教堂的神奇顏色的圓形屋頂，有時看起來就像菌，有時又好像纖細的樅樹；那兒有古代的森林，灰黑的，嚴肅的，在牠的寂靜之中，你要幻想到音樂中的神祕世界……。

在那些部分，俄國的人種是純粹的，自由的，從來就沒有農奴制度，他們對於言語以及一切美麗崇高東西的愛好，是非常的敏感與有活氣。

馬麗亞·克利沃波賴諾娃——是她故鄉自然的一部，是語言，是音樂，一位森林中的老婦人——在大戰之中被引到彼得格拉得，使她登臺歌唱，雖然她只有三個牙齒，但是她能以她的熱情與無上的藝術，把握住萬衆的人心，報紙上登載長篇大論的文章稱讚她。三個月之後，她就回轉了

家鄉，她的物質上的需要也解決了。

十月革命後，當一九二一年時，人民教育委員盧那卡爾斯基 (Lunacharsky) 招請祖母克利沃波賴諾娃到莫斯科去。她已經七十八歲了，但是她在莫斯科，列寧格拉德及其他城市登臺，在一種完全改變了的世界，與完全新的聽衆之前——在各種文學及研究團體之前，在學生團體之前，她勝利了。最後，退隱。

馬麗亞·克利沃波賴諾娃數年之前纔死——她是一個神奇人物，也只有俄國的處女地纔能生產這種人物，一個連繫兩個絕對不相容的世界的婦人。她所屬的種族，現在還生存於俄國，有一個叫亞賴阿馬斯卡·諾維科娃——瓦新左娃 (Alyomushka Novikova-Vashintsova) 繼續她的精神。亞賴阿馬斯卡·諾維科娃自述身世如下：

一八六〇年，我生於莫斯科省。母親是女地主的使女。父親是鐵匠。他自己讀書寫字，並且還要教我。但是因此母親責備父親說：他想些什麼呢；裝些天纔知道是些什麼在女孩的腦子裏，與魔鬼開玩笑。自開天闢地以來，就沒有女孩子讀書那一回事。因此我沒有讀成書。到十二歲時，我

就作一個紡織工人，一個上帝誠虔的奴隸，我自己生活的奴隸。二十歲時，我嫁一鄉人而成了我丈夫的奴隸。我生了十個小孩，養活了五個，我經歷一個不幸的生活：我丈夫不斷地詈罵，我則禱告。沙皇的戰爭，擄去我的兒子——有的去打仗去了，其餘的只有上帝知道在什麼地方。當五十三歲時，我離開了丈夫而去作一個畫工。

沙皇之戰，像一片可怕的黑暗的雲籠罩着我們。我已五十六歲。在基輔醫院侍候斑疹傷寒病人和傷兵。我不得不聽那些殘廢者的呻吟與咒罵，他們是如何地罵咒戰爭，咒罵上帝和沙皇，我是知道了：本來就沒有什麼上帝。當我六十歲時，我全心信仰了『布爾雪維克』。

一九二三年，我在莫斯科關稅處和搬運夫工作，被選為婦女組代表，參加工人集會。

那時，我對於我的年紀和半文盲情形不勝恐懼。但是蘇維埃政府大開方便之門，使我們得着光明與學識。於是我起始再獲得我的青春。我接着加入了婦女通訊團。我的半通不通的作品，有的發表於中央雜誌上。一九二四年之初，我得着養老金而退職了。

我現時是無職業了，我讀婦女代表雜誌，我回味其中的一張小畫片：一個勞工婦女在蘇維埃國家中也是被當作人看待，到要生產時，她臥在光線充足的婦科病房中。但是在從前，婦女在

這種時候是被認爲污穢的，就好像禽獸一樣看待。我想到此，淚珠不禁奪眶而出。因此我很希望寫些關於舊生活的東西。

但是如何地開始呢？如何地下筆呢？我簡直不知道如何去……。

因此我買了一枝鉛筆，敲我自己的腦袋，甚至流出一點眼淚，而我要寫的希望是變得更強了。如此經過很久的時間。但是終於寫了在這個題目之下我想說的話：『讀婦女代表雜誌的回憶。』

在這雜誌中，我的投稿成了最好的。在一張大紙上寫着：『舊式生活。』都是印的，題目改爲『辛酸的愁苦，婦女的愁苦。』

自此以後，我非常熱烈地想寫東西。我想我還應該多學些知識。我買了一本小文法書，並在圖書館登記，以便借書。於是，我開始在我的小屋中單獨地讀書：這樣，以後纔可以寫得更好些。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之中，除了在婦女雜誌上的短篇故事外，又由國家出版部印了我的幾本小書

自我開始寫作以來，我就打算寫一本關於婦女的巨作，自她們的初生一直到現代。紙鋪在

桌上，鉛筆拿在手中。我已往的鄉村與工廠生活，在我前面展開，就像一條長而狹的道路，一條經過了舊式生活之荆棘的網，而又充滿了一切的侮辱與打擊，充滿了婦女辛酸的眼淚與屈辱的路……。

我不耐煩而又堅毅地寫——或者說我學着寫是更確切些——『馬林卡之一生』(Zinka's Life) 這個故事。盡我的能力，我現在了解文學的智慧了，我第一本巨著於一九三〇年之末出版。

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八號國際婦女節那一天，我要滿七十三歲了。但是，我要感謝蘇維埃政府，現在我返老還童了，並且有共產青年團員那樣的精神。我的末年如何，還不可預期，因此我希望留下一『馬林卡之一生』的第三部分，以為建造光明的未來的青年之紀念品。

我的晚年是美麗光明的，即死亦瞑目，我的文學生活要感謝我的同志兼好友盧德米拉 (Ludmila) 女士的指教。我所以要寫這段話者，因為我希望證明沙皇時代對婦女的觀念之錯誤。假如一個婦人不論老少只要是下了決心，沒有什麼事業與困難她不能克服的。

當亞賴阿馬斯卡·諾維科娃的『馬林卡之一生』出版後，高爾基（M. Gorky）批評他「最幼的」同志說：「對於她是很困難的工作，不過在我們驚奇的蘇維埃的現實中，是一件非凡的事……我國有無數像諾維科娃——瓦新左娃那樣的婦人，給她們一個像她那樣的模範，也許可以鼓勵去開闢一條新路，一條到自由之路。」

但是諾維科娃的這本書，就像她其餘的作品一樣，不僅是「蘇維埃現實中的非凡的事件。」她的體裁是有色彩的，新奇的，有聲有色的；她的人物的繪形是栩栩如生，輪廓清晰；她的描寫使人如身歷其境；她所表現的思想是獨立有創造性的；我們欣賞那些不講究技術的小說時，好像是在讀古俄的史詩，山歌，民歌，神話，諺語，格言——總之，是一切天真的俄國民族的智慧，再加以無與比擬的表現藝術——的精華，這些都是永垂不朽的。我們自問：一種民族的語言是充滿了音調的變化的，時常是溫柔的，深入人心的，善於表現的，調和的，文雅而活潑的，同時宜於述事與抒情詩較宜於戲劇的，這種民族的行為如何呢？那種豐富的變化又從何而來呢？也許是因爲那個地方的民族處於歐亞之間，在地理上，種族上，歷史上，都蘊含着歐亞二洲一切巨大的寶藏，例如牠們的自然地勢與文化，他們人類的表率與藝術，以及他們的言語。

我們可以拿利提阿塞勿里納(Lydia Seyfullina)爲這種東西合璧的俄國文學的表記；在新俄的女作家中，她穩穩地佔第一把交椅。她生於一八八九年，父系方面遠祖是韃靼（在阿拉伯文字中 Seyf-ullah 的意思即 Sword of God 上帝之利劍）。幼年時代，她的做牧師而又熱烈愛好文學的俄國化的父親，使她接近俄國文字的豐富與美麗，同時她的母親，祖母，孃孃(nyayya)們，又使她熟知俄國的神話世界，雖然她們不識字，但是她們是與俄國民族與她們的故土是一致的。六歲時，她寫了一封信與沙利沙(Tsaritsa)，求她減輕她有病在身的父親的痛苦，並推恩及她

——她們姊妹與父親都分離失所——她的父親自此就夢想他的女兒有一天會成爲一個女作家。九歲時，這個小女孩子正式地開始寫小說，在俄基(Rubso-Kirgin)界之俄楞堡(Orenburg)省小鎮中的一個預備學校中，她第一次身經文學上的侮辱：學校教師不相信她交卷的文章是她自己作的。一九〇六年，畢業於中學而未預試，出校後曾做工作，有時作舞臺演員，有時作教師，革命以後，在西比利亞作圖書館員，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她的幾篇短篇故事，絡繹在本地報紙上發表，一九二二年，她的小說『四章』(Four Chapters)發表於『西比利亞之火』(Siberian Fire)上時，她的文學事業纔可以說是正式開端。一九二三年，在西比利亞，她小說的頭六本『腐敗了的肥料』

(Rotten Manure)『維林奈亞』(Virinyeya)『列寧之鄉村稗史』(The Peasant Legend of Lenin)『和平破壞者』(The Breakers of the Peace)出版了，其中有的已譯成我國文字。我已經引證過她最後而猶未出版的『逐流』(Drifting with the Current)中的精華。

塞勿里納所以與國內外的女作家不同者，所以使她像自然的一部分者何在呢？

對於這個問題，蘇俄文學批評家勿倫斯基 (Voronsky) 回答說：

從她文學活動的開始的時代，與她的文學的內容與特性趨向，兩方來說，塞勿里納可以說是革命後的作者。她的小說都是關於農村的，關於知識階級的，關於革命時期的小孩子們的。尤其是關於十月革命初期的情形，和十七八九年間的西比利亞與俄楞堡草原的情形……塞勿里納描寫的西比利亞是到家了。牠的冬季與暴風雨都使我們回想起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所描寫的農夫很像利阿桑 (Ryabaly) 和塔姆善夫 (Tambov) 的人。農村都是我們所熟知的：舊式的，拙劣的俄國，住着穿粗布衣，吃麵食與衣羊皮的俄國人……所描寫的，都是以十月革命勝利後，與內戰發生的農村與市鎮為題目。她自內面來描寫農村，那正是農村中貧富起了劇烈

的衝突的時候，是一切傳統事物被打倒的時候，春天的溶解作用開始了。冰不過剛破裂。河水剛開始流動，而牠的巨潮已經把各種東西掃蕩殆盡。

形成鄉村風味的農夫們——從前線歸來的兵士和他們的妻室——是鄉村，是土地，是田園，是他們的血肉的主腦；他們生於斯，死於斯。不過那時的農村已不是從前守舊的，半死的，受壓迫的，被牧師所蹂躪的農村了——從前的鄉下人，只要遠遠看見了鄉村警察，就脫帽行禮——而是新的，反抗的，因革命的激刺而變為熱狂的農村，這種農村勃興了，並且覺悟到牠自己偉大的力量。

善於描寫環境的塞勿里納既不描寫鄉村的純潔和儉樸，又不描寫西比利亞和俄楞堡的農夫，而描寫鄉村的貧窮。這就是她藝術中最重要的一部。她描寫的沙弗倫人（Shofrons）和阿塔孟人（Artamonns）不但生動，真實，和確切，而且以一種稀有的才能與無比的力量，使讀者得着很深的印象。他們確是屬於我們的，其中之一描寫得非常與他們相似。好像她自己是來自這種家庭的。我似乎覺得那種時候會來的——那種時候不久就會來到的——那時我們的農村真開始產生女作家與藝術家，她們起初並未入學校，而她們像塞勿里納一樣地能寫作，如同她

一樣地以一個簡樸的農村婦女，一個阿塔孟人的女兒的眼光，來深深觀察農村……」

塞勿里納作品中最好的，就是「維林奈亞」這本書在蘇俄受着熱烈的歡迎，後來又編為劇本，在國外——巴黎等處——各舞臺長期出演。維林奈亞這種俄國農村婦人，在已往俄國文學中是未見過的，她是新時代的，非凡的，不像舊式婦女那樣的被屏棄，那樣的忍耐，那樣的可憐。她的特性，就是她對於一個婦女經過最多而又受苦最甚的每件事加以反抗；她反抗呆板的家庭，反抗已往的兩性間的關係，尤其反對與舊式生活同時存在的虛偽。

維林奈亞生長在市鎮與鄉村之間，她能讀善寫，眼光非常地銳利，她並且了解統治階級之「可尊敬」的生活和他們的談話。她很難於尋出她應走的道路，不過她因「布爾雪維克」黨佩維爾(Pavel)而找着了正路，佩維爾是從前線返回故鄉的兵士。她和他共同經歷新的，不安定的生活，她分擔他的思想，她的情感，終於在掙扎找她的小孩的路途中——「就好像一個雌的狼找小狼一樣」——被白俄所害。

勿倫斯基又批評說：

維林奈亞這個人物，因為她的有生氣的力量，所以是新的，無匹的。偉大地構思出來的，而又
是迷人的。她靈魂中的本能生活之偉大有力的吶喊，將她表現為一個強的而又有反應的人物；
她是大膽的，剛愎的，固執的……坦白而至於粗暴，然而同時又是女性的，她必須戀愛，生孩子，工
作……維林奈亞這種新式的婦女，在俄國也只有我們這個時代纔能存在，她表示勞工人類
——尤其是鄉村婦女中之勞工——之巨大的進步……現在我們整個的知識階級理想中可
愛的女人，都是像托爾斯泰的那塔霞（Nataasha），或者圖該尼挨夫小說中的婦女，而在實際生
活中發現了像維林奈亞這種婦女。她們在我們這一代青年生活中，已經佔有地位了。

利提阿·塞勿里納的文體是非常地有色彩，簡括，含蓄甚深，純潔，生動，並且是不能翻譯的，是
從俄國文學和俄國人民的靈魂深處發生出來的，也只有從這方面來看她的文章纔能了解。和托
爾斯泰一樣——人們常常將她與托爾斯泰相比——她也愛俄國的鄉村與俄國生活，那兒有帶
着新鮮氣味的草，大地，馬廄；不過托爾斯泰的容忍與不抵抗主義，都是她完全沒有的，她恨一切虛

假的掩蓋 (figleaves)，她像自己所寫維林奈亞一樣，熱烈反抗一切淺薄的，守舊的，帶知識階級性的事。自純政治立場看來，在俄國，她是屬於那種從俗和隨波逐流的人。但是每個無偏見的觀察者都要認清，在她用藝術以反照時代趨勢的鏡頭中，她是比那些過分反對蘇俄外表的從俗者還有更多的真誠純潔的革命精神。那些人他們自己很難避免一種嫌疑：他們是那些因自私的動機而從俗的人中之最不良的分子。

美麗挨塔·山金陽 (Marietta Shagin'yan) 也是蘇俄的著名女詩家，她的文學事業開始於十月革命之前，她的作品是屬於這個時代與俄國的象徵派——如她的詩集『俄利安泰利亞』 (Orientalia) 及其他稗史、短篇故事、小說等。山金陽是哥德的研究者和崇拜者，她後來作了一本書叫『到淮馬的旅行』 (Journey to Weimar)，其中讚美人格之觀念。她繼續不斷地尋求她的道路，並且自革命以來她就走的一條新路；她晚年著作之一的『水力場』 (Hydraulic Power Station) 在蘇俄受了熱烈的歡迎，這是一本政治哲學小說，描寫深入整個俄國生活而徹底變化了的新舊之掙扎，書中的主角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但是他天生地不能給工人以指導，反之，在重新建造生活的過程中，他倒能自那些熱心的建造者得一些知識。這個主角與作者自己的生活歷程

相吻合；一如她自己所說，她要爲『自我的發現與自我的認識』而感謝『蘇俄的報紙與蘇俄的土地。』

當美麗埃塔·山金陽在新時代已經尋着她自己的道路，而每天去上馬克斯主義的課程，並且很愉快地描寫她自己所經驗的知識的返老還童之時，她的老同志阿格·福爾希 (Olga Folsch) (她著名的小說是『在石中』 (Clothed in Stone))，在現在的蘇俄，是有一點落伍了。

無產階級女作家安娜·卡拉瓦埃娃 (Anna Karavayeva) 是黨中的心和靈魂；在回答調查十月革命對於蘇俄作家的影響之問題時，她說：『十月革命對我本身的影響嗎？這還用多說嗎？假如沒有十月革命，我也不會成一個女作家了……』她的國內外聞名的小說『森林中之工場』 (The Factory in the Forest) 說到一個荒涼村中的懈怠工廠之復興，以及牠對這個鄉村社會情形之影響，並且說到城鎮與鄉村互相的影響。

『處於新舊之間』的，富於天才而又受人歡迎的女詩人未拉·英伯爾 (Vera Inber)，在一九一二年時，她只寫近代抒情詩，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她寫了許多幽默的散文，還有短篇小說，其中多半描寫俄國的新生活，將新生活很生動地，諧談地拿來放在抒情的敘述文中。英伯爾在她自

傳式的小說『在太陽中之地位』(The Place in the Sun)中，談到她從一個良善的中等階級的知識者，轉變成一個新時代的有知覺的合作者之心理的掙扎。當她有了機會從近處觀察到俄國羣衆的『知識的恐慌』時，她就打定了她的主張。她動人地描寫一個水手聽見她因為缺少木柴而以書代替的時候，阻止她『焚燒亞歷山大·浦什金，尼科萊·哥哥爾，和密開爾·勒蒙托夫』等人的書，因為牠們是『屬於人民的。』她又說到如何地有人向她建議，叫她逃到外國去，這位建議的人還辯駁說：『崩潰恰好在我們這一代來臨，這並不是我們的過失，終於我們要流血而死的。我不願作一個受傷者。』她回答說：『我寧願作一個受傷者，而不作一個膿疱。』像這同一的經歷，在外表上看來是無關宏旨，實則是很重要，牠們是使她『在太陽中』取得『地位。』

在現時的蘇俄，在戲院，影戲場，以及課室中，不但對於當時的社會文化等問題感覺很深的興趣，即一切戀愛，婚姻，家庭等問題，也熱烈普遍地討論，這時產生了一種直接的敘述文學，有時甚至是押韻的，彷彿有些像日記，不過稍為改變形式而範圍又較狹小。其目的在乎與時俱進，與『布爾雪維克的拍節』(Bolshhevik tempo)取一致的步驟，並且這種文學也只表現與此有關的問題。這些作家都被吸引入五年計劃中，分派到各種工廠去，做講故事者及詩人，歌頌勞工男女英雄，和

勞工挺進隊，競爭，農工業中之巨頭（Gigant）等；但是他們幾乎未完成所有對他們的希望。命令決不能代替靈感，這是很清楚的。因此，現在五年計劃完結之後，這種嘗試已經放棄了，詩人們還是歸回到出版界與新聞學那方去，這些詩人中也有幾個著名的婦女：如利赫脫（*W. Richter*），阿薩克（*W. Asarkh*）等人。

在此我們還要提到拉利薩·利斯納（*Larissa Reissner*），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她是編內戰史的史學家，她死於一九二八年，時年三十三歲，蘇俄青年尊她為聖人；她是蘇俄最著名女新聞學家之一，她之著名因為她兼革命家，偉人，婦女，新聞學家，詩人於一身。

在她的兩本文集序言中，卡爾拉笛克（*Karl Radok*）敘述如下：

當資產階級的俄國之死鐘敲打的時候，她只二十二歲。但是她不及親身看見革命第十週年的紀念，她曾在革命羣衆中勇敢地奮鬥過，她描寫革命戰爭，只有像她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戰士纔能描寫得如此其完美。

在拉利薩·利斯納的所有文章與書集中，所有文學遺著中，所談到的只有一個題目：十月

革命。

利斯納一八九五年生於盧布林 (Lublin)，她父親是此地農學院的教授。在她的脈絡中，參雜着她父親波羅地海人的血液和她母親波蘭人的血液；是嚴厲的法學家之舊日耳曼家庭的遺傳，混合着熱情波蘭人的烈火。

拉利薩·利斯納長於德法，因為她父親求學於德法，後又在德法作政治移民……她認識了培培爾 (Bebel) 和利布累克特 (Liebknecht)，她一直是很喜歡德國的。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她父母回至俄國聖彼得堡。

自二月革命始，拉利薩·利斯拉就在工人團體中活動。同時她幫助高爾基 (Gorky) 在『新生活』報中工作。十月革命之後，她從事於接收與整理博物院的藝術古物。

當撲滅反革命運動的鬪爭開始時，拉利薩·利斯納與黨合作，去到捷克斯拉夫前線。她在斯維亞施 (Sviyashsk) 工作，因為那時紅軍正在那兒與捷克戰爭，後來的佛爾加艦隊之變，她也參加的。

在戰役中，她以一種熱情的，手足的愛去愛那些水手，因為他們是單純，勇敢，而又有偉大的

仁慈，沒有一個人猜想得到她不但是前線上的同志，並且還是一個艦隊總司令的妻子呢，他的名字叫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是那時莫斯科海軍部的委員，她一九一八年與他結婚的。

一九二〇年，她去阿富汗，她丈夫在那兒作大使，她在東方專制皇帝的朝廷之下，過了二年的光陰。她熱誠地研究馬克斯的著作，研究大英帝國主義及印度鄰邦的解放鬪爭史，著『阿富汗』一書，她於是從俄國革命家一變而為國際革命的戰士。一九二三年回到蘇俄，至德累斯頓（Dresden）工作，正當暴動發生時她去至漢堡，著『在防寨上之漢堡』（Hamburg at the Barricades）及『煤，鐵，與世人』（Coal, Iron, and Living men）二書，自此以後，拉利薩·利斯納的文學著作，開始了一個新時期。

以下是從拉利薩·利斯納給利提阿·塞勿里納的一封未公開的信中擇下來的話，塞勿里納是她很好的朋友；那時這位女詩人正和她的丈夫到列寧格拉德的『學者書院』去，拉利薩勸她回到莫斯科；這一段特別可以表現她對藝術的觀念，在蘇俄一直到現還是覺得她的話很有價

值。

……我好久沒有與你通信了——我又有什麼權利對你之走而興起悲感呢？但並不是因為這個。莫斯科是藝術的發祥地，普遍地說起來，牠如蜘蛛之網，一離開牠就不能生活。聖彼得堡是一個反射的城市。你——跑到學者書院去！在一羣患精神的瘡疾，乖戾，痛苦的人中，他們的太陽早已沈沒了。在他們的天上，只能看見一線南北極的光。而你——在那兒！無論你是如何好，無論維利連安·巴夫羅維支（Valerian Pavlovich 塞勿里納的丈夫）的拳頭如何的壯健，在那兒也只有死寂，你不應當在那兒……快回來吧！

此外：莫斯科是亞洲，有一些像薩馬康德（Samarkand）的市場。不過你應當坐在你的市場貨攤上，你不應離開牠。尤其是當你正在被攻擊的時候。在你最後一本書出現的時候，這件事早已解決了，因此，辯護是自然不成問題的。但是這個寂寞的城市中的最良善的人，一直在談到你，在想你，一如他們所應為的。這也許是那少數污陋的批評家所以侮辱你的緣故，因為巨大的羣衆已經承認你有權寫你所願意寫的。假如你成功了，那是很好。假如你不成功，那是你自己的事。

那是像你這樣富於天才的人所有的特權。你一舉即獲得了這個權利——一次就解決了。以後就沒有人能剝奪你的這種權利。你不要和我生氣，你會嗎？我敢要求你一件事。請你寫一些壞的，無意義的，顛三倒四的東西。你必得如此，否則你不能再進一步。讓這些禽獸們將牠吞了。像這種人必須要給他們一個當頭棒喝，這樣地他們纔不敢觸動一個藝術家以如此大的代價所得來的權利：創造的獨立之代價，輾轉於污泥中或行走於屋頂上的權利。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當拉利薩死時，她傷心的母親——也是一個富於天才的女人——寫給利提阿·塞勿里納的信中末了的一句話：「……我吻你並且擁抱你，像我對她一樣。因為你，和她一樣，是熱情而帶着一種自然力的美性……。」

蘇俄對於世界藝術恐慌，與世界經濟恐慌一樣地不十分感覺得到，雖然如此，我們對於蘇俄婦女在雕塑術與圖畫術中的地位，是不能立刻就下最後的斷言。現在先要建築住房，公共廚房，食堂，托兒所，學校，醫院等。現在先要能夠穿得很合適，能夠洗濯，能吃得飽，睡得足，能修養，然後裝飾纔會發生。然而新文化五年計劃就是與這種事有關，所以蘇俄的畫家，雕刻家，繪圖家，並不發生恐慌。

因爲他們並不需要在藝術學院作事，所以國家另外給他們以種種機會。蘇俄正在大規模的建築，沒有別的，只是建築。由本國的建築家及外國人來建築。因此，那些畫家時常奉命去爲公共建築，公共機關，『工人皇宮』，工人俱樂部，住宅等，繪畫巨大的圖畫，壁畫，以及板畫等；同時正在發展的蘇俄的標語宣傳，也需要藝術家的力量。雕刻家去佈置公共廣場，巨大的文化公園，和社會主義化的城市等，是更相宜些，他們並且雕塑著名的革命領袖。此外，博物院還買了許多近代的美術品。繪畫藝術家，不但在極度發達的書籍繪圖說明及一切報張雜誌中有極大的範圍，尤其在兒童書籍上有很大的發展——蘇俄的兒童書籍是最可愛最帶教訓的——這種兒童書籍都是由男女藝術家來計劃的，女尤多於男。男女藝術家時常奉命去幫忙電影戲劇，以及一切街市游行的計劃，羣衆示威，羣衆宴會，羣衆慶祝會等。我順便要提一句，蘇俄的雕塑藝術，一如蘇俄的音樂，完全缺乏能够代表新實質的形式——因爲時間太短了——並且可以說俄國人一直沒有他們自己的雕塑術值得提到的；這是一個必須另眼相看的問題。

有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蘇俄婦女所沿以發展而在其中產生男性婦女的新路線，可以從雕刻術中男女藝術家不成比例這件事來尋索，例如在莫斯科就是女多於男，她們擔任雕刻的事，

以一人處置那樣大而且硬的雕刻材料，是必需相當的體力。還有一件事如果注意觀察也是很有意思的，無論在博物館中，在雕刻展覽會中，在各種私人美術家之工作室中（在莫斯科，雕刻家自己形成一個分離的組織，他們的作品陳列都是與畫家分開的），男雕刻家出產的人物，集團物，半身像，大小雕像等，最大只是與活的東西一樣，其他多數都是小而美妙的作品，與古代雕刻東西有相當的關係，所用的材料，多為白大理石；而婦女的出品，則多半是比活的東西為大，並且是更強壯更有力。結果，蘇俄的人都說不但在政略與政治中「婦女進攻」(Assault by women)，在藝術亦如此，尤其是在雕刻術中。

著名女雕刻家妙基娜 (Mukhina)，利琵琶阿娃 (Lebedyova) 等人的藝術，是屬於過去的；除了她們之外，第一就要數到俾阿特利沙·桑多密爾斯卡亞 (Beatrissa Sandomirskaya)，她是特出獨立的，擺脫了舊有的傳統，並且轉而用美麗的本國木材。自這種木材如樺木，橡木，和菩提樹等，桑多密爾斯卡亞 雕成她的村夫村婦；她工作之精巧，恰如從前北方的俄人不但建築完美的木材教堂和「上帝的住宅」，並且建築他們自己的住房，因此產生了豐美的木刻物——不用其他工具，只是手斧，也不用預先作什麼草樣，一直從木塊雕刻。她自樹心中畫出她的鄉愚——有敵意

的批評家如此稱他們——自生長於故土的材料的最內層的物質畫出農人，使得他們栩栩如生，她只幫助牠們——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取得那種富於表情的，單純的，簡潔的形式；因此，不再需要任何裝飾，也不要專門的技術，牠們就好像是自然而有機的作品，並且是不能模倣的，好像能以自內在發生的靈感之聲來發言。

桑多密爾斯卡亞十四歲的時候，已引起聖彼得堡一般人的注意了，她的 *Styenyka Rasin* 及農人半身像，在國外陳列時獲得成功；甚至在美國，一般人自她的作品中承認『蘇俄婦女雕刻術，在表情，力量和色彩方面，都超過男子的技術；』不過像她自己的作品 *Oktyabryonok* 一樣，她之成爲藝術家也是十月革命的產兒。一九一八年之夏，列寧命令以一種競爭的方式造五十個石膏粉紀念像，以慶祝十月革命的第一週年紀念，當一半已經委託給完全有資格的雕刻家，一半已經交與還在學校研究的青年藝術學生之手時，做學生的桑多密爾斯卡亞請求給她作羅培斯彼爾 (*Robespierre*) 的紀念像——那時要打算作羅培斯彼爾，馬拉 (*Marat*) 同同 (*Danton*) 三位革命家的像。別人警告她說：『誰知道到明年革命能否存在；不要選擇一位革命家而選擇一位詩人如科爾左夫 (*Kolytsov*) 或射夫陳科 (*Shevchenko*) 爲安。』但是桑多密爾斯卡亞並不聽

這個警告，她堅執要造羅培斯彼爾的像，並於三個月之內交工；造好後陳列於「克累姆林」旁的亞歷山大花園，一星期之後果然被白俄所毀。不過桑多密爾斯卡亞得着一筆獎金，她就去至土耳其斯坦，在那兒過了十八個月，她自彼地的土人中得着許多知識。

當她回莫斯科之後，又繼續工作，一如她自己所說，「她整個專心一意地從事於革命以及爲需要表現的新題目找一種新的，適合的方式這件事。」她出產了許多作品，都是木的，包括她的偉大的「母親」這是一種比真人還大而又充滿着熱情的生命的作品。這不是什麼聖母，在舊俄時代，上自沙皇加冕的莫斯科「克累姆林」(Moscow Kremlin)的大禮拜堂，下至很小的農戶，都掛上一張聖母像供奉——是一個與世界隔絕，否認世俗，另一個世界的非物質的東西，牠只存在於人們的觀念與精神中——但是新時代的農母（見圖——譯者）是以泥土裝潢的，帶些粗氣，兩條強健的腳，很穩地站在土裏，很明顯地還未自土中解放出來，這個「黑土母親」(Mother Black Earth)是帶着有希望的勝利的神氣，手中抱着她的小孩，她的青春豐滿的健康，和美麗的赤裸的身體，什麼也沒有穿，只頭上戴着一個共產女青年團員的頭巾。這個不只是象徵蘇俄新婦女而是象徵整個的「小母親」的俄國的模形，是應當安置在「小母親」的莫斯科中最榮譽地

方的。

蘇俄女畫家——如培俾脫娃 (Bebutova)、麥爾尼科娃 (Myelnikova)、枯拉金娜 (Kulagina)、雪爾諾娃 (Syernova) 等——一如女雕刻家一樣，在她們作品之中，我們注意到一些男性的色調，同時還有一種新革命题目的浸透更引人注意，這也許是因為她們與新生活（如在宣傳標語中，舞臺上，解說中）有直接關係的緣故。如『繡旗幟的婦女』(Women embroidering Banners)、『Ssyelmashstroy』(作農業器具之工作)、『建造』(Building)、『在工廠中』(In the Factory)、『來福鎗射程』(Rifle-Range) 這一類的題目，除了蘇俄的女畫家願意畫之外，是別國的婦女所想不到的。但是在畫我上面所提到的兒童書中，她們又表現出女性。

我們不需要詳細討論蘇俄的舞臺，許多未到過蘇維埃地方的人都很熟知，他們一方由於自己的目睹，一方由於許多談到蘇俄舞臺的書籍而得知的。蘇俄一般的舞臺，是完全帶批評性質的，是非常地認真的，並帶有深刻的教訓，對於俄國的民衆是一個『道德的制度』(moral institution) 一個『人類的行爲學校』(School of human conduct)。在莫斯科一處就有三打以上的戲院，但並沒有舞臺恐慌的現象，每晚上都能賣滿座，有的前數星期就預定出去了，因此有時你



Mother Black Earth

(Wood Carving by B. Sandomirskaya)

黑 土 母 親

(桑多密爾斯卡亞之木刻品)

只得站着看戲，或者要費許多時候纔能進一個戲院去。蘇俄民衆與舞臺之密切關係與夫強有力的團結，都是人所共知的，有時舞臺就成了大講堂。蘇俄的劇場是一種社會共同事業，在其中共事者——無論自第一人到末一人，簡直不能說誰是最末一人——都視他們的工作爲神聖的責任，因此他們以同樣的熱忱，同樣的尊敬，以及責任的意識與完善，來研究及表演重要的或不重要的角色。於是在蘇俄的舞臺上無所謂明星，並且一幕戲中也無所謂女主角。不僅於此：新俄國劇本，其中照例包括很少的女角，並且很少有什麼特別的女性的，戀愛的問題，也沒有兩性間之緊張與衝突，只是關於純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問題，做女演員的婦女在俄國舞臺上的地位，並不如婦女在公民生活的地位好。現代的戲劇簡直沒有什麼「高貴的夫人」，除非有時用以諷刺資產階級的婦人。她們之是否美麗，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一個女演員不因爲是一個婦人而去刺激誘惑任何人。因爲舞臺是人生的反映，所以完全肅清肉慾觀念，使牠機械化，使牠成爲客觀的；牠另外有遠大的屬於全人類的目的。俄國舞臺所以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者，不僅是由於牠美的方式的偉麗和道德成功的深遠。而多半是由於牠的超越的表現力。一時在俄國舞臺上是不會有性問題和性鬭爭的地位的。他們共同奮鬥——在舞臺上和在实际生活中——以建造新世界。因此，在新俄國舞臺

上，是沒有「悲劇女演員」也沒有女明星；在此處當作真實人生的懇切的表演，是不知道什麼叫敵對的演員，只是戲劇中的共事者。

說到舞臺，也值得提起蘇俄的一些女舞臺經理，最著名的是乃塔尼亞·沙茲（*Natalya Sazs*），她是莫斯科第一個兒童劇院的創始人及經理。蘇聯現在有很多像這樣的兒童劇院了，牠們以自己的努力證明「兒童的世紀」（*centrey of the child*）在蘇俄已漸見曙光了這個事實。

電影女演員與舞臺女演員有同樣的情形。你不能找出一個蘇俄電影明星，假如你要在國內外映演得着偉大成功的愛伊生斯坦（*Eisenstein*）的 *General Line* 一片中找女主角，你就會闖到利阿桑尼（*Ryabany*）省的鄉村中的牛棚中去；因為此片的中心人物瑪發·拉甫金娜（*Marta Lapkina*）並不是一個職業的女演員，只不過是一個單純的農婦，自九歲以來，就在田間工作。

愛伊生斯坦起初找不着一個蘇俄女演員適合於那個角色的；因為那些女演員既不會耕田，又不會使用曳引機，更不會榨牛奶。他因此在各處農村中搜尋了無數的村婦——搖鈴召集了這



A Group of Players At The Moscow Art Theatre

(A Scene from Resurrection, after L. Tolstoy)

莫斯科藝術戲院之一部演員

(托爾斯泰復活之一幕)



The Peasant Woman, Marfa Lapkina
(Principal Actress in Eisenstein's Film, General Line)

農婦瑪發·拉甫金娜
(愛伊生斯坦影片總路線中之女主角)

些婦人，詳細檢查，看她們是否能勝任；但是數月以後，還找不着一個合適的。愛伊生斯坦將國家農場的工人都攝在影片上，使婦人的背影向着觀衆，有一天，當他差不多要絕望的時候，在這種膠捲上碰巧注意到一個農婦叫瑪發·拉甫金娜者的後影，他立刻覺得這就是他要找的人。從來未看過電影的瑪發，起初不願離開家。因為給她錢，她終於同意了，帶着小兒子與攝影隊一起出發上路。旅程是很遠的。一開始攝影就見得瑪發是不會辱她的使命的；她不但能攝成很好的鏡頭，並且能夠隨從導演者的很小的示意，而立刻了解她應如何動作。她只需很少的排演。她自己以為排演只能使她迷亂的。確，假如很簡單地告訴她應如何表演，每件事會馬上一帆風順地作好。

在這張影片攝完之後，瑪發在攝影場有了一個位置，但是她拒絕了而回到她的鄉村中去，以後是否還露面於美術室中，這是不可知的。這個婦人這樣輕視全世的榮譽，對於那些雪影女明星是很有益的教訓。

在這裏問題就發生了：是否這個賦有真正天才的農婦瑪發，在蘇俄鄉村婦女中是少有的？我們現在可以確切地回答：『不是。』因為瑪發只是像我們已經知道瑪利阿·克利沃波賴諾娃和賴阿馬斯卡·諾維科娃——瓦新左娃，以及無數的無名鄉村婦女中之一片碎屑，她們現在自深深

的沈睡中，自漆黑的夜中醒過來了，她們正在慢慢伸展四肢，試試要張開半閉的眼睛而自己立足起來，她們開始行動而走到一條新路上去。在這新世紀中，不但她們本身受了變化，就是這個世紀也自她們以及她們潛伏的能力而得着一種新豐富的勢力，一種新色彩的增加，雖然在各種美國化的環境中，還不失其純俄民族的性質。

三 生產事業

十月革命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允許婦女在生產過程中有她們的地位，而自蘇維埃取得政權以來，凡是寫到或談到新俄之經濟發展的，沒有不連帶論及婦女勞動力擴充之重要。這件事的本身在蘇俄並不是特別的：在別的國家，工業生產的發生，與婦女參加製造物品之增加，這兩件事是並駕齊驅的，因此，甚至在蘇俄，這件事也只能視為是革命後急劇進步的工業化過程之附帶的產物。近年來蘇俄人民對於數目字的狂熱，並不能改變以下的事實：就是沒有革命，婦女之參加經濟生活也是可能的。在蘇俄所可奇者不僅是這件事實，而是這件事的無與比擬的速度與範圍，另一方是依據自然律進行的經濟過程的力量是故意地按照計畫進行的這種情形，因此一種與人類

作用無關的事件，也屈服於人類社會意志之下。只有像這樣解釋，蘇俄婦女參加經濟建設之增加纔能視爲是一種歷史上的革新。

故意按照計劃以規定一種與大眾意識獨立的過程之決心，表現於保護婦女勞動力與勞工婦女的立法中。沒有一個國家如蘇俄一樣地努力於注意女性生理上之特點與職業之關係，努力由法律來表現對母道之尊崇，此點由討論『母性與兒童』問題一章可見。婦女勞工之擴充，必定不要而且不能損及勞工婦女的本身及其子女。婦女除了享有生產的假期與保護授乳婦的法律規定之外，普通還要禁止招僱女工做過於用力的工作。婦女在十八歲以下五十歲以上，得免去強迫工作。蘇俄還有一樣特出的地方，就是男女工不平等的薪資的待遇已經沒有了——這一點，一如大家所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僱用女工的主要引誘；在蘇俄是按工作而非按性別以付工資的。

在其他國家以及革命前的俄國，婦女之加入工廠工作，皆因受經濟困難的壓迫，而在蘇聯，婦女羣衆之對於工廠工作，認爲是她們的天職。近年來高速度之建設與巨大工業中心之興起，使婦女勞工有意想不到之增加，後來甚至出乎五年計劃的預料之外。婦女工作在工業各部門中都擴

充了。一九三一年，在蘇聯有六百萬婦女加入生產工作，較之一九三〇年中增加一倍，至一九三二年，又增加了一百五十萬。這就是說：蘇俄整個勞動力有三分之一是婦女。有很多的工廠——即所謂女性工廠(Female Factory)——女工多於男工。在這種女工多的工廠中，管理膳食的三人委員會，普通都是兩個女人一個男人。

對於婦女較多的工業各部門來作詳盡的研究，這是不必須的，因為要是這樣做去，差不多所有的工業都要提到。我現在只論及在棉織工業中——步農業的後塵——在運輸業中，在製就的衣服業中，以及在市鄉的公司中，婦女佔大多數。自然，婦女至今還有做與她們不適宜的事業：例如有許多婦女還從事於礦業。到如今各處都有女建築家，女站長，女司機人等。例如在薩馬拉(Samar)，所有的電車工人都是婦女。其為『工人挺進隊』的婦女，她們在挺進隊教訓者指導之下，自己實行一切的修理和別種機器的工作。

我們想得到，因為工作婦女增加，所以她們加入工會的也增加，在工會中，已有四百五十萬受了工會的組織。一九三一年時，七百七十三個工會執行委員中，已經有一百零四位婦女；同樣地，在勞工會議(Workers' Council)以及其他生產委員會中，婦女佔百分之二十的地位。工業婦女在

社會活動上之猛進，由於在許多工業部門中——如工程，礦業，煤業等——婦女之擔任公共職務者女多於男這種情形，即可證明。

在表示蘇維埃婦女工業地位的婦女勞工，不但在數量上有了增加，其質量上更有長足的進展。整個的蘇維埃，佈滿了人人可得而入的專門技術科，農業科，訓練等科目，在其中，婦女增進了她們的品格以預備進入勞工科和專門技術學校；訓練精巧工匠的練習學校，在一九三一年之初，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女學生；此外，那些勞工婦女在工廠中還有機會改良她們自己。一九三一年，當婦女之擁入工廠者日漸增多時，特別地討論到以上的問題。在運輸制度引用到查科夫的曳引機工廠中時，『普拉夫達』報上發表自各種有經驗的工廠經理人來的信，都表示歡迎女工甚至去做精細的工作。人民勞動委員會受命決定可以容納精細婦工的許多工業部門。因此，蘇俄的婦女有了很大的期望，這是革命前所夢想不到的。一切裝置，電氣，礦工，鑄型雕刻，旋盤工的事業，以及其他特種金屬業與乎化學紡織中之高等技術，對婦女都開放了門路。

於是，婦女在今日之從事於精細工作者，日漸增加。在莫斯科的巨大的『鈍鏟』（Hammer and Sickle）工廠中，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女工；在鋼絲工廠中，一九二八年末還沒有僱女工，

現已佔百分之三十一了。在新俄國。有女航空家，女獸醫，女鐵路工程師，和曳引機女司機等。假如你問蘇俄的女孩子她們將來希望作那種職業，大概回答說作建造汽車路，橋樑，開礦的土木工程師，或機械工程師，建築家，農業科學家，化學家，水力工程師等。這種希望在蘇俄的今日是很容易達到的。工廠婦女的事業，由於精巧工作而至於工程師與工廠經理。任何工作婦女都可慢慢升為廠主，副經理與經理。一九三一年時，蘇聯已有十八位女經理。在像這樣有女經理的一個煙草工廠中，我聽說所有的重要位置的負責人都是婦女。在這個工廠中——牠自己發行了一個報紙叫「工作室的呼聲」(The Voice of the Bench)——當我一九三一年秋去參觀時，女工人數有相當的減少，幾乎只有百分之五十了。因為差不多最能幹的熟練工人，都漸派至其他工廠，以增加生產。婦女之作各部主任者，是很普遍的事，甚至在建築巨大的堤壩 Dnyeprostroy 中，都有一位婦女在指揮工程。

在莫斯科與列寧格拉德，有好幾個工廠中，是女經理或代理經理，她們差不多都在上面所提的那個工廠中工作十年的工人。一直到最近，做這種職業的男人還是很懷疑這件事。我們時常聽見說：「等着吧，那些裙帶經理會滾蛋的。」但是她們實在幹得不壞，至今日幾乎所有的懷疑者



Woman Mason Engaged in the Building of Enging Works

(in the Ural Province)

女泥水匠從事建築機械工程

(在烏拉省)



Women Worker on A Soviet Plantation

蘇維埃農場上之女工

都信服了。

這種女工之巨大的發展，和女性做男性職業，使蘇俄鄉村和城市婦女的心性有很大的改變，這是不待多言的。俄國婦女平均都經過一種改變，我們只好說她們是男性化了，這種事第一是與西方各國一樣地受大戰時缺乏男子的影響，不過在俄國還有其他的原因和日漸變化的事實。這是包含在我下面要討論到的生活的改造；就是因為這種改造而使得「管家婦」歸於消滅。在蘇俄，工廠——普通可說職業——已經不覺得是痛苦的需要，如他國一樣，也不是消遣時光的方法，而是一生的工作和生存的目的。頓尼索瓦（N. Denissova）寫道：「當沙皇時代，婦女能免於蹂躪她們生活的工廠工作而專心從事於家政者，以此為幸福，今日的婦女，視生產工作為對社會的服務和人生的重要目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婦女之日漸參加生產工作是如何地產生了一種新式的婦女，她的化身——新俄的代表婦女——是那青年的曳引機司機者，她就如同曳引機一樣，是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象徵。

俄國現代小品文作家都以這種婦女為題材，現在我引證高爾基（Gorky）的雜誌「我們

的成功』(Our Achievement)上一篇說到這樣的一個曳引機司機者如下：

波林卡 (Polinka) 是從莫斯科來至鄉鎮的。好像船舵的輪軸一樣，她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不能因為她是女子而阻止她實行她的職務。她穿一件藍色的工衣，稀少無光的短髮，帶着一個「克撲卡」(Kopka)，此上附有一雙開汽車用的眼鏡。波林卡很高，方肩，粗手，像男子那樣有毛的臂。自肘以上纔看得出是女人，她的雙手是強而有力。穿着紅軍外衣，就像一個男子，她行動之嚴峻。也許只有無意之間想到她是一個婦人和做婦人是她的天職上，纔能使之和緩。也許她的確可以代表生在高原的婦人，她們時常有權做男子的事，因此甚至不能引起最無生趣的小說家之注意。

工作隊一天之前就到田地中去了，曳引機整天地工作；紅軍露營廚房在九點鐘時就預備好了熱的早餐——麥和牛乳……當波林卡等待食物時，在帳篷外我坐在她旁邊：「你的生活如何啊？」我開始與她談話。她取了帽子，亂而無色的頭髮散開來了。她告訴我她原來在莫斯科讀書，後來就在那兒作機械工程，又曾經受過曳引機司機人的訓練。接着就來到這高原，她預備

老死於斯，因為整個的聯邦都是她的家。她覺得此地很適宜於她，她願意一直住在此地，除非她被派遣到更急切需要她的地方去。

「你的家呢？你的丈夫呢？假如你有一個小孩怎樣呢？」我接着問。

「這些都是無足輕重的，」她這樣地說，我覺得這是無味的談話題目了。我知道她有丈夫，他剛好到車站取柴去了，無疑地他會回到鄉鎮中來的，不過以後他不能馬上到田中去找她……。

散班了。沈沈黑夜之中，已耕的三角形地，在稀稀地星光之下，就好像潮溼沙土的地氈。

帶着鐵的叮噠聲，曳引機很小心地自草上滑到耕過的那片地上，波林卡真正重要的工作這纔開始。她並不是如一個男子垂手可做的那樣的普通曳引機的司機者。她必須要走一條直線，使耕出來的犁溝必定要在農業專家所定的兩個地點的正中，這條線要直得像以尺在紙上畫的一樣。其餘的人就駕着曳引機照着這條直線走。也許「直」這種意識對於波林卡的印象甚深，因為在她眉毛之間有一條指揮溝（Commander's follow）。

耕那處女地的黑色曳引機，我看起來就好像技師駕駛的船一樣，又好像艦隊中之旗船，領

導着男子叮噓的曳引機去奮鬥。因此我漸漸明白了因為什麼在這鄉鎮中永沒有聽到別人稱波林卡為女人。

四 五年計劃與婦女

當今第一次五年計劃業已完成，第二文化五年計劃又已進行時，我不必將大規模地按照計劃以建設工業之時代創造的努力，很詳盡地告訴西歐的讀者。人們早已不以為五年計劃是一個國家的不能實現的幻想之工程羅曼司（engineering romance）了；反而證明了牠是勞工的時代史詩。不久以前，荒瘠的高原與未開墾的森林與田園是一望千里，而現在無數巨大的工程物高入雲霄，牠們是人類建設意識之表現，是充滿了未來的希望。

五年計劃就好像一場暴風雨；牠不是雇傭勞工之結果，而是鬪爭之熱誠和甚至使目前光榮的未來的有刺激性的理想之結果。五年計劃之所以能使人人都有衝刺力者，是由於使人狂醉的數目字，和把握羣衆的情緒二者使其日漸緊張的神經所致；他們以一種西歐人所不能了解的真實的豪勇，去忍受他們所應該做的超人的犧牲與飢餓。在新興的蘇俄很少遇見一個不是五年計

劃犧牲者的人，他們有一種過度工作與過分疲勞的外貌。在蘇俄中之生活，是一種不斷的戰鬥情形，需要每個人精力之不斷的奮鬥，而疲勞的身體再由不斷地更新的熱情來補充。

在這個勇敢的奮鬥中，在國家中，在工業中，在文化生活中資格相等的婦女，也同樣地要擔負一種重要的責任。一般人承認，婦女對於這偉大計劃之實現所貢獻的，至少與男子相等，甚至或許要大些。的確，她們實際上已經證明她們是五年計劃的柱石，其原因一方是俄國特有的，一方是普通的：例如她們不酗酒，不偷懶，不欺騙，她們差不多比男子還熱誠，據說她們之管理國寶的機器都比男子細心，男子在這方面時常受嚴厲的責罰。

以無數由戰爭而新創造的專門名辭使俄文更加豐富的五年計劃，產生了新式勞工組織。五年計劃的真正柱石是『陣隊』(Partiations)，是勞工挺進隊 (Storm Workers)，在這些人中，女人多於男人，這是很有意義的。男子有一半是屬於挺進隊，而女人則有百分之六十，不久以前，『普拉夫達』報登載婦女勞工挺進隊工作的速度是男子所得不到的。在全國工廠中，婦女對於五年計劃所完成之服務，出乎一切預料之外。在差不多的大工廠中，婦女勞工挺進隊佔大多數，例如革命史上著名的浦提羅夫 (Putilov) 工廠，二千五百個女工中，有一千六百人是參加挺進隊的。在

馬格托尼哥爾斯克 (Magnitogorsk) 就是婦女勞工挺進隊首先表示如何鼓舞與加速工作的速率。在羅斯托夫煙草工廠——這是一個純粹合理化的工廠，其中工人輪班工作不息——中，女工的非常技巧，使我驚奇；她們不擡頭，甚至連眼都不擡起來地專心一意工作，作事簡直就像機器一樣。

自然，婦女在工業勞動中能獲得如此技巧，是需要多年的時間。我們可引證如下：

一九二八年，列寧格拉德曳引機工廠赤色浦提羅維持 (Red Putilovets) 需要新工人原來出產三千曳引機，五年計劃第二年必須要出產一萬二千個；此處從來沒有用過女工。但是在勞工介紹所的男工人不夠，就送了一些女工去。

曳引機部的管理大怒之下說：「因為什麼送她們來，她們有什麼用的？確人人都知道女人既不能作鐵匠，又不能製造齒輪。不過勞工介紹所固執地繼續送女工去，而曳引機部也只好將就。」於是，在工廠中開始了堅決的掙扎，就是新僱用的女工要為她們的權利與地位而奮鬥。組織了一個婦女隊，共有八個女工，其中有兩個是黨員。這個隊以女工雪米俄諾瓦 (Semyonova)



Woman Mechanic Repairing A Tractor

女工匠修理曳引機

爲首。這個女工隊的成敗是很有關係的，特別是男女工人平等之承認這件事。她們都三思過了。每天爲她們的出品之質與量作劇烈的鬭爭。

不久就有了成績。因爲女工之細心謹慎的工作，她們完全沒有男工所時常免不了的浪費。加之女工隊的分，沒有不呈出充足的理由而就告假的。

此隊在勞工挺進隊員所登程的長而艱苦的途中慶祝第一次的勝利。第二次勝利：沒有因工人的過失而浪費的；沒有無充足的理由而不到工廠的；同時沒有遲到的。奮鬥繼續前進。女工一步勝一步。

現時此處女工能做每種工作。在數年前見不着婦女的部分和沒有人想到要僱用婦女的部分，都有女工了。任何處——在工作臺前，起重機上，鑄造室中——婦女都獲得了她們的激勵，在質的方面，她們的工作不亞於男子。

有五個女勞工挺進隊員在齒輪製造處中的高貴重要工作部，此部在工頭安德利（Andrey）指導之下做很精細正確地工作。工頭對於她們的批評如何呢？

「我對於女工的工作之質與量都沒有什麼不滿。至於說到工廠的規律，以及對工作和設

置之謹慎態度，女工遠勝於男工。女工能專心一志地工作，並且很小心一切的設置。有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的：從來沒有因為女工之過失而損壞機件的。『婦女勞工挺進隊——耶立科維支與雪里科(Yel'ykovich and Shileyko, Women Storm Workers)』

以報酬與榮譽來鼓舞勞工挺進隊——特別是婦女——對於生產工作的興趣與愉快。除了自由賜與的各種勳章外——斯達林格拉德的 *Traktoriy* 中，第一個受與赤色勞動獎章的，是一個女工——還時常發給花紅，都是些日用品，如書籍衣服之類，這些東西都特別受歡迎，因為俄國那時還是十分缺乏工業製造品。比花紅更受歡迎的，就是所謂『勞工挺進隊書冊』，受者可持此冊獲得那時求過於供的貨品。當上面所指的那個斯達林格拉德工廠中機械部的二百六十三個勞工挺進隊員——她們是全數女工的百分之四十八——忽然得着這種書冊的時候，她們拿這件事當為婦女勞工的新勝利來慶祝。有兩次約數百勞工挺進隊員——約百分之三十的婦女——因為急進的工作而得允許乘蘇維埃汽船至西歐旅行。這種榮譽是很大的，因為蘇俄勞工之親自到國外去是很稀少的，他們認為差不多是駭人聽聞的事。無怪乎雜誌和報紙繼續數月登

載這些國外旅行者的報告與消息，都是很有趣的，有時非常的天真滑稽。

男女勞工挺進隊的熱誠，是被他們在蘇俄輿論之前所享受的榮譽而不是他們所得的酬報引起來的：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新的，社會主義的人類之典型，並且很受推崇。當我們讀到下面那首婦女勞工挺進隊員所寫的詩，我們就確實知道這種婦女是一種新典型的，同時可以想到西歐的婦女的抒情詩：

婦女勞工挺進隊歌

我們不止不息，

又有堅強的階級意識；

愛國的熱血，

使我們精誠團結。

志氣堅如鐵，

熱情滿胸懷；

我們要趕快努力，

我們要趕快努力，

不要止息。

* * *

欲害我們的惡人，

將之擲入地獄。

看那鎔化了的鋼流啊，

燄燄如火紅。

* * *

工業繁且榮，

這是我們的志願，我們的快樂。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Women Storm Worker From A Kolkhos

集 體 農 場 女 工

將自我們心火中湧現。

久藏的礦產，

在地下震動，

一車接一車，

拿去應用，

這是寶貴的貨物，黑色的金。

我們不止不息，

又有堅強的階級意識；

愛國的熱血，

使我們精誠團結。

——特泰安娜·哥爾茲卡亞 (Tatyana Korelskaya)

貨車歌

信號，軌道，

叮噹的車輪往前跑……

曳在車後長鍊上的機器，

爬上高崗。

* * *

鋼鐵來自烏拉；

頓河流域出產黑煤；

木材來自北方，

高加索出產煤油。

* * *

燈光恰如燃燒的火簇，

笛聲是快樂的呼聲。

我們知道那是曳引機，坦克車，

和廠裏的工作檯。

——夏波施尼科娃 (V. Shaposhnikova.)

黨內男女之崇拜勞工挺進隊的英雄，使人想起別國之尊敬體育健將與電影明星。在蘇俄，沒有一個工廠的外堂或天井不裝以懸掛當代男女英雄的像片之走廊，因為要使人人得有機會，所以掛的像片是時常調換，甚至於就像柏林之有『西吉沙里』(Siegesallee)，莫斯科的著名『文化娛樂公園』(Park of Culture and Recreation)也有一個『烏達爾尼克散步場』(Udarnik Walk 『烏達爾尼克』即勞工挺進隊)，兩旁立有著名男女勞工挺進隊的半身像——是小小的藝術成績。出版物也是時時準備為這種有效的宣傳盡義務。就是馬克斯主義者卡爾·拉得開 (Karl Radek) 也以爲這種英雄之崇拜，與不承認偉人之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不相矛盾的。

馬克斯與列寧皆不承認羣衆中是包含同一的各體的。在他們以爲歷史並不是一個含混的，無名的羣衆之奮鬥。人類存在一天，其中就包含有前進的分子，他們能奮鬥以解決歷史提出來的問題。仍舊有英雄之存在，不過他們的英雄主義是羣衆企圖的表現；他們的英雄主義也只有成爲羣衆的英雄主義，也只有使羣衆與自己在一條水準上，纔能達到勝利（Moscow Review of August 16th, 1931）。

比勞工挺進隊更能鼓勵人爲五年計劃而作任何犧牲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競賽運動上的競賽精神，現在轉用到工業中去了。當一個口號引用到實際生活的問題發生時，必有一個使整個蘇維埃生產勝利之羣衆現象發生，這差不多是百不一爽的。俄國的格言是：熱情加上組織。斯達林在第十六次全俄共產黨大會上曾說到這個題目：「競賽中最重要的，就是根本地改變人們對工作的態度，自歷來認爲是疲勞的，壓迫的重擔，升而爲尊榮的，英雄的事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就完全不同，因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每人所希望最好的幸運，就是攬得私人的收入，依利息爲生，和逃避

工作，這都認爲是可鄙的。但是在蘇俄的我們，其情形正相反，一般人所承認的唯一希望，就是作一個競賽之英雄，被無數工人的敬尊的光輝所照耀。」

在工廠與工廠之間，工廠的各部之間，都有競賽。我們自統計方面得知俄國婦女加入競賽之熱心：一九三一年冶金工業中之婦女，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加入競賽的，化學工廠有百分之五十四，紡織工廠有百分之五十七，製紙工業有百分之五十九。後來她們的百分率又加高了。但是同時她們就疏忽了戀愛，伊發諾弗發斯內孫斯克的紡織區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女工，那兒有首四行詩，是那些青年人伴着風琴唱來以表示他們的退讓：

撫愛已成往事，

她現在不顧我的悲哀。

她粗聲地說：

「只要有競爭，我必得去拼命。」

婦女雜誌有固定的一欄，以請求婦女加入競賽，和宣布競賽的結果。當你流覽到最風行的這類雜誌如拉波特尼查時，看見這一欄的「訴諸全聯邦的勞工挺進隊婦女們」這種標目，你會感到特別的驚異；勞工挺進隊婦女在此響應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廠女挺進隊的請求；她們開始改良她們工作的實質，加倍努力以從事文化的組織，又訓練更好更精的手藝。挺進隊很滿意地說，在勞動關爭中，她們已經表明了她們的血氣。勞工婦女還抱怨她們的工廠不够合理化。女礦工現在也誓要從事於補救逐漸增加的落後，而使出產的「黑金」能够供給五年計劃所需之量。現時工廠都宣言要用大量的女工，借此又可提倡婦女加入生產過程。現在又在竭力消滅偷懶的事。時常指示出方法，而那些溺職者也捲入了如暴風雨的生產之漩渦中。

我來引證一個工廠中之競賽如何進行。在列寧格拉德一個叫「列寧卡」的工廠中，成立了一個赤色獎章以酬勞來月工作成績最好的一部工人。有四個星期的時間工廠都在熱烈情況中。到工廠的入門處，張佈了活動的圖表。上面有習用於競賽中的表號：一架飛機，表示用最短時間所完成的工作，此外表示漸漸低減的速度者，有汽車，火車，龜，蟹。圖表每天指示競賽的情形。一月之末，纔來詳細地決定那一部產生了最好的成績，其中包括參加政治與社會工作的度數。最後因為有

兩部產生相等的好結果，於是召集了一個全體工廠大會，以決定到底那一部應該得到赤色獎章。

個人間的競賽也是很有趣的——也許是太過分了——這種競賽時常發生於男女甚至夫婦之間。社會主義的競賽已經深入家庭，將那些拒絕與時俱進的少數人掃數除盡。有一婦人，她的丈夫和兒子在工廠作工，並且是勞工挺進隊分子，他們時常加入競賽，她因此不能再在廚房中忍耐下去了；她起始探聽，並且注意廚房外所發生的事，她最後也加入了。在斯達林格拉德有五百個主婦組織起挺進隊以支配公共食物之供給。在頓河流域的主婦與女子決定五天之內在礦中工作一天，將她們的薪金拿來建立工程學院。她們請求全體工人之妻加入，到第二天就只有小孩留在家中，每五家有一個婦女看管他們。這些婦女在這一天所完成的，的確不少：她們裝載了兩車的煤，帶來了支持兩星期的礦中木材，並且還油搽了許多貨車。自她們之中選組了一個挺進團，答應去學礦物分類工作，並在兩星期之內明白全部的機械，如此男子方可專入礦坑去工作，而將分類部的工作讓給婦女。

蘇維埃報紙最近登載一件最滑稽的事，就是巴什基人(Bashkirs)中的夫婦間之競賽。妻子

的挑戰文如下：

「爲促進五年計劃的第五年之建設速度起見，我，安尼支科娃（Anichkova），向我丈夫康士坦丁·安尼科夫（Konstantin Anichkov）要求作一個社會主義的競賽，並接受以下的義務：

「我願節省我們的進款，只買最必需的物件。我將不耗費一文錢以購買奢侈品如香料脂粉等。

「我決不容許我丈夫在工廠中逃避他的工作，我並願竭力在家中禁止酗酒。

「我願以最大的注意力使我的小孩養成共產主義的精神，並屏棄無正當理由而不赴黨與代表會之習慣，又願監督別家主婦使其赴會。

「我願完全實行黨與代表總部（Delegate Headquarters）所賦與我的一切義務，並使我丈夫赴政治學校與黨會。」

丈夫以下面的話來宣布他接受他妻子的挑戰：

明：
「我接受我妻子對於社會主義競賽之挑戰。我答應實行所有的條款，並加以我自己的說

「我家中將不存留一個哥裴克，所有的錢都放在儲蓄銀行中。

「在發行之「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公債上，我願以我所有的財產來換牠，並捐助我一月半的進款。

「我願積極參加社會工作之組織，如 Osgoefakhim, Mopu, 赤色援助會等，假如這些團體此處無分會，我願組織牠們。

「我願捐助「赤色巴什基」(Red Bashkirs)「比斯波什尼克」(Besboshnik)「無神論者」等雜誌，以及兒童的「摩西爾卡」(Mureilka)雜誌，至本年終為止。」

在家庭中還有別種方式的競賽。不過最特別的還是父母子女間之競賽——這種事是俄國以外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我眼前有一個鄰近莫斯科地方的一個十一歲女孩親手草的合同；以下就是牠的特別造句法：

社會主義的合同

我——一個工廠工人，與我的女兒先鋒隊員成立一個合同——在這合同中，我以最近可能的態度，擔任與我的工廠合作，直到五年計劃之結束，我並參加『五年計劃之第四年』這個挺進隊。

我，一個年青先鋒隊員，簽這個合同，我發誓我的工課不得壞的分數，我將永不遲到，我永不逃學。勤謹上先鋒隊的訓練，並努力通過任何團。我將此合同一併通知學校的蘇維埃與先鋒隊。

社會主義競賽的潮流，已經漸漸及於落後的鄉村，由這個事實我們就可以知道牠對於人們的勢力如何的巨大。一九三二年三月八號的『普拉夫達』報上登載了一件事，牠很生動地報告南方一個棉產集合農場中之夫婦競賽如何地進行，我簡述如下：

瓦西卡(Vasyka)正在不高興。他的妻子以一種前此所未有的態度將他的事揭發在全村之前，使他成爲全村農人取笑的資料。這個該死的女人還膽敢在鄉鎮的壁報上插入一段佈告，指他爲一個不可救藥的懶惰者與遊手好閒的人。照已往的習慣，他就應當給他妻子一頓好打。不過現在的時代已經改變了。但是他仍然不能放過這種侮辱。第二晚，他去找壁報的編者，說以下的聲明，並請其發表：

「我妻以競賽來向我挑戰。昨天她採集了三十六疋的棉花。但是我今天採了五十二疋，我發誓在幾天之內增加到六十疋。編輯同志，我來拜訪你是要求你以我的名義將以下的請求公布給「新燈塔」農場的一切男子：男子們，不要坐在家裏，不要聽那些無稽之談說採棉是女人的工作。都來學我。」

在集合農場的會中討論到一封信。婦女對於她們偷懶的丈夫，兄弟，和鄰人，都取一種敵對的態度。這是一個無聲息的戰爭。在鄉村中發現了一種新武器，就是競賽，報紙，輿論。而新農村的婦女，集合農場的婦女，激進工作的婦女，就採用了這個武器。

但是鄰村的規避工作者召集了一個會議，其結果就是見諸本地報紙上的一封信：我們原

來都是規避工作者，但是我們將來會使『庫拉克』(Kulak)滿意。自此以後，我們宣言我們不再作偷工的人，而是激急工作者，並且願意做效在棉場上以挺進隊的工作速率男女工人的好榜樣。

凡激進工作與競賽不能收效的地方，五年計劃以一種西歐正在討論的『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以使農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態度起劇烈的改變。農民私人所有的一部分，成爲集體農場這種公共制度的組成分子，以後纔來按步核對；其結果是許多目的都達到了，甚至有過無不及，因爲共產黨宣布了牠甚有意義的口號：『注視農村！』雖然有的地方不免故態復萌，但是有相當程度集體化的農人，已在比較短的時間中習慣於新生活方式了，數年前在集體化剛一起始時所有的各種荒謬觀念，現在已成爲無稽之談了。當利阿桑省(Bryassanly Government)的農村初行集體化時，婦人們集合在市場中悲泣，要求不要剪掉她們的髮辮。她們誓死不受這種侮辱，並宣言要上呈文到莫斯科。

農村婦女漸次參加村中的互助委員會以及合作社，這就是表示鄉村人口社會思想是加強

了凡農場還未集體化的地方，這種合作對於聯繫分散的農場之目的，是很有利益的，並且很合於工人的需要。一個深知這種事的作者彭非羅夫（Pant'yevov）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以解釋這種情形，這個例子指示出來改變了的環境如何改變鄉村整個的生活態度：一個農夫有一所房子，一匹牛，一隻豬，一小塊地。他為兒子打算婚姻的事。自然他父親也已為他找了一個有一小塊地，一些陪嫁的箱子，以及陪嫁的牛，豬等的妻子。但是現在他不再需要土地，或一匹牛，或一隻豬了。他自己不需要任何東西，也不為他的兒子打算，因為他兒子與父親一樣地不需要。所有的這些阻礙都消除了——因此兒子可以自由與他所喜歡的女孩子結婚。老年人不再反對他了。

婦女在農業集體化與集體農場的生活中所擔任的事，無疑地也是很重要的，和在物質與文化生產方面所佔之地位不相上下。在集體農場管理方面，也請她們去指揮，假如五年計劃之一切需要可以說是滿意的話，那就多半應歸功於集體農場婦女之熱心的合作。頓河流域集體農場的女主席——此處的工人百分之七十為婦女，其副主席也是女子——關於她在集體農場的生活有如下的答話：「現在較集體化之前的私人農場自然好得多了。我們的確自早至晚地工作，有時還到深夜，因為我們必須要出產比以前三倍之多的穀米。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將工作讓給任何人。

我們盡心工作。現時我們已有較好的滋養品，較好的衣服。你們自己評斷，我們的生活是否比較舒服些。以前集體農場的婦女都爲小孩所累，但是現在除了學校與洗浴室之外，又在高原上設立了二十七個託兒所，於是婦女得以解放出來做生產工作，因此現時除了一百四十七個男子以外，有一百二十個婦女在集體農場中佔着重要的位置。」

在集體化的過程中有一個週知的弱點，就是缺乏耕牛，因爲加以受強迫而加入集體農場的
大地主之怠工，使這種缺乏更嚴重化了。婦女在這一點又爲國家與五年計劃而工作。諾佛代瑞維
安科瓦 (Novodyerev'yankovo) 的集體牛奶場擣奶婦，在克瑞斯特楊卡 (Krest'yanka) 雜誌
上敘述在前一個九月，她們如何地救了她們的牛羣而得免於死亡。當這個地方實行集體化時，所
有小農的牛，都與大地主的集合在一起，此後就不再缺乏牛用了。由於區黨部的提議，以前的擣奶
婦與貧農婦就管理了那些餓得半死的畜牲，她們自己組織起來，在六個月之中，就創出來一個興
旺的模範牛奶場，產乳的母牛增加了一倍，不但在量上就是質的方面也有巨大的進步。

一般地說起來，要提到典型的集體農場婦女，還不如在集體化上來作一個最後的評判。在鄉
村中，就正是新舊之間與自然力起衝突的地方，自然有許多農村婦女很不易使她們自己習慣於

農村的新生活環境。但是執政者盡力爲她們和緩這種衝突。並提高她們的自信心。西爾吉·特拉特約科夫(Sergey Tret'yakov)以一個作者的資格出席於一個集體農場會議時，對她們大聲疾呼說：『不要藏躲，農婦們。擡起頭來。驕傲地往前看。你們是全世界視線的中心。你們在現在世界上是比所有的沙來賓(Shalyapins)還要有名。他們讚美你們，學你們的榜樣。』聽了這些話，農婦們彼此作會意的點頭，癡笑着說：『嘻嘻，他們從亞美利加看我們呢。』

自『列寧火星』鄉鎮來的一個叫盧克麗阿(Lukerya)的老年集體農婦，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八號的『伊斯維斯提亞』報上發表了一個譬喻的敘述，解釋集體農場中的轉變期，因何對於婦女是特別困難，其文生動而又是道地的俄國式：

新生活在掙扎中產生了。農村，就像婦人一樣，在痛苦中生產。生產時常是痛苦的。這就是婦女因爲什麼總是充滿了悲哀。在小孩將要降生之前，她們慘啼的聲音愈來愈大。但是一到嬰孩剛出世，熱誠就開始了：熱烈的母愛，謹慎的愛護，與從全世界的一切仇敵與罪惡中救護親子的衝動。

但是集體化農業的真女英雄，是女曳引機駕駛者，關於她們，前面已略提及。雖然她們是在鄉村工作，而她們實在是工業工人，是五年計劃與鄉村新生活中之戰士，她們對於鄉鎮的同化作用，使她們成爲歷史上有意義的人物。一般人都說她們在工作能力與經營上都超過男子。一九三一年之秋，烏拉的幾個集體農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之慢，有南方的國有農場的三百個女工，在十個女曳引機駕駛者領導之下，到了彼地，建立一個新的集體農場，組織挺進隊，成立競賽，她們的好榜樣，喚醒了無數的男女農民，很快地就挽回了已往的落後，而開闢了許多荒地。蘇俄的神話，已經將這件事歸入其中，牠成爲五年計劃史的一頁，題目是「偉大的運動，」人們都以熱烈的感謝來紀念牠。

當你在烏拉聽見人們在「鋼鐵機」(Steel Chargers)上唱歌或者敘述到那些曳引機女駕駛者之偉大的運動，與她們在五年計劃中的同樣的功績時，你就好像聽見唱一首還未寫出來的詠史詩，一首新俄婦女詠史詩之狂風暴雨般的吼聲……。

第十章 新生活(The New "Byt")

我眼看着一羣建設者，不停地在那兒工作……我們要創造一個新世界，一種新人類，和一種人與人的關係之新形式……大地日夜勞動。所有的人都在工作，任何人都不能享受懶惰的特權。並且我們還要除滅懶惰者……。

——皮爾乃克(Pilnyak)

前章論及蘇俄婦女如何地佔領革命爲她們造好了的領域。但是並未詳細談到這個新領域在現代歷史上出現的形式如何。這最末一章就是補前章所故意略去的事件。

凡一切人類生活的方式，人類的關係與環境——無論是由法律或只是由風俗，傳說，習慣等規定的——在現在俄國文字中，皆以一個新鑄的字“byt”來統稱，此字來源於“byty”，即英文中之“verb to be”。這個字義中的簡潔豐富處，是不能翻譯的，在土語上包含了錯綜複雜之客

觀與主觀的兩方面；牠包含人類所處的整個環境和人類對這環境的態度。當現在俄國一般理論家三番五次地聲明每種byt都是經濟的，是以生產力與生產狀態來決定的時候，假如我們要談到byt的意義，於是他們除了提出馬克斯在早先就很清楚地與『資產階級的環境理論』(bourgeois milieu theory)劃分開的唯物史觀外，還加上一個必須要了解的原素。在一個國家中，新經濟制度正在以非常緊張的熱烈進行建設時，其環境(billion)決不會定着，決不會一次就解決了，而是在一種流動的狀態中。因此，人與其思想的態度，也不能成爲他四周事物(surroundings)之定着的產物，而是與四周事物一同日日改變的。同時他又使四周事物日日改變。

俄國現時的觀念，認爲蘇維埃創造計劃核心之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在俄國產生一種完全新的環境，並且重新改造byt的主觀情形，改造人對於其環境之關係。生活之新形態，和社會主義的byt，是正在發展中之新經濟環境的產物。換言之，新byt是生活各種形態的總匯，這些生活形態，在一種依據社會主義的基礎以支配生產的而又未達到最後目標的社會中，不是直接屬於經濟的。因此，甚至在蘇維埃國家中，希望總是走在事實的前面；人民雖然以熱誠與清晰的目標以求真理之實現，但真理之孕育，還是較先於其實現。

當一般在言語文字中不斷地討論到新byt的問題時，和人們因時常談起而致誤用了這個字時，都以爲這所談的不是已經存在的而是一種未來的事。其實新byt只是一種度量，由於這種度量，「現在」纔可以——而又應該——估計；只有某種原動力由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而實現了——雖然這些原動力之力量是日漸增加的。在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中，尤其是在兩性的互相關係中，和戀愛，婚姻，家庭中，我們已經能很明顯地看清這種原動力。雖然如此，我們在許多地方還是仍舊看得見新舊併行的事，腐舊的分子還是在那兒掙扎生存。他們以某種現象爲新byt的要素的事，也是常有的，人們時常責別人爲舊時代的產物或殘餘，或者如蘇俄的口頭禪，稱別人爲「舊時代的溶岩」(eruptions of the past)。當人們注意到這種事實時，他們加上一句很風行的俏皮話，差不多可以譯爲：「就是因爲這個我們立在戰線上嗎？」在另一方面說來，雖然也有很新的東西，但牠是不成熟的，是被稱爲「新byt的滑稽面孔」，「正在增長的痛苦。」

無論如何，人們正在努力減輕男女新關係間以及社會生活中——如文化，教育，禮儀——新byt降生之痛苦；前者我們已經談過，現在不再論及，我們以下要討論到後者中之新byt在此處所指的意義。

一 新與舊

U. S. S. R.——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The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約八百萬方哩。六倍於西歐。六十倍於德國，一百六十倍於英格蘭，佔全球地面六分之一。其最南部較意大利的最南部還近於赤道。氣候，地勢，動植物等，南北的差異是非常地大，南方的橘子熟時，北部的雅庫茲克省的夏日，土地最多只溶化了一尺。

因為在自然上有如此的差別，住在這片大地的民族也是如此：根據莫斯科科學研究院的人種學地圖，只西比利亞一處，就有三十二種民族。

俄國民族生在開朗的草原與森林之中，在偉大河流之旁，介於回教與基督教之間，俾威與 (Byzantium) 在其南，日耳曼與拉丁居其西。在這個和平，巨大，安靜的地方，那一望無際的平原與無限的風光，引起一種生命與崇敬的超越意識，並賦與人們以一種闊大的胸懷。無疑的，這就是俄國民族之擴張的性質與俄國文學之史詩的成分的來源。

俄國式的人性，俄國的歷史，俄國的世界，都與其地勢氣候一樣地處於兩極端。當全國中心的

莫斯科，各方面都表現牠是深遠寬大的亞洲之遺屑時，這個笨拙的，污穢的，襤褸的，赤腳的巨人，又由彼得大帝所建立的彼得格拉德來帶上一頂西歐的帽子。

現在，當一切阻礙已經打破，當南與北，已往與現在，上與下，東與西都錯雜在一起時，兩極端的成分，更是彼此衝突。

在蘇聯的每個大小城市，都有牠的「革命廣場」(Revolution Square)，列寧紀念館，十月二十五號街(Twenty-fifth of October Street)——在每條街之末和每個大廣場之間，都有一個高聳的教堂，在教堂中，現時改爲一個飛機庫，或者一個電影場，甚至有時還有一個反宗教的陳列室，站在那些失掉了華美的聖像之前時，你很容易遇見一個農夫，他熱誠地，機械式地不加思索而以手畫十字。他一如塞勿里娜的小說「腐壞的肥料」(Rotten Manure)中的那樣農夫，在臨死時說：「我主上帝啊，小父親啊，請發慈悲接受「布爾雪維克」阿達孟的靈魂。」

伊發諾佛——發斯內孫斯克是蘇聯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六年以前，在我最後去訪那「俄國的「倫巴底」」(Russian Lombardy)那古代的「夫拉提密爾蘇斯達爾」(Vladimir Sevskal)的途中，週圍所看見的，只是森林，森林，森林。現在森林沒有了，你只看見工廠，紡織

廠形成的網，與工人住宅區。但是經過斫伐樹木的開拓後，那些古代教堂的塔與屋頂，對於這空前的民衆活動之猖獗，不勝驚異。

在斯達林格拉德，有一個大而美的花園。是佛爾加河上的一個人民的「普賴特」(Prater)。一到晚間，和着音樂散步的，只是青年人。他們都是成對的，是國家未來之主人。差不多沒有過二十歲的。充滿了活力，歡笑，快樂，不被任何問題所煩擾；無論如何困難的工作，對於他們不過是一種遊戲，一種快樂。但是在這樂園的門外——有一個人，他已經被逐出於伊甸樂園，而現在只能作一個生命的旁觀者，假如快樂的青年自他手中買一束花，他就會快樂的。

在斯達林格拉德的「特拉克脫爾茲羅」(Traktorstroy)廠中，每天出產一百個曳引機，「膳食工廠」(Kitchen factory)每日要烹十二萬碟飲食。人們在鋪着白布，擺着鮮花的桌上用飯。侍飯者穿着全白的衣服。有一個廚房專上牛奶，還有一個專上特別的飲食。雖然如此考究，還是有人時常吐痰在地板上。

有二萬工人住在這巨大工廠附近的時髦的新住宅區中。差不多都帶着家眷的二百五十個美國專門技術家，住在他們自己的特別居住區，並且有他們自己的酒店。在他們工作的時候，派六

十位翻譯員給他們。但是在鄉鎮內，在郵政局前，第一件引起你注意的，就是在入門處，有一個書報桌，佔了半間屋，而在郵櫃後的女子，在我要發一個電報到維也納時，問我那兒是否也有郵政局！

在「特拉克脫爾茲羅」廠中，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鎚打，製造。社會主義的競賽。挺進隊。赤色勞工獎章。紅角（Red corner）。工人俱樂部。托兒所。壁報。圖書室，閱書室，全國各種報紙。勞工男女英雄的像片陳列室：智慧，聰明，緊張，熱誠的無產階級的頭腦。一個完全的新世界，一種新意識，一種新情緒，因此，一種新道德制度——一切如雨後春筍，隔夜發生。這些人中，有不少極端戒酒者。而近在咫尺的污穢惡濁的鄉鎮中，那兒沒有草木，只有更多的瘧疾；大街小巷，盡是作牛飲的酒徒——完全是一些廢物，甚至其廬山真面亦復不可辨，也不能劃歸任何一種階級，他們都飲得面紅筋脹，這種人數之多，就好像舊俄時代的酒徒，在此開了一個會議。

在尼西乃諾夫哥羅德（Nishnyi Novgorod）港：二十個腳夫，排列整齊，正在拉一條極大的繩索。他們要以堆集如山的巨大煤油桶裝在輪船上。彼等急速拉繩，很少停止。當每次拉繩時，其中一人——領唱者——開始唱一種特別的曲調，其聲淒涼而有單調的韻腳。別人隨聲附和。一拉一推——桶只稍微一動。這種工作在彼處猶未機械化。因此，這些腳夫不假思索地拉他們的舊繩子，

唱他們原來的佛爾加歌，好像他們是賴濱（Рыбин）描寫的從前那種『佛爾加的舟子』（Volgo boatmen）。但是現在他們能讀能寫，都懂得初步政治學，其中大部分是勞工挺進隊，許多人加入競賽，以此而盡他們復興國家生命的責任。

時間表上只定十天而實際要兩星期以上，往來於雅羅斯拉夫爾（Yaroslavl）與阿斯特拉罕（Astrakhan）間的佛爾加輪船，整裝待發。最上層，下層，中層，尤其最下層，都擠滿了人。每到一個碼頭，上船下船的人，就有一次可怕的鬪爭。但是上船的人還是多於登岸者。他們的手中，肩上，頭上，時常是帶着數不清的大包小包，以及箱籠等物。有的人還帶着像房子那樣人可以住在內的長箱子向前擠，當者披糜，好像他們是兩條腿的坦克車。人人都在大呼小叫，喧嚷咒罵，你推我擠，隨地吐痰。加之兒哭，女啼，犬吠，而青年人還若無其事地時作滑稽語。擁進這隻不大的一『米爾金紀念船』（To The Memory of Mirkin，米爾金爲一革命水手）的人，是如何的龐雜啊！長髮長鬚，在最熱的天氣穿着羊皮衣的尊嚴的俄國農夫，包着漂亮頭布，性情溫良，大而帶稚氣的臉的村婦。目光銳利的櫻黃色的基爾歧斯人，帶金光燦爛的小帽，穿黑或其他彩色的緊身衣服的韃靼人，細眼的卡爾馬克（Kalmyks）人，兒女環境的孕婦。共產黨青年團員。頭帶高皮帽，胸佩盒子炮，腰橫指揮刀

的高加索的武士。與高彩烈，擾攘不寧的白齒的吉卜西人。紅軍兵士，已往的小康之人，佛爾加區的日耳曼人——雖然在俄國已數代——他們時常不懂一個俄國字，而同時說的德文亦復一字不能解。新的人不斷地擁進來，各式各種的民族，各種不同的文化程度，的確像是一種殖民……事實。上他們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因為什麼要來此處，其目的爲何呢？但是這個『諾阿舟』(Noah's Ark)上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你他們目的地與旅行的目的。不過這是不必須說的。他們要到別處去碰碰運氣。小母親俄羅斯是很廣大的，而沙皇又推翻了，總歸有一個地方，他們可以找着安身之所。

固然總歸有一個地方，不過決不是在輪船的下層甲板上。此處甚至對於那些歷盡辛苦而善於忍受的人都不能忍受。不僅是因為那兒近機器房，在高熱之下熱不可耐，又不僅是因為日夜不息的火光照射你的眼睛——假如是不得已時，這種事還能將就——而第一是因為成千的人擠在那一點小地方，至少超過了四倍原來地方所能容下的人。因此，這些旅客晝夜並肩臥着，坐着，站着，人重人——男人，女人，小孩，中年，幼年，老人——寸步不能移。有的下船，又有的上船。婦女有生產的，小孩掉在河裏又救起來了，碰巧還有人抽瘋……但是，在到處掛着標語旗幟與領袖像片的義

務書報篷中的小販，還是供不應求。我的同艙人曾在奧國作過囚犯而知識很高的紅軍司令，和我談德國文學；同時，寬闊閃爍，經驗豐富的佛爾加河，和灼熱的八月太陽，以仁慈的超越，向着這一切的矛盾而又是事物之精華而微笑。

列寧格拉德的『學者書院』（“Scholars’ House”）是在近沙皇冬宮的尼發河岸上的前大公爵夫拉提密爾·亞歷山大羅維支（Vladimir Alexandrovich）的名宮中最精美的部分（夫拉提密爾是羅曼諾夫朝最末一個皇帝的叔父）。自然此地不很適用。數百人睡在金碧輝煌高大而絕不能使之溫暖的屋中的軍用小鐵牀上。清晨，你必須要趕快去等着入盥洗室，那是三四十人的唯一的便所。在華美而完全裝以希世奇木的板壁的飯廳中，在名貴的桌子上，透明的青銅燭臺之前，預備的是沒有糖的淡茶，麥粥，胡瓜生菜，僅僅有時有像肉饅頭那一類的東西或者真真的肉。

在飾以淡粉色的，充滿稀有的精美建築物中之香氣的大公爵夫人閨房中。現在居住的是學院的經濟系主任盧克麗亞·波格達諾娃（Lukerya Bogdanova）。但是已往她在一個莫斯科區的紡織工廠中作了四十年的工。她雖然不識字，但是自一九〇三年以來就為黨服務（在女工

人之中分散宣言等物)，一九三〇年五十二歲時，她被舉爲『勞動女英雄』(heroine of labour)，而給與養老金。她在現在這個位置已有二年，說話多而且有生氣，喜歡她自己的喉音，她時常重復以下的話，好像她是在指基督：『列寧同志是已去世了，不過她的主義還遺留在世界上；我們永不要忘掉。我們應該步着她的後塵去奮鬥。凡不遵循此路者皆不可救藥。但是我希望親眼看見一切！尤其要眼見蘇聯與國外勞動婦女聯合，因爲德國是宜於文化的國家。尼其沃(Nichnev)，我能親眼看見一切。』

但是，最矛盾的事物，見諸於莫斯科——的確找不出不矛盾的東西——此處是全體矛盾成分聚集之所，就好像在分光鏡中一樣。沙皇首都彼得格拉德中，有引人注目的海軍部大樓的金塔，有筆直的街道，牠是一個裝飾精美，無奇不有，古香古色的城市，牠玷染西歐的精神，其客觀冷淡之狀，使人一看就覺得像一條直線。反之，寬大白石的，又加以『四十乘四十』的教堂的莫斯科，總是天真快樂的，就像鄉下女人；牠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鄉村，不過其中充滿了各種人物——在十八世紀，屋子大半是木頭造成的——是到亞洲的門戶；人是不可勝計的，熱心的，和善的，有時熱烈得像一場夢。

莫斯科的這種情形，到現在還有許多遺留下來。不過今日的矛盾的象徵是更其顯著了。紅場（Red Square）彩色如畫的巴西里阿斯大教堂（Basilius Cathedral），有各種尖塔的「克累姆林」，在許多莊嚴的大教堂之金碧輝煌的圓屋頂探首出來的長頸的伊發維利基（Ivan Velikiy），紅場中最引世人注目的莊嚴偉大的黑紅色花崗石造成的列寧陵墓，凡此種種，都形成一個奇異的矛盾現象。當紅場中有什麼大遊行時，其矛盾情形更爲顯著：如五月一日勞動節，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紀念，或在一月二十二日的列寧忌日，在這種場合中，當成千上萬的人——紅軍兵士，步兵隊，騎兵隊，砲兵隊，海軍隊，男女工人，各種組織——共產青年團，小學生，全國各處代表——一言以蔽之，整個蘇俄的人，帶着他們的標幟，紅旗，勞工旗，及其他徽章，排着無限長的隊伍，敏捷地走過領袖的陵墓，排列整齊的飛機隊——普通人稱之爲「人造天鳥」——盤旋空際，這時沙皇的孤零紀念碑，成了一「布爾雪維克」秩序下的一部分，新與舊合成了如此的一種表現力量與一致，以至無論平時觀念如何的人，都免不了發生感觸。當夜既深沈，萬籟俱寂，紅場浸潤在黑暗中時，紅旗飄揚在「克累姆林」城上，自下照耀，較之白天還更看得清楚——普照到已往的俄國，向上燃燒，彷彿像一枝火箭。

在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是像紅都(Red Capital)那樣，牠的生命之脈不停地躍動，一種內在的動力，一種無數馬力的無形的發動機，使牠的生命繼續下去。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或在什麼地方留戀，你總可以得着一種印象，覺得莫斯科自早至晚都在開步跑。情形的確如此。在六點鐘以前，做夜工的男女工人就開始回家，做日工的則忙忙地到工廠。但是這個差不多有三百萬居民的城市，並沒有地下軌道。因為每一個人不是手藝工人就是機關職員，所以都不在家，在六點鐘時候，他們魚貫而立搶先上電車或汽車，彼此擁擠，啼叫，呼喊——使在莫斯科的最短的旅行，都成爲痛苦的事，其情形是西歐人所夢想不到的。駛車多爲婦女。在八點鐘或更早些——因爲誰也不知道等車要等多大的時間，假如你終於弄得遲到了，那是要記過的——第二批人又在停車處候車了，他們忙忙地要到辦公室，機關，委員會，鋪店，學校去。這樣一直忙到十點或十一點鐘。同時主婦又要出去買東西；自一點到兩點，有的小學生又從學校回來了，到三點鐘，人們又開始回家，一直到黃昏，接着赴俱樂部，演講會，會議，戲院，電影院等的時間又到了。這樣一直到深夜兩三點。甚至在清早三點至六點，莫斯科的街上都很少有空閑的。一個巨大的羣衆，整天不停的在城市中活動；在已往而常常活潑色彩的住宅區，每一步都聳立着最新式的建築物，幸喜一般人後來都棄絕了這些

建築物的暗淡色彩。

初看起來，莫斯科的這些羣衆，你會想他們是很貧窮的，衣服襤褸而破敝，因為俄國現時還缺少衣服。因此，你由衣帽鞋等，就立可認出男女外國人。雖然如此，這一幅圖畫的色彩是快樂的，其極端相反的事物，不斷地使你驚奇。有時一輛運貨汽車風馳電掣地駛過去——你簡直無法看清牠是從何而來的——其中擠滿立着的紅軍兵士，看起來非常地快活，頭上戴着灰色的盔，牠的後面就緊跟着一輛餓得半死的馬拉着的破舊的 *исповодник*，或者一輛破爛不堪的小馬車，裏面裝上一個巨大的沙發。甚至一塊有兩扇門的壁板。有時一輛有長車箱的車子走過去，後面跟着幾個人，他們竭力不使人注意。這就是——在從前是一件大事——莫斯科從前中產階級的殯儀；不但在生前，即死後他們都要設法不使人注意。

在他種情形中，當今的蘇俄，死已經不是一件刺激人的神祕事了；反之，牠與每件發生的事一樣地是純實際的，人們對於牠沒有時間來思考。並且認為牠對於正在繼續掙扎的工作大綱是一種阻礙。蘇俄的青年，沈醉在生命中，對於死的觀念普通較之他國青年為淡漠，加之他們拒絕去認識其他一切問題，所以在這一點上是有些迷惑。有一次我在莫斯科遇見了一個赤色殯儀——一

個覆滿紅花的女共產青年黨員，臥在紅色棺車中的打開的紅色棺材中；拉棺車的馬也飾以紅色的馬具，一隊穿着制服舉手作敬禮（總是預備好的）的女青年黨員排隊一齊走，同時一隊青年黨的風琴音樂隊，伴着這國際的行列前進。這確是一個莊嚴，美麗的景象，不過牠差不多也可說是任何政治的羣衆游行的一部分。

在莫斯科，每當下午工作完畢之後，自鋪店或者手工場或者小辦公室等處的下而窗戶中，你可以看見以下的情形：十五或二十個男女，坐在一間屋子的椅子，臺子或桌子上；他們面帶倦容，早就預備要回家的樣子。有一個男人站在屋中正在演說。這些在座的人，有的一半是在聽講，有的很明顯地是難於集中他們的注意力，同時有的人不斷地向演說者發問。但是演說者儘自指手畫腳，搖頭擺腦地繼續他的演說，並不顧別人的插問。簡直無法等待他演說之收束。收束一段又來一段，如此下去，時常要好幾個鐘頭。這就是工作畢的集會；這些集會也許是要練習無限止的自我批評（*Ssamokritika*），也許是以後黨綱中實行而毫不留情的清黨之初步。不管牠是什麼吧，演說是全俄的一切會中——開會時不僅在午後，晚上更多，甚至在清早——一定是有的，而這些會每一個人都必須到的。

在我清早九時到斯達林格拉德的旅館中時，第一件引我注意的事，就是旅館中僱的女侍者的一個集會。在莫斯科，二十四小時的每一小時，甚至在電話中，你都可以聽見街上以大聲疾呼的方法廣播擁護五年計劃或別種的宣傳演說。俄國人，無論男女，都是天生的演說，雄辯家，他們之愛說話是如此其甚，以至在這種機會之下，時間好像是站着不走了，甚至在今日，那舊有而習用的俄國字 *asyeychass* (即英文之 *directly*) 和 *podoshditye* (即英文之 *wait a minute*)，還可自「布爾雪維克的拍子」(*Bolshevick tempo*) 中聽到。就如同那些舊式官吏總是希望繼續延長官吏制度一樣。

莫斯科的街道，在別方面也浸入政治範圍中。不可勝數的書鋪的窗中，所陳列的，除了國際與俄國的革命領袖的像片與半身像之外，大半都是現代問題的書籍和專門技術以及政治文學的書籍。在所有的公共地方，在一切建築物中，機關中，電車中，總之只要有機可乘的地方，就有密集成列的廣告，標貼，訴求，其中包含勸誡，格言，布告，以及普通政治性質的口號。此外，在城市繁華區中，巨大的字母的格言寫在寬大的布條上，掛於過街中，每隔數百步就有與此差不多的東西。因為這些時常變換的，永是漂亮的，有色彩的，動人的，顯著的，好像是為兒童計劃的堂皇的宣傳品，使得城市中

有一種特異活潑快樂的景象。這就無怪乎有的外國人拿莫斯科以及全蘇維埃聯邦比作一個巨大的幼稚園，尤其是當他們看見俄人對於求知的普遍的熱心——這個幼稚園的學生的興趣。是不斷地被引起與保持活躍的。確：男男女女站在陳列有閃光的，繪畫的，漂亮顏色的東西的鋪店的窗前——尤其是古玩鋪，圖畫珠寶鋪——細細地賞鑒與分析，永遠不倦去看每樣東西，他們不是小孩嗎？一次，在清晨兩點鐘之前，一個抱着小孩的婦人，在一個古玩鋪的窗前止住我問我板上畫的那個獸形鳥是如何的稀奇，這種事能發生在別處嗎？假如我再說一切跳舞，音樂，唱歌，遊戲等，對於這個極端緊張的藝術化民族是很要重的，甚至在所有的機械化生活當中他們都不能離那些娛樂，則我們就不用擔心五年計劃與機械化的過程，會將他們天真的民族精華，他們天賦的資質，他們接近自然等性質磨滅。

莫斯科街上最後使我驚奇的，除了前面已經提過的那些孕婦外，就是許多在衣服與舉止上與男子相差無幾的的婦女。我們常常看見年老樸質的婦女吸煙，差不多還沒有肥胖的女人；還有許多自東方或西比利亞遠方來的女學生，幾乎全是女共產黨青年團，帶着紅的頭巾，她們點綴一部分全城的氣象。許多婦女不帶帽子而帶男子的 *Кепка*。

每次我從莫斯科回國的時候，各方面都要問我：『俄國人穿什麼衣服？我可拿阿賴夏（Olsha）的劇本『善舉之一覽表』（List of Benefits）中的女戲子剛查羅娃（Goncharova）回答』『黎的白色裁縫的話回答他們：『在晚上他們穿清晨的衣服。』』『那一種材料最時髦？』『我想是鋼鐵吧。』』『舞臺上的戲子穿什麼？』『氈鞋。』』『什麼，穿大衣與氈鞋？』『不是，你看不見大衣。』』『因為什麼？因為他們不注意大衣嗎？』』『不是，因為他們不注意舞臺。』』

一位很著名而同時又是很聰明的德國女作家，對於莫斯科的敘述是大有不同，這是真事：她在不久以前，自外交界之優越地位中觀察蘇俄婦女——無疑地是在外國公使等的宴會中——她以為她們最缺乏的是脣膏，香料，和沿花邊的裏衣。但是她錯誤了：脣膏與香料決不是蘇俄所缺乏的物品；這些東西很多，並且供過於求。一個『幕網之半身小像架』（Little bust-supporter of curtain net）就給與了她一個巨大的印象，而甚至比『不可勝數的人時常在謁列寧紀念像的紅場』所給她的印象還大，這個事實就證明了她的莫斯科旅行，是一個可惋惜的錯誤。

自然蘇俄婦女對於衣着不是完全沒有興趣的。一切婦女雜誌，除了充分報告經濟問題，五年計劃，和競賽外，專劃定一欄登載衣服的樣式。簡單的樣子最得擁護。裝飾品是禁止的。然而，以一個



Patterns of The Soviet Uniform Dress.

(Byt Costume)

蘇維埃制服樣本（新生活服裝）

女共產青年黨員注意外表爲羞恥之時代，早已過去。所需要的只是是避免過分的興趣，以免流於賣弄風情與女性的矯飾。梅奈爾特(Mehner)在他的『蘇俄青年(Youth in Soviet Russia)』一書中，曾談到這個問題，此問題曾經熱烈地討論一時：

假如一個女孩有波紋的頭髮，假如她是塗脂抹粉而美其衫服，那嗎有人就要叫她：『這個俗物簡直像一個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的確她也許要被逐出共產青年黨團。不過假如她不注意外貌而隨隨便便，於是那些以不整潔與樸質不相宜於無產階級者的人，又要以同樣的話施之於她。人們之間有一種不確定的意識，沒有人願意作一個俗物或一個小資產階級，但是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應該如何舉動。

一個人太注重外表，仍舊認爲是反無產階級的，而且在這一方面又是『舊時代之溶岩』(eruptions of the past)。例如你，時常可以在電車上聽着婦女們激烈地辯論：『你帶上一頂帽子，你自以爲是屬於知識階級的。』『我所以帶帽子者，因爲牠便宜些；一條頭巾

要花費六十個盧布，而一頂帽僅用十六盧布。」男子中之執袴性氣，更不能得好評。結成蝴蝶形的領巾，就如同西歐人之用單眼鏡一樣。

一個半官式的報紙對共產青年團員的舉止之惋惜，證明現時的情形——甚至在共產青年團中——不特大大地改變，而且自從人們認為注意服裝為不當以後，已經轉變到極端相反的情形上了。據說列寧格拉德的共產青年黨員，在戲院或影戲院中，凡衣服不好的女同伴，他們一概裝不認識，第二天到工廠時他們自稱沒有看見「見斯麥爾諾夫(Semirnov)所作共產青年團與女子(The Komsomol and the Girls)」。

在工業區中，正在根據科學與數理的基本，產生一種合於經濟，實用，儉樸的制服，以解決服裝問題，並以攻擊「不幸的時髦意識作用(wretched fashion psychosis)」雖然事實上現在很少見這種「時髦意識作用。」近二年來，在莫斯科有一個機關叫「尼西」(Nishi)即服裝工業科學社(Scientific Institute for the Clothing Industry)之縮寫，其中專門研究職業的服裝問題。主任馬蘇麗娜(Mashurina)女士本人就是一個藝術家，除了一些做顧問的著名美術歷史家外，她還與全部受了很好訓練的助手一起工作。她說：「服裝是社會的經濟的，社會的構造的反應。

我們衣服的方式，應該表現工業時代之特性。在今日的蘇俄，服裝需要簡單，樸素，合身。最重要者，服裝應合於一個人的職業，但是審美的效果如顏色之類，也是不可忽略的；在鄉村中，他們也許可以回想從前的民族服裝。

已經製出來各種不同的職業服裝樣子，這件事做得非常地徹底，每種特種工作之特種需要，都在當地詳細考究，觀察動作，測量時間。一個駕駛曳引機者，一個擠牛奶的婦女，或者一個集合農場婦女應該如何穿着纔為合適，大概的樣式已經定出。最有意思的，就是本社社會打算定出一種標準服裝，其獨立部分，袖子，前襟等，可以隨時換改。這種標準衣服，還有一種便利，就是當某種情形之下，可以部分地翻轉裏子，換掉地穿，而裏子是紅色的。這種「新生活」服裝已經設計好了數種。其全部的方式，顏色，剪裁，都表現技術上的實用，而同時又表現新生活的特徵。

所說關於街道與衣服的情形，也可以引用到文化的其他方面。這些地方也是新舊交混，人們也是自誇其新式人類關係之進展，同時在另一方面，舊有的風俗與惡習仍舊有很大的勢力。因為還是缺少能幹的教育家來對羣衆作有系統的指導，羣衆中有的人最近已經是向前進，而大多數人還是連教小孩的事都從來沒聽見過，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已經提過斯麥諾夫之半官式

出版物——其目的在喚起對於一種情形之反面的現象之注意，並尋求補救方法——說到列寧格拉德的婦女收容院的情形，院中女子大半為從前孤兒院的人（我們知道在沙皇時代，院中情形非常之壞）：

牀鋪既不通空氣，而衛生之基本的需要都缺乏，不僅膳宿的事情如此。女孩子們自己報告她們的污穢之處，說她們從前如何地貪睡，如何地不洗濯，或者不用肥皂。只是到戲院或為社交的緣故，纔刷一次牙。

最近在『無產階級的幹部』（The Proletarian Cadre）這個雜誌上，發現了以下一個美妙的故事。

娜斯霞卜蘭尼娜（Nastya Pranina）是一個第三學期的學生。她決定在睡覺之前洗腳。她的拿來一桶熱水，坐在她的牀上，將腳浸在水中，但是她找不着她的腳布了，因此拿起她的牙刷，

將腳趾的上上下下，連腳縫都好好刷了。娜斯霞走到洗臉架前洗臉，以同一牙刷又來刷牙。而娜斯霞仍舊是新生活中之最講衛生者。

還有許多惡習仍未滅盡：咒罵，發誓，粗暴的舉止，及俄雷阿利烏斯（Olearius）在十七世紀時所抱怨的社會缺乏禮貌。這種情形又與施惠，仁慈，人道，和善，不自私等美德相合。例如，每輛電車內都爲孕婦保留六個坐位；在純理論上，這是對母性與弱者最好的敬意。不過這幾個坐位要經過一番爭執纔能達到原來的目的，這種事時常發生。一個男子讓一個拿着包袱物的老婦先上車，或者在車上讓位子給她的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總之，使人感覺對人缺乏體貼，甚至十分贊成男女平等的人，也不免覺得在有的地方對婦女之減少的禮節，是實行得太過了。

另一方面，在黨員中——甚至對上司——用親熱的第二單人稱的影響是非常的好，這種習慣是得之於共產青年團的一般年青人中的。像從前俄國習慣之稱呼姓名的。現在已漸次減少。總之，社交上的談話方式已經簡單化（有一時甚至見面握手的事都受排斥）。現在你聽不見「先生，」「太太，」「小姐」一類的稱呼，只聽見「公民，」「同志。」假如有人由於習慣而用「紳士」

的口氣，那他就要受同樣的責斥：「現在沒有紳士了。所有的 *дворяне* 都沈諸黑海之底了。」因此，俄國的談話習慣正在肅清舊時的尊敬的習俗，這是空前的發展之過程，而西歐的言語，還在繼續使用中世紀的殘物（“*Monsieur*”，“*Signore*”，“*Senor*”等字，是由封建貴爵的稱呼“*senior*”而來）。其餘，由此類推，就知道蘇俄言語是合於適用的；一方由於最近發展中之技術名辭使其豐富，他方由於商業性質之簡寫，起首字母之縮寫，以及似乎很醜陋而在聲音上又違反俄國文字之精神的各種不同的新方式等使其粗陋。

俄國人已經勉強屏棄了一個俄雷阿利烏斯所非難的一點，就是饕餮之惡習，尤其是過分的肉食，蘇維埃城市中現在有許多無肉的「蔬食主義者」的飯店。彼處依據新生活是要勸客人在入座之前先行洗手——不過現時不說很少而又很貴的肥皂沒有，簡直就沒有地方洗手。普通說來，缺乏肥皂和其他文化所必需之品，對於物質文明，清潔，衛生之缺陷所應負的責任是到如何的程度，這是一個公開的問題。甚至體育，雖然竭力提倡，但是因為缺乏重要物品如足球，槌球，打球棒，溜冰鞋等物，所以不能發展。

再者，與外國的隔絕，也妨礙了文化之進步。許多俄國人沒有一種標準能將俄國與外國的習

俗來作客觀地比較。此外，前面已經提及的對於西歐文化估價過高之傾向，使你時常發現因為完全不懂得真實的歐洲文化反而估價過低。你也可時常遇着一些人，他們因為某些成就而非常得意，不知這些成就在西歐早已視為當然之事了。我十分不願意提及，研究專門科學之整個的熱誠，就陷入這種情形之中。在列寧格拉德一個工務女職員叫我對她公事房的自動電話機加以注意，當我告訴她這種用具在西方是非常地普遍，她顯然很失望；她還同我爭辯，以為至少美洲還沒有。總而言之，生活之外表，要從文化上看來，在現時決不能算滿意，其不滿意之程度還更甚於我們以後要論及的住房情形。除了一小部分人民之環境外，一切在俄國都沒有。所不同者，現在的人已經認清楚了缺陷而努力去克服牠們，並且開始有系統地去創造克爾脫拉（*Kulturno*）之物質環境——這種 *Kultura* 現已在各方面宣傳，並為此已經喚起了一種絕對的需求。文化的五年計劃有一種明確的目的，就是要急速提高蘇俄羣衆的生活標準。我現以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的話來結束：

我們國中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已經證明他們自我犧牲的志願。不過我們不能專依賴熱情

與希望而前進。工作的力量，需要好的食物，好的居住環境，總之，是要衛生，如此纔可以盡早達到正常人類心理所指示的準則……必定要等勝利達到後纔尋找人生的享受，會使爲未來而作苦鬪的現在沒有一些快樂，這是一種錯誤（見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月份的「新俄國」中之「蘇聯之文化事業」）。

二 生活之社會化

蘇俄復興弱點之一，就是住房問題，或者無寧說是悲慘的住房環境。建築的活動，不能供應所需，而又不能與城市人口增加之比例相稱，其重要的原因是因爲鄉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尤其是莫斯科。就是新建的房子，也有許多需要改善之點，雖然牠們享有家庭建築物中的許多近代的發明。只有在有幾個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區——差不多都根據美國的式樣——纔有幾分預示未來之社會主義的城市。從彭提賴孟·羅曼諾夫（Pantyeleymon Romanov）所作的聰明的小說『三雙絲襪（Three Pair of Silk Stockings）』中引證一段，以形容蘇俄人民如何居住，甚至在新建的房屋中：

這巨大的房子……是非常地動人，因為牠的正面很堂皇……五層樓的每一層都有小巧美麗的洋臺，欄杆雕刻得好像葉子的捲鬚，因此，看起來像一籃一籃的花。房子的整個前部都漆成淺紅色，鋪道上置有裝煙頭器，一到晚上，五層樓的窗戶內都有電燈。裝以鏡子的大廳中，擁擠着許多巡視的人；牆上掛着黑板，寫着居住者的姓名，其旁有一張蒼蠅爬過的紙，寫着以下的字：

「市民們，節省你們的精力，請用升降機！」

在升降機的門上，黏着同樣的紙，也是有無數的蒼蠅足跡，上寫一簡明的語句：

「升降機現不能用。」

當房屋修理好了之後，就開始用升降機，不過第二天就不轉動了。有許多房客興高彩烈地要試試這升降機是否能裝載比牠裏面小布告所指示還要重的東西。結果房客們現在不得不步行上樓，晚上還得瞎摸，在黑暗中你碰我，我碰你，你駭我，我駭你，因為樓梯上的電燈泡已被人偷去。這些電燈泡雖然已罩鐵絲網而又裝得很高，但還是時常被人偷去。管理當局早已承受這種情形，最後放棄了樓梯上有電燈的便利，而房客也不願自己出錢來另外買。

在每個房門上有一張卡片寫着許多房客的姓名，在每個姓名之旁，註上要找某位房客要按幾下電鈴的數目。

門鈴普通都經過三個步驟。起初你看見一個油漆一新的木盤，中間有一個白色鈕按。繼之木盤與鈕按不翼而飛，所餘者只圓形的木底和兩個小銅片。接着木底又復不見，電線的兩端就脫穎而出，假如你要按鈴，必須將電線的兩端接起來，當這線頭又不見了的時候，你就得親勞費手打門了。但是你又不能記住打門的次數，因此引起全樓不斷的嘈雜聲。

……屋中所居者，一半爲知識階級，一半爲工人階級。後者有許多小孩，而知識階級則有不可勝數的狗。

……在後樓，煙氣與菜味觸鼻，好像你進浴室的水蒸汽一樣，在每一層的梯頭，對着打開的廚房門，放着木箱與垃圾箱，其中裝滿了各式各種的廚房的廢物：胡瓜皮，雞蛋殼，西瓜皮等。有的垃圾箱已經滿出來了，在各處地板上，甚至每步階梯上，收集了許多廢肉廢菜，在狹的階梯，小孩子以西瓜皮來作臨時的足球戲。污濁的貓，又增加了污穢與零亂。

克斯賴科夫 (Kisrail Yakov) 所住的那層樓，住了十家人，共有二十七個人口。

兩面排列着門的長廊，堆滿了箱子，籃子，碗櫥。結果長廊成爲暗無天日，當房客要從廚房或廁所回他們的屋內時，就會碰到許多角隅上，撞破了前額，擦傷了膝蓋，咒罵那些放東西在此的人們，雖然他們自己箱籠也佔了相當的地盤，而在黑暗中又分辨不出你所碰的是別人或是自己的東西。與房子的正面大不相同，每層樓就像傢俱店或者典當舖，那兒東西堆集起來就好像正當拍賣之後……。

廁所是在廚房外的一個小穿堂中，牠永久地被人佔用。早上也用，中午也用，晚上也用。

「那個鬼又坐在這兒了！」有一個人暴跳如雷地說，他非常地失望而又暴怒，因爲他從屋內到廁所來了幾次都空跑了。時常有人佔這間屋子的緣故，大半因爲牠是浴室兼廁所。

樓中房客的職業與社會地位是各式各樣的，好像是因水災而來避難的，每人都似乎是匆匆地安置下來了。其中三分之二是受過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工人階級。代表後者的是兩個鐵匠和他們的家眷，與一隊泥水匠；每當他們從自己的屋子到廁所去時，總留下一長條白腳印……。

這個與實際生活相符合而又充滿特徵的描寫，還需要一點補充。新舊之矛盾，沒有像蘇俄的

房子 (House) 與家庭 (Home) 那樣的顯著。最令人驚奇的，就是呼聲甚高的文化要求與不成比例的實現方法中之矛盾。一如羅曼諾夫所描寫，凡日常用的物件一旦損壞了，他們不修理牠，認為根本就沒有那東西，這的確是俄國人的特性。大部分的俄人對於他們週圍的東西沒有顧慮周到的觀念，不很愛惜，東西很少用，一用就用得不能再用。在這種環境下，尤其當現時房屋缺乏之際，西歐意識中之家庭文明是提不起來的，這一點是絕無疑義。住宅內公共地方之情形更壞。特別是火車、旅館、輪船中之廁所，其不可忍與不衛生之情形，簡直是無以復加。提夫利斯 (Tiflis) 地方的認為很優美的『東方旅館』的一個廁所上所寫的『女廁所』字樣，令人覺得是在開玩笑。在另一方面，頓河羅斯托夫 (Rostov) 的一個旅館，又有一個如下的告示：『市民們，旅館侍者和你們一樣同屬人類。請舉動小心，務使你走後不至費力掃除。』

在住房中，居住者甚至以最大的願望也不能維持清潔與秩序，因為房屋都是非常擁擠。在房子的內部，舊而刺眼的俄國人的色彩的感覺與色彩的欣賞，產生一種相反的結果：滿牆淋漓顏色不良的翻印之物，和陳列滿屋的小雕像——列寧半身像也在其中——都是俗不可耐的紅色，其審美觀念之惡劣，也足以驚人。與在俄國很受歡迎之來自外國的影片與小說是一個有價值的對

個凡較一個忠實而熱衷的革命家之家庭佈置稍帶小資產階級性的東西，殆不能想像；一個人時常驚奇地問他自己，這樣矛盾的事，如何能聯在一起。無疑的，羅薩·盧森堡（Rosa Luxemburg）從獄中寫出來感人甚深的信，假如在今日是失名的話，就不免要被這些對他們四壁的鄙俗之物而能容忍的人們，罵爲是帶小資產階級性的東西。

執政者對於現時住房情形之不宜於新生活之發展與新生活之激勵這種事實，也的確看得清。有一本宣傳冊子上說：

我們已經屏絕了許多舊的生活方式，不過我們一部分仍舊是已往的習俗與傳統的奴隸。工人自日常的經驗，知道工業之節拍與其他仍舊存在之生活情形中，有多大的一條鴻溝。他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劃分爲二。白日在工廠的社會生活中竭力合作，而被生產工作的熱誠所策驅。但是當他工作完畢回家之後，馬上就陷在最守舊，可怕，和自私的環境中了。

在蘇俄的家庭中，已往的生活還強烈地堅持其生存。你不但在鄉下可以看見架起來的舊式

牀鋪，就是在城市中也看得見。甚至在莫斯科的「紅羅薩」工廠（羅薩·盧森堡）中的女宿舍裏還未廢棄這種牀鋪。雖然各方面都攻擊宗教，但是舊有的光輝的聖像仍然未完全絕跡——自純藝術的眼光看來，這是俄國人的靈魂，俄國人的特性，俄國的民族之唯一的表現。一次，我去拜訪一位著名的女共產黨員——她因故不得不與她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我看見她小孩的搖牀放在聖像牆之下，十分驚異。她解釋如下：她的公婆是舊派人，他們不願放棄他們的宗教，甚至還要去看望那尊敬的牧師。在老年人與青年人之間有一個默契就是無論如何各不相干涉。只是老祖母暗地裏煩惱，因為她的小孩子還沒受洗禮，每當她拍嬰孩睡覺時，她總是唱：「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只要你受了洗禮啊。」自然小孩的父母也聽見這個含有暗示的催眠歌。結果決定這小東西長大不要受洗禮，不過要放在聖像之下，就如此決定下來了。其餘的，因為牠生於革命第十四年——就是共產主義時代——牠就命名為伊雷克特利非卡茲亞（Telectrifkatsia）。但是有一時牠的父母猶豫了很長的時間，他們是否不叫牠為阿基塔（Agita），列寧娜（Lenina）或者孔妙娜（Communa），因為這些以及與此相同的名字，在蘇維埃的今日是風行一時的。以下是一首著名的四行詩：

我們的生活是循着一條新路，

已往的像礦山那樣爆裂；

我們的兒子要命名爲「五月」

我們的女兒叫「十月」。

過分擁擠的房屋，使一般人脫出家庭，正是因爲有計劃的集體化——新生活之重要條件之一——而至如此。但是，俄國人的癖性，再加其強烈的社交傾向，遠不及西歐人之喜歡孤獨。當我在佛爾加河上旅行時，輪船上一位旅伴告訴我說：「我和我妻子只有一間屋子；我們住在那兒，假如有人和我們一起而感覺得舒適，並且我們也不會打擾他，他就可以住下來。我們不在乎。」革命前俄國所追逐的社交生活，因爲時間與房屋之雙倍缺乏而中止了，假如環境許可的話，俄國人的好客也許立刻恢復。但是現在人們彼此的拜訪一天少似一天。格拉德科夫（Гладков）的小說中之一位主角所說的話，是非常地有意義：

在我們疲乏的工作中，我們不觀看別人；我們重視他們，僅僅是因為他們在完成一種固定的工作……當我在工業辦事處的整個期間——五年——我從未一次拜訪過我的同僚，並且不知道他們的興趣是什麼，需要是什麼。人與人間之聯繫是斷了，自我們生活中失去了。而我們的生活——是勞工過程的永久的影響。

對於那些不完全專心於工作的人們，離開家庭這個問題是比較困難。在蘇俄，一個人可以消遣時光的咖啡館是非常地少；茶樓酒館是更少了，其餘所有的街頭賣笑者一概沒有了。因此，人們只好去赴集會，到戲院，電影院，尤其喜歡到俱樂部，此處的會員人數本來就很多，如此一來，更是日漸增加，俱樂部的組織亦在嘉獎之例，因為認為牠們是新生活的培養室。在蘇俄，沒有一個工廠或合作社沒有牠們自己的俱樂部，至少有一個滿置書報的「紅角」。俱樂部中舉行戲劇的表演，音樂會，講演會，象棋，將棋，彈子等都可玩；人們利用閱覽室與圖書室，借此互相交談。

整個的傾向趨於一方，結果不出全體生活之社會化的範圍中，但這也可以說是私人生活之

解體。假如不吸收個人於羣衆中，不打破隔離人與團體間之屏障，則新 *Order* 是不可能的。至於說到主婦，關閉在家務範圍之內，這種障礙最難克服了。新式生活是否可能這個問題之解決，完全有賴於婦女之能否走出家庭而加入社會化之偉大的程序。這與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婦女加入生產的問題有關。列寧在當時也曾指出這件事之重要與迫切，自此以後，大家皆以從家庭奴隸中將婦女解放出來是絕端地重要，這不但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關——因為如此可以增加無數勞動力——就是自政治的立場來看也很重要，因為「家庭的環境，會磨滅婦女的才智。」雖然想盡方法使婦女在家庭中之活動與養育嬰兒，與男子的生產勞動相等，並且不亞於男子的尊嚴，但是一般人還是以為這種工作是應該消滅的，因為當撫育嬰兒之事完全社會化了的時候，這種工作是不必須的而又是不合於時代的。根據蘇俄的輿論，在合理化的生活中，其不能合理化的家庭工作，是無權生存的。

列寧某次曾說過：「婦女的家庭生活，是在無數不關重要的瑣事中之每日的犧牲。」目前的統計學者，也以爲女性勞力之用於家庭中，對於社會經濟有很大的損失。根據他們的計算，仍有約八百萬的主婦，她們的不能合作而至使工業建設蒙受損失，這實在是事實。根據蘇俄工農

調查的數目，在蘇聯，每日要浪費三千六百萬的工作時間在家事中，反之，以工廠的生產力來做這些事，只要六百萬工作時間就可得同樣的成績。因此，如果要集中食物的供給，每日就可節省三千萬的工作時間，就是解放了四百萬人手來做工。

但是蘇俄的主婦除了消磨在廚房的時間外，我們還應該計算上她更困難的事，其費時並不亞於在廚房，那種情形西歐人只有在戰時纔經驗過，就是：魚貫而立。一位受了統計學家的影響的主婦在 *Rabotnitsa* 上寫道：

本年有一百七十萬婦女加入生產工作。但她們同時是能自廚房與家事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嗎？除非她們自己努力，這種事是不會實現的。請想想！那一百七十萬婦女，每天魚貫而立不下於兩點鐘。這樣每天要費三百四十萬工作時間，這就等於一個工廠有二千女工，不停止地工作八個月。

並不是不明白那有勢力的剝削理論，這種理論認婦女為家事中之犧牲者，在家庭中工作的

妻子與母親，在蘇俄中是工作時間最長的工人，這是人所熟知的；她們的工作時間至少要比在工廠的人多五點鐘。至於時間，實際與理論是相反對的，甚至出去作工的婦女，仍舊要作雙倍工；一個女工人，當晚上很疲乏地從工廠中回家，還得要補作她白日不在家時所未作的事，而時間還不夠分配。就是她不到工廠去時，也是如此，她要忙於洗濯，縫補以及一切家庭瑣事，在滑稽報紙上我們時常可以讀着如下的滑稽故事：母親站在洗衣桶前，回答要求帶他出遊的兒子說：『你在想什麼！是啊，今天是我出去玩的一天。』在此，我們又只好以未來的希望來安慰我們自己。

無論如何，一般人現在已經看出來，新社會主義生活之不能依賴沒有訓練和對於當今重要問題沒有興趣的家庭婦女而建立起來，尤甚於——引一句老生常談的話——社會主義之不能賴無知識的人而建設。『廚房是黨細胞之仇敵！』『扔去鍋盆！』都是普遍的口號，一個聰明的箴言說：『廚房與結婚之分離，是比政教之分離在歷史上還要重要的一件事。』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已經看見許多婦女走上『自廚房到工廠』這條路上來了，尤其是在最後一年。有一次，有十七位自列寧故鄉烏蘭諾夫斯克（Улановск）來的婦女，在婦女雜誌 Работница 上發表意見說：『甚至在現在，在革命第十五年的時候，她們仍舊關在廚房中什麼都不知道，』在另一方，一位解放了

的主婦以一首四行詩表示她的滿意：

飾着紐帶的頭巾，
有玫瑰色的花邊。

我原爲人婦，與人作湯羹，

而今加入了婦女之羣。

同時，漸漸地家事與廚房也並不是與生活隔絕的孤島了，時常有許多主婦並不與廚房告別而非常的「活動」——在蘇俄是如此說——這就是說她們一方還做政治工作，甚至加入生產。當本地食物供給的缺乏需要主婦之有組織的合作來補救時，或她們被舉爲代表而派定午後的義務工作時，加入生產的事更是時常有的。烏拉礦區的主婦，因爲要挽救落後，所以組織了一個勞工挺進隊；在斯達林格拉德，有五百主婦組織了同一的勞工挺進隊，以備辦伙食，在有些地方，她們聲言願意在附近的工廠或集體農場中於一星期中做一兩天義務工作——如此以免我們在家閒

坐吃葵瓜子。」

廚房與生產間之鏈環已經接近，那末向廚房之社會化與真實新生活之發達是已經前進了，這是無疑的——雖然遲緩的發達不能與如暴風雨的希望並駕齊驅。這個過程，由於經營單獨家務之困難而加速，我們前面已提過的魚貫而立之需要，也是這種困難之一。我們必須承認，在蘇俄作一個主婦，並不是什麼快樂的事。一切東西都缺乏，簡直沒有希望找着一個女僕——在蘇俄稱爲家務工人——來作幫手，完全僥倖可以得着一個這種事是沒有的。主要的原因，是『扔去鍋盆』這種口號也同樣地影響了家庭工人。自然，從五年計劃開始以來，從前的家庭工人應當努力改進，她們要作曳引機駕駛者，作技師，汽車婦——並且也達到目的了。在伊發諾佛發斯內孫斯克發生了一件事，彼處好幾百女僕成羣地湧入工廠，而使原來的熟練女工不得不反回家庭中去。這是一種不良的交換，所以凡要求入工廠的女僕，必須要證明她們的主婦是不用她們而方許入廠。

普通，女僕的地位，是從鄉下新進城的女孩們的過渡辦法，時常是很短的一個時期。我現在說一個這種鄉下女孩子的故事，自某方面說，我們可以拿她爲代表，雖然普通女僕不是爲愛男子而是爲愛獨立與有收入的職業以突然中止她們女僕的生活。

巴霞 (Paasha) 來自利阿桑省極遙遠的地方。當一九三〇年冬天我在與我同住的莫斯科的朋友家認識她時，她只十九歲，那時她新自鄉下來。她穿着長統氈鞋和一件羊皮襖，頭布是圍得非常的嚴密，以至你只能看見她的雙頰與灰長的眼睛。她很少洗濯，睡覺時差不多所有的衣服都不脫。巴霞從來未進過城，她沒看見過電車——沒有馬，也沒有車頭——不肯開電燈，因為她以為那是魔鬼發明的，每當電話鈴聲響時，她大呼而跑出屋去。但是她已經開始讀書寫字，並且似乎是很有天資。

四個月後，發生了第一步的變化。氈鞋，皮衣，頭布都取消了。巴霞穿着自己很精巧作成的簡單布衣和沿邊的鞋子；黑而粗的頭髮剪得很短，整個的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假如不能說是美麗的話，也可算是聰明而有精神，強健的體格有一種優美的姿態。

白天，巴霞看許多書，凡她得着的書她都看，尤其關於浦什金，科羅楞科 (Korolenko) 的高爾基等人的著作；她的工作並不多，與六歲的加利克是很好的朋友。到晚上，帶上一個紅頭巾，去赴約會；她要赴一兩個區會議，或者去作家庭的調查。就是說：她是家庭工人的代表，因此，她調查我們所

住的那個家庭合作社的許多組房間，看看主婦們是否九時以後還在叫女僕作工。假如她發現了一個她的同類在這時工作，而她這個同類當着主人的面說她是自願工作的，那她就兩手插腰地站着，並且以一種有意義的眼光對着這「剝削者」說：「我們知道這種自願的工作！」充着滿懷的階級意識地樣子走出去。

但是假如我的朋友——她的主人——自己有時晚上要出去，那她就要問巴霞所安排的是什麼，因為加利克不能一個人留在家裏，自然他的媽媽必須讓巴霞一步。因為：「巴霞是在政府有一個地位，她的每件事應有優先權這是很明白的。」但是又不能辭退她，因為她要以沒有家為理由而要求留住。如此則什麼都得不到。

六個月以後，我又回到莫斯科，巴霞又經過了一個新的，完全想不到的改變。紅的頭巾，她的代表地位，她的整個政治興趣都束之高閣了，因為有一個男子第一次走進巴霞的生活中。她現在是捲髮如雲，衣履一新，塗脂抹粉，十分修飾，而還夢想着一襲好看的中國 (creme-de-chine) 新裝。

她現在完全成爲一個專心戀愛的婦人了，專門看歌劇式的小說，去看不好的外國影片。當我的朋友，她的主人到小廚房自己去作茶時，她總是看見這種景象：在鋪着精工的被單上，全付裝束，

高統鞋——差不多時常是有些醉的——睡着的是「他」那位空前絕後的。在牀的腳頭坐着的巴霞，她衣服整潔，手中拿着一本書。當我的朋友進去時，這個女孩只用眼一瞥，好像她主人不過是空氣一樣。這種情形對於主人是十分地不舒服，在這種時候，加利克時常吃不着常吃的麥粉布丁。

這時更是不能辭退巴霞了，因為恐怕她要求她的男朋友也要留住在那兒。

八個月後，我又和莫斯科的朋友在一起住。我看不見巴霞了，問起她來，據說當我上次走後，她宣布她不再作家庭工人，而此後要到工廠去做工，她並且要合她的伊發佔我在莫斯科作客時我朋友款待我的那間小屋。根據外國人不能永遠佔據合作社的房屋這個理由，這兩個人訴諸法院，但是他們敗訴了。因此巴霞只得與發乃克（Vanya）一同離開這屋子，她同時自己認出她是一個流氓而又是一個酒鬼，她若無其事地與那個男子過不幸的生活，但是她是不能離開他的；她顯得老而且憔悴，並且已經經過兩次墮胎手術與一次自殺。

自此以後，一個真正的悲劇似乎發生了，在她離開數星期之後，她又回來看她的舊主人，請教她在困難情形之中應如何處法。她的丈夫又帶了一個女人到她們所同居的屋裏去，並且告訴巴霞，他將來是與她或與第二個婦人同居，完全看她的行動如何而定。她來問問對於這種情形，「聽

明人』如何想法。玉麗阿·麥羅諾夫娜 (Yuliya Mironovna) 回答她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對第三者給以勸告，必須自己決定，並且她也決不同意如此一種安排。巴霞只得走了，六星期之後，她好像一個勝利者似地回來說：她留下了，她的情敵已經被迫而去了。只是不幸『他』成爲怙惡不悛的，而又經常不但將他自己的薪水，並且將她在工廠中所得的錢，一概浪費在飲酒作樂中。

數星期之後，當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時，她是默然寡歡，面色慘白，像一個影子在那兒動，臉上有許多青塊。她來與這家告辭，特別是來看她最要好的朋友加利克。因爲她決定回到她鄉下去，她說這話的樣子，有些不吉之兆。也許她自此以後不顧一切地找着了第三條道路。

但是假如廚房不社會化，則家庭社會化與婦女自烹調中解放出來了，還是不能解決飲食問題。已有向這一方進行的事，雖然還離得很遠。除了直到最近纔組織成的公共廚房，現在他們又建築大規模以機械來工作的飯店——『廚房工廠』(Kitchen factories)即所謂食物供給廠(Food Supply Works)在一九三一年時，全蘇聯的公共飲食的經營的數目，增加了五倍以上，其容量增

加了十六倍。自一九三二年尾，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與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家屬，都飲食於僱用五十萬工人的社會化的飯館中。與俱樂部一樣，這些公共飲食的機關，對於私人生活之廢止與新生活之發展，有不小的利益。對於這事有更大的貢獻的，就是公社（Communes），牠是新生活之真正的柱石，因此稱為新生活公社（Byt Communes）。牠們時常是單獨的家庭根據一種建設改變而成的，以下是一個婦女雜誌所得的建議：

在我們這一連房屋有一百組房間。在每一組房間有一個廚房和一個爐竈。在每一個爐竈上有兩三位主婦用四個到六個鍋在烹調。假如你計算每位主婦需要兩點鐘預備飯食，則共需六百點鐘，八十五整天，只一天就耗費在爐竈上了。假如二十組房間的主婦聯合起來，用兩三個人輪流烹調，則每人隔四五天纔輪着一次，其餘的時間就空着了。假如十二組房間只用一位主婦去買東西，則其餘十一人就可每天省下至少兩點鐘去魚貫而立。因此，魚貫而立的人就減少現時的十二分之十一，而實際上就可廢除這種魚貫而立的事了。因為這個理由，我贊成新生活公社。

莫斯科新生活公社調查之結果，知道公社之起源有種種不同的原因。除了缺乏住屋與希望得着較好的營養這兩種原因外，以前教育界與療養院居所，和因彼而生的習慣，都促進公社之組織。通常，最初目標是要創造新人類關係的「熱誠者的問題，而有時他們自己也不十分了解。」(Naystat, etc., Youth Communes)。

雖然如此，在蘇俄已經有了無數的工廠公社，這種公社在極短的時間由於先決條件如廚房，托兒所，洗衣房等之漸次設立而發展成爲居住或新生活公社。並且竭力宣傳，使每個共產青年團員與黨細胞都去提倡設立公社。

「所謂新生活之最高的組織方法」的公社，在已往歷史上不是沒有先例的。大戰前數十年，有許多農村公社根據托爾斯泰之樸實理論而產生於各處。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著作家斯來卜左夫 (Слычков) 在聖彼得堡組織勞工和居住公社，不過只支持了數月，因爲不久就引起軍警的注意。除此之外，充軍以及移殖到國外的俄國革命者，時常組織暫時性質的小公社，其內部組織與生活方式，都與現在的差不多。在這一方面，俄國現時的理論家承認歷史的連續——在他們

平時的實行中這是一個例外。

現在：新居住公社的生活，不但對於以個人原則爲至高的快樂之西歐人士，即對於大多數不屬於公社的俄國人，也是新奇的事。公社中，尤其在青年公社中，日常生活上流行一種休戚相關的意識，這可以說是達到一種新家庭觀念了。雖然許多公社已經不再採用社員將全部收入歸入公社經費這種辦法，並已放棄完全平等的原則，但是集合的性質無論如何是保存的，一切的財產都是共有的。每個公社有一本每日登記簿，以備全體社員登記他們的思想，經驗，和意見，總之，他們的快樂與悲傷。許多這種簿子上所記的，證明了在這以「掃除一切資產階級的習慣」爲原則的未來細胞中，財產觀念漸漸地消滅了。以下是這種簿子中的一段：

我將我的電鍋拿在公社中來，但是大家用時一點也不小心。因爲什麼我要拿來呢？

不過當他寫時，他就注意到他所寫的是財產心理之表現。他將所寫的塗去，懺悔地加上以下
的話：

我……我的……去吧……舊的東西……。在我們這兒，牆上的鐘也壞了……。在我們這兒，大家用縫紉機器時一點也不小心。在我們這兒，電鍋因為在裏面烤白薯而燒壞了。一切「舊時代之殘餘。」從前的僕人毀壞交付與他們的器具纔像這樣。不過這種事不應該發生在公社中。我們應當小心地用公共的東西。

公社對於同志之遭遇疾病痛苦者之扶持，非常感人：

麥奈亞 (Manya) 在工作時總是不快活。她是十分的沮喪。我們已經討論過這種不快活。她現時又高興了。

孫奈亞 (Sonya)

對於楊奈亞似乎有些誤會：沒有允許他入 V. D. S. (大學)。我們將要在星期五討論這件事。假如他之被拒絕入校是公正的，那我們就要注意他是未考上。但是，假如他受了不公正的

待遇，我們應當盡力幫助他，看這件事如何辦法。

科里亞 (Kolya)

在公社中生病是再舒服不過的了。沒有一個醫院可以比得上。在早晨，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安靜。有人輪班服侍你。不過這是應該如此的。公社中的社員應該互助。每人都盡力幫助病者，並對他說些仁慈安慰的話。任何人生病，我都要勸他到聯邦中這種最好的療養院去。在那兒三天之內準保完全恢復健康。

鮑利斯 (Boris)

另外有一個社員在每日登記簿上寫下最後的話：

公社現在的任務是要替鮑利斯在療養院找一個牀鋪用兩月。在莫太亞 (Motya) 恢復康健時，我們非常關心她。有一次我們看見她在擦地板；我們跑去止住她，嚴禁她以後再作這種事。我們跑開了，自窗戶中看着她是否還在工作。她像我們的姊妹。我說姊妹嗎？她是遠勝於此。我一點也不知如何說法了。公社中之親愛的分子。在那種撫愛中我們得着如何的一種快樂啊。那簡

直令你成爲另一種人了。就好像有一種光明在你內中放射。因此我們彼此相望，而不信我們的眼睛。像這樣的生活是不可能嗎？是的，我們就是如此生活的。

我們覺得一種新的家庭觀念正在發展，在別處只有對父母的家庭觀念纔能與此相比。由於遠離或因故脫離公社社員之來信，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總是寫信給全社的人，而所用的體裁是別處寫與最親近的人纔用。有時從前的社員送錢與公社家庭。例如莫斯科公社的公共每日登記簿上有一筆一百八十盧布的記載，那是愛麗娜（Лина）在暑假中得機會掙來的，她立刻就送與公社。社員都很感動，以爲愛麗娜應當用那筆錢去吃點好的並且修養一下。不過暗地裏他們對於這種「精神上的結合」之「鞏固」是非常地高興。

當讀過這些實例以後，對於在這種「重造人類靈魂之工廠」中發生了一種新關係的這種事實，是不會驚奇的了。對於我們，實際的問題是關於婦女在這已經達到新生活的相當程度之公社中的地位如何，以及公社中的男女關係如何。關於這兩個問題，社員自己會解說：

莫斯科的工廠公社中人述敘說：「對於我們，婦女們第一是自舊有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第

二，我們使她們也專心從事於生產服務。從無數不關重要的日常生活瑣事中解放出來，以及經濟自由——這不是真真的解放嗎？在公社中，就是「主婦」一辭都是不採用的。在我們之中，只有工作時間固定的家事專家，廚師，清潔隊，或者生產的工廠工人。沒有第三種。我們之中有一位最近娶了一位「天生的妻子」(Born Wife)：她什麼也未學過，也未在工廠作過事。我們在工廠中替她謀得一個地位，而使她去學習。她後來自一個「妻」(Better half)一變而為「一個完全獨立的人類。」

在青年公社中，男子與女子輪流擔負每日工作，在有的公社中，你也可以看見男子與婦女一起做家庭事務。

蘇俄的人民，認公社不但是未來家庭的模範，並且是由新生活以及其先決條件而生的未來兩性間之關係的模範。關於這一點，我們引以下的一段：

公社非常反對任何種無規律的性關係，並且不容淫亂的談吐。假如你問他們在青年公社中兩性間的關係如何，則青年社員會回答你：「我們同住在一起，社中男女彼此保證對方的生

活。這種生活一方有一種莊嚴的效力，另一方牠使相互間的關係簡單化。自然，也有純粹的同志關係起了變化這種事。——公社不能將所有的分子立刻改造過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他們加入公社時大半是成人而非兒童。假如公社中的男子尊敬他們同志的意見，並且不容對於女子有一種無價值的，非同志的接近，則他們設法將他的愛轉變到社外去。

公社中的婚姻問題在原則上似乎已經解決了。極端主義的事件如已婚夫婦必須分居或男女必須同房，是很少有的，並且為整個公社所非難。結婚與小孩——碰巧有時談到——決不應損及公社的公共經濟基礎。這個原則在對創造新家庭之影響中，是非常重要的。從前資產階級家庭之經濟基礎已經毀壞無餘了，加以婦女之加入生產與社會生活，這種過程進行得更快。新生活以及新家庭之能否發展，完全有賴於必要的經濟條件是否能完成。因此，根據社會主義的基礎而論到一種完善生活之復興，還非其時……我們起始建設社會化的生活的基本條件：公社是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模範。甚至現在，公社中的婚姻還是與別處的婚姻不同。因為牠代表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婚姻，其中經濟的聯繫，在夫妻之互相關係間，不再佔一個位置了。兒童的問題其情形亦相同——雖然公社中直到現時對於這件事的經驗很少。在最初幾年，因

爲物質的原因，公社不希望有小孩。不過現時已經有許多公社兒童了（Nastat, etc., Youth Communes）。

有一件事是已經證實：所有的公社，在牠們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中，是牠們自己的小世界，新生活中之實際的新東西，很明顯地已經具形了。除了婦女在社會中之地位外的確是人與人的關係，男人與女人的關係，在今日的公社中產生一種新印象。自然，只有未來纔能證明這種事是否是一種沿着前進的路線而不停止的進化的過程。

三 阿爾泰金納婦女公社

「一隻母雞是禽類，一個婦人是人類。」

在前一節中我已簡略敘述了公社與婦女在工廠，居住和新生活公社中之地位。在蘇俄有的公社不但飲食居住，就是工作生產都社會化了，這就完全是新形式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社。我們對於這種形式感覺最有興趣，因爲其中之一的「婦女公社」聞名全國，這個公社起初沒有

男子，現在還是很少。

當一九三〇年之秋我在莫斯科時，聽見有人說起這個差不多是傳奇的公社——在北高加索的一個地方，鄰近頓河的羅斯托夫。——我立刻就想去，以便探訪這描寫得空前的公社。但是冬天已經來臨，人人都勸我不要在冬季去作這並非易事的旅行。

差不多有一年，我對於這「母系制度國家」(matriarchal state)總是念念不忘，甚至在莫斯科的農村當局，都找不着關於牠的消息，只是在給我方便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的會議記錄看見一點。你要知道俄國是非常之大，而這個經營又是新起的。

直到一九三一年夏我到了頓河的羅斯托夫，問到這婦女公社，纔知道一件事，「阿爾泰金納公社」(Antyukhina Commune)與薩爾斯克(Salsk)城很近，自羅斯托夫八九個鐘點可以達到；甚至在這兒也沒有人可以將詳情告訴我。

薩爾斯克，地處南俄大草原中——並非那許多到俄國來旅行的新牌(Brand new)的西歐人在未邁過波蘭邊境之前所看見的草原——這是一個可愛的，徹底受了文化的，純俄國的州鎮，住民多半爲哥薩克人。一個美而暖和八月的一天午後，我帶着我的介紹信件與希望，出現於地方

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之前，他們立將我到彼的消息以電話通知婦女公社，回頭告訴我一點鐘之後有車來接我。同時在彼處的唯一旅館中爲我定下一間小而清潔的房間，因爲節省時間起見，我決定出外小步，以觀察市面。

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是我在莫斯科，列寧格拉德和全國任何處的街角中很熟知的佈滿報章雜誌和領袖像片的架子。自然此處人也看『普拉夫達』報和『伊斯維斯提亞』報。不過他們又看羅斯托夫莫洛特報（Rostov Molot），自然，本地至少有一種自己的報紙。薩爾斯克還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一如我從前之在羅斯托夫以及後來之在提夫利斯和一切高加索的地方一樣，就是街上男女之穿白衣者甚風行——這是一種好的舊俄國風氣，現在的大工業城市中已經沒有了。紅的頭巾配上哥薩克婦女的白衣服是非常的相宜；她們差不多體格都很好，大多數都有漂亮的皮膚，黑色的頭髮，緊張的藍眼睛；在北高加索，你也可以遇着這樣的男子；他們是美麗的民族。在薩爾斯克，草木並不多，這種色彩之配合，像稻田裏的能行走的罌粟花，實在是壯觀。索羅科夫（M. Sholokhov）的小說『靜靜的頓河』（The Tranquil Don）（有中譯本——譯者註），描寫哥薩克婦人如下：一種熱烈的民族，雖然受了多年的壓制，但是她們還是以一種百折不撓的

意志與精力以保持她們自己的特性；她們的生活因為受了戰爭、革命和「反哥薩克化」(Anti-Cossackizing)——馴服她們暴烈的民族性——之影響而起了一種強烈的變化。

這個公社是因為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的領袖而取名叫「阿爾泰金納」(離鎮一哩多，位於頓河支流耶哥爾里克河 (River Yegorlyk) 之峭峻的岸上。當你未渡過那一半已浸入水中而走在上真有生命危險的筏橋之前，就看得見散開的白房子。

在今日公社所在之地——與國有農場「吉干」(Gisant)相離不遠——當五年前只有一個荒山，山之附近，有一個所謂「機械合作社」(machine co-operative)，其實只有七家農戶，而沒有一架機械。一九二九年冬末，正是集體化問題在俄國興盛之時，一百左右薩爾斯克州附近村中的單身婦女，不願再替別人的農場作日工，又受女工蘇羅金娜 (Sorokina) 之鼓動，帶着她們的兒女聯合起來，並決定組織一個她們自己的集體農場，由有實力的村蘇維埃幫助，給了她們一片土地；她們大部分本身是晝工，貧農婦，已死共產黨員的母親與妻子，其中有許多是哥薩克人與烏克蘭的混合種族。一九二九年五月一號，這個「阿爾泰金納公社」就正式成立了。這些婦人所帶來最重要的資本就是她們強健堅硬的雙手，此外還設法聚集了五千盧布。原來在彼處居住的七

家人戶——公社一起始就與他們聯合——不久就離開了，因為他們不願意整天盡與婦女起交涉，並且那個集合農場又是一個婦人的名字。

所留下的婦女，幾乎都是餐風宿露，後來纔住在空倉與牛欄中。公社主席蘇羅金娜僱用了兩個幹練的工人，公社人員的堅難困苦的生活，以一個曳引機，兩匹駱駝，三架收割機，兩匹牛而開始了。不但三百五十公頃（約八百六十五畝）的地與十二公頃（約三十畝）的菜園必須在這荒蕪乾枯的草原上開闢出來，並且還要燒許多磚瓦以爲建房過冬之用。這些婦女的功勞不小，她們日夜不倦地工作，以期逐漸集合她們事業所需之物。其中有不能在長期中忍受困難者，多半離去。不過有五家原來離去的，在這年秋天又回來了，所損失的人數因此恢復。起初這個組織原定爲純婦女的公社，並爲訓練集合農場女工的實例。不過正當普遍集體化之時，她們只好放棄原來的排斥性，所以在一九二九年秋，公社中的一百六十八人中有十八個男子。

在這新成立的婦女或「寡婦集體農場」中，那些勇敢的婦女不但進行困苦的純物質鬭爭，並且還要與其他許多方面鬭爭——反抗毀謗，仇視，疑嫉，反抗對於這空前的婦女事業在附近所傳的可怕的妒忌的謠言；這確是一個困苦艱難的奮鬥。無產階級作家麥斯萊科夫(Merajakov)

在他至今還未發表的作品上，描寫這種普遍的現象非常生動：

她們都不睡。有些人在新興的集體農場中查出了一個誓不兩立的仇敵，而無數陰險的謠言像毒蛇似的自附近村中爬來。

「你聽見了嗎？」

「什麼？」

「什麼？就是關於集體農場吵架的事呀。」

「好，現在！」

「她們如何地彼此攻擊啊！她們如何地彼此打罵啊！簡直是有些可怕。她們第一位主席蘇羅金娜的頭髮全被拔落了，在她的眼下有很大一片傷痕，以至她一年之內都不能去掉。在此次爭吵之後，集體農場的人走了一半。」

後來有人遇着蘇羅金娜，不免偷偷地看她，但是看不見任何傷痕，十分驚奇地說：「他們造什麼謠言，那些畜生！」

但是可怕的謠言每天都有。「這公社拿去你的小孩，使他們反抗基督教。魔鬼的符號印在他們身上。」在四週七「團」(Verst, 1 Verst = 0.6629 Mile) 之內的農人，都避開這婦女集體農場。

「他們在外散佈我們卑陋的謠言，」蘇羅金娜的兩個助手之一莫幾納(Mogila)如此說，他並以下面有趣的故事解釋這一句話：「我要到離此三十「團」的耶哥爾利克村去買馬。當我在市上巡望時，看見一些農夫農婦圍着一輛貨車站着。其中站着一位莊嚴白髮的老者，他正在談我們的集體農場。我想我應當去聽聽。因此我擠進去站在老者的旁邊；我往下聽，我還以為我的耳朵靠不住。

「那不是什麼集體農場，而是一個賊窩，一個罪惡之窟，我的天！」這個老傢伙說，一邊吮他無齒的嘴唇以作聲。她們都睡在一條七十碼長的被下，婦女就是公共的物產。假如一個男子在頭一夜睡在這頭，第二天早上在另一頭爬起來。這樣的事……！」

「談下去，談下去，」我自己如此想；「我聽他再說些什麼。」

「但是當這老頭兒看見那些農人在聽完他的話以後，都目瞪口呆地以手畫十字並喃喃

騰告，他自然火上加油地說：「她們那兒最年長的男子名字叫莫幾納，他一下就得着十二個妻子……。」

「於是我實在忍無可忍，問這老傢伙說：『你看見過這個莫幾納沒有，老頭子？』我怎能不看見過他呢，我的孩子？我至少也看見過他五次了。一個粗大漢子，樣子像個篩子，眼睛在頭上跳。」

「假如你遇着他，這個莫幾納，你會認識他嗎？」

「我會認識他？我發誓，在半哩之外看都認得出。」

「真的嗎？」

「我可以發誓！向着聖像！假如我說謊話，我一世就黏在這兒。」這個老頭拿下帽子很熱誠地畫十字。

「你是如何地一個造謠者啊，老頭子。我就是莫幾納。」於是我自袋中拿出證明來給大家看。

「你簡直是一個流氓，老頭子，因為什麼你要撒如此可惡的謊，你這老匹夫？」那些農人都對他咒罵。他眼睛瞋着，鼓着鼻子，不知回答什麼好。

「這是真的，」他終於想起話來了，「不是我親眼看見過他，而是我們村中一個正當，有錢，尊貴的人，並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他在那兒……。」

「這次圍觀的農人與婦女都笑了，還未等他故事說完，都笑得直流眼淚，那個老頭子擠到人叢中走了……。」

穿着黑青色高領的俄國 *Kobsovorka* 裝而像男子，又有好看的短髮的公社書記馬拉細阿，與區黨部的書記一同招待我，因為公社主席基波達麗俄娃（*Chebota'yova*）到莫斯科去了。她告訴我：「現時我們社中共有六百七十八個人口，其中四百二十四個是女性，二百五十四個是男性。他們之內有二百二十五個身強力壯的婦女與一百十個身強力壯的男子，其餘為小孩與老人。我們有耕地二千八百公頃（約七千畝），六十七公頃（約一百八十五畝）菜園，三公頃（約七到八畝）果園，六百頭牲口——一百多匹馬，八十頭乳牛，二百七十隻羊，百多隻豬，十二隻駱駝，十八隻牛——和五架曳引機。」

我又得知整個公社的工作由五隊分工合作，每隊有自己的委員會，有自己的區黨部，有常常

是論辯而同時又是政治的無所不載的壁報，並且都有自己的鄉村通信員。其中有一田地工作隊，一牧畜工作隊，一菜蔬培植隊，一手工隊，此隊擔任修理曳引機，鐵匠工，馬具工，木工，鞋工，縫工等。此外還有一個磨坊與一個特別磚瓦廠，公社現時的基本專門技術是養雞。她們專養一種雪白的「累蒿痕」(Leghorn)，所有的這種雞養在十五個雞房中；共有六千頭，每一羣雞在這寬廣的草原上，就好像一個巨大白色而能行走的島。到秋天時以三分之二交付與國家，其他三分之一留待冬天。依據五年計劃，在一九三二年又建造了六十個雞房，在一九三三年，以美國孵卵器孵出了十五萬小雞，二百萬雞蛋，約一萬良好種類的雄雞以使母雞受胎。

我問社中男女社員如何在一起生活，區黨部書記塞內科夫(Спереков)同志回答如下：「我們覺得好像是一個家庭，這一句話就夠了。」公社有一所簡單清潔的房子以備結婚夫婦之用，其中房間是按照人數分配，還有兩所房子為一百二十個單身男女之用，男女各一。此外自然還有一個廚房，由婦女管理，一個麵包房，一個洗衣房，和一個蒸汽浴室，都是用電機工作，飲食是在公共的飯廳用，當我被請於留薩爾斯克期間在公社中用飯時，我到後的第一晚，就在那兒看見飯碗堆集如山，裝着麵粉與發酵牛奶作的布丁，上面傾有一層乳酪，厚得差不多拿刀子都切得下來。尾食品

是多汁深紅色的西瓜，他們不給我飯單而給我一塊繡着十字花和沿着透光手工花邊的俄國鄉下布，那種布歷來是用以掛在聖像之下，而現在應該放在古物陳列所的。

社中每分子仍舊還是要爲三個人工作，時常連休息日都不顧，因此每秒鐘都是寶貴的，中飯是很匆忙而又不豐富；只有點湯，幾薄片瓜和麵包。很少吃肉。小孩與成人分開吃，成人限制他們自己而使小孩吃多些；小孩們吃的是最好的，最衛生的食品，看起來他們是非常活潑而營養充分。有的人在她們工作的地方吃東西，其餘的人因爲桌椅不夠而分成兩三班吃；男女老少都在一起，空氣一方是快樂而同時又很莊重。

她們談到已完成的和仍在進行的工作，談到正在建造社中得意的冬季存物的秣草保藏室，談到新俱樂部，談到可以容五百人的住房，和正要開工的大牛棚。她們對牧者咆哮，因爲他在草原中遺失了一隻駱駝。她們又談「同志法庭」(Comrades' Court) 談斯蒂彭(Stepan)昨日在那兒受了公開的責斥，因爲他損壞了機器的一部。她們一再很高興地告訴我如何起初附近的人們對她的譏笑，他們拍她們的窗戶，向她們說些不可忍受的辱罵，如何每人都對她們開玩笑說：「一個雞場？你們和雞一起作什麼？」又告訴我如何養雞部證明了是最生利的，如何公社的信用在短



Chicken Yard in the Women's Commune.

婦女公社中之養雞場

期間增加得很快，如何別的農場從她們那兒請專門家，又告訴我關於這新興婦女農場之流行而又與起初相反的口頭語：「母雞也是禽類，婦人也是人類。」

文盲在社中已剷除了，並且社中有一種熱烈的文化生活。因此，爲半文盲與程度高深的學生都備有課程，還有爲婦女的特別集體農場學校，由婦女管理，三年畢業，在理論與實際上訓練集體農場中農業各部門的管理與組織的人才。特別熱心的學生二年即可畢業。在公社中，自然也有置滿報章雜誌的「紅角」，又因爲婦女要求的書漸漸增加，所以正在計劃設立閱書室。白天人人作工，一到晚上，尤其是冬日的晚上，人人都在公社中讀書，繼續讀書；以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

在那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放着一排一排清潔的牀鋪的女宿舍中，一位好脾氣約四十歲的農婦——我發現她於白日的疲倦工作後正在低頭看書習字——對我說：「自我們開始讀書以來，我們纔算是開始生活。」第二天我在公社中看見一件事，我一世也不會忘。當我和馬拉細亞一同走過那些離開好幾里的田園草地和工廠雞房時，最後到公社最末端的孤立部分，我看見一個並不十分年青的哥薩克婦人，坐在雞羣中在看守雞，赤足，頭上一條頭巾；她有一本練習簿和一本拼音書，在工作中，她一邊讀一邊寫，手上有一枝鉛筆。這個青年擠牛乳的婦人芬奈亞（Fenya）對我

說：「我原來在一個富農家作了十二年的事，一個字母都不認識。我甚至連十哥裴克與五哥裴克的錢都分不清。而現在……。」芬奈亞滿臉通紅，拉拉她的頭巾，以她清亮的眼一半偷偷地看我一眼：「現在我已寫了點東西寄到羅斯托夫的報館去了，不過還未發表，但我也還未得着回信呢……。」

這兒有多少像這芬奈亞這樣的婦人，她們都工作，讀書，而漸漸了解她們的人性呢……「婦女現在是在活動了，」克盧普斯卡亞有一次曾在婦女大會中這樣說。

除了成人學校之外，「阿爾泰金納公社」還有一個可容約五十名的托兒所。其中有二十名是「公社中之當然社員，」她們並帶一種驕傲告訴我，不久他們的數目就要增加八名。並且還有一個可容五十人的兒童運動場；這兩處都在受過訓練的人才管理之下。

公社對於所有兒童之飲食一如成人，父母可以將他們的兒童完全留在托兒所中，或者有時帶回家；無論如何，他們一些也不覺得累贅。

公社中自然也有無線電，在自己沒有電影之前，城市的電影每星期過河來兩次。據說，不久以前公社有一個二十七位婦女的風琴隊。領隊也是一位女的。但是，有一天她的丈夫紅軍兵士回家

了，帶走了他的馬霞(Masha)，全體樂隊只好解散了。除了必須的手風琴之外，現在只有一個有二絃琴，六絃琴，琵琶的樂隊。青年人——都是共產青年團員——自然都喜歡跳舞唱歌；他們發起許多遊戲，『活動新聞紙(living newspapers)』，研究和工作等，並且彼此服從。『我們這兒完全沒有離婚的事，』活潑的馬拉細亞告訴我，她以一種特別姿式往後仰她那強壯的頭。『但是有許多結婚的。』甚至有有的女子因婚姻而離開公社：『假如她愛上城裏的男子，讓她和他結婚！爲這事，她可以得休假一天。』不過在已往一年中，公社中有六對結婚的。

在我到後數天，公社中婦女請我出席她的區黨部會議。我看見我那些新知，圍坐在一間中等大小房子內的桌前，房中的坐位不夠，後來的四五十人沒有地方坐只好坐在小腳凳上或者坐在地板上。男女都在一起，我又被我在公社中已經看見過好幾次的事引起了注意：就是男女之間與老幼之間的懇摯親切的快樂舉止——只要是必須的話，他們如何地讓位子，如何地彼此相助啊。這都應歸功於婦女之教育與文化的影響。

議決允許幾個新黨員入黨，包括未出席的基波達麗俄娃公社主席在內。賽內科夫同志領導會議，他的代表人很簡單地報告預備黨員的已往的事業，此後再討論贊成與否的問題。因爲只有

出席者差不多徹底知道的分子纔提出來，所以很少有反對的。「一個好女孩子，還要討論什麼，」一位婦人善意地說。一個婦人隨便提到基波達麗俄娃是哥薩克種，不能認爲是絕無問題的無產階級，她得着以下鄭重的回答：她的祖母是否是坐鋪店的，於我們毫無關係；我們只知道她是頭等的勞動者，和能幹的管理人。」

「阿爾泰金納公社」自然是包括在五年計劃之內的，因此，不但所有的挺進隊，小分部，小團體都以急進的速度作競賽而又彼此竭力幫助，甚至十二人團與個別的雞房都彼此競賽。「列寧路」集體農場（在佛爾加河下游）在「普拉夫達」報上請求加入社會主義的競賽，婦女公社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此社成立不到一年——的Molot上發表她們的回覆：

「列寧路」集體農場的男女同志！在你們的請求書中，你們說你們爲集體農場經過一場偉大的奮鬥；你們寫出來你們的成功與缺點，並請求全蘇聯的集體農場分子告訴你們關於他們的工作。我們響應你們的請求並回答如下。

去年五月，我們組織了一個農業合作社「薩爾斯克。」不過在同年十二月，我們採取公社

的形式，而以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長之名阿爾泰金納名之。我們的合作社差不多完全是由女工與極貧的農婦組織而成。

公社忍受了許多不幸。一般人都取笑牠，因為牠是一個婦女公社。外面宣傳我們許多醜惡的謠言，人人都說女人的公社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因此，起初生活是不甚容易的。我們沒有住處，一百七十八位婦女與牛一起住在牛棚內。雖然我們受盡堅苦而我們的仇敵又盡力摧殘我們，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退縮。

我們農場的基本成績如下。這些表示我們的鄉村合作社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所有的是什麼，與現在我們公社中所有的是什麼。在從前我們只有七十八個人，到一九二九—三〇年我們社中就有六百二十六人了。其中一百六十五個男子，二百零四個婦女，二百五十七個未成年者與兒童。社中有九十六家勞工家庭，七十家極貧農民，四十家中貧農民。

以下是關於牲畜與耕地之詳細的記載；接着敘述如下：

因爲要以積極的速度進行春季工作，我們與「理想」公社與「別寧遺賜」公社訂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競賽，我們以組織挺進隊的方法來遵守這個競賽。公社中的全體婦女都放棄了他們的休假日，在復活節都不休息……。

我們種了五百株水果樹，三萬八千株桑樹以爲養蠶之用。當播種時，我們組織了一個「文化隊」，牠擔負全草原的文化工作……。

我們婦女之中有三位入農學院，有一位在研究電影事業的機械學，還有幾位在研究別的課程。有二十多位女學生在我們這兒研究家禽飼養學。

我們社中的主席是一位婦女，除了耕種部是一位男子外，其他每部都是女指導員。我們從城中僱來了三個男工人，他們對於我們很有幫助。我們要謝謝勞工階級以他們最好的代表來幫助我們的公社與集體農場。

夏天我們工作十小時，冬天八小時，凡研究人員只工作六小時。按照每人所屬的隊而預先分與衣服及其他物件，食宿則由社中設備。老人與兒童完全由社中供養。

這一年之中，只有六家離開了我們，因爲他們不慣於集體化的工作與集體化的生活方式。

我們在薩爾斯克是第一個做完了播種工作的公社。我們得了一架曳引機以爲獎賞。

同志們，現在我們響應『列寧路』集體農場的男女同志之請求，轉過來我們要喚起所有北高加索的公社與集體農場以響應『列寧路』集體農場與我們『阿爾泰金納公社』之請求，爲春耕，爲集體農場與公社中工作之組織，爲收穫，而加入社會主義的請求。

在我定了要走的那一天，我得知阿爾泰金納自莫斯科回來了，並在食堂中候我。一位強健，高大，黑髮的中年婦人仁慈地歡迎我，她穿着黑色的衣服，神色聰明而幹練，眼睛青亮而靈活，看起來好像還很年青；她立刻開始告訴我許多消息，好像她要對我彌補她不在那幾天的招待。

「我們婦女現時是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她在談話中鄭重地說；「她們每天都有她們自己特別的計劃。她們正在建築自己的生命，並且很清楚地認識什麼是她們所需要的；你在我們公社中所看見的一切，都是艱難困苦與嚴格組織之結果。此地的天氣是溫和而又宜於衛生，所以我們終年不息地工作。不過如『薪金，』『收入，』『工資，』等字，在我們之中是不用的。社中管理委員會由七人組織而成，其中有五位婦女。絕對沒有婦女對於男子不滿的事，也沒有男子拒絕幫助

婦女的，總之是沒有一點意見不合的事。人人都保守他的地位，盡他最大的力量，並且完全明白他對於社團的責任，婦女的影響如何地提高了道德的標準，這是很可驚奇的事——有一個積極的爭取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雖然離城很近，並且有許多引誘，但是社中完全沒有酗酒的。你從來聽不見輕佻的話，老年人是「集體農場中的老戰士」（其中有幾個婦女，她們在河上鑿冰，以期爲社中獲得些必需品）他們是特別受青年的崇拜與尊敬。我們的確對於新分子要細加考慮，拒絕了許多人的要求加入，因爲我們的房子不夠。」

她最後告訴我，這個受了列寧獎章的婦女公社是已經盡人皆知了，一九三〇年一年中就有一萬八千人來參觀，其中有許多外國人——美國人，德國人，蒙古人，和黑人——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薩爾斯克區三百婦女代表，在此舉行一個集體農場女工大會；有許多演講以及改良的建議。不久以後，婦女牛車旅行以參觀「阿爾泰金納公社」之舉開始了，有一天有四百從高加索來的山居婦女來了，她們首先要求看她們所聽見說全體社員睡在一起所蓋的那條長七十碼的大被。聽說那不過是一種謠傳，她們也表示無限的驚異。但是當她們很詳細地看過社中的一切時，她們充滿了熱誠而願留在社中。

當我向基波達麗俄娃，馬拉細亞，賽內科夫和全體社員告辭時，已是黃昏時候，那很熟習的大院子因為落日的反照而點綴着玫瑰色。一輛裝着很多鮮草的大車正往裏走。一羣擠奶婦女提着奶桶正從日夜在外食草的牛那兒來。雞已就埕，靠雞園的那邊，有三十個青年婦女正在整理一大堆黃芽菜以爲明日中飯之用。空氣清明而芬芳，已有秋意了。草原一望無際。天邊只有地平線，不知從何處送來一種快樂，少壯，無牽掛的滲雜遠方曳引車叮噹的笑聲，同時從另一方面傳來一種淒涼古調的悲歌……。

向小耶哥爾利克河的那邊一望，那實際存在而非烏托邦的蘇俄，那已見光明的「偉大母性之島」已沈入夜色中了……。

深夜中，我乘火車回返頓河的羅斯托夫。我非常幸運：全部位子都是空的，我馬上就睡下了。清早，我被一個溫和仁慈的聲音喊醒了。我張開眼睛。收票員站在我前面，穿着潔白的制服，一條金屬錶鍊，一個口笛掛在胸前；他和善地對我笑，並問我要票，我很驚奇地發現他頭上有一條紅頭巾，原來並不是一個男人而是一個女收票員，自然，我馬上就與她交談了。車差不多要到站了，但是這個哥薩克女人馬麗亞見我很有興趣，匆忙而高興地將她的一生簡單告訴我：她現年五十一歲，住

在薩爾斯克城裏。在一九一九年丈夫死了，她一人孤苦地帶着三個小孩。假如在從前，她除了乞討過日外別無出路。但是現在第一樣她作的事就是去讀書寫字——她原來是不識字的——立刻她就好像「年青了十年。」小孩不久就安置在別的地方，她們也學了一些東西。她在鐵路上找着一個位置，在那些年中，她存儲一些錢，雖然沒有丈夫，她也能備置一個小房子。「而現在，」她說，「時面有得色，」我有一個女兒是農業專家。還有一個在合作社做事，第三的女兒是區黨部的書記，我也是一個黨員，每星期爲黨作三天的工。不過我主要的職業是讀書。再嫁啊，不！我不再找罪受了。我這樣生活很快樂。我現在借郵務課程之助來研究學問，並且竭力設法使我自己再受些教育。我研究什麼嗎？黨的科學和地理，化學。我愈看關於化學的東西，我愈想知道得更多些。現在我知道什麼是達爾文主義了！但是我直到四十九歲還一點也不知道牠，還以爲人是上帝造的。我對於四世紀的羅馬史也很感興趣……我願意研究任何事，知道任何事……我好像一年比一年年青……」

我想馬麗亞一定願意往下告訴我關於她如何由開始讀書而返老還童的事，一如我之願意聽一樣。當她說話時，我不僅想到她一個人的歷史，並且連帶想到無數口述筆寫的俄國婦女生活

史，還想到許多我不知道的人。當火車到了羅斯托夫我和這婦人熱烈地握手告別時，她發展到一個個人的進程，成爲全歐陸的婦女發展到人類的徵兆了。

結論

每個作者都是以推測未來結束他們的著作。假如我要隨俗的話，那我不但必須回答蘇俄婦女是否在前進這個問題，同時還要回答在俄國現時所處的震動全世的歷史事件中會發生如何地一種結局這個問題。不過我覺得不是我不能回答這種問題，而是不需要。

我已經竭力使這本書盡可能的避免爭論之點，現在我要討論外面對於蘇俄婦女地位的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起源於已往有關婦女社會化之反布爾雪維克宣傳的謠言，不過現時又以一種新形式出現而謂蘇俄婦女所受之混亂較勝於其他各國女同胞。我們不必再說到這個問題了，因為我這本書中就是反駁這種不嚴重的謠言的。

其他的一個假定更是有趣了。因為鑒於俄國婦女勢力之日漸增加，以為俄國已經走上一種母系制度的國家（matriarchate），甚至以為是女性統治時代之發端，這實在是空前的事。的確，自從處在歷史進化暴潮中的蘇俄婦女開始佔據了她們的新領域後，她們就成為人性與精力之偉



Turhoman Mother With her Child.

突厥人母子



Tatar Women Learn To Write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鞑 韃 婦 人 與 其 子 女 共 同 習 字

大的淵源，有了這種人性與精力革命纔能產生，纔能長生不老。婦女影響整個的生活，以她們卓絕的舉動並且可以形成新式生活，因為沒有一件事是不需要婦女的——反對她們是更少——婦女與兒童在公共福利中所佔的不但是重要而且是一個中心地位。在聯邦中，婦女所用以得到地位——十月革命使她們易於成功——之巨大的精力，引起了一種我們時常聽見的怨言『被婦女攻擊 (assault by the women)』。

雖然有這一切情形，但我們仍不能認為如開瑟林 (Keyserling) 引用到北美合衆國上那種意義的『母系制度國家』為對。在蘇聯的地位範圍 (sphere of being) 中，並沒有一種等級之分，而以『分極的原則』 (principle of polarization) 假定為婦女獲得一個權勢與支配的地位以超過由功績來評判的男子。反之，俄國是由『功績的等級制度 (hierarchy of achievement)』統治着，根據一個一致的原則而創造整個的生活，無論男女，按照他或她的功績而估計他或她的價值，而功績又是按照其社會價值而定。這個等級制度之所以包括婦女在內者，不但是因為她們的母性與育兒工作是有偉大社會價值之功績，又是因為她們參加各種生產；這完全要靠她們自己的能幹與精力，她們之能升到那一級，那完全要看她們的功績而定。假如男女兩性的地位是以

一個共同的標準來定的話，則無論如何已往的偏見在某種的情形之下保存其勢力，一方支配另一方的事，是絕不會保持長久的。

再者，像開瑟林那樣在俄國民族史中只尋找父系族長政治制度的成分，而認「布爾雪維克主義」爲這種父系族長政治制度國家之特殊的產物，這也是一種錯誤。反之，我們雖不能自俄國民族發展史中尋着母系制度的遺跡，還仍舊可以在基督教俄國中尋出一些未消滅的痕跡，一如我在這本書中首章所指出來的。

總之，要說「婦女獨裁代替無產階級獨裁」之發展是仍在演進的父系制度之不斷的發展，這是過於武斷了。我們無寧應該考察實際。這就是說，在蘇維埃國家中——與西方男性片面的文化確是極端相反的——在歷史上發生了新的東西，一個完全根據兩性平等的社會，在演進的過程中，是愈來愈豐富，樣式愈多。只有婦女有一天不能在無偏向的等級政治中佔據她們的地位時，纔會回返到父系制度與男性統治中去，唯一根據事實的問題也許有這種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中，我這本書簡單地是一個有事實爲證的反面答覆。

這本書中所包含的積極的理由是什麼，讀者應該判斷。我自己認爲這是關於全球有歷史意

義實驗的一個過渡情形的報告；是一個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嘗試，而又是根據兩性有平等去改造我們的生活之實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版

蘇俄婦女一冊

(34241)

Woman in Soviet Russia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原著者 F. W. Halle

譯述者 蒲耀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possibly a stamp or signature,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